

● 大型文化期刊《黄河》随笔精品 ●

【珍藏版】



林贤治 邵燕祥 李新宇等著

思想的时代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大型文化期刊《黄河》随笔精品 ●

【珍藏版】



思想的时代

林贤治

邵燕祥

李新宇等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时代:大型文化期刊《黄河》随笔精品/林贤治等著 .2 版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9

ISBN 7-80626-488-4

I. 思… II. 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54337 号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38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80626-488-4/G·208

定 价: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黄河》杂志是由山西作协主办、著名学者谢泳先生主编的大型文化期刊，在中国文化界享有广泛盛誉，尤其是2000年第一期刊登了林贤治先生的代表作《“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的长文后，令中国文化界睁大了双眼。

本书精选了近几年林贤治、邵燕祥、单世联、李新宇等先生的发表在《黄河》杂志的代表性随笔，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忧伤的年代

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思想的时代

大型文化期刊《黄河》随笔精品

世纪论语

《文艺争鸣》学术论文精品

今日思潮

《北京文学》随笔纪实精品

边缘思想

《天涯》思想随笔精品

边缘感觉

《天涯》中短篇小说精品

边缘纪录

《天涯》民间语文精品

风雨敲书窗

《博览群书》百期精选

守望灵魂

《上海文学》佳作精选

天火

《书屋》杂志佳作精选





经典收藏

林贤治 《“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单世联 《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赵振先 《今天》忆往

邵燕祥 《避席畏闻篇—读书札记：文字狱传统在当代》

李新宇 《“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5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ISBN 7-80626-488-4



9 787806 264881 >

ISBN7-80626-488-4/G · 208

定价：20.00元

目 录

第一辑 霜打胡风

- 3 林贤治 “胡风集团”案
——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 58 伍 宇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 79 单世联 告别黑格尔
——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第二辑 诗在民间

- 119 李恒久 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
- 134 赵振先 《今天》忆往
- 155 齐 简 飘满红罍粟的路
——关于诗歌的回忆
- 169 邵燕祥 避席畏闻篇
——读书札记：文字狱传统在当代

第三辑 恩怨沧桑

- 185 章立凡 章乃器在1957年
- 212 李硕儒 无名氏生涯记略
- 245 李新宇 “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
——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 266 姚青苗 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

第四辑 “红楼”风雨

- 289 蓝翎 四十年间半部书
347 李希凡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关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辨正
384 宋谋瑒 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第五辑/尘埃落定

- 423 黄昌勇 寂寞孙大雨
433 张耀杰 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
476 王芝琛 两极决斗争中的《大公报》
485 王芝琛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495 智效民 王芸生的悲剧

第一輯

霜打胡风

□林贤治

“胡风集团”案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以敢于让自己触礁而言,他们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因他们而得到指正。通过他们,我们对某些事物察觉到紧密的关联,这个关联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就永不能察觉——然而事实上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确切了解这种事物究竟是什么。

——雅斯贝斯

你们的命运是我们的警钟。

——波兰鲁布登纳粹集中营“万人坑”

引 言

历史不是封闭的城堡,沉寂的墓地,不是只有一个燃灯者,几个仆役,在黑暗中出沒的盗墓人。历史是开采中的矿场,争夺间的战地,是不断的失却和收复。它是永不垂降幕布的舞台,生者和死者一起登场,悲剧喜剧滑稽剧同时上演。我们观看,聆听,从中辨认一切:从台前到幕后,从脸谱到内心……由于剧情的需要,或者出于激情的驱使,结果发现自己竟也成了剧中人。任何标榜“客观”或主张“宽容”者,都无法挣脱其角色规定及价值原则;任何关

于现在和未来的计划,都必得在历史的“神秘的余数”中进行。“最后的审判”是没有的。

1955年发生的胡风“集团”案,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在事件中,30年代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从作家到读者,从家属到朋友,株连甚广。从此,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次年,文艺界开展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又次年为反右运动,知识分子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越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反动学术权威”乃至一般知识分子的迫害,也都未尝不可以看做是胡风“集团”案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伸。由于目击了十月革命后的事实,高尔基曾经指出:在一个文盲和没有文化的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尤其不可饶恕的无理性的犯罪行为。

无论对于生命个体,还是社会群体,无论对于血肉之躯还是灵魂,胡风“集团”案所造成的创伤都是极其深巨,难以愈合的。80年代中央所作的三次平反决定,不应当被认作是这次事件终结的标志。为事件所裹挟的人物,如林默涵、康濯、绿原、梅志、舒芜等,各个以自己的方式,对这段历史相继进行了结算。这些结算,大抵纠缠在事实的真伪上面。的确,历史的任务首先在于确定事实。遗憾的是,当年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周扬、袁水拍等,包括毛泽东,已同重要的史料一起亡失;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因为坚持维护某种圣物,使得许多档案材料至今未能公开。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重要的是为何如此发生。这样,在事实背后,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追索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直接牵涉到事件以外的更为广大的人们存在。然而,时光的流逝难免要洗涤旧迹。即以平反本身论,便颇有几分“大团圆”的意味,消减了许多为事件固有的悲剧色彩。在一个因经济杠杆而变得日益松动起来的社会里,政治意识相应日趋淡化;许多作家学者,也都在类

似的大大小的悲剧性事件面前充当“局外人”，这是有诸如“躲避”、“告别”的论调为证的。倘使大量迫害与牺牲的事实可以与社会无关，那么，它们将永远属于过去，孤悬时空之外而无法进入历史。

案件与事件是不同的，正如个人的屈辱不同于人类的耻辱一样。如果不拘限于胡风“集团”案发生的短时段，应当承认，作为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仍然与我们处于同一个大结构里。它以血和生命书写如下主题：自由，民主，正义，人道主义。这是人类的基本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显得特别迫切。

50年前，胡风在一篇题为《关于结算过去》的文章中写道：“‘温故’必须是为了‘知新’，而且必须是能够‘知新’才行。”新，既有别于过去，也当不同于现在，它是在斗争中行将生成的。历史在向着未来不断重构的进程中，要求我们投入足够的勇气、理性和热情。今天，对胡风“集团”案事件作全面反思，自然不是一次感伤的旅行。

权力与文学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这时，毛泽东便开始独力进行意识形态的统一工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及《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文艺报》编辑冯雪峰等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批判，几乎全部针对国统区的大知识分子，而且，方式也不再是延安整风时的“同志”式，而是“钦批”式，用鲁迅的话说则是从审判席上一路骂下去。1951年开始，接连几年的文艺整风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牛刀小试耳，嗣后的胡风“集团”案，才真正体现出庖丁的大师风格。

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中胡风，作为当时全力击刺和解剖的主

要对象呢？

思想的对立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胡风仅仅是一个空头理论家，或可相安无事；致命的是，他的论文偏偏带有挑战性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到一个“民族形式”问题，延安文化界随即展开了讨论。远在重庆的胡风，写出《民族形式问题》的小册子，强调“五四”传统，着重批判把“民族形式”还原为大众化和通俗化。他提出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恰恰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所倡导的。1945年1月，胡风在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同期还发表自己写的短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和机械论。虽然胡风等使用的“主观”一词，有着更宽泛更充实的内涵，但是从现象来看，却是明显抵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的。正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中共南方局当时才奉命组织人力开展对《论主观》的批判。及至建国前夕的1948年，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再度发起批判，那已经是一个恶兆了。

建国后，批判的子弹最先散落在胡风的朋友中间，紧接着，火力便集中到他身上。1953年是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假如没有其他事件的牵系，火力圈或许终不致于超出思想批判的范围。然而，胡风正是在这个时候上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并积极介入由毛泽东发动的对《文艺报》的批判。根据周扬的说法，胡风的这两次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注意；从后来发表的关于胡风“集团”材料的按语看来，毛泽东的印象是深刻的。在这里，胡风不但坚持多年来与毛泽东相对立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着严重的“僭越”的表现。这是不能容忍的。结果，胡风很快作出检讨。但是一切的努力已经无济于事，他给舒芜的私信，通过林默涵、周扬，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手上。这些信件

充满“暗号和隐语”，可谓居心叵测；在随后搜集到的“集团”分子张中晓的信中，却是毫无遮蔽，直接攻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称之为“图腾”。毛泽东为什么会把一场思想斗争升格为政治斗争？很难推测终极原因，即所谓“原动机”。

周扬与宗派主义

对于周扬，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给予他的作用以足够的评估。如果认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把鲁迅看做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话，那么周扬则是另一位旗手。他们处在各自不同的方位上。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还将鲁迅喻做“独立支持的大树”，对鲁迅来说，其实这是比“旗手”更为合适的。

鲁迅是一位平民作家，无党派人士，自由撰稿人；周扬自任“左联”党团书记开始就以文艺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鲁迅的创作始于“五四”前后，那是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发轫期；周扬作为一颗政治文化新星，则升起在另一度思想空间：30年代为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由于环境的恶劣，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也不得不采取地下斗争的方式。鲁迅坚持“艺术为人生”的道路，致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底层的病苦，文学思想基本上属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血统，但也汲取了世纪末现代主义的美学成分，形同铸剑，熔冶百家而锋棱乃见。周扬的文学理论，则主要来自斯大林一日丹诺夫主义。他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用鲁迅的话说，即“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做“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语言形式相应主张大众化、低俗化。鲁迅也曾把自己早期的部分文字称为“遵命文学”，但他所遵奉的，是那时的战斗的前驱者的命令，正如他说，那是他“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

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所以，他是不惮于单身鏖战的，但因此也就常常有“独战的悲哀”。周扬不同，他是有组织的：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鲁艺”，50年代以后，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而当年培养的部属和学生也都一跃而成新中国的“文艺骨干”了。鲁迅的存在，全凭个人创作的实绩；所谓“鲁迅精神”也者，其实也都在文本里面，此外一无所有。而周扬，虽然在文艺理论方面毫无创造性可言，但毕竟先后作过众多纲领性的报告；他完全可以用遍布全国的庞大的文艺队伍，加以如此理论造就的不可数计的文学作品，来炫示他的政绩。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独特性和多变性，毕竟给思想一人格的结构功能和文化价值带来很大的差异。如果对未来的潜在影响可以存而不论，而专就过去几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影响面而言，鲁迅是远不如周扬的。

长期以来，鲁迅是被偶像化了的。在延安，鲁迅一方面被当做“现代中国的圣人”受到崇奉；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批判的原则，以及贯穿这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却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所拒绝。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公开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阅读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讲话》明确否定“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规定讽刺的具体范围、语调和风格，以苏联文学为范式，强调“以写光明为主”，描写黑暗“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这样，鲁迅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文化人的批判，对革命内部的各种“蛀虫”的批判，都给一笔勾销了。在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把鲁迅称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明把一个独立的思想战士党派化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对“鲁迅精神”的

阐释,也都因为出于政治功利主义的目的,使之明显扭曲。由于鲁迅始终立足于社会底层和自由个体,因而他的思想和文字,也就天然地带有消解国家权力的民主倾向。对于高度集权和一体化的战时需要来说,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它必将给政治实践家的具体操作带来障碍。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发表系列政论性文章,抨击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种种不人道的行为。结果,他遭到列宁的严厉指责,并因此被动员出国。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长达数十年不能出版。这就是革命政权下的一个自由思想者的代价。至此,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他何以受到实用主义的对付就变得可以理解的了。

基于同样原因,在整肃胡风之前,王实味和萧军先后遭到整肃的事实,也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王实味只是写下《野百合花》等有限的几篇杂文,却因为他使用了“暴露”的方法,竟使延安的阴暗面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萧军除了“暴露”以外,最突出的是对权威主义的肆无忌惮的批评。对于鲁迅,萧军一度颇多过从,王实味则素昧平生,然而在精神实质上,他们与鲁迅是相通的。从传统的生成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鲁迅的继承者。

在意识形态集团当中,周扬可谓举足轻重。这是一位富于斗争经验的典型的“政治人”。早在“左联”时期,他就同鲁迅发生过冲突,给鲁迅的身心造成严重的损害;为此,鲁迅公开表示过内心的憎恶,无论一些新养成的学者如何重新散播关于鲁迅“偏狭”一类论调,我们总可以相信,在鲁迅那里从来未曾有过无谓的纠缠。正如他所说,许多论争,都是出于“公仇”,决非“私怨”。说到知人论世,近世以来中国不会有人比他更深刻。对于胡风和周扬,他这样说及自己的印象:“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周扬)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

恶起来了。”他在有名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及许多私人通信中，指周扬为“元帅”、“大人物”、“英雄”、“工头”、“奴隶总管”，“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是那类“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指周扬“借革命以营私”，“喊口号，争正统”，“左得可怕”，“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还指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用联络手段”“招揽扩大”，有明显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于是有“大布围剿阵”的“群仙”，“大霉荫下的群魔”，“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在这里，鲁迅把“心术”，也即品质和人格问题同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联系到一起了。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领导者一律当做政治符号对待，以为没有对于权力的欲望和嗜好，没有优秀的或卑劣的人性体现，行动则除了受一种普泛的思想影响之外，没有个人人格或性格的影响。鲁迅对周扬和“四条汉子”——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意识形态集团”——的描述和评价，在中国现代政治分析，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是具有经典意义的。

事实证明，周扬对鲁迅的批评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极力加以掩饰，以维护一贯正确的领导人形象。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说成是冯雪峰的托伪之作，致使鲁迅的手迹长期不能公开；把鲁迅对周扬的不满说成是受了冯雪峰的蒙蔽和胡风的挑拨所致，他们当然也就成了破坏鲁迅和党的关系的罪人了。此外，鲁迅晚年的一些关涉周扬的书信，也未见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文集。根据徐懋庸的回忆，他当年唐突鲁迅是因为衔周扬之命，而周扬并不认账，却把责任推卸到他的身上。甚至徐懋庸本人，后来也同冯雪峰等一起被打成“右派”，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了。周扬以为剥夺了有限的几个证人出庭作证的资格，就可以左右历史法官的意志。事实上，他在《文艺战线上的一

场大辩论》中系统阐述的30年代的文学格局,便是公开篡改历史。到文化大革命玉石俱焚,此间,周扬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他会不会因此对从前迫害其他知识分子的行为感到内疚呢?的确,复出之后,他在许多公开场合曾经向自己所伤害过的人赔礼谢罪;但是,在隐蔽的地方,仍然咬住这些被害者不放。丁玲逝世后,周扬对《丁玲同志生平》原稿中“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伤痕很深的作家”一句话,也非要删去不可,直至争执到当时中央主管文教的某位官员那里,决定留下才算了事。对于冯雪峰,周扬的态度也如此。在冯雪峰获中央平反之后,“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不惜歪曲史实,著文贬损;遭众人驳斥之后,仍在随后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保留伪证,^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周扬与胡风劫后重逢时,见面便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②大家都是受迫害者,这样一来,当年作为迫害者的身份就给隐匿起来了。在给中国现代历史清算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罪愆都被归结到“左”的名目之下。这是一座漂亮的拱门。那些理应承担责任的人物,一个个堂而皇之地,都打从这里给开脱出去了。弥尔顿在一本很著名的小册子^③里写道:“我们和道在各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人压迫,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了不朽的布鲁特斯说的话,当他看着凯撒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但决不是好人——时,他说:‘你们罗马人,如果我还能这么称呼你们的话,那么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干什么。记住,你们正在帮助凯撒打造锁链,正是这些锁链,他有一天会强迫你们戴上的。’终于有一天,周扬也饱尝了锁链的拘系之苦。”

脱掉锁链之后,周扬依然以“指导者”的身份,做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④这个报告,虽然被个别官员当成“自由化”的标本,但是文化知识界却普遍认

为它是周扬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页。其实,报告的主要内容,早经一个曾经被称做“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者所宣示,并且,在全国报刊中广为流布,决非什么异见。周扬不过借了纪念马克思的机会,获取“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在中国的“倡导权”而已。在正统意识形态经过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短暂而猛烈的冲击以后,周扬发现,他从前所有的布道文字简直成了一堆废纸,连《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终于没有勇气收入文集,“指导的英雄”的形象也随之塌陷下来。这种彻底崩溃的局面,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的那种有僭主气质的人物所不能接受的。为了重建意识形态集团中的个人权威,周扬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有利时机。

历史上,胡风和周扬有过两次较大的论争:一次关于现实主义,另一次关于“两个口号”,致使周扬成为胡风的“私敌”^⑤。此后,胡风出版的两个评论集《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都曾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了周扬。建国以后,胡风困兽犹斗,在“三十万言”中披沥了对周扬的看法,指为“宗派主义”,“小领袖主义”,甚至为“反党”,这是最致命的。“左联”时期,内部已有“周扬派”和“胡风派”的说法。鲁迅曾经说过:“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之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而胡风偏唠叨。周扬谈及1928年创造社同鲁迅的论战时,说:“不过那时候没有实权。你扣帽子也不怕。”^⑥一旦拥有:“实权”,扣起帽子就不能不是沉重可怕的了。在整肃胡风的斗争中,周扬紧密依靠毛泽东,先后传达过毛泽东的不少的口头指示,可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延安时期,周扬就已经把自己原来的理论立场,主动纳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并且达到相当的一致;还编过一本指导性读物《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把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至于此时周扬是否故伎重演,像鲁迅当年所判明的那样,“造事生非”,“造谣”“诬陷”,以影响毛泽东对胡风问题的决策呢?人们不得而

知。所知毛泽东与周扬在 50 年代的关系是密切的,有的地方不分彼此。据韦君宜《记周扬》一文所叙,她向周扬组稿时,周扬承认他文集里的有些文章或段落,是毛泽东修改的,甚至还有亲笔写的。至于属下群修,自在彀中,更是调遣自如了。这里只举林默涵的例子。林默涵是在斗争前台亮相次数最多的一位官员。他获接《人民日报》文艺部从舒芜手里借得的胡风信件,不但对违法行为不加追究,而且亲自诱使舒芜将信件摘抄、分类、注释,使之成为一份“材料”,然后经周扬等研究决定上呈毛泽东^⑦。据梅志驳文揭示,胡风第一次平反文件所留的“尾巴”,亦出自林默涵之手。在胡风“反革命”的事实澄清之后数年,林默涵还发表题作《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意在坐实“胡风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联系”和有“宗派活动”的指控,为当年的恶行辩护。周扬利用组织关系,上下其手,把几十年雄视文坛的老对手变成阶下囚,竟是轻而易举!

周扬和胡风互相攻击时,都曾动用过一种重型武器:宗派主义。战争发动以后,我们看到,同样的武器在一方可以攻无不克,而另一方却无法奏效。为什么呢?

关于宗派,毛泽东在胡风“集团”材料按语中,明确地将它等同于古代的“朋党”。在整肃胡风前夕,党内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其后有“章罗同盟”,还有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其实在当时都应被目为同类的性质。既然名为“胡风集团”,那么照例用对付朋党的传统手段,如“编造党籍”及“禁锢之刑”来对付他们,把思想文化斗争政治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宗派主义,无论如何作正反方面的解释,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是只有“学派”、“流派”而没有宗派的。即使给各种社团和派别冠以“集团”或者其他恶谥也罢,它们在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斗争都是正常的,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和压制。爱因斯坦明确表示:“集团”的产生以及互相间的摩擦是必然

的。他说：“大家都清楚，集中——即消灭独立的集团——在科学和艺术上会导致片面化和僵化，因为这种集中压制了，甚至禁止了不同意见和研究方向的任何竞争。”在民主社会里，在正常的人文环境里，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势力的斗争，同样可以和平进行。正如康德所说：“唯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其成员有高度的自由，从而成员之间有剧烈的对抗，但社会却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使每人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彼此共存——唯有在这样的社会，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它赋予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才能获得实现。”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或文化，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也不在于政治集团或文化集团，而在于集团与集团之间是否拥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所谓宗派，而在于其中是否有任何一派凭借自身的特权，阻碍甚而剥夺了别的宗派存在的自由。这时，唯有这时，宗派的存在才是恶的，或者说非正当竞争的宗派主义才得以产生，应当在扫荡之列。

鲁迅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里论及“两个口号”，本来是文学运动中的问题，为什么他竟一再说及“宗派主义”呢？原因是这两个口号关涉到面临的政治问题，即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起应们”“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从修身上来打击”，以“实际解决”相恐吓，“锻炼人罪，戏弄威权”，“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这才叫宗派主义。没有权力的参与，没有“实际解决”的能力，胡风的“宗派主义”算什么呢？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丁玲等在内，不少作家学者都曾把此间的混乱与荒芜，归结到宗派主义上面。并且每每提起来，总不免痛心疾首。其实，倘要刨起根底来，与其说是宗派主义作祟，毋宁说是权威主义或霸权主义更合适，更准确。事实上，情形正好相

反,除了新文学运动起来时尚有几个小小社团,我们什么时候产生过像西方一样独立的、自由的、面貌鲜明而力量强劲的团体、主义和流派呢?

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作过这样的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唯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

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⑧,在“空气坏的洞中”^⑨给朋友写信,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象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证之国外,则基本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出:“此种与国家一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20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撼的。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因为唯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唐诗云:“欲采苹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苹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亦非易得。“组织”不是永远敞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唯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做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膊上阵的许褚的。他曾经说过：“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境遇的不同，最重要的正如胡风所说：“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⑩，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⑪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网络，而成为党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后来有人在翻译上闹小花样，把“文学”换成“出版物”，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到这笼罩的空气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⑫，他说：“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⑬“但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⑭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去，从庸俗

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至今仍然留有在这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要挨骂”。^⑭他说:“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⑮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⑯他通过痛苦的个人体验,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罩子下面”,“‘理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图。”^⑰“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⑱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唯其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运动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的发生。人人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把阅读制度化,教义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有来由的。在宗教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所以,像通罗克、张志新等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做“异教徒”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

志新表示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士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脾气是道德的脾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对这种极其偏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罗素也指出:“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发展成为“事件”以前,在文化界已经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了。其时,《文艺报》编辑向有关的知名人士征集批判胡风的文章,“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⑨真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会那种神圣而盛大的愤怒,也便可以想见了。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与“知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明白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公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为止。这期间,也当辅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⑩群众斗争大会使人们长时期处于被动员的状态,使斗争者在狂热中失去理智,使被斗争者愈来愈显孤立,抵抗力下降,以致丧失信念,感到精神崩溃。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有一个“强化”理论:在“斯金纳箱”放置强化物,通过奖赏,强化某种行为模式。与

此相反,塞利的“系统性压力”理论通过实验证明:对老鼠施加系列压力,结果出现“一般适应性症状”从惊恐反应阶段、抗拒阶段到衰竭阶段。人是高贵的,却又是不可折磨的。然而,群众性斗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同时进行奖赏和惩罚的试验场。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已然成为公理,种种非人道行为也就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群众性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使法律成为多余的屏风,良知和理性遭到公然的践踏,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凶残、贪鄙、虚伪、嫉妒、阴险狡诈,被道德化,正义化了,告密与诬陷成了时髦的勾当。真诚保持沉默,世界唯余一片附和的喧哗。

胡风“集团”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这个环境,是不利于一个正直的公民的生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工农兵被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建国后沿袭下来,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技术知识分子可供利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提示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于人的。在遭遇运动的压力以后,自卑会迅速特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做哲学范畴加以探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逃避自由”。胡风的青年朋友,“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

格的建树,除了土壤,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到人格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1952年,胡风的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1955年,著名学者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胡风30年代的朋友冯雪峰,40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胡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际间的变化,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七百多人报以热烈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但也立即招致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的更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了。

1979年,胡风获释时,问儿子晓谷道:“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由系统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无援,于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心儿子反判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

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顺从,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代人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胡风“集团”事件作为政治事件,完全是人为的悲剧。胡风的问题,始终没有超出文化—文学的范围。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性方针。他把“双百”方针置于预设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前提之下,运用习惯的“两分法”,把斗争的双方规定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香花”与“毒草”,彼此不能相容。其中,还规定了判断的“六条标准”,十分具体,其实不具可操作性,相反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这样裁判权最后仍当落在权力者的手上。果然,不出一年,文中所预约的“可以自由发展”,“可以自由争论”的局面非但没有出现,而以剥夺数十万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内容的反右运动,却遽然发生了。这是颇有点谐谑剧意味的。“双百”方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一定范畴,不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民主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放”和“收”一类问题。用“双百”方针取代国家大法,对精神文化活动进行任意的规限;正如同把文化一律视为“阶级的文化”,划归“意识形态”,然后进行政治干预一样,是不可能不产生悲剧的。

回顾建国后的第一个“文字狱”,曾经作为“胡风分子”过来的绿原说:“历史已经粉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这是穿越炼狱之后的觉悟者言。

舒芜与犹大

但是,仍然有人坚持这样的意见,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所以最后衍变为“集团”问题,政治问题,乃完全出于一个偶然性因素,即舒芜献出“密信”这一叛卖性事件。于是,舒芜成了犹大。如果不是犹大找了祭司长,耶稣怎么可能被钉到十字架上来呢?

40年代中期,自路翎介绍认识后,舒芜就成了胡风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亲密伙伴。胡风在思想上给他以指导,尤其在现实斗争实践方面;对他成就为战斗型学者,确乎有过很大的帮助。此外,给他刊发文稿,为他引荐名流,甚至多方面代他寻找职业,可谓关怀备至。那么,数年之后,他为何要出卖胡风呢?犹大只为30块银币,而他意图得到什么?

《论主观》是一个死结,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1944年,舒芜在胡风的鼓励下写成《论主观》。这篇一万余字的长文,旨在阐发“五四”精神的一个基点“个性解放”,针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痼疾,上升为哲学意义的批判。文章明确反对“机械—教条主义”,强调“探索和追求”的主体性,以确立“我们自己”的总坐标,表达了进一步的战斗要求。关于“主观”的认述,舒芜声明说:“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我们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胡风十分重视这篇文章,不但给予刊发,而且在《希望》编后记里,郑重指出它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同期刊出的胡风的短评,名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目的在“打击创作上的客观主义”。这样,实际上构成了与《论主观》相呼应的一种阵容。然而,《论主观》的发表,立即引起了批判的风波。最先是中共南方局文委召开的座谈会,由茅盾发难,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开辟的“关于论主观问题”特辑,中共意识形态的代表性人物林默涵、何其芳、乔冠华、胡绳、邵荃麟集体亮相,集中批判了《论主观》、胡

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小说。开国大典的礼炮刚刚响过,朱光潜、费孝通、冯友兰等著名学者相继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这在文化界是不可能没有震动的。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很快开设了“批评与检讨”的专栏,在该报先后发表同类文章的作家多达三十余人。1951年10月,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再次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接着,又有一大批学者纷纷表态,立志埋葬“旧我”,重造“新我”。1951年冬,全国文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然后向全国铺开。可见形势的咄咄逼人。在此前后,胡风的朋友如阿垅、路翎、吕荧等不断遭到批判;“小集团”之说,不只一次出现。1950年,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做报告,提到阿垅时,即指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招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云;并且警告说,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无论对胡风还是舒芜朱说,都构成了严重的精神威胁。1950年3月,胡风致信舒芜,说:“《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何等,港派^②咬定你是为了反对‘整风’的反主观主义而写的,我发表了它也是罪大不赦。”对于他们,同时存在着一个放包袱的问题。

可是,什么时候放?用什么方式放?对此,胡风和舒芜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胡风于1951年10月致信牛汉说:“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份,但我们汲取得真,也工作得真,这就是一切!”态度明显是以不变应万变,固守阵线,伺机进行。舒芜则不同,“决心主动公开检讨《论主观》的问题”,于同年12月开始写思想检讨,五天得字一万,题目是《向错误告别》。次年5月,又主动写出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公开承认《论主观》等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表示同意报刊上对吕荧、路翎等的批判,并指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

思想”。文章在《长江日报》上首次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第一次由官方喉舌确认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接着,舒芜沿用这“小集团”的称谓,继续做检讨文章,但已将解剖刀指向朋友,于6月写成《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于《文艺报》。接着,从广西到北京,应召参加中宣部主持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多次会议。1955年,在没有组织压力的情况下,借出装订成册的胡风的一百多封信,由此点燃导火索,把胡风整个地抛出去了!

时代背景向个人心理背景的转化,有一个重要的中介,就是人格。什么样的人格,将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动机。1951年冬,当鲁煤把舒芜写检讨文章,“把过去百分之百的否定了”的重要信息转告胡风时,胡风复信说:不以为怪,早料他如此云。在胡风眼中,舒芜“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其一,自私,“只顾自己”,“患得患失”;其二,在思想方法上,太多地耽于“逻辑”和“观念”,“基本上脱离现实进程”,“积极性的东西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血肉”,“缺乏血肉的‘主观战斗要求’”;其三,而且“带着极强的虚伪的东西。”关于舒芜的为人,路翎说是有较多的教条主义,缺乏“平易的诚恳和日常的勇敢”;绿原则认为他“不够坦率”,“无法看透”,“阅世深,造诣高”,对斗争形式“昭然若揭,洞若观火”,是主动“从堡垒内部放这第一枪”的。在舒芜向自己开火的时候起,胡风已经警觉到他有可能在思想改造—文艺整风中“牵到别人”,甚至“把文艺问题当做资本”,“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②。因此,在通信中,胡风及时发出讯号;并且要路翎“好好准备”揭露舒芜,对绿原则叮嘱说要“尽量和气”地向舒芜“请教”,免使“节外生枝”。胡风当时就称舒芜为“无耻”,为“风云儿”。面临舒芜和舒芜所趋附的有关人物,胡风肯定:“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当然要有一通胡缠。”^③不能说胡风对未来的一场斗争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从“批判的武器”

到“武器的批判”，其速度之迅速及威力之猛烈，毕竟是他所无法逆料的。舒芜跑到他的前面去了。

数十年间，对胡风“集团”案发生前后的情况，舒芜讳莫如深。直至前几年，才就交出“密信”一事，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1997年，他又在《新文学史料》第2期上发表《〈回归“五四”〉后序》，对当年的情况，主要是与自己要关的部分，作了相当详尽的记述。从做第一份检讨起到交出“密信”止，舒芜是否有过试探的企图，像下赌注一样的冒险的决心，身不由己的烦恼？有没有过各种困惑，侥幸，犹豫，惶恐，荣耀或愧赧？在舒芜的总结中，这一切是没有的。只有一味适应和配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简单，明快，进行曲式。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精神分析方法无论如何是有缺陷的。对于舒芜的内心和灵魂的探求，除了质之行为本身，实在很难作更深入的发掘。不过，其中有几个疑点，揭示出来不是没有必要的。一、在舒芜开始写检讨时，鲁煤问他为什么不给胡风去信交换意见，他答曰：“在信上说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当年围绕《论主观》而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信上说清楚，怎么现在连简单得多的作检讨一类事情会“说不清”呢？倘直接通信不能达意，辗转曲达反倒会增进理解吗？二、对老朋友路翎，彼此间许多不一致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私下讨论或批评，而非要一来就采取“公开信”的形式？是便于解决“思想问题”呢，抑或纯然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三、关于借出“密信”一事，舒芜与《人民日报》的约稿编辑叶遥所忆^⑤有出入。据叶遥回忆，把信借走是舒芜批判文章作为具体选题被确定以前，而不是文章写成送审之后。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不能把私人通信出借，并作为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材料公诸于众的。而且，舒芜根据胡风信件奉命写作《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时，为何把致路翎的信件也一并带上？通信的内容及隐私性质，舒芜不是

不知道,何以同意借出?其时,胡风已成众矢之的,这样后果岂不是更严重吗?对素性沉稳多思而又有相当社会阅历的舒芜来说,怎么会无知到如此地步呢?

在《〈回归“五四”〉后序》里,舒芜强调说他的检讨,是因为听从了胡风于1950年3月29日复信的劝告的缘故。信件被当做证据称引的一段是:“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舒芜的原信迄未公开,但从上述情形看,舒芜去信必是有着关于强调“暴露思想”——“改造思想”的内容。正是这方面内容,传递给了胡风某种不祥的信息。“我希望”云云,在这里也就成了表面文章,或者稳住对方的小策略。舒芜明显曲解原意:一、胡风复信开头说的“暴露思想实际”乃从“你看出了”而来,是舒芜原信的意思,并非胡风的劝告。二、复信转述舒芜原信内容而加以肯定的部分,同后面关于如何处置《论主观》的部分,是分开叙说的,是两回事;舒芜把两者合并起来,即把“暴露思想实际”同重印《论主观》合并起来说了。三、胡风是要舒芜通过重印《论主观》并加“平心静气”的解释,以消除批判者妄加的罪名,消除有意无意的曲解;但是,舒芜后来并未起意重印《论主观》,相反把《论主观》纳入检讨文章,而加以“百分之百的否定”。这样,岂非通过作者自己来证实当年对《论主观》的批判是正确的吗?四、关于《论主观》,胡风在信中明确主张不如早点把书“印出来”(原文并加着重号),让事实说话,以使读者对毫无根据的批判文章有所认识;而不是舒芜对胡信总结的那样,说是最好早点把问题“提出来”。由此看来舒芜显然有所掩饰。

几年前,舒芜在《随笔》上著文称;在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有责任说出事情的真相。对于胡风“集团”事件,《〈回归“五四”〉后序》勾勒出了某个局部的较为真实的外部轮廓;它的出现,应当算

得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文章终究不敢触到死穴,人格的缺陷,内心最阴暗的地方。雅斯贝斯在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说:“在政治恐怖的情况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在舒芜自叙中,不见丝毫政治恐怖的痕迹。他当时在行动上所以背弃朋友道义和褻渎社会正义,人格完全崩溃,如果不是政治恐怖,那么这样巨大的摧毁性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恐怖一方面通过改变个体而改变群体,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变个体以改变群体,此即所谓“典型”。绿原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他把舒芜的典型性称为“舒芜方式”。要充分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重视个案研究,重视个体心态—人格的研究。知识分子人格的建构成重构,如果不是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即如沙上建塔,顷刻便坏。我们说“尊鲁迅”,首先是尊鲁迅的人格。思想观念是可以仿制的,唯人格不能。鲁迅有一段著名的独白,是:“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自己,他敢于明言。

假如自私、卑怯、不义就是人性恶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个人弃恶从善,而非要隐善扬恶不可呢?如果叛卖者就叫犹大,那么正如胡风的朋友聂绀弩所说:“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⑧,这是为什么?鲁迅说:“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面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建国以后,卖友的情形尤甚。这就不能不让人考虑一个个人以外的社会问题,国情问题。在追究个人责任的时候,决不要因此转移了大的目标。认识和改造人格赖以产生的环境,与人格自身的完善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如果舍弃了对社会

环境的追问,而专注于个人道德的完善与否,最终也只能使知识分子保持“慎独”而失去现代的意义,人格也将是不完整的。

胡风“集团”中的年轻的牺牲者张中晓,去世前在笔记本上写道:“只有经过激烈的、残酷的人生战斗才会理解别人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有着种种功利的情欲的打算,而另一方面怀抱着对真理的神圣的追求。”他以未泯的对人类的挚爱,为我们留下了充满人性温暖的启示。再回头说舒芜。他是一个双重角色:既是叛卖者,又是受害者。看不到后者,至少对舒芜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由于他的叛卖,他失去了当年战斗的朋友和大群易于为义愤所支配的人们;而因为受迫害——两年之后沦为“右派分子”——而为革命政权所唾弃。他是彻底的孤独者。这种无可诉语的痛苦的人生体验,使他从前未曾进入血肉的观念,不能不进入血肉而重新有了来自内在的战斗欲求;这样,在他可以以较为平等的身份,较为自由地整理自己的思路,在回归“五四”的大题目下发表文章,与半个世纪以前《论主观》时期的战斗自然衔接起来,且比过去更切实,更深入。短论固不待言,即使做《红楼梦》研究和周作人研究的学术性文字,都有着分明的思想指向,即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而致力于“人的发现”。他选择周作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是饶有意味的。关于周作人,他看重的是文学家思想家的一面,而有意撇开政治上附逆的一面,认为应当取文学标准思想标准来看待。其实,他本人走的也正是周作人的思想学术路子,用他的话来说即是“回归‘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子是他以他所须付出的人生代价摸索出来的,是大劫之后的重新选择,有着别的学者所没有的个人的印痕。

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解放后30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

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反正谁有马克思主义,谁就有权改造别人。而改造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都是实践,集中到最高的实践,即共和国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与策略。”“回头一看,原来你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者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30年过去了,可以做点事的时间不会再有30年。检点下来,我原来的几个思想基点之中,只有尊‘五四’,尤尊鲁迅,反儒道,尤反理学,反法西斯,尤反封建法西斯这几条,大致还能保存;其中有的例如‘个性解放’思想虽被我宣布抛弃了,有些淡化了,生锈了,但大致还能寻回来,磨濯干净。”还明确表述:“不再附会我从未懂过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勉强许证‘五四’传统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通,只是回过去,探究‘五四’精神本身……”像周扬一类官员,在80年代初也曾有过彰显“五四”意义的文章和讲话,但缺乏的是舒芜在这里的精神救赎。而像余英时一类纯种学者,对于“五四”遗产的承受,也只是声明在“知识”方面,因此再三强调“超越现实效用”,“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舒芜的“回归‘五四’”是侧重于思想的继承的。对于中国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黑暗面的发掘,其耐心,敏感和深入,超出了许多自以为“正统”的人物。虽然,对于个人内心的历史,他仍然掩盖了许多而不免使人遗憾,但这或许正是构成他的个体生命的死结所在,使他惊悸而永生难忘的地方。这是个人的耻辱也是世纪的耻辱。如果我们看到舒芜目前批判的锋芒所指,乃是制造胡风“集团”案的恶势力,如果我们同意把历史,把人类的希望定位在未来而非过去,应当说,舒芜实际上已经在暗暗地做着“洗手”的工作了。

鲁迅尝慨叹中国论人的苛酷。当一个人倘若曾经有过污辱,往往千夫所指,万劫不复。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发表以后,随即遭受当年“集团”中人的非议和攻击。这是可以理解的。可

是,正如伏尔泰所说:“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利!”即使通篇胡扯,也是可以当做一代知识分子心态史的个案材料看待的,更何况披露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我们都曾经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受害者。窒碍言论和出版自由一类事情,不应当由我们作出;不然,我们将重蹈那些“无畏的官僚”的复辙。文化专制主义的遗产,只配叭儿之类去承受;如果我们不彻底加以抛弃,正如鲁迅所说,将会成为一丘之貉的。

胡风与刑天之梦

胡风曾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他的文学事业,是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血脉般连在一起的。在中国,比起其他理论家,除了对艺术的敏感,理性的明澈,雄辩的语言气势等方面的过人的天赋以外,最重要的是,胡风具有对文学的焚烧般的热爱,他把对真理,对人民的苦难,对斗争的热爱全部倾注其中,并体现为一种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当他开始从事理论工作,便选定而且执著于自己的基本主题:“论现实主义的路”。遗过对世界范围内的丰富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传统的阐扬,通过对现代作家和作品的充满激情的评论,通过对诸如“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写真实”、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相生相克”等不同范畴的多方面意义的开掘,以及相应的“民族形式”问题的探讨,通过不只一次的口号论争和问题论争,胡风初步建立了富有个性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他一直沉浸于现实的斗争,因此,他的理论也就不是天才头脑里的悬空预设的公式,也不是实验室中的个别试验的结论,而是夹带着血肉的颤动,具有相当杀伤力的战士的武器。正是在对弥漫于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斗争,对闲适主义,庸俗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的斗争,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瞒和骗”的现象的

斗争中,它显示了锋锐的光芒。

同时,胡风还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编辑家。《七月》、《希望》杂志的编辑,影响是广远的。在这里,理论工作和编辑工作,构成了精神战士的两翼。而他,是始终追随着鲁迅的道路的。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曾经痛击过不少颇负名气的作家,其中包括党员作家,显示了他正直的、忠实于思想原则的一面;而另一面,于艰难困苦之中,扶助了大批年轻的战士,并伴同他们一起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前行。后来,被划入胡风“集团”中的一群,正是为《七月》所凝集的一群。这是陌生的一群,他们唯在贡献于人民的解放事业这一共同的文学理想中彼此相认,而又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默默的一群。胡风在他主编的杂志中,并没有放置任何足以蛊惑人心的口号和纲领,唯以自己的入格,工作的热忱,现实主义的理论倾向,和体现了这一切的整个刊物的战斗风采感召了他们。事实证明,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所有可以称之为“流派”者中间,“七月派”是最具实力的一群。

现实主义道路是不平坦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首先应当具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其中包括由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所构成的现实。可是,人格是否可以强大到刀枪不入?阿喀琉斯的脚踵在哪里?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不会造成牵制吗?人类个体有没有可能进行自由选择?他应当同周围形成的“场”保持怎样的距离,才能使思想永远维系其独立的尊严,面不至于因压力而变形?长达大半个世纪,胡风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他战胜过,也妥协过,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他死在路上。

鲁迅是一个横跨了两个时代——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战士。在他留日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的酝酿期,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政治家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共和政权的建立,发展了其中的民主、平等的

方面；而鲁迅，则重在吸收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方面，于是有“立人”思想的确立和独立人格的形成。对人类生命个体的关注，对个人生存权利包括在思想权利的维护，在鲁迅那里是十分突出的。所以，在“五四”期间，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在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左联”内部的“四条汉子”等共产党人的斗争中，他先后强调：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是不可以“锤炼人罪，戏弄威权”的。如果世上真有“教人死”的“革命”，他必定起而反抗不可。事实上也是这样。即使在集团中，他也是坚持着独立作战，不肯屈从于长官的意志或是“众数”的意志。

胡风是“五四”后的一代。乃至20年代中期，当年作为思想中枢出现的《新青年》的战斗者们早已风流云散，连鲁迅也有了彷徨无地的时候；个性解放的氛围，已为劳工大众的群体性的政治斗争所冲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苏俄革命的影响，基本上为广大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多元并存的思想局面，也为随之而来的国共分裂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转变成为二元对峙的局面。胡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留学日本的。在留学生运动史上，我们看到，留学东洋与留学西洋尤其英美的知识分子，明显呈现为两种迥乎不同的思想文化景观：欧美留学生笃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日本留学生则崇尚集体主义与革命精神。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培养了一代人的特有的气质、心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在日本，胡风参加了日共领导的反战同盟，接着参加了日共，并由此开始他的理论生涯。对组织的依靠，受集体的制约，在作为理论家的胡风的一生中是带有决定意义的。回国后，经历过一个极为短暂的“个人化”时期，也即在鲁迅反对“四条汉子”前后，

至《七月》的盛期。可是,旷日持久的抗战时期,在客观上给理论斗争造成了一个组织化了的条件,因此,即便启蒙也只能在集体救亡的大主题下进行。“五四”的充满活跃性的思想战斗传统如果不是说已然中断,至少命若游丝。此时,胡风一面加入党领导的群众文化团体,一面独立支持文学刊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革命战争中去,而在理论专业中,又坚持保留他在集体意识中的独立发现,也就是说,在公共空间中保留了自己的个人空间。形势的发展,在他那里,逐渐地形成了集体与个人的一种紧张的内在关系。到了重庆以后,这种紧张关系日趋严重,直到1948年发表《论现实主义的路》,也即香港文委发起对他和他的朋友的思想批判时止。这时党组织和胡风同时分头进行总结,并非偶然的戏剧事件;变换一个角度,则可以认为,这是从胡风的精神内部,集体与个人维系了长时期的紧张关系最后破裂的一种表面化、事件化的结果。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开头,他借但丁的《神曲》作为引子:“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这个血的湖,可谓不祥的预兆。1948年是结束,也是起始。建国后,在强大的集体面前,胡风所要保留的个人性的东西,再也不能并行不悖,只好“负隅顽抗”以至于彻底覆灭了。

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胡风的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和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五四”反封建的激进主义的继承物,是带有鲜明的异端色彩的。“集体”的存在,无论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组织实体,都构成了对个体一个性的包围。在这种情势下,胡风坚持他的异端理论而不惮于“绝对孤立”^②,敢说,敢想,敢骂,敢打,在行为方式上实践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自由的要求。正是为此,他既不见容于官方,也不见容于“文化圈子”。然而,无论如何,他的文学活动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影响所及,使他自觉

或不自觉地扼制和改变自己,在理论中掺含不应有的杂质,从而产生不少畸形的、混沌的,甚至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密云期风云小记》序中,胡风如此表白他对组织的态度:“我是小兵,懂得‘服从’的道德。”这是一个理论家的全部的悲剧所在。

首先,作为理论的来源,胡风在世界文学中主要择取苏联文学和日本普罗文学,明显地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拉普”到“苏联作家协会”,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在胡风的理论文字中留下了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斑驳的辙痕。而这,又正是他所力疾反对的。对于鲁迅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胡风有着很不少的富有创见的阐发,但是也有与流行的陈词滥调颇相近似的判断。比如,说鲁迅关于建立“人国”的理想的理论根据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说“由于十月革命,鲁迅完成了从空想主义的共产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转变”;说鲁迅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基础”,等等。倘如此,鲁迅已不复是荒野中的向坟的“过客”,而是走在红地毯上的贵客了。胡风在《民族形式问题》中对“五四”传统的论述,后来也被他按照正统的理论做了修正,用他的话说简直“翻了一个面”,完全窒息了那段喧哗与骚动的历史。就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来说,胡风把党性的立场等同于人民群众的立场;把文学精神等同于认识方法,确定现实主义就是文艺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把社会主义精神等同于党和国家政策的精神,强调接受政策的领导,和对于政策的具体内容的了解,认为唯其如此,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精神的保证,从而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有了“根本区别”和“原则区别”。临到最后,作为个人的爱爱仇仇消弭了,“精神奴役的创伤”愈合了,现实主义因此被拿掉了灵魂。虽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无威慑作用,但是这同胡风置身于革命集体及其意识形态系统之中,无法回避那种无往不在的思想渗透

大有关系。我们再看他本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可以了解到,他的变化了的思想同过去的思想潜在着一种关联。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当论及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人民结合的问题时,他说:“要从实际情况认识知识分子底革命性,更要从实际情况认识知识分子底游离性,即所谓知识分子底二重人格。”“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到别的阶级里面,并没有在生产诸关系当中承担着决定的地位,可以成为一个阶级……”这就是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阶级论基础。知识分子改造首先是自我改造,而且只能是自我改造,或称自我批判;它应当被视作社会文化批判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以不致丧失批判者自身的独立性作为前提。虽然,胡风也反对对知识分子的无条件改造,但是毕竟把改造的主题定位于革命集体——“人民大众”,而不是知识分子自身,这就无形中给迫害知识分子留下了理论上的缺口。

由于胡风一直无法摆脱组织的制约,所以在《论主观》的一大公案中,理直而气不壮,在公开的场合一开始便已言不由衷。在重庆的座谈会上,他声明发表此文是“想引起批判”,并说文中“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在“三十万言”中对舒芜和《论主观》作出否定自不必说,直至晚年,他撰写《我的自传》时还说:“由于失察并想引起论争扩大整风影响,我发表了舒芜的带唯心论倾向并寄寓反党情绪的哲学论文《论主观》等。”在《胡风评论集》后记中,也持类似的说法。事实如何呢?正是胡风,成了《论主观》的催生婆。舒芜承认,他是在胡风关于“启蒙”的战斗要求而又执著于现实斗争的具体的“指点”之下写作的,也有胡风的多封书信为证。他说,发表《论主观》是“等于抛手榴弹”,“我觉得,更深的解剖旧的,才能更痛地说明新的。其次,解剖了发展内容,就更能击中要害。”并赞赏其中有些提法“都是非常之好的”。当舒芜请教胡风,是否需要把胡风和路翎的意见作为“附录”一并发表时,胡风在信中作了肯

定的答复：“关于主观的附录，要的。有时不管他们骂，有时要他们无法骂。前者虽然勇敢，但自以为后者为得计也。”对于舒芜为配合发表《论主观》而写的系列杂文，胡风也表示激赏，说：“这样的白兵战是够味的，虽然也有失之浮的地方。更好是每篇一名，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致轻易来犯，快何如之。”并嘱咐说，“成集之前，望勿与外人道及。”在关于《论主观》的座谈会开过之后，胡风立刻将情况告知舒芜，说：“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在黄药眠批判《论主观》的文章发表后，胡风随即督促舒芜著文反驳。对于1948年“港派”的批判，胡风也都是跟舒芜商量着如何应付的。从本意来说，胡风办刊物，在刊物上发表《论主观》，“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如果机械论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一种思想风气，胡风是应当有面对的勇气，而不至于作出这种台前幕后不相一致的近于双面人的表演的。问题是，作为“统治势力”的存在，这种思想已经找到了它的物质根据，也即有组织的力量。尤其严重的是，这里的组织并非敌对的组织，而是党领导下的革命集体，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依靠。他不能背叛，也不能轻易离开；一旦失去组织的庇护，对他来说，就失去了整个家园。建国后，他汲汲于南北奔走，从安家到寻找职业，都离不开组织的安排。因此，他必然要作出一些迎合组织需要的行当，其中包括写作与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违的颂歌式的报告文学；名为歌颂时代，其实这“时代”不过是组织的被拉长了的虚幻的投影而已。因此，他学会像政治家一样地讲究“策略”，乃至不惜降格为“小动作”；因此，他变得委琐起来，斤斤于领导者是否接见，接见时的态度如何，甚至为了某个会议是否向自己或者朋友发出邀请一类事情感到为难和忧虑。为了安身立命，为了文学事业的生存，胡风不得不在组织面前改变着自己，而不复如先前的“鲠直”。俄罗斯作家伊万诺夫在高尔基研究中指出：高尔

基在苏联时期的信函和言论,从整体上讲是非常矛盾的,有意地模棱两可的,经常是极不真实的。由此,我们被告知: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环境,可以使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变成两面派和伪君子。当然,这里不是说,“以伪装出现”^②的胡风没有人格上的缺陷;或者说,正是这存在的缺陷与环境互为因果,演出了这许多令人感怆的场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在一个非常的组织或者非常的时期里,由人格缺陷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与胡风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三十万言”,从策略家的眼光看来,很可能是一种失算。而辩护的人会说,其实当时胡风已经成了一头困兽,上书言事是唯一的出路。不论胡风出于何种动机,事实上,“三十万言”并非什么新作,不过是此前的多次“检讨”的扩大,外加“净谏”的内容而已。有一个法国公式叫“既服从,又反抗”,英国人有“效忠的反对派”的概念;而净谏在中国,是有着从先秦屈原到晚清康梁的久远的传统的。这些士大夫的一个共同的思想定势,就是以为祸端全在于“浮云蔽日”,因此总是设法接近“明主”,以表心迹。胡风亦如此。在上书“三十万言”前后,他就有过接连的悲壮而又荒诞的表演,目的是“使上面看清问题”。他的幻想,首先建立在对组织,对领导人的认识上面,是一种太深的“隔膜”。他所以选择这种古老的对话方式,无非证明:在他的身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反角色倾向。鲁迅说:“我是不和政治家说话的”^③。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持如此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立场。

再来研究“三十万言”的文体。

我们看到,早在1945年,胡风就已经在斗争策略上煞费了苦心。在给舒芜的信中,他说:“我们虽从来没有希望得到批准之心,但无奈他们总要来审定,因而从此多事了。而时代又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要考虑作法,而且也只有在这意义上考虑作法。”“我想,以

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防止他们不懂,一面防止他们构成罪案。”随着环境的播迁,从前的这种矛盾的、隐晦曲折的,甚至矫作的“作法”,在“三十万言”中有着更为集中的表现;然而明显增加了申辩的、孤注一掷的成分,还有一些谰词。用胡风曾经借用的列宁的话来说,通篇都是用一种“奴隶的语言”书写的。

“三十万言”共分四个部分:一是“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与屈原的《离骚》的开头简直同构,陈诉对党的忠诚,以及由此而来的“忠而获咎”的屈辱。二是“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主要是围绕现实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虽然,从字面上力图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去加以说明,但是仍然固执地保持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中核心的东西。三是“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内容是清算旧账:一方面揭露周扬,连带揭发了舒芜;另方面为路翎等辩护,为“小集团”辩护,而这一切都是以党性立场为评判标准的。四是作为参考的建议,即关于文学机构、文学运动等的一些建议;进一步表明对能够取得组织“信任”的期待,对能够参与“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情况”的期待。

其中,特别提到在检讨期间也曾提出过的“解决组织问题”,也即恢复党籍问题。胡风控诉周扬们如何“用党底名义”给他施加了庞大的压力,专门做“债权人”,把他当做“纯粹债务人”来算旧账。而其实,他对党已经达到了“高度集体主义的信任”。他说:“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斗争中都跟在党底队伍后面走了过来的我自己,现在却被踢出了斗争以外,被看成文艺发展底唯一罪人或敌人,我心里又涌起了对时代对党的无地自容的羞愧。”在他看来,党中央基本上是信任他的,对此他“一直毫不怀疑”,不信任的只是“文艺上的负责同志”而已。所以,他说:“正是因为这,当正视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所造成的失败和失责,无论是对于党或是对于

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负债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也正因为这,他表示“非马上首先正视我自己,向党交待问题,争取参加斗争的条件不可。”重复检讨的用语,说:“我很愿意改造自己,在实践中一步步地争取做毛主席底一个小学生。”

胡风描述了建国后文坛的“混乱而又萎缩”的灰暗现象,并把它归罪于周扬,和周扬“自命代表党的棍子理论和棍子批评”。他指出:“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同时指出作为“统治了整个文艺战线的指导理论底重要构成部分”的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理论“比拉普派底理论还要庸俗无数倍,实质上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他控告这些理论家“玩弄权威”,“把‘思想改造’当成了一根随心所欲的理论棍子”;因此形成的恶果只能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谁企图‘忠实于现实’,那是准要惹得一身不干不净的,不吃棍子那还算是万幸。”他把作为“统治式器”的理论概括为著名的“五把刀子”论,认为:正是其高度反实践的性质,“不但把思想改造变成了军事统制的咒语,闷死了实践的途径,堵死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进行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抽空了思想改造本身,而且使党底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于是,他质问道:“在这种‘理论’和做法底绝对支配之下,文艺怎样能够不荒废下去?”今天,我们可以从中进行这样那样的挑剔,但是在当时,它毕竟是中国知识界唯一勇敢的声音。当然,胡风还不算是那种理性极度健全的智者,他不能理解,事情发展的趋势是根源于怎样的一种必然因素。他跟周扬争夺“话语霸权”,也不能理解身份是早经规定了的,作为实践的指导的理论是不可以任意杜撰的,真理的阐释权是被指定的。胡风不但把周扬说成“反党”的异端,也把舒芜说成“叛党”的阶级异己分子,说:“舒芜是他那个出身的地主贵族阶级在思想意识上派来做破坏作用的代表,他是看准了同

志们底宗派主义的强烈的统治欲望,所以敢于胆大包天地从这个空隙打了进来的。而且,他是由于他的叛党行为,被党洗刷了,使他无法不在内心上看到了自己的阶级本质,因而恼羞成怒,产生了对党的仇恨心理……”此外,还指名批评了一些作家,如不加分析地指王鲁彦为“庸俗的作家”,在辩护路翎发表作品的权利时,证实沈从文、张恨水比路翎更“糟”,还以生活作风和片言只语为例批评姚雪垠等。在这里,虽然有着文艺思想的分野,但态度是粗率的,不负责任的。照此发展下去,很难确保不会拐到为他所不满的对立面去。

在最后部分,胡风建议取消所谓“国家刊物”或“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所谓“大区刊物”;解散“中央和大区的、行政管理或变相的行政管理的所谓创作机构”,如“驻会作家”、“创作所”、“创作室”、“创作部”、各种“创作组”等。他认为,这些刊物“成了主观主义或机械论底基本阵地”,“都是独占性的”,“作家们成了由编辑部裁决的对象”;“培植了官僚主义、小领袖主义或雇佣思想”。而在那些机构中,“日常生活完全违反了作家成长底规律,使成员们一天一天衰萎下去”;用“行政的手段”保证了一批没有发展前途的成员硬要做作家,同时排斥了有发展前途的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保证了庸俗、虚伪、低劣的作品而排斥“异己”分子的作品;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奉公行事”地进行政治学习,等等。他建议完全废除强迫的学习制度,废除不合理的作家等级制,建立首席导演负责和导演独立负责制。凡这些,都表现了胡风观察的敏锐和思考的深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运动领导者的胆识。由于本意在“统一”,因此胡风这些在体制内的建设性意见是不可能被采纳的。他一方面力图消解体制,一方面又作着将自由的文学体制化的设想,比如建议让业余作者选择和“领导层作家”的直接联系以“诱发积极性”,“有选择地动员”“政治品质和艺术修养兼优”——其实等

于后来官方提倡的所谓“又红又专”——的青年作家到“文学岗位”上来。作为“原则问题”胡风提出,要“提高党底领导作用”,使“党中央能够站在主动地位上加以监督和领导的批评”。他在建议中十分突出“中央宣传部”的权威地位,如刊物或机构的解散,须接收中宣部直接指示和监督;群众刊物的主编直至编辑部成员,刊物的篇幅期限,剧团导演以至剧本演出,都须由中宣部审查批准。此外,还建议给刊物分配“共同任务”;规定包括负工作总责任的作家在内,刊物须有一半是党员作家;“通过党底系统了解特定作家或特定投稿者底基本政治情况”,等等。胡风在肯定现行的审查制度的基础上,争取有领导的创作自由;但是,由于建议被置于体制的框架之内,且限制极为严格,流于繁琐,其实是束缚创作的。

这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论,愈是接近教条主义和机械论,——这是怎样的一个怪圈。20世纪中叶,由一个坚持“五四”——鲁迅文学传统的理论战士以报告——其实是“奏议”——的形式写成的“三十万言”,面对它简直犹如面对一头人面狮身的巨兽,神秘而惊悸。有一个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这样代我们发问:“在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曾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是否混淆了争取自由和争取谏议权利这两个目标,致使斗争的意义受到了损害?因此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儒教国家一样,反对独裁的结果助长了权威主义。”

被幽囚了二十多年以后,胡风恢复了行动上的自由,还获得了许多荣耀的头衔,然而思想上的自由已经无法恢复了。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只是忙于打扫历史的房间,基本停止了向前探索,甚至停止了对过往“集团”事件的追问。从他后来的作品,如《革旧迎新五愿》、《喜投神圣的一票》等,大体上可以得知他的晚年思想活动的范围。至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路翎,被“改造”好了以后,其作品大多是按照写中心、写“英雄”的流行模式制造出来的,不复有

先前的激情的想象和突入灵魂的力度。周扬曾经说过,胡风的理论错误可以用路翎的作品来证明。胡风承认,路翎的问题和他的问题带有“二而一”的性质。倘若如此,可以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两位天才人物,都已经在未完成的途中过早完成了自己。战斗已成过去。美国有学者认为,胡风“集团”事件中对知识分子的戕害,是超过了此后的几次政治运动的。不知根据为何,是不是指逮捕、囚禁、逼死、逼疯的具体数字,还是故事的惨烈程度。但是,人格和精神上所受的戕害,无疑是更为深广的;既无法统计,也难以说明。况且损害也可以如资本一样“增殖”,使原来的创面不断扩展。胡风“集团”事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其循环出现都可以看作负面“增殖”的表现的。被害人十分重视“赔偿”问题。这种巨大的无形的损害,难道是可能找到赔偿的等价物的吗?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叫刑天的神。他的头被砍断了,手里仍然握着武器,继续他的战斗。陶潜有诗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聂绀弩把胡风比做刑天,赠诗曰:“尔身虽在尔头亡,枉作刑天梦一场。”胡风战斗一生,所余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中间,或许我们可以窥见“集团”案作为一个重大的悲剧事件的性质所在。

回溯“五四”与角色重寻

胡风在其著名的两个文艺论集《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中,着重阐发了“五四”对于现实中的文化—文学建设的主导意义,在若干短论中还直接论及“五四”,对鲁迅的阐释也同“五四”有关。可以说,在他那里,有一个“五四”情结。他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高度评价“五四”的伟大的母性存在的。颇具戏剧意味的是,“犹大”舒芜今天公开宣称“回归‘五四’”;长期的对手周扬,在他尚可“笑谈历史功过”的晚年,也曾不只一次提及“五四”的思想启蒙的意义,被毛泽东称作胡风“靠山”的蒋介石,在总结“五

四”时,赞同的唯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却激烈攻击运动中的破坏偶像等反传统思想。他把“民主精神”解释为“纪律”,把“科学的意义”解释为“组织”,在“科学”和“民主”之外,还提出应把民族主义或伦理道德作为第三个口号而加以提倡。至于毛泽东本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所作的经典的论述,把“五四”看做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更是众所周知的了。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治家,对于“五四”,都有过回眸远虑的时候。“五四”是经天纬地的太阳,是天狗;是狂飚怒涛,是溃决的堤岸;是香木焚烧的烈火,是死于火中尚未涅槃的凤凰。“五四”是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历史,是爆破的瞬刻,以其神秘的伟力使人礼赞,伤悼,嫉恨,惊悸,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五四”把人们一次又一次抛回到过往中去,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落到现实之中。“五四”面对的问题,同样为我们所面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科学,权力话语,社会转型。近百年来,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各个根据不同的利益和意向阐释“五四”。阐释“五四”也即阐释自己。于是,“五四”在名人的演说和著述中,就有了不同面貌的重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分两个层面,或者可以说是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的:一是思想启蒙运动,一是反帝爱国运动。早在清末民初,文化革新的思潮已经随同政治革命一并发生了。及至1916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北京大学进一步改革,青年知识分子社团在此前后相继成立,已然形成一股新兴的革命势力。这股力量,力图摆脱“政党政治”而致力于“国民政治”,选择的道路则是中国的文化思想的改造。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作辛亥革命队伍在革命成功——一定意义上的失败——以后的一次新的分化组合,是一次“补课”运动;它以对既往革命的补充、修正和总结,而开拓了新的思想空间,成为历史过渡时期的方死方生的一个重要的衔接点。整个

运动镶嵌着辛亥革命党人的背影,许多重要的领导者都是国民党人,或是辛亥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③;然而,对于国民党却呈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至于共产党的成立,则在两年以后。正如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形容一样“没有首领、没有旗号,但却具有令人惊异的团结一致”。无论何种党派,要阐释这样一个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自发的行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家对运动的阐释仅只局限于政治层面,虽或旁及文化方面,也根据预设的决定论的公式,把它纳入经济—政治的框架之内,而无视或小觑了它对历史的独立的贡献。关于运动的内容,只谈“科学”和“民主”,不谈“自由”,不谈“个性解放”和“偶像破坏”;致使这类问题长期悬搁起来,被陌生化,直至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现在。科学是一种精神,反蒙昧主义的态度,观察和判断世间事物的方法,但是在阐释中往往被等同于科技,沦为强权政治的辅助工具。民主被理解为简单多数,是权力集中的基础,结果不可让渡的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被集体淹没了,出现了如鲁迅所说的“以众虐独”的局面。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发现和解放,是覆盖它的灵魂;如果从中抽走了这个灵魂,什么科学民主,都势必异化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狰狞的替身。政治家的阐释,使运动的性质遭到同样的不可避免的曲解:“反帝”只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而许多富于现代意义的思想都被置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名下而被淘汰,从而确保十月革命后苏联模式的一元化;“反封建”相当于土地改革一类运动,重要的是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未曾受到根本的质疑和触动,且得以新的形态存留。而反对封建专制,正是新文化运动最富于战斗成果的部分。作为运动的主体知识分子,由于用“无产阶级”的眼光去打量,结果成了“改造”的对象。他们所进行的启蒙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公正的承认,反而成了他们致命的缺失;唯一的出路,便是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就意味着在另一个庞大的革命主体——其实是纯粹客体——中消融自己。“五四”在以权力为本位的阐释系统内,出现了一系列悖论:从启蒙出发,走向新的蒙昧主义,所谓“智识即罪恶”;从个性出发,陷入更为严密的组织之中;从自由民主出发,被置于国家主义的铁掌之下;从世界主义出发,返回民族主义;从多元主义出发,崇奉权威主义;从知识分子自身出发,最后毁灭了知识分子,那是人类的头脑和良知。政治家的阐释一旦进入实践,正如我们所见,历史遂出现可怕的异形。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性质的特异性,以及近代世界性气候的影响,“五四”的发生,故不但不同于根源于中土思想的历次知识分子运动,如东汉末年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清末的维新派的活动;也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运动,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主义运动。“五四”在个性自由方面颇类文艺复兴,然而它并没有采取“复古”的形式,相反全面反传统,而且没有文艺复兴那种暖洋洋的肉欲气味,其激进方面更接近法国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比较而言,法国的启蒙运动拥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哲学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则由来缺乏逻辑和理性的训练,所以缺乏科学的坚实性和彻底性。“五四”的理性口号,只是借用而已。中国长期凝滞的封建土壤,萌生不出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只能来自西方。在这里,西方决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时间概念,它是先行的,现代的,指向未来维度的,因而是新的。但是,对于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我们并不像俄国、日本那样主动接收,而是通过英国大炮连同苦味的火药一同输送过来的,是被迫接受的。所以,即使由先觉的知识分子揭橥文化革命的大旗,传播西方的知识,思想和理念,仍然要遭到来自本土的传统势力的强力的不间断的排拒。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所以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而改变“五四”的多元格局,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带有决定意义的是,它已经

被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原创型态,而是结合形态的了。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以火烧赵家楼为标志的学生爱国运动,形势开始发生转折。随着党派势力的加强,工农运动的崛起,新兴的势力与政党合流,“五四”运动便从总体上夭折了。“五四”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这是一个一直被掩盖了的问题。我们说它夭亡,除了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冲击文化,工农兵取代知识分子等诸多事变性的现象,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确证之外,还因为“五四”的理念没有得到赓续,意义没有得到彰显,从辛亥革命战斗过来的富于革命道义感和文化导师气质的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已然为“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所埋葬。折戟沉沙,烟销火灭。“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瞿秋白号召说:“没有理由停留在‘五四’……中国的文化运动现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知识分子和学生必须脱去光耀一时的‘五四’的衣衫!……我们即将迈出的一步与‘五四’无关。”

的确,历史场景已经转换了。

辛亥——“五四”的一代,是多么英雄的一代,多么令人神往的一代!这一代,兼受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旧学新知集于一身。他们有幸负笈留学,得以亲睹异域,开拓视野,因此对老大帝国的黑暗腐朽更为敏感;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也就不只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且在情感和心志上容易引起长久的冲突、扰攘与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炽热的革命环境,赋予这一代以鲜明的历史性格。论理想,论道德,论意气,论实绩,对这一代来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只有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俄国19世纪集合在《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周围的撰稿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知识分子群体可堪比拟。

胡风执著于发扬“五四”新文学传统,除了理论上的认同,其中

也不无心理上的因素,即对当年那种挑战权威,破坏偶像,自由批评的英雄主义的追随。他的“三十万言”,一半出于防御,另一半出于诱惑。对于革命文学事业的追求,他渴望以播种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充当“文化英雄”。然而,风云际会只在“五四”,政治权力的超弱势时期已经过去。不是群雄并起,而是一元化英雄统驭社会,所谓“定于一尊”;这样,也就不能不压抑了人类的自然英雄主义的发挥。对胡风来说,英雄的悲剧在于环境的改变,此外是意识形态在内部的破坏与消解。寄存于他身上的英雄主义并非太多,而是太少;他要成为他自己,那是不容责备的。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现时代英雄已死,所以要躲避崇高。其实,英雄主义作为人类潜能的一种存在,构成批判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冲动是自然的。问题是,社会以何种方式建造英雄主义体系?个性解放是英雄主义,独立自主是英雄主义,直而人生是英雄主义,勇于表达是英雄主义。日常生活一样有“英雄”的用武之地,何况精神文化领域?只是在险恶的环境中更见英雄的本色而已。让我们揭挥压挥人类英雄进取的罪恶的石块吧!

“五四”运动首先是知识分子运动,文化批判运动。在回顾它的时候,如何从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成了性命攸关的问题。然而,历史间距如此之大,况且以“价值中立”去阐释价值冲突,以“消极自由”去阐释“积极自由”,以静态去阐释动态,难道这是可能的吗?结果出现了“五四”意义的颠覆。

其中之一,就是全面反传统问题。“五四”时候,革命的先驱者确乎发表了对传统文化遗产实行“价值重估”的种种叛逆性言论,“全盘西化”论是最具代表性的,因而也最受攻击,以致始作俑者胡适不得不作出修正,说:“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无论怎样调换概念,实质上是反传统,这是无须辩白的。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在它

走向开放社会的道路上,都存在着一个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19世纪40年代,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发生过“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著名的争论。所谓“传统”,犹如人类的血脉,它是贯穿整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直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部分,是只能更新,不可置换的。正如克拉孔所说: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那么,“全盘西化”如何成为可能呢?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识,单就知识的角度而言,无疑是有悖于“学理”的,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却是有效的,合理的,鲁迅打过一个比方:你要主人给屋子开一个天窗,他不肯;但是如果你扬言掀掉整个屋顶,窗口也就开成了。这就是实践。如果舍弃了实践,我们又凭什么去证实或证伪所谓的“学理”呢?其实,“全盘西化”论是包含了一个方法论在内的,即:对于认识对象的把握,必须把前置的部分,或潜在的部分计算在内。战斗—实践主体当下的行动,只是极小的一个面,要承受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压力,是不堪重负的;因此,为了减小“压强”,就一定要扩大战斗面。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如果不能作出强有力的反拨,便根本不可能与既存的压力相抗衡。“五四”的战斗者对于他们的势孤力寡的处境十分清楚。除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敌对势力以外,改革者自身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也是一大隐患,无论口号如何偏激,行动上往往趋于中庸。“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几乎成了通例。所以,以极端的形式,提出类似“全盘西化”的口号,以引起足够的警觉和全面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首要的任务,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叫醒“黑屋子”里的几个熟睡的人们。然而,不管屋子与人的状况如何,学者所要的是“学理”。于是在攻击“全盘西化”论为“粗暴”,为“偏狭”,为“过激主义”,为“极权主义”之余,又进而批评“五四人物”未能脱离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其实,任何主义与思想,都可以说是“一元论”的。所谓“多元”,只是当思想作为客

体,被置于统一的思想场中所呈现的一种整体性景观。在这里,“一元论”其实是指代表性的倾向,是最富于个性特征的思想形态。因此,应当把思想态度,也即思想定向同思想成分作为严格的划分。在“五四人物”当中,大约最“偏激”者莫如鲁迅,他把几千年的文化道德概括为“吃人”,却也翻古书,做旧诗,弄《十竹斋笺谱》之类。对于他,反传统的态度是一元的,确定的,义无反顾的;而内涵是多元的,丰富的,甚至是充满矛盾的。自以为客观持平的学者,既指“五四人物”为“全面反传统”,又说他们“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受了传统的思想模式的影响^⑨。其实,知识分子是只能从思想、文化入手,并且也只能从事思想、文化的工作,这是为其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至于是否“解决问题”便很难说,只能说,他们负担解决的仅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作为问题,几乎是无从解决的。在“实际家”们看来,这批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五四人物”只尚空谈。法国启蒙思想家又何尝不是借思想、文化的方法,一味空谈呢?但不久,大革命的烈火就烧起来了。有谓“世无卢梭,即无法国大革命”。卢梭们算不算“纵火犯”或“教唆犯”,功罪可以不论,但至少证明这种思想文化革命的方式,与意在“补天”的中国“传统”无关,是可以肯定的。“五四人物”从一开始就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是革命者,又是启蒙者。他们把“社会”与“个人”置于思想文化层面上加以统合;而且,一切价值的重估都不是从学术概念出发,局限于“学术规范”的建设,而是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追究之上,建立在否定和批判之上,建立在未来的解放之上。如果弃置了“社会”和“个人”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割裂了“五四”;如果弃置了统合两者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则是从总体扼杀了“五四”。扼杀“五四”,对知识分子来说,其实相当于自杀行为。

何谓“知识分子”?作为概念犹如“文化”之类一样,众口腾说,莫衷一是。在这里,我们不妨使用淘汰法,找出其中最纯粹的部

分,明确其性质然后加以整体的确定。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幕僚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为“统治集团的管家”;二、技术知识分子,也称“技术专家”;三、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是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分别为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所吸附,唯人文知识分子留在原来的知识谱系内,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样从事实事事务,谋求世俗利益,却往往显得不同流俗,不切实际。按葛兰西对知识分子所作的阶段的划分,他们明显超出作为“已经存在的、传统的、前此积累的知识财富的管理者和推广者”的“最低级阶段”,而跃升“最高级阶段”,因为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带有乌托邦性质。所谓创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象征物。他们对社会的基本理想和中心价值表现出显著的关心,总是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人物自许,不但出演布道者的角色,而且充当控告者,谴责社会的罪恶和不公,主动担当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公开的辩护人。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因此总是站在现存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由于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样,有着一定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因此常常孤身奋战,而且是纸上谈兵,亦所谓工作的“书面性”。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及此后对思想者的种种类似的惩罚固不待言,对于道义上的轻微损害,人文知识分子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受挫感,稍有姑息,全经受不住良心的质询。为此,他们不能接受权力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扮演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美国著名批评家屈瑞林把具有这种性质的知识分子活动,统称为“敌对文化”。

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界不同的

是,他们没有那种阿附,因循和顺从。中国古代士人有所谓“学道”,以同“治道”相对,其实是后者的分支或补充。唯有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批判的品质,这种批判,不同于官方的批判,庸众的批判,即过去在政治运动中常称的“大批判”;他们的批判是反批判,坚守孤立的立场,对全体或全体的代表进行无所忌惮的异议,在广阔的范围内表达对社会未来的关怀。鲁迅把知识分子分为真假两种,就是从超功利性方面立论的。他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作为以思想为生的人,知识分子不可能处于平和的状态。所谓启蒙,在他们这里,其实与批判是一个重叠的概念。正如福柯所说:“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启蒙首先意味着破坏。有人把启蒙视同建设,这种建设,也只能在破坏之后作整体的重建。好像学者对“破坏”特别反感,所以对“五四”和“五四人物”才有那样诋毁性的评价。实际上,“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勃兰兑斯称卢梭、施蒂纳、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人为“轨道破坏者”;鲁迅进一步发挥说:“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这应当是对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最高评价。盖伊在《批评主义的桥梁》中这样声称:“为了建设必须破坏……尊重不值得尊重的东西,这不是高贵的标志,而是奴隶的标志。”我们不要寇盗式和奴才式的破坏,但是要“革新的破坏者”。他们的内心有“理想的光”。

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独立性、自主性表现为一种集体意识,即葛兰西说的“行会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和体现在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身上,构成人格的力量。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个体,知识分子作为阶级或集团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奢谈。知识分子是特别看

重思想和人格的尊严的。他们无须加入任何社会组织,无须倚仗任何社会势力,即使在最亲密的文化圈子中,也仍然注意保持自己的思想和人格不受侵犯。恩赐的判断,流行的观点,都是他们耻于接受的。对于他们,接受或拒绝,都必须经过个人的独立思考,怀疑一切是他们的天赋的品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深入批判统治的意识形态,尖锐地指出它的工具性,虚伪性,辩护的功能。他们称它为“虚假意识”、“公开的谎言”、“现存的非真理”、“集体性迷惑的工具”,揭露它旨在压抑、管制、操纵个人性,以图建立一种“社会同一性”。其实,在此之前,其他知识分子就已经对这种霸权话语进行过各种抵抗了。知识分子肯定有挑战强权的嗜好。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集体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一个又一个地遭到政治的打击和社会的遗弃。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卢森堡,在她的一本历尽坎坷的小册子《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在一个控制严密的国度和组织里,“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遭到剥夺是必然的。为了免于孤立,知识分子只能放弃他的个人性,如中国士大夫所倡言的那样“合大群”;但是,倘使隐身于实际的或是虚构的组织中去的话,已经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了。思想这东西,按其实质来说是超越组织的。既然组织与思想不能相容,那么,知识分子必须有勇气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易卜生借了“人民公敌”之口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正是最孤立的人。”既令人数舞,也令人寒慄。

马克思在一封信里说:“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胡风“集团”事件的真相,至今尚未完全说出。

况且,即使明白了事件的始末,也未必一定可以把罪过洗清的。这里有一个追究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问题。在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以后,总督彼多拉的双手是肯定洗不干净的了。可是,事情的发生仅仅是犹太和总督的罪过吗?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当时在做着什么?面对同类的痛苦和屈辱,有没有个人的罪感和耻感?胡风“集团”事件一直被叫做“冤案”,其实不确。“冤案”是一个充满封建正统观念的语词,它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自身的安全完全寄托在官府和王法的保护上面;作为人的权利,不是人所固有的,而是一种恩赐。这样,当权利——其实是平安的生存——一旦遭到剥夺,自然不必依靠自己的抗争,而是祈祷和等待。如果有一天,“冤情”竟然得到洗雪,事情也就算是结束了,从此任何与此相关的不祥之物都与自己无关了。倘使“冤案”代替了悲剧思考,便容易把灾难局限于个人范围,“小集团”范围,而抹杀了知识分子精神遭受公开扼杀的事实,掩盖了更多更有价值的历史内容,从根本上排除了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可能性。从目前的出版物来看,除了有限的几本纪实性图书之外,还没有一部对事件进行全方位文化探讨的理论性著作。这是与事件的重大的悲剧意义不相称的。阿多诺说:“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然而,我们抛弃了真理,不信任真理,我们事实上至今仍然在逃避理性和良心的责问。

在胡风“集团”事件和“五四”运动中,都是知识分子担任主角,无论是悲剧的角色还是正剧的角色,在这中间是有着深沉的精神联系的。个性、自由、民主、科学、价值重估、偶像破坏……我们会惊异地发现,所有的“五四”出现的东西,在胡风“集团”事件中打一个漩涡就都消失了。可以肯定,存在着一个“百慕大三角”。这是知识分子通往解放之路的绕不开的死角。因此,必须勇敢地从事探险和打捞的工作。记得有一位犹太人作家说过,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他希望能尽自己的职责,从星散的幸存者中间创造一种联

系,建立一种延续的网络。这是自赎,也是拯救。未来只能产生于众多个体的拯救行动。在这里,首先是有意义的拯救。在最黑暗最危险的深处,应当有我们建立的网络,去延赎“五四”,延续鲁迅以后星散的知识者和思想者,去维系一种精神。唯有它,才能导引我们摆脱困境,挑战命运之神。

知识分子力量来源于知识分子自身。对知识分子来说,生存的勇气就是批判的勇气,而这勇气也是只能来自批判的。从批判到批判。“生还是死?”问题并非两难,只是必须由哈姆雷特作出抉择。

注释:

- ①参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4期。又,李何林著《关于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 ②参见晓谷文,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 ③《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
- ④参见《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 ⑤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 ⑥参见《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
- ⑦参见《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 ⑧参见胡风1952年5月9日致冀方,同年5月24日致路翎信。
- ⑨参见胡风1952年4月16日致路翎信。
- ⑩参见胡风1953年10月12日致罗洛、张中晓信。
- ⑪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编者按》
- ⑫胡风1951年1月16日致牛汉信,见《胡风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 ⑬胡风1949年5月30日致路翎信,同上。
- ⑭胡风1950年1月12日致路翎信,同上。

- ⑮⑯胡风 1950 年 5 月 12 日致艾青信。
- ⑰胡风 1951 年 10 月 27 日致牛汉信。
- ⑱胡风 1952 年 3 月 27 日致路翎信。
- ⑲胡风 1952 年 4 月 16 日致冀汭信。
- ⑳参见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 1989 年 11 月 4 日《文艺报》。
- ㉑《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
- ㉒何，何其芳；港派，指 1948 年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等发起批判的理论家和批评家。
- ㉓胡风 1952 年 1 月 7 日致鲁煤。
- ㉔胡风 1952 年 8 月 12 日致绿原。
- ㉕参见 1997 年 11 月 29 日《文艺报》。
- 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
- ㉗胡风 1945 年 1 月 18 日致舒芜信。
- ㉘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 ㉙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
- ㉚可参见（美）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㉛参见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等。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舒芜，原来姓方名管，安徽桐城人。人们往往认为，他是我国清初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方望溪先生）的后人，其实并不是，他和方苞是同里同姓而不同宗。但是，作为一位著名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家、编辑家、杂文作家，他是有家学渊源的，这里且不详论：只说舒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70 年代在咸宁“五七”干校，他是一位辛勤、本分的劳动者。那时我天天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叫 14 连）从荒坡上开出的一大片菜园和猪圈。每天在那里干着整地、育苗、锄草、浇水、担粪、喂猪等活儿的，也就是舒芜、冯雪峰、牛汉、绿原他们几位。他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是出勤干活却特别认真，常见他们扎起裤腿、汗珠挂在脸上。

舒芜在 50 年代初期，大名远扬的自然是他发表在中南地区的《长江日报》，而被转载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及 1955 年对“胡风集团”揭发批判升级时，用他的名义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今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早已彻底平反。然而历史地看，舒芜在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感兴趣，并作了些材料的积累和思考、探索。我很早就知道舒芜同志，但平时并不来往。只

是因为要探寻上述问题、核实事实,了解具体细节,才同他作了交谈。因此我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本人没有关系,文责由我自负。当然,我希望这个问题的探索能给历史、给读者提供一点思考的线索,也欢迎批评。

舒芜的《论主观》——五十年前一大公案

舒芜的《论主观》,洋洋 27000 多字,可以算作一篇哲学论文吧。这篇 1944 年 2 月写成二次稿的大作于 1945 年 1 月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创办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写作这篇论文的舒芜年方 22 岁。当时他已在一所大学教国文课并自己选择研究先秦的墨子哲学。其实舒芜本人并没有进过大学,抗战初期他是个高中生被迫中途辍学,以教书谋生。逐渐地由小学教到中学,再到大学。他可算是自学成才。他的学问文章怎样打下基础的呢?据他自己说:“我进初中之前,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同时在家塾之外有机会读到两类书:一类是宋明理学书,理学终于不喜欢,对哲学理论的兴趣却培养起来,使我后来搞过哲学和哲学史之类……另一类是中国新文学书,包括了新文学几大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家的好些名作,读来读去,最吸引我的终于是鲁迅、周作人的散文杂文集,尽管一个尚未进初中的孩子当然有许多不懂,却丝毫不妨碍兴趣。”(见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舒芜文学评论选自序》)那么,他为何从研究古代的墨子转而写像《论主观》这样的现实哲学文章呢?这就要说到他和胡风的关系了。凡是读到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胡风从 30 年代起就是鲁迅身边有名的左翼文艺批评家,抗战初期更创办了有影响的《七月》杂志。后来在重庆,他是周恩来信任的跟“周公馆”常有联系的“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坚分子、重要工作人员之一。舒芜是经过当时年轻小说家路翎的介绍认识胡风的。那时舒芜走的是纯学术研究的路,已在《中央大学文史哲

季刊》上发表了墨学论文《释无文》，还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舒芜将这些文章带给胡风看。胡风立即热心地将《论存在》推荐给《文风》杂志，将《论因果》推荐给《中原》杂志，将《文法哲学引论》推荐给《中苏文化》杂志分别发表，并且将墨学论文《释无文》介绍给陈家康看。陈家康是胡风在周公馆的熟朋友（后来是新中国一位著名外交官），他是研究墨子的。胡风给舒芜写了信，将这些情况告诉他，并就根本研究方向提了建设性的意见。他主张舒芜最好不要搞纯学术，而是结合现实谈现实的文化问题，这是最急迫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是考虑、采纳了胡风的建议。陈家康看完舒芜的文章后对胡风说，他想请胡风约舒芜见个面。胡风于是带舒芜到当时主编党的公开刊物《群众》的乔冠华那里去，约好了陈家康同时去那里，大家会而。这次见面，舒芜和陈家康、乔冠华之间谈论哲学、学术问题颇为热烈，陈家康谈墨学研究，对郭沫若的尊儒贬墨之论很不满。乔冠华说要发起纪念费尔巴哈，来强调哲学上的“感性”原则。他说我从德文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比已有的中译本准确。将他的译文稿给了舒芜，要舒芜准备写文章参加纪念（后来纪念并未实行）。胡风只在一旁听着。这大约是1943年冬天的事。陈家康、乔冠华都是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俩人都是共产党内的才俊之士，俩人同岁，都到了而立之年，也就是说比舒芜大9岁。陈家康的谈吐、见解，比乔冠华显得稳定而老成，更受胡风欣赏，也同舒芜颇谈得来；乔冠华气宇轩昂，胡风后来回忆说他有点儿恃才傲物，但学术见解有时使人感觉似“客串”，也略显浮薄。1942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作了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讲话，发动了整风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然，在党内，“三风”主要针对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1943年，整风的主要文件及精神已

经通过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带到了重庆。周恩来身边的几位思想活跃的秀才像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曾经帮助邹韬奋编《大众生活》，当时编《新华日报》第四版，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等纷纷根据自己对整风文件精神的理解写文章。陈家康在《群众》杂志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乔冠华在《中原》发表《方生未死之间》，胡绳写文章提倡“新理性主义”。这几篇文章总的倾向可以说都是批判在重庆进步文化圈子内一些人感受到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左”的简单化，沉闷僵化的教条主义，还包括宣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苦恼。当然，这跟延安的整风目标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的，或许根本就没有对上号。较值得注意的是陈家康那篇，对借以唬人的僵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实质和危害作用的揭露批判有一定份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自然生命力”的论点，这可能是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提法欠缺科学的准确性，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舒芜在1944年2月写成的《论主观》中，倒是捎带批评了“自然生命力”这种观点。他说：“人既是人，其所发挥的，就只能是那有机的统一了自然生命和社会因素而不可分的主观作用，自然生命力不再能藏在任何里面而自有其作用；以自然生命力为武器的企图，实不免徒劳”，这“表露出费尔巴哈的倾向了”（见该文第十二节）。我提到这些是想说，自从胡风介绍舒芜认识周恩来身边几位有才华的、比他见闻、阅历更加丰富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并成为朋友后，在谈论学术，交流观点时，不能不相互受影响。当然也有发现彼此的论点分歧而产生争论甚至冲突，这都很正常，然而并不妨碍彼此的交往、情谊。从舒芜这边来说，他1943年酝酿、1944年2月写成《论主观》，不能说，他没有受到在他之前发表的几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反教条主义文章，尤其陈家康那篇《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的影响，虽说个别论点彼此有争议。还有，他们的文章，包括舒芜的《论主观》都是在延安整风这个大背景下写出的，这也无法

否认。在胡风介绍舒芜同陈家康他们交往后不久,胡风告诉舒芜,陈家康、乔冠华、胡绳他们几位发表的前述几篇反教条主义文章,在党内受到批评,认为他们是用唯心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个共产党员新闻、宣传工作者被视为“宣传了唯心主义”,这个批评不能不说是重的。很快,陈家康被调回延安,舒芜收到了他一封百感千思的告别信,并附赠他一副自作的对联:

胼胝穷年 蝼蚁稊稗屎溺
荆棘满眼 孔孟黄老申韩

这副对联中的一些字,我对今天的年轻读者稍加解释。上联两句都是《庄子》书上的话。“胼胝”是讲手掌、脚底因长期劳动摩擦而生了茧子。(见《庄子》“让王”篇:“颜色肿皴,手足胼胝。”)“蝼蚁稊稗屎溺”见《庄子》“知北游”篇。在庄子看来,像蝼蚁这样的小昆虫,像小米、稗子这样的草本小植物以至屎尿这等排泄物都蕴含着“大道”(真理)。所以上联是说:穷年累月,辛辛苦苦地在最平凡最卑微的现实中研求真理。下联是说:满眼都是荆棘杂草,尽是儒家(孔子、孟子)道家(黄帝、申不害、韩非子)之流,而没有墨家的地位。这副对联有没有“弦外之音”呢?我不好判断。但至少可以说是低调儿的,掺和点发牢骚的味道。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舒芜的长篇大论《论主观》却写成了,被胡风发表于1945年1月出刊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胡风先生对此作是如何评价的呢?舒芜在文末附录了胡风的两点意见:“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点。例如,今天知识人底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而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里由于实践精神不够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阔大。”胡风还在本期

的编后记中说：“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最近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刊登的胡风《文稿三篇》，其中第三篇《关于乔冠华（乔木）》（1977年7月18日完稿），涉及了《论主观》发表后的一些情况。《希望》刊出舒芜《论主观》，惊动了周恩来同志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有茅盾、乔冠华、冯雪峰等人。胡风说会前他到乔冠华房里，见他将《论主观》的内容写了个提纲，他的态度是基本上同意舒芜的，提纲是作为发言的底子。但会上关于《论主观》他只谈了几句，就再没有发言。而胡风自己，他说他在会上对恩来同志和大家说明了，他发表《论主观》是想引起批判。我想胡风这里说的“批判”的意思，可能跟解放后搞运动，发动了对某个人的“批判”，那意思还不大一样，并非对舒芜文章全盘否定，而是引起讨论、批评的意思。他在编后记里说得明白，《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因之“希望读者不要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会上的发言，除了冯雪峰肯定作者用心是好的，其他人对《论主观》持批评态度，有的近乎指责，说作者是“卖野人头”。但这毕竟还只是内部小范围的批判。胡风在《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二期上又接着发表了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中庸》，继续发挥《论主观》的观点。

最早“闻风而动”写文章公开批判《论主观》的黄药眠，文章的题目是《论约瑟夫的外套》。舒芜的《论主观》强调“新哲学的约瑟夫阶段”的概念，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哲学）的斯大林（约瑟夫）阶段。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为避开反动人物的注目，进步人士写文章，常以“新哲学”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卡尔、伊里奇、约瑟夫来称呼他们。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

活动中,重庆进步文化界有人(例如侯外庐)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阶段”的概念,给舒芜很深印象,他写《论主观》时便发挥了这个概念。所以,黄药眠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这意思,也就等于说“论披着斯大林的外衣”,无异说作者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来反对马列主义,那只能是马列主义的敌对者了。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胡乔木从延安来重庆,找了胡风说要找舒芜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胡乔木认为作者好学深思,但文中有很多问题不妥当。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至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张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党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它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正好服务员来通知吃午饭,准备饭后接着谈。及至午饭后,胡乔木说:很抱歉,下午周恩来同志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也要参加,没法继续谈。下午,舒芜去买了第二天早晨的回程船票,晚上舒芜又到张家花园胡风房间里,忽然乔冠华来了。他一来就开玩笑说:我是代表我来的。原来,那时乔冠华在

南方发表文章,常署“乔木”的笔名。胡乔木一到重庆,便有了南北两个“乔木”,进而文化界有所谓“二乔之争”的趣闻。乔冠华也借这个玩笑,表明他是代表胡乔木来的,接着他拿出胡乔木一张条子给舒芜,条子上说:上午我态度激动,很抱歉。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希望你留在重庆再谈一谈。过两天伯达也要来,他也想和你谈一谈。然而舒芜已买好回程的船票,只好婉谢。乔冠华又闲谈一阵而去,这次他没有对《论主观》问题表示任何态度。乔冠华走后,冯雪峰来了,这是舒芜第一次认识冯雪峰。冯雪峰好像是已经知道胡乔木谈话的事,他明确表示了对于《论主观》的态度,对舒芜说:你是主张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理论上武装自己,而且要把自己炼成钢筋铁骨,这是对的。但是,钢筋铁骨怎么炼?要在群众斗争中炼。这一方面你却忽略了。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并首次提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这些批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论主观问题》(荃麟)、《文艺创作与主观》(乔木——即乔冠华)、《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胡绳)、《略论个性解放》(默涵)。后来这些文章很快收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中。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国统区的武汉读到这部书,可见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我没有机会读舒芜的《论主观》,胡风的挨批评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这篇文章及舒芜的多篇作品如《论中庸》、《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个人·历史与人民》、《关于思

想与思想的人》、《论“实事求是”》、《我的聪明》(这篇文章是对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的反驳)、《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直到1955年全国范围大规模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才从作协下发的铅印五辑《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中读到的。

现在略说几点对《论主观》的批评、讨论及《论主观》这件公案的看法。

1. 关于人类的主观,即主观能动作用,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探索、讨论的。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毫无疑问十分重视人类的主观、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革命哲学即先进世界观的人们所起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更明显不过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称这种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参看《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什么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说反映了对世界正确认识的人们的主观实践,能够能动地有力地推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就是在与中国的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之下,千百万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取得的吗?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说思想。”(见《实践论》)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

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甚至承认精神的東西——人的主观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起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他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见《矛盾论》)所以,当人们说,“精神的東西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你可不要轻率地、简单地断定他是“主观唯心论”。

2.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作用,即人(作家)头脑的主观能动作用,即胡风先生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不宜轻率地简单地扣一顶“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给予否定;相反地,应当积极地肯定并认真地研究、探讨它。前几年提出和讨论“文学的主体性”,无疑对文学创作活动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批评这一观点的人们,我的印象,往往只是简单地强调唯物论的反映论,好像文学创作只是去“反映”客观的一而简单的镜于,实际上否认了它是作家比蜜蜂采花粉酿蜜要艰辛得多的再创造,是大脑极为神妙、精细、复杂“加工”的产物,而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说实话,那些年,包括40年代末期,仅是从“唯物”、“唯心”的分野批评舒芜《论主观》的人,也有这种倾向。事实是在文艺如何反映和表现生活这个创作的大问题上,建国以后若干年,也长期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连“理论”都够不上的“政策”。给我印象深的是某些“领导”文艺的人提出的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样极其荒谬的所谓“方法”,在“四人帮”江青之流弄权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是中国文艺界和文学创作者的大灾难。这样的“方法”能够“创作”出来哪怕一部站得住脚的作品,恐怕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了!这样的“结合”,作家、文人

自然是最可怜、最屈辱的一个角色了。“领导出思想”，作家还要什么思想，更不用说独立的思考了；“群众出生活”，难道还需要作家对生活长期的积累，独特的观察、感受吗？还有不公式化、不一般化的文学创作可言吗？作家只不过是“我——大人先生们”雇佣的一个可怜的会说话的、会写字的工具而已！而同作家的思想、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密不可分的技巧，在他们看来，则不过是类似某个工匠依样画葫芦的雕虫小技罢了。这正是反映了江青一类掌权者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反动封建主义思想和倒行逆施的文艺写作观。他们是从庸俗“唯物论”堕落到彻底的主观唯心论了！所以直到今天，假使“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那么就仍有深入研讨“文学创作与主观”或“文学的主体性”这个问题的必要。

3. 舒芜的《论主观》有没有错谬？肯定是有的。主观问题既然值得探索，就不能够不允许作者在思考、探索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何况是个22岁的青年！一位导师说过上帝还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呢？至于《论主观》对于当时党在白区贯彻正确路线究竟有什么大的妨碍？也许确实有的妨碍，则是我不知道的，不敢妄加推测。当然在探索过程中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形，即真理往往向前走一小步，便成谬误。舒芜也是这样。《论主观》中，对人类的主观作用强调过分，便走向绝对化，犯了片面性，违反了科学唯物论。例如对人类主观发展史三阶段的论断，便是使精神现象抽象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唯物论，于是自然就授人以“唯心论”之柄。对错谬的东西，完全可以批评。但批评仍然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仔细区分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是对朋友，就宜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论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说理。像黄药眠先生的批评，整体估价是说人家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敌对者，这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了。40年代末期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者们，鲜明地指出了别人理论有“宗派”主义倾

向。但第一,自己的态度似有“马列主义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味道,其实学术问题最好是持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平等讨论的态度。第二,既然居高临下,有时就难免论据不够充足,不实是求是、冷静地分析。个别文章更有挥舞棍棒的色彩。这都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4. 舒芜的《论主观》在对问题的探讨中,有没有可取之点呢?也是有的。例如第九节,他主张“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地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的成长”。“今天,由于批判地接受遗产这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为鲁迅先生所斥责过了。”再如第十节,作者并没有否定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而只是说,具体的人是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其生活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生活”,其所接触的人物事象也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人物事象”,所以其本身的阶级属性也就不那么完全而纯粹,其相互之间的区分,也不一定全是那么“楚河汉界”了。至于精神文化上的阶级基础,乃是最不能轻率判断的东西……这些本来是对的,但在批评时却先设定是“反对了阶级论的观点”,而作为“水”泼出去了。再如,第十一节指出的,今天,“文”有“坛”,“学”有“界”,“影剧”有“圈”,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最容易陷入其中……“于是,就以其缺陷而聚在一起,互相陶醉,为了一点可怜的小利害而争夺抢攘,不能感到此外广大世界的存在,把工作的社会意义忘记得干干净净”。因此,作者建议文化工作者要努力突破各种小圈子,生活就能开扩。这个建议,本来是正确、合理的。但在40年代末期批判者的眼中,是完全无视的。不仅如此,当时因为首次对以

胡风为中心的理论家和作家进行“集团”式的批判,在批判中不仅不去区分被批判对象其观点中错误和正确的部分;而且也不去区分胡风的视点和舒芜的论点,或舒芜的观点和路翎的主张或胡风的理论除了其共同点,究竟还有什么差异性;而作为“团体性”的错误,放在“一锅煮”了。如果是为澄清对手的错误而开导读者,其效果可想而知。

5. 人们只要冷静地了解舒芜在 40 年代初期写作针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哲学论文,包括《论主观》的来龙去脉,以及研读《论主观》之外本文前边曾经列举了的那一时期其它多篇论文,便可以得出看法,舒芜不是进步力量的敌人。相反地,是倾向进步的,进步人士的友人。其文章所犯错误,是一个追求学习、进步的人,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无法否认,有些文章并无大错;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作者学习、阅读了延安整风文件后的作品,如 1946 年发表在《希望》第二集第三期的《论实事求是》及《希望》第二集第四期上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等。

舒芜“起义”真相

我先说说舒芜解放前夕、解放初期在广西南宁不甚为人知晓的一些经历。解放前夕,他是南宁师范学院的教授。南宁解放,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民主教授,受命接管广西省一所有历史有影响的中学——南宁高中,任校长。身为学者、文化人,他还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省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联副主席、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市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等等。光这些兼职,便可见出解放初期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学,他还要参政议政,参加各种工作、学习会议,要花许多时间精力投入社会活动。在南宁,舒芜被吸收参加了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他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当地知识界的。但是,他

明白,他在全中国文艺界,是处于被改造、待改造的地位。那时广西的要务还是清匪反霸,恢复社会秩序等等,还没有人顾得上《论主观》之类的问题。但是,1950年3月12日和19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陈涌、史笃文章,批评阿垅发表在天津和上海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这是解放后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家进行公开批评。胡风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舒芜。当时舒芜要设法将《论主观》等文结集出版(后未实现),胡风表示赞成,告诉舒芜:《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自己早点将它结集出版,让解放后的读者看得到;自己再附一篇文章,该解释的解释,恢自我批评的自我批判。胡风这封信,自然给舒芜极深的印象。接着,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起头,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兼及其编导、主要演员及赞扬《武训传》的文教界人士。全国各地报纸很快刊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批评、检讨文稿。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之风迅速吹向全国,包括南宁。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舒芜更经常想到自己身上还有《论主观》这一大公案,想到胡风关于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预言,想到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的话。这期间他同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出自延安鲁艺的陆地同志有一次闲谈,陆地讲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当时鲁艺及其领导人周扬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关门提高。但是周扬接受快,作了自我批评,很快取得了主动,这是舒芜从所未知的。舒芜本来对周扬持怀疑态度,想到30年代他和胡风发生纠葛的往事,怕他利用文艺整风对文艺界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施加报复。但听了陆地同志的一席话,他受到鼓舞,觉得并不是周括挟嫌报复的因素在起作

用,而是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治病救人的。他回想《论主观》核心是要求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力批判的,他自己参加思想改造领导工作中也是常常发挥这种批判的。他想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大概也就是指此而言。他开始考虑,无论如何,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寄给他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的《长江日报》。《长江日报》于1952年6月8日转载,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的那篇文章。其后,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应北京之邀,1952年12月,舒芜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周扬主持、很少几个人参加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这就是舒芜的“起义”。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确实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的人。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仍然觉得他的检查是真诚的。但是有些话似乎也难免言过其实了,如“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错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致路翎的公开信》则牵涉胡风派的作家、友人的进言、批评,也算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过去的行为。他的并未“觉悟”的友人们,自有对他不满的观感。

但平心而论,舒芜的检讨自己、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他是个长期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主席(原来兼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

地检讨自己的过去。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之解脱。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胡风和“胡风集团”问题在解放后逐步升级,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是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当时在重庆、后来在香港批评过胡风和胡风派文艺观点的人们,他们并未忘记,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并未表示接受批评。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环境,而现在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身份、地位很高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帮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解决严重的思想问题,这件事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的“宿敌”,迟早会较量一番。但周扬而今是正当名分的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他有明显的优势;而胡风作为一个团结对象的党外民主人士,处于被动地位。周扬并未忘记过去,包括他所了解、掌握的重庆、香港时代的一些是与非。1952年周扬通知胡风来北京讨论问题。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话,其中周扬一句极有份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

是受了批评的。周扬这句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够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共产党内关系密切是党内受了批评的“才子集团”的那些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见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我们这里还要说说,在1952年至1954年,胡风问题再次提出来,由内部少数人的小谈升级到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再升级到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当此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批评胡风问题的关照和对胡风本人的关心。据舒芜回忆,1952年9月至12月,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会,开会期间,总理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可是,当胡风表示有些批评一时难以接受,需要时间消化……林、何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胡风由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升级到全国范围公开批评,而且上了“反马克思主义”之纲。周总理原来的指示,很快被突破。胡风在《关于乔冠华》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中也说,即使在1954年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发言,批胡的事态正在扩大,其发展难以预计时,周总理仍然派乔冠华、陈家康、邵荃麟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总理说,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然而,事态后来的发展,跟总理说的“实事求是”,要胡风“打掉应该打掉的建设新的”的设想,真是南辕北辙了。即使身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如此微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以起到缓冲、抑制的作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局

势推着走,更难以设想像舒芜这样一个和胡风派有牵连的普通文艺干部,在那强大力量面前,能够独立地自行其是了。下面我就要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和整理信件的事。其经过情形,《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已大体披露了。我想强调的是,第一,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属私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任何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大多写进了“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一条。尽管舒芜对胡风给他的信保存完好,但舒芜和中国任何一个公民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将这些私人信件交出来;而且由舒芜那儿得到的信中,再引起联想奇想,要所有得到胡风私人信件的人们和“分子”与“分子”之间将私人信件,统统交出来,并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梳理”,加上批语、按语、注释,形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发行数十万册,这更是一般人们难以预见的。真是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事情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编辑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据舒芜讲即使是重庆时期,他也感觉胡风先生排斥人太多,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例如他不赞成胡风、路翎对沙汀作品持贬低的态度。而舒芜是欣赏沙汀小说的。那位女编辑向舒芜约稿,舒芜就想写写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文章交稿了。但舒芜没想到阅读者(显然不是约稿编辑一个人,而是还有审稿者,审稿者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稿件中所引胡风的信件。第二,又出舒芜预料的是,组稿人要“借”胡风的原信去看一看。舒芜设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信件交给女编辑。第三,再出舒芜意料的是,女编辑通知舒芜中宣部林默涵处长为谈他那篇稿子的事要召见舒芜。去了之后默涵处长谈的却是:“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

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将胡风的原信拿出来,只见上边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林处长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于是由他口授了一篇大文章的提纲:“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那么要舒芜做什么呢?也就是照葫芦画瓢,将“重要的”材料摘抄出来,填充其间罢了。再就是按林默涵要求的,将原信中一些不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等作些注解。我曾设想,舒芜可否拒绝这样做呢?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党中央机关在人们心目中极具权威地位。由中宣部分工管文艺的处长亲自召见并布置任务,在那种情况下,不仅仅是舒芜,任何一个干部也难以拒绝代表组织的人交代的任务。除非他真是个“抗拒党的领导”的人。还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拒绝了,胡风的100多封原信俱在,这篇已拟定提纲的文章,还愁做不出来吗?当然,林默涵等领导同志,设想还是更周到了,由曾经保存胡风原信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整理、披露这样的材料,其效果岂不更好?于是舒芜难以拒绝,也必定会充当这些信件的整理者、揭发等这样一个角色。而策划者们是隐身在后边的。这件事,其真相的曝光,是在35年后的1990年。在这之前一个很长时期,有谁知道,胡风的原信是怎样取自舒芜手里,经由《人民日报》、经由中央宣传部,直送毛泽东主席的呢?还有谁知道,交出胡风原信,并非舒芜初衷;信件并不是舒芜自动整理,而是文艺处的领导人或许还有更上级的指示?出题目做的文章。这后一点我们不好无根据地随便报断。不仅如此,信件材料整理后的

题目在很短几天内,曾“连升三级”:舒芜交给林默涵的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经过林默涵、周扬同志研究了呈送给毛主席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题目又必须升级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所以,未曝光的过去三十多年,许多人包括文艺界的一些人推测判断,胡风的信件以及编成的材料可能是舒芜其人“品行不端”,为了自己邀功,不惜以朋友的牺牲作代价做出来的。舒芜无可避免地,也就落下一个“叛徒”“无耻”之类的冤枉名声了。

事实上,舒芜并没有从“起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捞到什么好处。1955年蒙“区别对待”,没划为胡风分子。但在隔了一年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舒芜仍被扩大为右派分子。舒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在1956年发表的《说“难免”》可算是杂文名篇。我记得毛泽东主席在某次讲话中曾给予关注,毛主席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觉得执政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些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不应对此求全责备,《说“难免”》是犯了另一种片面性。然而舒芜批评的恰恰是,如果做观地看,“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至于舒芜1957年被扩大进右派队伍,是不是“难免”的?我没有考察。从其后几十年来看,尽管遭遇曲折、坎坷,舒芜毕竟不失学者、文人本色,除了在运动中几度劳动改造,而且在“文革”中付出了夫人惨死的代价;但只要给他以文墨生涯求生存的机会,他便回到书斋中去,过着淡泊的物质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在文化积累上为社会、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李白诗选》的编辑、注释,《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以上二种与陈迥冬、王利器等合作)、《舒芜文学评论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著

作的出版,就是他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舒芜的“起义”和揭发“胡风小集团”材料事件的客观评说,我觉得舒芜的老朋友、老同事聂绀弩先生所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现引录如下:

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见《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 1992 年出版,418—419 页。)

□单世联

告别黑格尔

——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黑格尔进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位身前受到普鲁士官方支持的一代大哲,在中国也享有其他哲学家难以想象的殊荣,不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倍受尊重,而且其历史理性、必然规律、终极目的、总体意识等思想直接支持并被整合进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黑格尔是哲学,也是政治,思想史迫切需要对黑格尔在中国的政治化过程作出解释。本文则提前一步,对中国告别黑格尔的几个思想人物作一简单评论。

张中晓:血色背景

张中晓是个文学青年,本与黑格尔无关;而且在写作以《无梦楼随笔》为名的笔记时,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已被剥夺。在极其悲苦的60年代,他是“《小逻辑》的热心读者,札记摘录了大量《小逻辑》的文字”。“中晓摘录这些文字,一定有他的想法。”^①他对黑格尔发表的首创性评论,是当代思想对黑格尔主义的第一次批判,而他的悲剧性命运,也证实黑格尔主义在当代,首先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一、反对先验史观。“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成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

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②先验的历史观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历经许多年且经过许多思想家精心营构出来的，波普尔把它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张当时的条件和学养，对此庞然大物的来龙去脉还不可能充分理解。他完全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对黑格尔的判断提出这一观点的。一方面，“社会生活(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所能说明和解决的，它的行动取决于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的中和。”^③完美的制度、英明的领袖、理想的社会等等都是幻想，人间根本没有伟大、神圣、永恒的东西。另一方面，辩证法气度恢宏，牢笼百态，“在黑格尔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都僵化了，干枯了。”^④思辨的体系具有禁抑个体思维的力量，尤其是在它演变为“历史规律”并得到现实权威的支持之后，已完全蜕变为中国的思想专制，正像海耶克说的：“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⑤所谓“先验”，一是指理想的，二是指逻辑的，它们都不能把握具体的历史和人类行动。说起来，二三十年代的胡适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张所属的胡风阵营对此是不太赞同的，目前还难以发现张在这方面的资源。在黑格尔主义正强有力地在全社会广泛播散的当时，张旗帜鲜明地提出“历史不是某种特殊的人格”、“必然性可以休矣”、“理性主义不切实际”等这类经验性主张，是难得的清醒之音。

二、反对绝对真理。“过去认为只有一个真理，现在感到许多不同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他们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⑥按照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哲学史不是一大堆谬误的堆积，每一个哲学体系不但是历史的一个环节，也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阶段。这个极富洞识的哲学史观，在中国影响很大，这个逻辑严格推下去，当然会否定有绝对真理一

说,但是,黑格尔却认为,真理到了他的“绝对理念”(具体体现在他的《逻辑学》中)就停止了,“绝对”是大全,不但包罗万有,也涵盖历史上的所有真理。实际上,黑格尔对哲学史上各个体系的评价,基本根据其在绝对唯心主义中的位置如何,这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体系来衡量既往哲学,虽然腹大能容,毕竟以我为准。当这种历史观进入到中国黑格尔主义时,黑格尔原本具有的对既往体系的尊重已然无存,在革命成功的支持和政治权威的挟迫下,现行的意识形态被宣传为“绝对真理”。张每种思想都有真理性的观点,尽管类似黑格尔,但其重心显然是在否定“绝对”,突出对历史和“他者”的尊重。

三、呼吁个人价值和自由。“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⑦张对存在主义有一点了解,但更多是在失去自由的禁锢中体悟到自由和自我的珍贵和美好,并从中认识到人是自我完成的。“一个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⑧其时张非但不自由,而且正遭遇着人世间罕见的困厄苦难,“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⑨就是在这种活不下去的境遇中,张却唱出了一曲个体、个人、个性的颂歌,他的力量来自鲁迅、贝多芬、罗曼·罗兰。包括张在内的一大批人都被送上中国黑格尔主义的祭坛,黑格尔主义与让人活不下去的现实体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思想史的最大课题。在个体生存体验中反抗现存体制,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基本途径,在萨特存在主义的启发下,从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初步确认开始,一代青年才更艰难地跨越否认整体价值和尊严的极左政治。

黑格尔的巨大身影在现实体制的支持下完全遮蔽了张的抗议,在埋没了几十年、中国读者已经可以读到先于张十多年、具有

更强说服力的海耶克、波普尔等人的著作后,发掘出来张已并不特别警策惊人,但他已经提出了告别黑格尔几个主要问题。其思路与波普尔大体相通。清算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历程起于这样一个经常“写于咯血后”的哲学自学者,倒显示出黑格尔主义与个体生存的紧张关系。19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向黑格尔举起反叛大旗的,都无一例外地是从抽象概念回归现实具体:克尔凯郭尔是个体存在的人,费尔巴哈是感性自然,马克思是经济基础。王元化在几十年后说:“中晓的‘无梦’,我想大概也含有抛弃梦想,向乌托邦告别的意思吧。”^⑩张中晓悲苦地告别了历史最辉煌的理性之梦。

所以张中晓虽不深刻周延(以此来要求他是多么残忍),却抓住了必然性这一整个问题的关键,没有一个后来者可以回避这一问题而对黑格尔作出有意义的反思。对于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来说,他不但是第一声啼血的杜鹃,也给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沉郁的背景。

李泽厚:徘徊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李泽厚对德国古典哲学确有研究。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每讲完康德的一个论题后,他总是先介绍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再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出自己的评价。

所以尽管李没有写过关于黑格尔的文章,但他谈到黑格尔的地方却很多,并自觉把锋芒指向中国的黑格尔主义,率先在中国提出要黑格尔还是要康德的问题,核心是历史必然性:“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这段话一字不易地出现在李两本主要著作中,^⑪可见这段话是其对黑格尔的基本看法。

《批判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的全部结论是:“历史总体的辩证

法是黑格尔所长,个体、感性被淹没在其中则是黑格尔所短。”^⑩因此他一方面高度评价黑格尔的历史总体性思想:“继康德之后,黑格尔也紧紧抓住了这个‘总体’观念,把它与辩证法密切联系起来,这就取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意义。黑格尔认为,‘总体’只有在辩证法的全过程中才真正存在和能被认识。总体是过程,是辩证法发展的全程。”^⑪另一方面又不断从个体的角度批判总体性:“到黑格尔,个体日益看成或作为总体理性的工具,并明确地企图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上来把握、规定和理解人和人的伦理道德。”^⑫黑格尔把整个哲学等同于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不能回答许多与认识无关的人生问题。从1984年修订《批判哲学的批判》到1994年的《告别革命》,李关于黑格尔说了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

作为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和必然性的矫正,李在哲学上反复强调感性与偶然性,反对把总体过程当成了机械决定论的必然,要求极大地注意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为此他隆重请出康德,“康德哲学的功绩在于,他超越了也优越于此前的一切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这个主体性,康德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他的‘物自体’有多少唯物主义的成分和内容,而在于他的这套先验体系,因为正是这套体系把人性(也就是把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⑬主体性含义甚广,在实体即主体的意义上,黑格尔的“理念”也是主体性。李基本是综合康德的“自我意识”、“先验形式”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构成其主体性。但为批判黑格尔,李首先以费尔巴哈式的感性自然来理解主体性,试图以康德—席勒—马克思的路线代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路线,拯救被黑格尔总体必然所淹没的主体性。“贯穿这条线索的是对感性的重视,不脱离感性的性能特征的塑形、陶铸和改造来谈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不脱离感性,也就是不脱离现实生活和历史具

体的个体。”^⑩他进而在美学上明确地将哲学上的偶然性与具体生存的人联系起来：“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而上观念的控制支配”^⑪；“似乎是被偶然扔入这个世界，本无任何意义的感性个体，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不只是发现自己，而且是去创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⑫

《批判哲学的批判》1976年初版，已经包含了修订版的主要内容，这是自觉清理黑格尔传统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物。由于这本书产生的深远影响，它实际上启动了中国知识界在学术思想的层面对黑格尔主义的反省。康德立场，美学视角，主体价值，生存意义，既是批判黑格尔的依据，也是批判黑格尔的成果。李本人后来一直致力于根据康德—席勒—马克思的线索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力图在理论上摆脱黑格尔的浓重阴影。然而，李的主体包括个体感性与社会实践的双重意义（他通过“积淀”来沟通），在美学上，主体就是具体生存着的个人个体，但在本体论上，主体即是人类实践，这便与黑格尔的总体性相通，李一直没有否定黑格尔的总体必然。主体论的含混，使他只能以感性个体来补充黑格尔的总体历史。由此出现了三个难题。

首先是由必然与偶然的二元对峙走向再度以历史总体压抑、否弃个体。李虽揭发前者对后者的压迫，却并不否定前者，他把它们的关系称为历史行程中的“二律背反”，它有多种类型，如历史与人生，历史与感情，历史与伦理等等，其中最基本的是整体与个体的二律背反：“在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到达之前，作为族类的人（整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有时常处于尖锐对抗之中，并经常要牺牲后者而向前迈进。”^⑬“概括地说来，个体的小我有时被湮没在

整体的大我中等等现象,是共产主义到来以前人类史前期所必然经历的过程。”^②作为一个经常以斯宾诺莎的“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自己的哲学家,李对小我的湮没和牺牲并不动情。90年代后,他还在海外竭力反对“光有社会正义的要求,光用道德眼光看社会”,而主张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这个理性就是历史理性。基于此,他持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立场,“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极为肤浅和贫乏,它不能历史具体地去深入分析现象,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任何历史事实,不可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从而经常流为一堆美丽的词藻、迷人的空谈、情绪的发泄。”^③李反复强调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但真正显示出来是“历史的”多“具体的”少,这个“历史的”实则就是总体的,依然是黑格尔的方法。从总体看,个体的命运并不重要,以至像王实味、丁玲这样明显的冤案“当时也不无道理,因为在严酷环境和自身并不巩固的情况下,难以承受来自自己阵营内部的冷嘲热讽。”^④所以李特别欣赏黑格尔关于“恶”的积极作用的辩证观点。

在坚持历史理性和总体必然的前提下强调个体感性,是一种美学式表情,总体理性的框架中无法安排个体个人的位置。“看来是个体的具体的人的需要、情欲、‘存在’恰好是抽象的、不存在的,而看来似乎是抽象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却恰好是具体的历史现实的、真实存在的。”^⑤这显然是黑格尔总体为真的转述,李也以抽象总体取代具体个体。正因为个体是虚妄不真的,所以并不存在所谓个人自由这一说,“只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体和总体进程而主动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命运,以符合这一总的行程,推动、促进这一行程,才是历史具体的真正的个性自由。”^⑥李反对黑格尔对偶然、个体的忽略,但仍坚持必然和总体,这不但使其理论呈现出内在紧张,而且实际上也不能对现实问题进行有效的反省。“一方面应该反对在‘革命的’‘集体的’旗号下种种抹杀、轻视

个体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另方面也要看到‘大我’(人类总体)与‘小我’(个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行程,用义愤、感伤、情绪以及价值判断、伦理原则是不能真正解释这个行程的。”^⑤关于这一方面、另一方面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配置等,李始终未予明确,所以大讲偶然、个体的李并不导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而仍然是一种实践哲学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一点,使他遭致年轻一代的批评。

第二,他没有注意到必然性理论的复杂性。黑格尔认为个体存在的人仅仅是历史的工具,而非历史的自觉创造者,这就是利用人的热情、欲望、牺牲成就自己的“理性的狡计”。历史是本体也是主体,人在其中只是扮演一个已经分配好的角色,历史的发展是在人的背后进行的。这一点确实表达了个体在按规律必然运动着的历史中的卑微无力,但黑格尔并非政治上的冷淡主义,也并未一般地忽视个体在参与历史时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马克思通过把革命的行动纲领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把自己的意志加诸历史过程的英雄行动与支配着人和历史的铁一般的必然规律的结合,必然性不是取消了而是强化了主体意志的自觉。“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⑥萨拜因认为它“要求人们参与并积极合作,它激励人们行动和献身。与其说它与科学的因果关系有关,倒不如说它们与加尔文派关于命运是上帝意志安排的说法近似。同加尔文教派一样,历史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以使命以及对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也许还赦免他们以历史的名义犯下的罪行。”^⑦中国的黑格尔主义在此基础上把黑格尔的历史本体论改造为主观意志论,强调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人,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它没有否认、贬低而是抬高、夸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问题是这种创造,这种主动,被限制在先验设计好的历史必然性的框架之

中,个体不但要对此无条件认同,还要义无反顾地为此牺牲。先验理性、终极目标对个体而言具有“绝对命令”的内涵。中国黑格尔主义不像李所说的“忽视人的现实存在,忽视了伦理学问题”,^⑥它既认为历史有目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否定个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人可以消极静观,而是认为只有人的意志才能实现历史目的,要求个体无条件地为无人称的历史规律献身,所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种历史观的特点是,既认为历史是被必然规律决定了的、是有目的的,它毫无疑问地凌驾于个体之上并践踏着个体的血肉之躯呼啸前行,却又不因此减轻个体的责任,而要求个体把必然规律内化为自己的命运,具有宗教的色彩。它忽视的是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强调的是个人的义务和奉献,意在把个体纳入现存秩序中,迫使他为虚幻的历史理性和总体“大我”而自我牺牲;它有自己的伦理学,一种真诚忏悔、强行改造的伦理学,一种牺牲奉献的伦理学。可以认为,中国黑格尔主义把黑格尔的总体必然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结合起来,剥夺了属于个人的一切权利,使个体无可逃避地做一个“螺丝钉”和“驯服工具”。李因为只注意黑格尔意义上历史宿命论,因此真正的个体悲剧失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真实的不是“人成了认识的历史行程或逻辑机器中无足道的被动一环,人的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质被掩盖和阉割掉了。”^⑦面是以历史规律为名的总体集权对人的严厉控制和强制奴役。

第三,由于没有否定终极目的、必然规律,李没有摆脱乌托邦情结,只不过这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理性王国,而是经康德、席勒的美感滋润过的未来取向的审美乌托邦。《批判哲学的批判》以绚丽之笔描绘道:“人类由必然王国迈进到自由王国,即美的世界”;“美是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整个人类的漫长历史告诉我们,美的世界必将出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星球之上,尽管将经过异常

艰辛而长远的奋斗历程,这一天却终究是要到来的。”^④其中历史总体、必然规律、终极理想,都是黑格尔的模式。李后来没有勾勒审美乌托邦的细节了,但从《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到《哲学探寻录》中有关心理本体、情感本体的畅想抒怀中,依稀可见其踪迹。“别让那并不存在的、以虚拟的‘必然’名义出现的‘天命’、‘性体’、‘规律’主宰自己。重要是讲情感的偶然中有真正的人生寻找和家园归宿:‘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在这种种似如往昔的平凡,有限甚至转瞬即逝的真实情感中,进入天地境界中,便可以安身立命,永恒不朽。”^⑤审美是个体的,艺术是感性的,如果说李挑战黑格尔是得益于美学支持的话,那么他一方面拥抱感性个体,另一方面又对历史理性恋恋不舍,同样是由于其美学立场。因为审美的感性可以抗议历史理性,却不能颠覆更不能代替总体行程的必然运行。这就是鲁迅和罗曼·罗兰多次说的,艺术可以改变个人,但对历史、政治,却无能为力。而且幻象可以产生满足,审美可以使个体在压抑和牺牲的状态下欢欣愉悦,沉浸于审美乌托邦成为历史理性必须的补充和平衡,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文化的肯定性:“灵魂的自由被用作去宽恕贫困、殉难以及对肉体的束缚。”^⑥

90年代后,李对黑格尔主义的反省有所深入,在《哲学探寻录》中,他提出要以英国经验主义来矫正中国的乌托邦主义,如“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和仇恨。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分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⑦这里抓住了历史理性、终极目的这一中国黑格尔主义的核心。然而在90年代反省激进思潮成为国内知识界主流的背景下,他的思路既不独创也不彻底,即使他呼吁“少来点海德格尔,多来点波普尔”,却未对自由主义有多少真

知卓见,对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必然规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他的思路没有多大变化。

关键是,虽然他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但对革命并无深入检讨。如果20世纪的激进主义、革命运动确是一个错误,那么革命何以蕴酿、何以成功才是更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涉到此,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后果便突显出来。而在李这里,革命之所以要告别,是因为他发现了革命所造成的破坏。他满足于经验观察,无法在理论上作出认真探索。比如他对乌托邦主义提出批评,但还是说:“乌托邦并非都是坏东西。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但同时又使水利事业大规模地兴起,许多穷乡僻壤也有水库,这对农业的发展很有利。”^⑨这就是说大跃进并不像过去说的那样通体光明,它有很多问题,今天需要批判。不过不能一棍子打死,大跃进毕竟为农业像了一点好事。这样的辩证法使一切历史悲剧都丧失其震撼力,使一切胡闹都可能具有某种正面意义,使人无法从牺牲中获得教益。——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逻辑。

王元化:从批判知性到质疑总体

黑格尔主义在中国的凯旋是与政治专制的强化同步进行的。然而,黑格尔主义的阴霾高压,并没有完全遮蔽黑格尔哲学的光芒。也是在艰难困苦岁月中,王元化不但从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思维训练,也从中增加了生活的勇气。他晚年的光辉,与他50年代、70年代两度阅读黑格尔大有干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与黑格尔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专制开始解体的时刻,王却多次对黑格尔表示服膺,其中比较有创见的,是他对知性问题的思考,从这里,他开始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早在1976年的《读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札记》中,他就申论了黑格尔“知性不能掌握美”的思想。^⑩知性的功能是“抽象”和“分

离”，而“在作为美的统一体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在本质方面和特殊个体的外在现象方面可以相互渗透。”^⑧美是现象与本质、特殊与普遍的和谐统一，“如果用知性来掌握美，就会把美的统一体内的各差异面看成分裂开来的孤立的东西，从而把美的内容仅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与特殊性的个体形成坚硬的对立，只能从外面生硬地强加到特殊的个体上去，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变成只是拼凑起来勉强粘附到内容上去的赘疣了。”^⑨从美学来批评知性，不仅因为在审美活动中，最突出地暴露了知性的无能和荒谬；大概也因为在乍暖还寒的 70 年代末，还不太可能直接批判极左意识形态。批评知性依靠的是理性，“按照黑格尔看来，知性只是理性认识的一个低级环节。”^⑩黑格尔的最大贡献就是突破形式逻辑的僵硬束缚，提出了动态的、综合性的理性概念，即包含特殊性和个体性的“具体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内在本质可以把特殊个体的外在现象统摄于自身之内，同时，特殊个体的外在现象可以把普遍的内在本质渲泄于外，从而形成各差异面的和谐一致。”^⑪这就是“具体的普遍性”，就是总体性。

1982 年，王在《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中扩展了他的美学思考，提议把知性范畴引进认识论，“我觉得用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是更科学的。”^⑫意图仍然是通过知性与理性的区分明确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不同，知性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必要的、是认识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但一旦超越这个界限、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就会把事物当作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陷入形而上学。这里的关键还是总体性，“知性不能认识到世界的总体，不懂得一切事物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亡。”^⑬知性的抽象片面的思维可以在辩证总体的思维中克服，黑格尔和马克思设计了从感性具体到知性抽象再到理性的“具体的普遍”的思维路线。辩证法能够“克服

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片面性和抽象性,而使一些被知性拆散开来的简单规定经过综合恢复了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达到多样统一”。^④从总体上认识和掌握世界。

重提黑格尔的知性概念,是为了给文革思维方式定性。80年代初,王批判中国文艺中的“抓要害”的方法,“据说抓要害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知性观点经过任意套用已经变成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⑤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反映本质等等。这一意向,由于王参与起草了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而发生广泛影响,黑格尔也因此有功于中国的思想解放。90年代初,王又据此批评了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模式:“尽量力求简洁,虽然使思想变得清新明快,但往往不免将生动的、具体的、复杂的、丰富的内容,化约为稀薄抽象。”^⑥文艺—认识论—政治之所以灾害绵绵,从思维方式上看,都是知性在作祟。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王对知性的看法始终不变。应当说,黑格尔精致的辩证法确可以澄清极左思维的粗劣混乱,然而,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对知性的贬抑有非科学的一面。如果说“理性”重“合”,“知性”则重“分”,而科学精神首先就是重“分”的精神,是严格的分析和论证精神。康德认为“感性”和“理性”都只是知识形成的条件,而获得知识则要靠“知性”,这是符合现代科学的。黑格尔承认知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比如在数学中取得了成功,但它对哲学来说是相当无用的。“使用‘知性’一词——略带贬低口吻——来表示有点呆板的、哲学上不合适的思维方式,这是所有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共同点。”^⑦另一方面,仅仅批判知性方法绝不能清理极左专制的思想根源,因为正是黑格尔历史总体的理性主义为中国集权政治提供了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基础。王似乎是抓住了芝麻面丢失了西瓜。原因之一,是他和李泽厚一样是从美学进入历史的。

然而,就是在大大得益于黑格尔的阶段,王也根据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黑格尔有所批评。在1988年改定的《黑格尔〈美学〉札记三则》中,王批评了黑格尔的“艺术清洗理论”,自然美是粗糙的,艺术应克服自然的缺陷,要把被偶然性和外在形式所玷污了的事物还原到它和它的概念的和谐,使“概念完全贯注到符合它的实在里”。他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认为:“‘类’在个体中绝对地实现,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同样,在艺术中也是荒诞的。”^④这个意见在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就有了^⑤,但在1988年的改写中更为明确。稍感遗憾的是,王在此文中仍然把这种绝对的美学理论归咎于知性方法,而不是联系到“具体的普遍性”。^⑥但是根据王后来的思想,这一批评的客观意义是比较重要的。

1989年的,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的《书后》中,王注意到顾“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把自己的反思逼进到黑格尔主义的核心。1992年,他在和一位学者的论学书中,讨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动机:“同时从一大、二公、三纯的道德理想出发,政治运动又可以被视为使人净化,达到建立集体大我消灭个人小我的唯一途径。”“道德理想主义所要求的‘纯’不同于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而是从传统的大公无私演化来的一种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可以用‘斗私批修’这一口号来作最简明的阐释。”^⑦王进而分析道德理想主义的来源,一是传统理学,二是卢梭的“公意”,三是黑格尔的总体性。“公意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它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⑧

“抽象的普遍性”是黑格尔认为的知性的普遍性,与此相反的是理性的“具体的普遍性”,前者是排除了特殊性和个体性的空洞普遍,后者是统摄了特殊与个体的具体普遍。注意到卢梭的“公意”在中国的政治后果后,王作了自我检讨:“过去我十分迷恋黑氏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⑥清醒了的王明确地表达了两点认识:

第一,所谓“具体的普遍性”其实是不存在的。“黑格尔幻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于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中。”^⑦“知性的普遍性固然不可取,但以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却是一种空想。它在逻辑上虽然可能,但在事实上却做不到。”^⑧这一点,与李泽厚对偶然、个体的重视是相应的。

第二,所谓“具体的普遍性”就是卢梭的“公意”的哲学表达。1996年,经过自我反思的王在为70年代的读书笔记写序时说:“无论总念的普遍性如何优于知性的普遍性,如果不承认它是不可能将特殊性和个体性一举囊括在自身之内这一事实,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将会给人类的政治生活带来极大灾害。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这也是以为普遍的可以一举将特殊的和个体的统摄于自身之内),他原来是想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当黑格尔陷人同一哲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后果。”^⑨这后果就是特殊性、个体性的淹没,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的取消,独裁制度的建立。

70年代末王批判了知性的“抓要害”,90年代他批判了与“具

体的普遍性”导致的独裁,前者包含了他借黑格尔对极左政治思维方式的批判,后者则体现了他对作为专制制度思想原则的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在此一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一些理论界限在王随笔式的文章中没有澄清。这首先是知性和理性的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始终是在批评知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的普遍”确实是“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知性是分析的,坚持同一性和差异性,把它们看成是分离的;理性是综合的,虽然也看到同一性和差异性,但把它们看作是相互联系的。辩证的综合就是在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之间建立相互过渡的有机联系。普遍性并不独立于客观事物,相反它是事物自身的内在本质;它并非从个别之中抽象出普遍,而是内在于个别之中并通过它们得到自身的必要表现的统一;它并非是思维活动的任意创造,而是表现趋向于统一的内在的辩证法、运动或过程。这种普遍性存在于并构成事物自身的存在,事物的差异性、个别性恰好是它们统一的发源处。“具体的普遍”的形成,就是被知性分割开来的相互对立的本质规定,通过辩证法的有机联系得到统一,表现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有限的事物也表现出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一切事物并不是普遍的实例,而是为它所包含,并作为它的环节从它那里产生出来,普遍包含并决定着一切相互联系着的、真实的个体事物,个体事物只有作为普遍有机体的成分才是真实的存在。黑格尔这一套说明自有其渊源和依据,但既然王已发现“具体的普遍性”恰恰是“抽象的普遍性”,总体性恰恰导致取消特殊和个体的集权主义,那么,反过来就要对黑格尔比较贬低的知性重新考察。

知性正确地把“普遍”理解为“抽象的”,因为离开了特殊和个体的“普遍”,不过是人为的设定,并无真实性、实存性;而为知性所坚持的特殊性、个体性,倒并非如黑格尔(李泽厚也是如此)所说的不真实、不存在,而是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实在。如果说在文艺中所

有特殊和个体都必须融解凝聚为总体的话,那么,在社会政治中,需要的却就是始终守护着特殊和个体,以抵抗国家权威和总体意志。所以应当肯定,知性不能掌握美,文艺作品要求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相互渗透、无美统一的,这种美的理想是黑格尔从古希腊艺术中总结出来的,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得到充分实现,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典型”就是综合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体,可以把“具体的普遍”理解为一种审美的概念。另一方面,现代政治原则需要承认个体和特殊的权利,而不能以虚假的公意、抽象的普遍来取代,因此政治思维上主要应当是重分的知性方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根据“具体的普遍”来组织社会生活,那就是政治的审美化,这是一切乌托邦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钉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⑤审美化的政治按照艺术的原则重建公众生活,要求一切个体都纳入整体系统,不允许有任何个体要求和特殊利益的存在,墨索里尼就说过,政治家之于公民,正如雕刻家之于泥土,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标准塑形,甚至可以打碎重来。审美化的政治的特点是,它的宏伟蓝图、壮观场面是在高度集权下才能实现的,它以其炫目的光芒迷惑公众,却在实际中剥夺个体的一切。王之所以没有对知性作出新的认识,与他首先是从美学角度反思黑格尔有关:对于浑融完整的艺术品,知性思维是无能为力的。

另一个问题是,“抓要害”是不是知性方法?王概括知性方法的三个特点,一是坚执区分,对事物取分离的观点;二是坚执抽象的普遍性,把多样统一的内容变成简单的概念和片面的概念;三是坚执形式的同一性,认为非此即彼。这几点的概括是符合黑格尔原意的。但所谓“抓要害”的方法恰恰是在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

要方面的幌子下,不对具体对象进行具体研究,而是肆意越界,以点盖面,以为抓住一点即可带动全局。“抓要害”不是以“知性”为“理性”,满足于对事物的抽象概念,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威意志无视事实编造概念;它没有对具体事物的亲切感知,也没有知性的细密分析,而是实用的经验主义和机械的教条主义的混合。知性重“分”,“抓要害”则是无根据的“合”。王也认为抓要害所得“只是与特殊性紧硬对立的抽象普遍性,它是以牺牲事物的具体血肉(即多样性的统一)作为代价的。”^⑤可见这仍然是无视特殊与个别的“具体的普遍性”,是根据抽象的公意制造出来的特殊、个体。

知性的坚执区分对文艺确实有害,(思辨)理性的“具体的普遍”对政治更是灾难。王正确地抓住了这两点,他的两难在于,当他否认文艺的知性思维时引进了理性的“具体的普遍”;当他后来发现了“具体的普遍”的政治后果时,他又必须抛弃黑格尔的理性。于是,黑格尔的两个概念都成了无所归宿的野鬼游魂。这里需要划界,承认知性方法在哲学上、美学上是不足的,但在科学上、政治上,却是必须首先坚持的。黑格尔的发现了超越知性的辩证法,发现了对立统一、普遍联系的“具体普遍性”,这对哲学是一个有力的启发,对理解美学问题尤为重要。但这个方法和理论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如果越位扩张,只能走向纳粹和文革的“政治的审美化”,把经国大业变为即兴诗;不顾物质利益和道德规范,纯任领袖导师的浪漫奇想,扼杀多元民主和个人意志。所以,把王元化反思黑格尔的见解贯穿下来应当是,在审美领域以“具体的普遍”取代知性思维,在政治领域以明确的知性区分清除(思辨)理性的“具体的普遍”。

顾准:终结“终极目的”

黑格尔认为,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人为堆砌,而是服从于某种

法则的规律性演进,主宰历史规律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意,而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运动着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即是普遍的理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他以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把孤立分散的历史现象建构为一个从东方向西方的世界性的总体行程。《历史哲学》的最后部分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历史的关系,解释“这个革命怎样变作世界历史”,认为“这件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国家。”^②

这个预言没有落空。寒凝大地的 70 年代初,当代唯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提出了 1789 年、1870 年、1917 年的问题,这三次革命改变了现代世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逻辑地导向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冲突。

1780 年革命有一个不幸的背景——对“九三年恐怖”的恐怖,“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从巴黎公社吸取了教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革命专政、革命恐怖成为口号。

顾于此提出三个问题,对于本文而言,重要的是第三个:“1789 年、1870 年、1917 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③

黑格尔为“世界历史”设定的“终极目的”是自由,“‘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克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④历史趋向自由,黑格尔在法国革命中找到证明。然而,当法国革命以断头台、十月革命以古拉格、中国革命以文革而

结束时,顾不相信“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龙种”——“终极目的”。

这一思考有两个维度,一是“终极目的”论的起源,二是“终极目的”论的后果。通过这一思考,顾彻底清理了革命的思想遗产,彻底反省了中国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后果,实际上完成了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关于起源,又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终极目的”论的历史形成,顾确认“终极目的”的起源是基督教传统,其宗教部分即基督复活千年王国的信仰;其哲学部分则是设定了“至善”的目标。法国革命把十六十七世纪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理性主义伸展到人类社会本身,意在用人的理性改造社会、主宰人类。作为其哲学反应,黑格尔结合了“至善”的目的论,以理性与现实的同一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构建了哲学化的新神学。

黑格尔认为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不但是思维的逻辑,也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规律,逻辑学因此是一种世界模式论。这个模式的基础是取自神学的两条主义,一是真理不可分,二是真理是一元的。能够认识此一字宙真理的是“能思维的人”,是客观世界的主人,是神,辩证法就是世俗神学。顾认为真善一致,真善一元说是自柏拉图到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传统,康德以其二元论在其中划下一条鸿沟,以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先验的本质(“物自体”)为出发点,区别了知识和信仰、事实与价值、真与善两大领域,它们的统一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不可知的无法验证的。黑格尔不满意康德的二元论,凭借其辩证法的锐利武器,他坚信人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能够发现历史的规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命运。“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至真的,至真的也必是至善的。”^⑩。晦涩的黑格尔哲学并不远离人间纷纭,他以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并实践至

善真理的论证而把人提高到神的位置：他有权对社会实施整体性改造，使之符合并趋向历史的“终极目的”

所以意在鼓动革命的马克思尽管在《神圣家族》中批评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但顾准认为，在这唯一一次的黑格尔批判中，马克思也没有抓住三个规律和两大主义，而是批评其把概念看得比具体高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完整接受了来自基督教神学的黑格尔唯理主义，“略为说得具体一些，是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黑格尔的一元主义，以及‘能思维的人’，‘其思维，最终说来是至上无限的人’，是客观世界的主人，亦即‘神性寓于人性’之中的黑格尔加以哲学化的新教精神。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人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是不可少的。”⁶⁰《反杜林论》批评了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但恩格斯仍把此一模式的精华即三规律拿过来，称为辩证法，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批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认同其唯理主义的辩证法。列宁说不懂黑格尔就不能读懂《资本论》，良有以也。

革命就是把唯理主义推进到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实践。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以培极式的改造。“黑格尔那一套，全在思辩中进行，在思辩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辩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哲学地解决了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命题拉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解决。”⁶¹唯物主义地颠倒黑格尔的结果是，黑格尔的真善一致、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不再是认识真理等于认识至善的认识论关系，而是真刀真枪明火执仗地行动；所谓实践不再是培根式的生产实践，而是对历史理性的实践证明，是要“在地上实现天国”；从而不但是黑格尔所处的普鲁士，就是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没有体现真善一致的理想，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大体说

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⑤这里只是“大体说来”,语气并不确定,而且其中“亚细亚的”是地理名词,与后面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不构成一个序列。但随着俄国革命的展开,马克思的含混见解被教条化、权威化,“大体说来”变成“必然如此”:斯大林在《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都确认人类历史五阶段模式,共产主义被设定为人类全部历史的“终极目的”,引领着残酷的革命。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终极目的”论都是由唯理主义推出来的,它并非思想家的向壁虚构,而有其认识论起源。顾认为“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⑥早期认识无法对世界作出科学的、客观的理解,只能以主观愿望和想象代替客观分析。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人对自然的解释越来越客观、越科学,但对人自身、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却并不客观、并不科学,上帝造人说被推翻了,但人为万物之灵、人的“终极目的”是在地上建立天国等等却还像幽灵般在萦迴人间。顾引《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作了解剖。“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不是至上的和有限的。”这段话可分解出两重意义:

(1)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2)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某些时候的现实来说,人的思维

不是至上的。按照命题(1)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按照命题(2)人所能掌握的真理是相对的。恩格斯对命题(2)加的附加条件是: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人的思维所处的某一时候的现实。顾准认为:“谨慎一点,可以说:(A)按过去历史,未见例外;(B)推测未来状况,我们还想不出会有例外的状况。”^⑥根据历史,根据归纳法,人的认识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

然而,如果过去的经验没有证明人能掌握绝对真理,归纳法不能推出人能掌握绝对真理的结论,那么真理是绝对的、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的信念从何处而来的呢?顾准分析了命题(1),其四个条件本性、使命、可能、历史“终极目的”,“这四个按照的‘东西’,可以说,无一不是理想性质的。其中,‘可能’一项,理想性似乎不太明显。不过,假如把它解释为人的潜在的神性的话,理想性就十分突出了。”理想的展望,不是现实的“是”、“所能”,而是或然性极大的“能够”。顾准经验性地把这一理想表述为:“甲、按经验归纳,人所能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的,相对的。乙、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⑦基督教神学发挥了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黑格尔体系发挥了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它们都是人的理想和愿望的表达,而不是科学的认识。波普尔有言:“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⑧

理想和想象力是不现实、不科学的,然而,“人要有想象力,那是千真万确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⑨围绕着革命,顾展开了对“终极目的”的后果的分析,他肯定它作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一方面,革命是对日常连续体的爆破和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

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另一方面,革命作为对现存体制和秩序的“他者”,其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现实,它必须以超越现实的历史目的、终极理想为依据,证明自己是“替天行道”“为民作主”。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⑧而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⑨这是极具感召力的。所以“终极目的”虽然是想象的理想,而非真实的存在,但它能有效地进行革命的动员和号召,使社会—政治运动强大有力。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⑩在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持和最后依据。

革命必须设定“终极目的”,这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真实的,而是因为它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它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救民于水火”“建立天国”重任,把“终极目的”当作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任何其他目的,把一切中间过程和部分目标都当作手段,清洗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⑪每次以“终极目的”为号召的革命都导向恐怖和暴力,这其中的原因,波普尔作过分析:“既然我们不能科学地或用纯理论的方法决定政治行动的‘终极目的’,有关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怎样的观点分歧,就不能总是用论证的方法加以消除。这些分歧至少部分具

有宗教分歧的性质,而在这些不同的乌托邦宗教之间不可能存在容忍。”^③“终极目的”原是理想的虚构和动员的口号,谁掌握它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这又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终极目的”都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的,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它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成了真正的目的,革命者从此走到暴政和恐怖,崇高的“终极目的”,是由苦难和牺牲烘托出来的。

至少在主观上,顾并不反对革命,“我赞美革命风暴。”因此他也不是一般地反对作为革命旗帜的“终极目的”论,他的问题是“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之后怎样?“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许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④顾终结了“终极目的”,从中解放出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精神,顾把它总结为五点,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每门知识都在进步,由小而大,由片而而全面,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精神也就是哲学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终极目的”,也就尊重各种思想主张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谁也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人讲话,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⑤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终极目的”、至善理握等等,都是违背科学的形而上学。黑格尔本想用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终因其“终极目的”论而成为最大的形而上学家。所以否定形而上学

不是回到辩证法,而是回归科学,只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才能开出哲学多元论和政治民主的新格局。这是“五四”精神的发扬,更是“五四”精神的超越:它批判了“五四”以来唯理主义的新传统,重新提出了建基于科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以不断的进步取代“终极目的”,以经验归纳取代唯理演绎,以多元民主代替一元专制。这将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

“终极目的”论既没有科学根据,在实践中更造成许多灾难。但对它的清算却并非易事。“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⑧对于像顾这种早已被政治整肃打入另册的思想者来说,这个勇气也许主要不是政治高压,是对自己早年理想的一种痛切反省,而是在放弃了理性万能、理想高调后对庸常的、不完美的现实的承认。“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⑨就是他坚决走向的民主,也决非通体光明,只是“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的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⑩否定了“终极目的”决不是认同一切当下行为,不能把经验主义理想化——顾真正告别了理想主义。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开放社会”理论。但是与波普尔不同,顾并没有否定对中国社会实施整体性改造的革命,只是在“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⑪这就是说,以“终极目的”论为核心的革命理想主义,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成功后有不同的功能。告别黑格尔主义的顾准没有否定革命,仿佛是预见到后人会“告别革命”,他还赞同性地说:“最近看到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⑫他

认为革命在当时的中国是有必要的,而“终极目的”论也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动员问题。顾准批判的是,在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仍然供奉着“终极目的”的信仰,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成政治专制主义。

这里的问题是,“终极目的”论从“飘扬的旗帜”到“反动的专制主义”,并不从娜拉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才开始的,它之成为“飘扬的旗帜”,一方面在其符合人们的一般推理:行动要有目的,而在种种竞争着的目的地中,又有一个总的目的或终极目的,只有它才能成为行动的至上教义。正如波普尔分析的:“看来作为任何合理的政治行动的一种准备,我们必须首先试图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我们最终的政治目的;例如我们认为最理想的那种国家;只有在此以后,我们才能确定何种手段最有助于我们实现这样的国家,或者逐渐向这样的国家前进,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目标,而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驾驭这个历史过程,使它朝着这个选定的目标发展。”^⑥另一方面,有了这个最终的政治目的,革命可以集中分散的特殊意志和目标,专横地把无数人整合进运动之中,这是从法国到中国屡试不爽的法宝。这成就了革命,却委屈了个人,其结果正是阿伦特说的:“人类似乎分裂成为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感觉是无力感。”^⑦

肯定革命中的“终极目的”而否认革命后的“终极目的”,这中间是有矛盾的。整体性的革命需要借用“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滋养了革命,从而,反省终极目的就一定要反省革命,中国革命是否是一个错误可以研究,但根据顾的思路,则必须拒绝这场革命。事实上,顾在反省 1789、1870、1917 年革命潮流时,已经提出民主与自由的进步潮流,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而革命的潮流却走向反面,天国的理想变成为地上的专制。在其

历史研究中,他认为“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⑥顾突出了历史形成的复杂过程和因素,突出了多种客观条件和偶然因素的作用,说明历史是形成的不是制作的,是渐变的而不是急转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历史进步的革命方式,从思考“终极目的”到告别革命,这才是他留给后人的真正遗产。但他毕竟没有正面否认中国的革命,也许他还囿于当时的识见——这是革命者的保留还是思想者的盲点?

余论:三个问题

在纳粹狂轰英伦的危机中,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给他儿子写信说:“在轰炸伦敦时,我已亲眼看到一种骗人的邪说造成的明显的恶果。这种邪说的根据,我认为就在我面前的这本书里”^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纳粹的崛起,在西方(主要是英美)引发了批判黑格尔的思想潮流。

中国黑格尔主义不但是现代思想史上最显赫的存在,也是当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哲学内核,它在1949年的欢呼中君临天下,也在文革浩劫中脓疮溃烂。正是在其肆虐横行的六七十年代,从张中晓到顾准,黑格尔在中国受到质疑和批判。王元化说:“我的某些看法发生变化不完全是借助书本的思考,而是来源于生活的激发。”^⑧如果不是无休无止的政治悲剧,远在天边的黑格尔与衣食皆忧的张中晓何干?不过,在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后果还没有彻底改革之前,这一工作只能是地下的,即使在政治控制松动后,也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除王元化外,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理论上的相互承接。这一“先验制约”,限制了中国黑格尔批判的理论水平和公众影响。

从学理上说,清算中国黑格尔主义又有一种特别困难,与其他

由外国输入的学说、观念、思想不同,以历史必然合理且具终极目的为特征的黑格尔主义,在中国传统中有着深厚根源。《春秋》公羊学、《易》、荀、韩、司马迁、柳宗元直到王夫之,都怀有历史理性与乌托邦思想:历史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将导向一个最终目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在传统意识形态瓦解后,这一思路却又在康有为等近代思想家那里顽强存留下来,并在30年代的社会史和历史研究中获得了新的型态。郭沫若开风气之先,“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产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自期,确信:“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黑黄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④中国社会不能例外于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郭沫若等为中国历史设定了目的,这就是后来黎澍指明的“在全世界都可以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能在中国实现。”^⑤

所以中国的黑格尔主义批判面临着比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大得多的压力和困难,从张中晓到顾准理应是当代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比较起来,张有勇气,李有敏感,王有见识,顾有思想。这其中,顾最为重要。与其令人伤怀的个人身世相应的,是他令人景仰的思想的彻底性。只是在他写于70年代的笔记在90年代被发掘出来后,告别黑格尔的中国历程才获得了一个真正的起点。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和波普尔、伯林、海耶克等进行对话的中国思想家。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黑格尔的批判都是在顾的思想空间中进行的。稍微使人失望的是李泽厚,与张、顾相比,他有最好的研究条件,与王相比,他是专业哲学家,而且对中西哲学,他确有深入研究,他本可以成为告别黑格尔进程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他没有做到。90年代,他尚未完成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就在海外背景下忙于建设“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表现出他

的迟钝和滞后。

这一告别历程将继续下去。需要提出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复杂关系。黑格尔哲学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和总体主义的政治处方,他不能不为中国的黑格尔主义负责。在上述四人中,顾对黑格尔的否定最彻底,“事实上,希特勒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行动家”。^⑧由此收获的思想也最深刻。但不能以此作逻辑的类推,以为批判中国的黑格尔主义就一定要彻底否定黑格尔。英语世界的黑格尔专家泰勒就认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十足是史无前例、无可比拟的。企图拣选几句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切口来将这套政治理论归类,只可能导致可笑的误解而已。”他又加注一句说“不幸,这些误解充斥于英语世界。”^⑨比如,“终极目的”论诚然被利用为总体集权的依据,但黑格尔本来的意图却并不如此简单,泰勒在分析它时指出:“黑格尔坚持最高伦理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实现,他这坚持相当重要。这意味着,最高规范必须在现实事物中发现,而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极力避免妄图根据蓝图来建造新社会。”^⑩因之不能把作为专制恐怖之源的“终极目的”与黑格尔的“终极目的”等同起来,在哲学学说与意识形态之间,横亘着各种更为有力的政治形势与现实需要,是它们在构建着从黑格尔到希特勒的关联。其次,黑格尔本人的形象基本上是保守的,无论是对国家权威的肯定还是对精神原则首先在日耳曼、特别是普鲁士实现的颂扬,黑格尔都被认为是表现了德人特有的“庸人气息”。然而自马克思发现了作为法国革命哲学家的黑格尔后,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怒火就一直喷射不止,矛盾、否定、冲突、斗争、一方吃掉一方的“综合”等等,都成为从俄国到中国的革命动员模式。黑格尔主义顽强生命力在于其既可以赋予革命以理想性质,也可以添加着权威的神圣光芒,可以鼓舞革命,也可以支持现状,这就是顾准说的“目的论不仅预设上

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⑧在拒绝多元自由这一点上,“终极目的”论的内涵始终是一致的,但它在动员革命和保持现状时,功能确有不同,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它的危险性易为人忽略;作为保守的专制主义,它内在邪恶较易受到批判,需要注意的是在其功能变化中的实质的同一。还有,黑格尔主义的名与实并不同一,比如“斯大林的苏维埃国家比黑格尔的国家更坚决得多地要求成为‘人间的上帝’,‘世上的绝对物’。它向其公民许诺的‘自由’决不比极端保守的黑格尔主义形式的自由更具体和真实。”但正是斯大林一再宣布黑格尔是反动贵族分子,要把黑格尔逐出黑格尔主义王国之外。^⑨似乎不存在通向斯大林暴政的黑格尔主义,但事实是这里出现的是名与实的分离,确如勒菲弗尔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变成绝对的国家哲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时,它就退化成为黑格尔主义了。真是历史的作弄,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黑格尔主义被正式抛到历史垃圾堆上的时候。”^⑩由于这三种情况,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关系异常复杂。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黑格尔主义声名狼藉的当代,黑格尔也绝非“一条死狗”,然有其活力和真理性,对中国哲学也有强烈影响,庞朴端绪他对中国辩证法传统的现代解释;叶秀山在研究西方现代哲学时强调黑格尔不可回避;薛华推翻了对黑格尔的一些传统评价,有些结论与顾不同,比如“普鲁士不是历史的顶点”;“历史形态的完善性不是绝对的”等等。^⑪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与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并不矛盾的,相反,只有在彻底批判、清理了作为总体集权的意识形态的黑格尔主义之后,对黑格尔的理解才能真正是哲学的;同样,只有在认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后,才能真正弄清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并对之作出彻底批判。

第二是黑格尔对后来以“黑格尔主义”为名的专制恐怖的批

判。黑格尔是少有的有着成熟政治智慧的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起源于对法国革命的观察和解释,其中许多与反省黑格尔主义直接相关。比如自由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绝对自由其实是“消极的自由”或“虚空”的自由”(这与自由主义者把“1893年”的恐怖解释为“积极的自由”的后果相反),它敌视任何具有明确结构的东西,对任何分化的结构疯狂地加以摧残。所以无法提供任何基础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当所有的旧制度被摧毁以后,它又摧毁它自己所建造的东西,因为那不是从当下活动的意志中涌现的。只有在对毁灭的狂热中,绝对的自由才感到自己是真实的。绝对的自由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人的精神化运动”:人是理性的承载者,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理性的意志。黑格尔的这些分析是可与自由主义者对话的。但黑格尔又认为恐怖之源在于人仅仅局限于“知性”的狭隘观点,无法认识到人是总体的媒介,它简单地把人理解为理性意志的来源,因此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内容,只能从事破坏,并以毁灭自己的孩子而结束。黑格尔是从“终极目的”来论述其自由概念的,“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不行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⑧个体只有在总体中才有其自由,总体是个体存在的根据。他的思想与自由主义者不同,但对九三年恐怖、对后来的专制政治同样具有批判意义。泰勒就指出:“黑格尔对绝对自由的批评,虽然是针对法国大革命而发,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预先对马克思的批评。”^⑨“我们不难想象,看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一般当代革命家对官僚体制化的畏惧,黑格尔会有什么想法。”^⑩不能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对作为专制意识形态的黑格尔主义作出充分的批判,但忽视他的意见是不应当的,黑格尔主义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崛起这一事实,就说明它具有它的两个对手(此前的封建贵族

制和同时的英美民主制)不具有的内容,如果正像泰勒所说的:“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中所指出的两股势力、功利主义式、原子论式的社会工程,以及企图实现普遍意志的绝对自由的冲力,均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塑造形成的作用。黑格尔对二者的分析既深刻亦富洞察力。而且吊诡的是,其所以与我们息息相关,正因为现代社会中它们的重要性原比黑格尔所以为的更为强烈。”^⑨那么,对现代政治悲剧的反省,黑格尔不只是被告,也可以是原告,有了这个原告,历史反省才会比较审慎,比较周延。

第三是告别黑格尔就是走向经验主义,但经验主义虽然是个哲学问题,不过它要进入公共生活,转化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就特别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的支持。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张李王顾等开始走出黑格尔主义阴影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向经验主义、自由主义靠拢,但除顾准之外,他们对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知之甚少;更没有对科学方法、经济理论等由主义的发源地及社会政治等公共领域有具体研究。所以他们多纵横议论,少理论阐述;多原则提示,少细密分析,这与他们大多以文学、美学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框架处理思想问题有关。而西方的自由主义大师们,都有其社会思想的科学基础及其对公共领域的经验性研究,如波普尔之于认识论,海耶克之于经济学,阿隆之于政治学、历史学、伯林之于思想史等等,都是一流学者,他们对黑格尔哲学也有独特理解。这里要再度表彰顾准,他对经济和历史都有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作过仔细检讨。确实,像黑格尔那样的巨人,决不是可以轻易击倒的。比如,与通常的认识相反,“黑格尔哲学是近代自由概念发展上重要的一步。他协助发展了一个以自由为总体的自我创造的观念,这一观念在他的哲学中固然只属于宇宙精神,但是,只要把它转移到人身上,便会使自我依赖的自由观念推逼到最后的两难困境上。他以真正卓越的洞识和先见,揭露这种自由概

念的空洞性及其潜在的破坏性。”^⑩但整个中国知识界似还没有着手分析黑格尔关于自由概念,还没有就其自由概念如何在中国演化为反自由观念的过程进行研究。当然,对于陷全民于浩劫的专制体制和极权思想,每个人都有控诉的权利;对中国黑格尔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应当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得到清理;但要彻底告别作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黑格尔主义,就需要对黑格尔哲学有较全面的理解;要从集权体制走向现代民主,我们就需要有完备的市场体制及建基于上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所以真正告别中国的黑格尔主义必须避免空洞议论与大要概括,而要有详尽的学术思想批判,并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为背景。

可以改写一句中国黑格尔主义的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前途是光明的,因为人类毕竟在走向进步和自由,知识界今天可以反省中国的黑格尔主义传统即是一例;道路是曲折的,因为“光明”其实不过是克服错误中的不断进步。

注释:

①⑨⑩王元化《〈无梦楼随笔〉序》,《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②④⑥⑦⑧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第 6、4、30、112、33 页。

③同上第 10 页。波普尔说:“我所批评的乃是提倡重建整个社会即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那种乌托邦工程。由于我们的经验有限,其实际结果是难以估计的。它自称要合理地制定整个社会的计划,可是我们并不具备为完成这个雄心勃勃的要求所必须的实际知识。”(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 170 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 年)

⑤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 15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 ①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34页,人民1984年第二版;《现代思想史论》第200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
- ⑫⑬⑭⑮⑯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08、233、340、424、414页。
- ⑰⑱李泽厚《美学四讲》,第250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
- ⑲⑳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350、433页。
- ㉑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1页。
- ㉒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127页。
- ㉓㉔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33、351页。
- ㉕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1页。
- 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42页。
- ㉗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82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
- ㉘㉙㉚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30、430、421页。
- ㉛㉜李泽厚《哲学探寻录》、《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
- ㉝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21页三联书店1989年。
- ㉞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110—111页。大办水利是大跃进的前奏,它恰恰是全民性胡闹的开端,详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 ㉟王写于60年代而于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审美主客体关系札记”、“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等文”就已经表达了对知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只是不能确定这三文是60年代的“原稿”还是70年代后期新写的“附录”。
- ㊱㊲㊳㊴㊵㊶㊷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121、122、122、121、21、23、21—22、24页。
- ㊸王元化《清园夜读》第181页,海天出版社1993年。
- ㊹芬德莱《黑格尔再考察》,《黑格尔之谜》第147页,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

- ④④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第116、1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 ④⑤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审美主客体关系札记”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④⑥④⑦⑧王元化《清园夜读》第182、184、185、185页。
- ④⑨④王元化《〈读黑格尔〉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 ④⑩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73页。
- ④⑪王元化《文学沉思录》第25页。
- ④⑫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94—499、503页,三联书店1956年。
- ④⑬④⑭⑮《顾准文集》第371—372、412、411—412、41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④⑯《马克思恩格斯集》第二卷第83页。
- ④⑰④⑱⑲⑳㉑㉒㉓《顾准文集》第345、403、404、404、424、370、406、375页。
- ④⑴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5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
- ④⑵④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512、5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 ④⑶④⑷⑸⑹⑺⑻⑼《顾准文集》第370、370、405、364、368、424、405页。
- ④⑽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 ④⑾④《顾准文集》第70、325页。
- ④⑿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题辞”,商务印书馆1996年。
- ④⑿王元化《〈读黑格尔〉序》。
- ④⑿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④⑿黎澍《再思集》第2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④⑿⑿《顾准文集》第339、248页。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第 129—130、143、239、189、203、260 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 年。

㉑ 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 年第 6 辑第 198 页。

㉒ 引自上文第 199 页。

㉓ 参见薛华《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㉔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53 页,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第二辑

诗 在 民 间

□李恒久

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出现过一批优秀的年轻诗人,我以为堪称为诗坛巨子的诗人只有一位,他就是《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等不朽的诗篇的作者郭路生(笔名食指)。

1968年初,在风云变幻的文化大革命中,19岁的郭路生一首《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琅琅上口的诗风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但是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殉道者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是以对文学艺术的扼杀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短短几年,强大的政治力量便把一切传统的、有个性的文学作品统统视为“毒草”而在公开的场合剔除净尽。那时,文学艺术的领域在中国大陆上几近一片荒原。诗人郭路生一篇篇带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的诗作便是在这片荒原中顽强地破土而出。

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统治着中国文化领域的“女皇”江青读到了《相信未来》。

江青为诗歌的内涵和影响独立不羁的个性所震惊、所恼怒。在她看来,这不啻是一篇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

宣言书。她一定要找到“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的“反动”诗人。

她的党羽们很快就找到了郭路生。但是,江青不相信具有如此生命力和震撼力的诗篇会是出自这样一个年轻诗人的手笔。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惯例,她要寻找诗人背后的“大人物”,她的党羽们到处追根源、查背景,在老一辈的诗人中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事实证明,“反动诗篇”的作者就是 19 岁的年轻诗人郭路生。

于是,诗人被审查,被批判。诗人的家人和亲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诗人的思维是敏锐的;诗人的感情是丰富的;诗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执著的;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是直截了当的。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诗人的意志和感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诗人愤怒了,在愤怒和痛苦中郭路生看到身边丛生的荆棘,感觉到更大的不幸就要来临。他在《黄昏》一诗中写到:“我是站在红色的礁石上/脚下翻腾着血的波浪/这些感情的波涛沉默着/巨大的悲痛失去了声响”。在《书简》的第二首中他也写到:“高举的皮鞭下可还有醉心的恬静/肮脏的辱骂里可也有深切的同情”。

诗人在愤怒和痛苦中渴望着憧憬着光明的到来。在同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彼得格勒还是茫茫无边的黑夜/西伯利亚却早已万物苏醒/彼得格勒还在雪毯下冬眠/西伯利亚却已是朝阳喷薄的黎明”。这就是当时诗人心境的真实记录。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诗人失去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也放弃了很多和朋友们聚会的机会(1968 年下半年开始),但在孤单和可怕的寂寞中诗人并没有消沉,他在反思,为自己反思、为社会反思、为一代人反思。

他不但没有停止创作,而且一篇篇更成熟、更深刻的作品从他

的笔下源源不断的奔腾而出。《难道爱神是——》、《命运》、《黄昏》、《书简》二首等优秀的诗篇都是诗人这个时期的作品。但由于当时的处境,这些作品没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开,诗人自己也没能够完整的收藏。

我和郭路生是在1976年底相识的(那是在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合)。

我是北京第十一中学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我们这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迈进大学校门梦想。作为那个时代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也身不由主的卷入这场可怕的“运动”。

在随之而来的红卫兵运动中,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鲜明的“血统论”的内容。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被称为红五类,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成份也被打入另册。在这人为划分的两大阶级阵营中,后者属于被压迫、被歧视、被限制、被改造的对象,它们的子女也不例外。成千上万非“红五类”出身的中学生被隔离在红卫兵的各种组织之外。

我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自然是属于被歧视、被压迫之列。

后来波及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开始后,一种不甘寂寞、不甘被歧视的潜意识使我只身加入了红卫兵走南闯北大串联的行列。

1967年上半年,红卫兵运动的狂飙时期已经过去。一部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也从最初的狂热和冲动中冷静下来,他们在没有出路中寻找着出路。当时正值中国在“抗美援朝”,他们在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上找到了更具刺激性的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机会。于是一部分红卫兵采取各种途径到了越南战场。

在郭路生的《海洋三部曲》第三部“献给红卫兵战友”一诗中,

对于这一部分所谓投身于“世界革命”的红卫兵也有过这样生动而悲怆的描述：“这夜，深远的天空中星光暗淡／狂风在暗淡的大海里燃起了狼烟／落了帆的小船啊，像是一匹颠狂的战马／扬起的头颈上带着鲜血和勇敢／它忽然跃进浪谷／沉埋在无底的深渊／在哪儿，在哪儿啊／我所期望的小船／呜咽的风掀弄着滔天的浪／精神的船只啊，划动着毅力的双桨／这里已不再是递送微笑的沙龙／我们已踏进流着鲜血的战场／像秋风卷走一张枯叶／命运的海洋啊，将把这条小船带向何方／地狱呢，还是天堂……”

1967年8月，出于相同的目的，我和北京翠微中学的红卫兵傅梅国一同搭上北京开往凭祥的火车并成功的从隘口越境到了越南。

个中的细节不是本文要说的内容，总之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北京。郭路生从我和他共同的朋友何昌捷（何其芳的女儿）、伊里·卡尔（民族学院附中的红卫兵）等人那里也得知了此事，他对我们去越南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1967年11月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百无聊赖中到颐和园去闲逛。在石舫餐厅吃饭时，恰逢郭路生也和农大附中的丁克白、姜克敏及石油附中的老贺（当时他们都是北京中学红卫兵的知名人物）等人在我们的餐桌旁等候吃饭（等我们吃完饭占用我们的桌子）。我们当时互不认识，但对于出身红五类的“老兵”（老红卫兵）的本能反感，我们恶作剧的吃完了饭也不让位。而他们叫劲似的偏要等到底。双方僵持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郭路生无意中听到我的一个朋友叫我的名字，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是叫李恒久吧，你去过越南，对吗”？我点点头，他笑着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一场无谓的冲突化解了。我从此认识了郭路生并成了我几十年来因其而获益匪浅的

良师益友。

从那时起,直到1968年6月我们几乎是日日相聚,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家中。可以说郭路生是何老先生最钟爱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色恐怖”中“焚书”是红卫兵“破四旧”的一项重要内容。爱书成癖的何老先生冒着危险保存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名著。郭路生得以在这里如饥似渴的汲取着营养。

慧眼识人的何老先生器重郭路生、看重他的罕见的诗才,但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里,何其芳先生无限的爱心只能以极委婉、极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

何老一贯认为读翻译诗无论在意境上还是韵律上都多有不尽人意之处,所以,何老多次规劝郭路生尽快学习和掌握外语以便直接读外文诗,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他本身的处境所限,近代诗坛的奇才郭路生终于没有实现何老先生对他的期望。

郭路生阅读的范围是广泛的,他熟悉并大量背诵过唐宋诗词。在北京五十六中念初中时,他就已读过了很多外国著名诗人的诗作,像莎士比亚、拜伦、白朗宁夫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人的诗他都是极为了解的。他尤其喜欢的诗人是法国的波德莱尔和西班牙的洛尔伽,对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无可否认,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天才出于勤奋”。没有他自幼就对于诗歌的酷爱、没有他对于古今中外大量诗歌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研究、没有他永远的独立精神,他也就不可能写出像《鱼群三部曲》、《海洋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洋波澜壮阔,令人有飞流直下、一气呵成之感的诗篇。

郭路生不是那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诗人,但他的创作态度是极为严谨的。在郭路生的诗、特别是他的早期诗中,

我们看不到一点点刀削斧凿的痕迹(但遗憾的是,在我现在看到的几本载有他的诗作的刊物中,他的一些诗已被改得面目皆非了),他的每首诗都像一件完美的、浑然天成的工艺品,令人爱不释手。但这除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深厚功底外还包含着他的血汗和鲜为人知的辛酸。

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相约在北海见面。见面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昨天夜里又写了一首诗。继之,在早春的寒风中,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聆听了他用那沙哑而低沉的嗓音缓慢的背诵了后来曾在一代人中广为传颂的《相信未来》。我被诗中的激情、诗人对未来的期待、憧憬以及他那优美的诗句和深深的内涵所感染、所震慑。直觉告诉我,这首诗一定会是一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传世之作。我请他马上给我写出这首诗,而他自己却觉得诗中的某些词句和段落还欠推敲。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拿到了他已几经修改过的、工工整整抄录的这首《相信未来》。

1968年6月的一天,我们也是相约在北海,他还约了他的好朋友张郎郎(1967年北京的一个文学沙龙“太阳纵队”的发起人之一)和周七月二人同来。那天,我等了很久,但等来的只有他一人。他痛苦地告诉我张郎郎和周七月因为政治问题都被抓走了。他还说,“上边”已经派人到他父亲的单位和他学校的“革委会”去调查过他。而且他发现在百万庄他家附近有人在监视他。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神情是那样的迷惘和痛苦。

在北海公园白塔下那清静无人的茶座上,郭路生把带来的两首诗交给我,告诉我这诗是有感于张郎郎等人的不幸而作。因为把它们放在家里不安全,他请我帮他保存,这就是《书简》二首。我读着这两首诗,听着他低沉、缓慢而无力的背诵着这诗:“真实的告诉我/苦役中的爱人/是谁向你透露出/我心中难言的痛苦/是那伤心中呆滞的目光/还是忧郁中憔悴的面容/是过度的思恋中

消瘦的双颊/还是痛苦在嘴唇上留下的齿痕……真实的告诉我/
苦役中的爱人/高举的皮鞭下可还有醉心的恬静/肮脏的辱骂里
可也有深切的同情……不! 还是别谈这些/一想到这些呀——/
我的心就激烈的撞击着胸/我的血呀! 就火一样烧, 浪一样涌/
你只要告诉我/我们何时才能相逢/是在明年枝挂绿叶/还是就
在今年, 等风雪飘零……

他缓缓的、无力的背诵着, 眼泪也在不断的滴落着, 直至他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 那天直至分手, 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的相对而坐, 共同啜饮着内心里的这杯苦酒。

命运是不公正的, 命运带给郭路生太多的不幸、太多的痛苦、太大的打击。读他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太多的苦涩, 但这“苦涩里流溢着沁心的甘美/甘美里寻不到一屑俗尘”(摘自《索性干脆忘掉她吧》)。

那两篇他后来再也没有收藏, 在那动乱的、谁也不知今后将会怎样的日子里, 为了使这些珍贵的诗篇不致散失, 也是由于我对于郭路生诗歌的深挚的爱, 我把他当时已创作的大部分诗作统统背诵下来(大约有三十余首), 牢牢的藏在了谁也无法夺去的记忆中。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历经十年, 它从身心上冲击着亿万中国人、冲击和改变着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思想。

早在 1966 年底从北京起乃至波及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中, 郭路生的诗才既已脱颖而出。在他参与写过的《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这篇极富幻想与浪漫色彩的诗篇中, 他就以其超人的想象力写出过这样的诗句: “我, 带着中美大战留给我的断臂/你, 带着祖国人民奖给你的勋章/温步在长安街的林荫大道上……他的一首《献给红卫兵战友》更是使他在北京的大中学红卫兵中诗名大震。

但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浪漫和认同在郭路生身上飘忽即逝。他追求真理的本性和思考问题的独立精神使他在冷眼观察中很快就看到了最初的红卫兵已被政治所利用的实质,看到了一时间完全失去理智的红卫兵们将面临的不幸与悲哀。当然,这是由于他诗人目光的敏锐而并非是政治家的预见。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郭路生就已经不再参加那批“老兵”们(红卫兵组织的最早的成员)组织的各种活动(公开的或秘密的)。《鱼群三部曲》就是他在空虚时期创作的。

在郭路生的《鱼群三部曲》这部成名之作中,他以形象的艺术的语言再现了红卫兵的起落沉浮并预示了红卫兵的未来结局。

在《鱼群三部曲》第三部的最后一节中诗人写道:“鱼儿死了,在晚上/黑夜里白花绽放/鱼儿死了,在月下/夜波闪烁着磷光”。这诗中浸透着一种黑色的艳丽、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哀。今天,当我们这些从那时走过来的人重新温习它的时候,不是仍能感悟到那狼烟已尽、尸横遍野的死亡中的宁静吗?

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他从不以天才自居;郭路生在当时的红卫兵中已是颇有名气,但他从不以诗名自傲。他真诚的善待他人、真诚的善待这个世界,他永远的追求着真、善、美。

鉴于他的诗名和才气,一些慕名而来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把自己的诗作拿给他看时,他从不会拒之门外,他总是在认真的读过后,真诚的提出自己的意见。作家刘孝存是我们当年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拿他的诗给郭路生看,他在仔细的读过之后使和我一同去孝存家中拜访。大家在聊天时,他随口便可把孝存诗中他所喜欢的句子背诵出来。

作为普通人,他那善良、真诚、平易近人的品格也是堪为人师表的。

正统的红五类家庭(革命干部)出身的郭路生难能可贵的是在“血统论”最为猖獗的红卫兵发起的最初年代,在作为红卫兵诗人的他身上却寻不到一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在当时非常时髦的思想的踪迹。他鄙视“血统论”,但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在一些很有思想的干部子弟身上也同样存在对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子女的歧视。但在郭路生的朋友当中却有不少像我这样出身于所谓非“红五类”家庭的子女。

诗人的天性是多愁善感的,郭路生更是如此。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他眯起眼睛的背诵诗歌时亦或是由于惊讶于某事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有人说:“文如其人”,年轻时代的郭路生就是这样。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和他的诗歌一样都是充满了激情和感染力的。那时,无论是在何其芳先生的书房里还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也无无论是在百万庄辰区他的家中还是在北海公园那僻静的茶座,我们大家聚会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被他的情绪所影响,或快乐或是感伤。他就像一缕清纯的晨风、像一株美好而又含蓄的百合感染和陶冶着他身边的人们。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前就又幻化出三十年前郭路生那奕奕的神彩、那微微前倾的身躯和他腼腆的微笑。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双军用旧胶鞋,他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烟、酒为伍,三十年来屡戒不止,为此而严重的影响着他身体健康。

在郭路生看来,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诗,但这诗中的快乐亦或是快乐中的诗都太少太少。他曾以“烟”“酒”为题写过两篇优美而又缠绵哀婉的小诗:

《烟》——“燃起的香烟里飘出过未来的幻梦／浓厚的云层里挣扎过希望的黎明／而如今这烟缕仿佛是我心中的愁绪／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我推开明亮的玻璃窗／迎进郊外田野的清风／又多么想留住那逃走的烟缕／那正是你向我告别的身影。”《酒》——“火红色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欢乐酒杯里溢满过疯狂的热情／而如今这酒杯在我激动的手中战栗／波动中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我已在欢乐中陶醉／但为了心灵的安宁／还要干了这一杯／喝尽你那一片痴情”。

郭路生是现代诗坛已逝去的一个时代的歌手和斗士、是中国诗史上承上启下的先驱者。通览他的诗作，虽然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在那压抑中我们也看到他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以及他为理想和光明而奋斗、而挣扎的身影。

诗人郭路生在感情上是复杂而又丰富的。在他的身上集聚着那么多的爱，他爱朋友、爱亲人、爱诗歌、爱艺术、爱这个给予他那么多痛苦的世界，也爱女人。

他的诗才、他的人品、他的气质使他并不乏女孩子的追求，但诗思敏捷、才华横溢的郭路生对着一次次扑面而来的异性的爱恋却是那样木讷和腼腆。在现实生活中，他逃避着女孩子的追求，他用无爱掩饰着内心的沉重的爱。他在诗中曾抒发和感叹过他理想和现实中的爱情。但他的爱情诗留存甚少，而这为数不多的几篇爱情诗使人读来也是这般无奈和沉重。

郭路生在1968年4月创作的《难道爱神是——》这首诗与古今中外诸多著名诗人的爱情诗相比也当属上乘之作：“难道爱神是焦渴的唇／只顾痛饮殷红的血、晶莹的泪／而忘却了在血泊中／还有两颗跳动的心／难道爱神是纤细的手／只醉心于拨弄心弦的

琴/而忘却了在颤抖中/还有两颗痛苦的心/难道爱神是踪引的风/只顾追逐天堂上轻浮的云/而忘却了在地狱里/还有两颗沉重的心/难道爱神是心舟的桨/无意间摇碎了月儿在湖心的印/而忘却了在波动中/还有两颗破碎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那硝烟弥漫、枪炮齐鸣的年代,郭路生的纯真的爱恋其实是被击碎了。当整个社会都在走向毁灭、走向深渊时,那单纯的少男少女之恋还能够幸福吗?1968年6月,政治上对他的迫害已有图穷匕现之势,我那时读了并记下他的最后一首爱情诗《无题》——“羞怯的微笑是醉人的不伤心的美酒/绯红的面庞是丰硕无核心的水果/如果爱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至今还未尝过爱情的焦渴/有人说,酒后异常的苦痛/有人说,水果也有时苦涩/朋友,那是因为我/至今还未亲自尝过/明朗的目光是笔直走不完的路程/深沉的眼睛是躲也躲不过的灾祸/如果维纳斯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的流着/燃烧着,挣扎着/爬进喧闹的江河”。

这两首诗都是郭路生为一个深深眷恋过他的单纯、美丽、善良的维族姑娘而写的。这个女孩子生活在新疆的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特殊家庭里,她家长对于维汉通婚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种世俗的偏见像山一样横亘在他们之间使他们根本无法逾越。他们只有把那纯真的爱恋之情深深的埋藏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永远。我无法记忆,送那姑娘走后,他归来时内心巨大的痛苦和无限的空虚是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他那苍白的脸上的。

郭路生成长在一个正统的革命干部的家庭里,他从小接受着共产党的传统教育。就在他受到一个又一个打击之后,就在他比常人更先看到了整个社会都是被一种政治所扭曲并在他的诗中抒

发着强烈的不满时，他对国家、对共产党、对党的领袖还是不改初衷的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1968年当一批又一批的中学生被送到农村或边疆去插队时，他依旧是满怀激情地为之讴歌。在一次送他的朋友们去插队在北京车站启程后，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是带走思恋和痴情的白帆渐渐远逝／也不是告别的泪水汇成的江水在澎湃汹涌／这是时代的列车向着光辉的未来挺进／这是党的血在沿着钢铁的动脉奔腾／所以，我不该也不用眼泪为你们送行／而应播起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在另一首诗《送别》中他也写道：“朋友，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要分手／一同来歌唱吧／在我们出发的时候／歌唱阳光的明朗／歌唱蓝天的自由／歌唱动荡的海洋里／一只无畏的船头／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

诗人郭路生的思想是深刻的但又是矛盾的，他的目光是敏锐的但他自幼接受的正统教育给予他的信念又是顽强的。是这一切使他的内心深深的受到痛苦的煎熬，而且是永远的。但作为诗人，郭路生无疑是伟大的先驱者。

1968年下半年我和钟阿城（阿城）、孙立帆等人一同离开北京，辗转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插队落户。当我们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疲倦地拖着扒犁、披着星光从庄稼地里归来时，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享受。他的诗使我们焕发着精力、憧憬着未来。阿城在他读过的诸多诗人中偏爱着郭路生，他近于强迫的责成我把我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给他。

许多年过去了，我无从得知在阿城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究竟从他热爱过的郭路生的诗篇中得到过多少启迪，但他倘能读到我的

这篇文章,在他依稀的回忆中,或许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吧。

1970年,我终因“反革命”罪而锒铛入狱。入狱后,我曾在单身牢房里披枷带镣度过两年多漫长的岁月,在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炼狱中又是得助于郭路生的诗篇使我获得生存的信念。为此,我真诚的感激他!

1996年元旦,我和诗人林莽、作家刘孝存又来到阔别28年的百万庄辰区郭路生家中看望他、看望我们共同的朋友——这位曾经在一个时代里叱咤风云的诗坛巨匠郭路生。

郭路生过早的苍老了,岁月的风沙虽击垮了他的身体但也磨砺了他生存的信念。他至今仍未辍笔,仍在为中国诗歌的发展而顽强的创作。

不久前,按照郭路生的要求,我把他由于年代的久远而已遗忘的部分诗作整理出来寄给他,同时写一短信。我把此信亦附于此文:

路生:

自年初一别,又几近一年。我和孝存、林莽等人时时在在挂念着你,不知你近来身体若何?非常想去看望你。

今天,我在这里为你录下的你三十年前创作的部分诗篇完全是凭着我的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很难说其中没有差错。但我想,当你重温到你昔日的这些作品时,无论如何也是可以触发你的回忆,使你把它们继续完善起来的,因为这里凝聚着你的血泪。

路生,这些珍珠般闪光的诗篇是属于你的,但也属于往昔的一个时代,它鼓舞和激励过我们整整一代人。如今,在静寂中我们尚可以听到它那隆隆滚动着的遥远的回声。

路生,作为你的朋友、特别是作为你三十年前曾经朝夕相处过的挚友,我引为自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别数载、渺无音讯。但我们的心却从未分开过。如今,该结束的已经结束、该过去的已经过去,在我们所剩无多的年月里,但愿我们不再被厄运追随。

无数昔日的年轻人竭诚祝愿你的身体早日康复!

1996年11月于北京

附：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
我仍然固执的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的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的,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是的,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干柴。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托住那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小孩子的笔体字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这样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或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他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迷途、失败、探索 and 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的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的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青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赵振先

《今天》忆往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文学刊物多如牛毛,生生灭灭,蔚为壮观。这些刊物的降生大多是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催生他们的大多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骚客,且大多形成流派,各有其文学主张;要不就是划地为牢,由父母官在所辖地域给文人提供一块园地,让他们栽花种草,以供人们观赏那些美不胜收的景色。只有为数不多的文学刊物例外,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要记述的《今天》杂志,它在严冬过后破土而出,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一个未完的篇章。

《今天》文学杂志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创办,这在中国确实近乎于神话,但它又不是大学生刊物,不是官方刊物,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当这份杂志 1978 年底张贴在北京西单街头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解开这个谜。可我明白,这份杂志迟早会出现的,因为我曾置身在那道潜流之中。

《今天》其实是从地下破土而出的一朵野花,由一些充满了反叛精神的青年文人所为,它横空出世,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地夭折了,像一个天赋过高的孩子,直到他他起死回生的那一天到来。

前 奏

话还要从老三届这一代人说起。

在20世纪中国,有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殊,他们从50年代起走上充满美好憧憬的人生路途,60年代还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便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弃学造反,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到了60年代末,他们被逐出学校,发配到工厂、农村和在边疆去“苦其心志”,尝遍人生之苦果,所以其中一些不甘沉沦者“动心忍性”,在文学中找到了他们的归宿,写下了震撼人心的作品。这一代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三届。当然,这种从生活的磨难走向精神创造的经历在古今中外许多文人身上都曾发生过,所以作为一种精神投射才有了诗歌和小说。可是在中国,一部类似犹太人被逐出家园、并使其“增益其所不能”的历史,既是发生在那些作为个人的青少年身上,也发生于整整一代人之中——历史在这代人身上开了一个太过残酷的玩笑。

那时候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生存条件十分险恶,更令我不堪忍受的是文化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除了毛选和几本指定的书外,什么都不许看,这对一个正处于求学年龄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于忍受的,我向往着回到北京,而且真的着手执行了潜逃计划,在70年代初曾几次回到北京。那时候的北京是万物萧索,昔日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不见了。只是走在大街上,墙上依稀还显露出来的斑驳墨迹在提醒着人们:这儿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

那时候的人们应验了老人家的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很多家庭在形式上已经解体,社会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了,干部下放干校碰到了一块儿,知青上山下乡凑到了一起。那些被逐出家园的年轻人虽然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落了,但是有失落就有攀援向上的意愿,他们心中仍然燃着一团火,不管在北京工作还是下乡去了边疆,一旦聚首京城,大家重又因为意气相投串在一起。

70年代初北京有不少小圈子,大多是以原来一个学校的同学

为核心,据我所知,四中有北岛的圈子,三中有多多、芒克的圈子,清华附中有个圈子,师大女附中有个圈子……这圈子很多,比较活跃也最具文学色彩的圈子当属北岛和多多芒克这两个圈子了。我所在的十三中同学们各奔东西,散伙比较彻底,回来之后我已经没有圈子可聚了,于是自然而然贴在北岛的圈子上,他是我的哥哥,我的家也是圈子的中心,尽管我的还乡还不彻底,还是一个户口不在北京的内蒙古汉人,可是在那个年月,谁又“在家”呢?

圈子虽然不能解决令人困惑的人生问题及诸多烦恼,但是一个不断旋转的场,人只要进到里边去就会感到被一种强烈的向心力揪住了。那时候大家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突破口”,大多数人投身诗歌,像北岛、多多、芒克都是从7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大概这和中国人几千年的诗歌情结不无关系;还有人写小说、研究哲学和美学,很像古希腊那个时候的氛围,诗人自由创作,哲人自由探讨,相互关涉,彼此时有往来。那个时候,每个圈子各有自己的内部动力,其间自然少不了一些文人相轻,说起来也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意气相投,才使这些圈子不停地旋转了起来。

各个圈子交流的内容无非是借书,探讨问题,当然也免不了在创作和学问上做一番较量。那时候只有一个人被大家公认为走在最前面,用不少人的话说“启蒙诗人”,这个人就是郭路生。郭路生可以说是从文化革命废墟上站起来的第一位歌手,他的诗影响了一代人,其中也包括了北岛。他的诗在各个圈子中间广为传抄,正是这种交流形式的出现,意味着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在北京城里尚有一个更大的、热衷于文学的圈子在地下运转着,有朝一日当它现身于世时,一定会令很多人大吃一惊的。郭路生的出现所具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这就是:一种自由体新诗正在中国出现,它对1949年之后的文学构成一种挑战,或者说,这种新诗就是中国的前现代主义诗歌,虽然仍留有过去时代的痕迹,但是

这种诗歌在精神上却是一反传统的。

由于手抄诗歌的出现启发了一些人,油印诗集便应运而生,北岛的第一本诗集就是油印的,封面涂上了蓝色,集子取名为《陌生的海滩》,印数大约一百多份,分发给圈子内外的朋友们。多多并不热衷出诗集,他的诗仍旧抄在笔记本上,在大家手上传来传去,多多对于诗歌的去向比较在意,也许在那个时候,这样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容不下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学作品的年代。

我在那个时候热衷于哲学和文艺理论,可以说不光人处于生存的边缘,所思所想之事也与诗歌不大着边。我对诗歌似乎有某种偏见,觉得诗歌是一种太过于奢侈的东西,与我的生存距离太遥远,对于精神上的苦闷,哲学比诗歌带给我的要多得多。北岛的圈子里有一个研究哲学的人,名叫张祥龙,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写过一篇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四三派宣言》,后来他潜心哲学,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至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直到后来我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文学和哲学在终极意义上是相同的,它们和人的生命互为依存,只不过思路不同罢了。

从70年代初期起,北京各个圈子一直都在运转,到了后来,这些圈子的校际色彩日益淡化,代之以更为浓厚的文学色彩,一个个圈子开始破裂,同时不断进行着新的组合。北岛和芒克的关系日益紧密。这种关系日后成了他们一起创办《今天》的基础。到了后来大概只剩下多多一人在家里孤军奋战,用他的话说是在“追求永恒”。一些诗人在圈子内外逐步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圈子继续存在下去反倒需要更多的“意气相投”、更多的理由了。

白 洋 淀

人在他的一生中总有难能忘记的时刻,这个时刻的到来可以说是一种命运,而且并不总在人的意料当中。特别是由于某种原因,人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她和喧嚣的城市掉换角色扮演起了文明之母,于是,在大自然孕育中成长的人,在她的怀抱中吟诵起了浪漫的诗篇。

北京的青年文人们终于在白洋淀找到了他们的大自然母亲。

白洋淀,这是一个离北京不远的淡水湖,那里沟汊纵横,湖泊相连,故而有不少知识青年相约到那里去插队。有人称那里为藏龙卧虎之地,这话一点不假。可以说,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经常在这里相聚,既是因为白洋淀民风淳朴,一派自然风光,也由于在这里插队的有不少是“地下诗人”,诸如多多、芒克都曾在这里落过户。

记得那还是在1974年,我曾在白洋淀住过两个月,那里所具有的“世外桃源”的景色与情调,那种青年学生浪迹天涯的氛围,使我感到这里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回归的伊甸园。在烟波浩淼的大淀上,我曾吟诵起芒克的《十月的献诗》:

——伟大的土地啊,你引起了我的激情!

是的,当饱经磨难的一代人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所能体会的自然是一种抚慰之情,那是大自然赋予的爱,在大自然的情怀中,又有谁能不动情?

我那时住在淀中间的一个岛上朋友处,那是一个村子,四周淀水环绕,出门要划船,颇有威尼斯的韵味。我听朋友说,在白洋淀周围的村子里大都有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有的写诗,有的研究哲学,基本上还是以学校为基础,围着白洋淀扎下根来。有一次我们泛舟淀上,去各村造访,见到一些学生,最后停靠在一个大堤底下。

堤上有一排土房,上去之后我才知道,这里住着清华附中的学生,其中有甘铁生、宋海全等人。那天晚上,大伙闹翻了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人朗诵起诗来,那是和多多芒克一起在白洋淀插队的根子写的《三月与末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充满颓废意味的诗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那时正值乍暖还寒的三月,而末日已经向我们走来。我觉得这代人很像“垮掉的一代”,虽然与美国相距遥远,可是经过 60 年代的造反,我们和他们在精神上走到了一起。

宋海全那时候写了一首名为《海盗船谣》的诗,风格和《三月与末日》有些接近,充满了颓废情调,粗野,豪放,要和“自由的侍女一道私奔”。当时我只是把这类诗和这代人“垮掉”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了一起,还没有意识到,这类诗歌正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直到 1976 年,当中国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多多的诗《教诲——颓废的纪念》出现了,我这才摸着了头绪。那首垮这样写道: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
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
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
用弄哑的噪音,俯在耳边,低声唱:
爵士的夜 世纪的夜……

这首诗虽然不是在白洋淀写的,但却和历史唱起了反调,当时人们都在为一些历史人物相继过世而迷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多多却在诗里用现代主义文学特有的自醒意识宣布:

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
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

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这首诗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气氛那样地不合拍,虽然它只是出现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但是已经有人约略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溢出了社会生活之外,就像啤酒的泡沫溢出了酒杯。

我第一次见到多多还是在白洋淀,还在那个接近末日的春天,我们在他们插队的村子见到了他,当时多多留着背头,穿着白衬衣,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和当地农民形成强烈的反差。后来他到我们住的村子回访,我们“联欢”了一次,多多用洋文唱了几首意大利民歌,其中有《我的太阳》和《重归苏连托》,到了他拔不上去的时候,他便使上捏鼻子往高调音的绝活。

由于白洋淀这面镜子的存在,这一代人从中照见了自己,照见了这一代人。在诗歌创作上,诗人们各自走上了自己的路,北岛试图用诗歌拯救灵魂,多多却在实现自我超越,其实这是一个圆的两上弧,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人本主义,在诗歌创作上都着重于语言实验,二者的诗都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多元性和反叛性的特征,只不过在对诗歌的探索上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而已。

诞生与危机

1975年我从内蒙古回到了北京,分配到一家工厂当工人,每天起早贪黑去上班,为了一份梦想了多年的工作,我的浪漫情调跟着减退了下来。北岛那时候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整天抡大锤,后来索性泡起了病假,猫在家里写诗和小说,其中就有小说《波动》,大多是靠他晚上熬夜写出来的。多多和芒克也相继把户口迁回了北京,陆陆续续,那些在白洋淀怀抱中长大的年轻人都回来了。许多人刚回来的时候没有工作,依旧吃父母的,除了读书写作,再就是在圈子里外串来串去,过着一种寄生而又闲散的生活。

其间写诗的还在磨砺诗艺,研究学问的还在读书思考,这一代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迎向不可名状的未来。

时间的脚步走得这样迅疾,随着 1978 年那个骚动不安的年头降临在中国的大地上,新的思想,新的追求,正在以难以遏制的势头冲击着整个社会。中国人为乌托邦式的幻想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们渴求在新的方式下过多少像些人样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今天》诞生了。

《今天》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不合法的,他像是一个报不上户口的私生子,不能去医院只能接生在家里,这个家就是我的家。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 1978 年的年底,老百姓正在准备过新年,社会上吵吵闹闹,在离我家不很远的西单那边,人们在街头申诉着、争论着。我下班回家免不了要绕弯上那儿看上一眼。那天我从西单回到家里,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家里床上桌上,到处是一摞一摞的纸,上面印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哥哥正和几个人忙着装订成册。他见我疑虑重重,就告诉我,他和一些朋友一块儿办起了一份文学刊物,起名《今天》。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潜藏在地下多年的诗歌和小说就要出世了。那天是 12 月 23 日。第二天当我再次经过西单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期《今天》,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便知道是铁窗。上边就有北岛那首宣言一般的《回答》。

当时国人对这类有着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不大能接受,有的人在刊物上写下了批语:“现在冤案这么多,你们不去管,写这些看不懂的东西干什么!”可见现代主义文学来到中国还是早了点,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文学还需要解冻,还得揭露社会的创伤,化解文化大革命中文学“高、大、全”的极左内容和形式,干嘛非要写这些看不懂的东西呢。可是文学毕竟是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不可能再在孤立中存在下去了,它必须、而且迟早得和世界文学特

别是西方文学汇合,就像社会的现代化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一样。在那个时候,《今天》在人们眼里是一份奇特的刊物,许多人不明白在诸多的社会纷争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在说话。其实这是一种对国民性进行自我改造的话语,在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它在改造着人们在文化专制主义下形成的僵化的思维习惯,这怎么能说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呢?

《今天》虽说诞生在我的家里,可是编辑部的地址却是保密的,据说总在搬迁,很有点革命者从事地下工作的味道。有十几个朋友经常聚会,商量稿子,买纸张印刷,后来因为意见不和,只出了一期便做鸟兽散,一批人退出了编辑部,只剩下北岛、芒克和画家黄锐三个人。《今天》处于危机之中。

眼看着双月刊《今天》再次出版的日期临近,不仅北岛心急如焚,我也很着急。毕竟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啊。刻腊纸没人,我凭着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出来的那点本事,上手干了起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介入《今天》的工作。然而,我家是机关宿舍,不是拥有了房产便可以为所欲为的私宅,自然无法当做编辑部,《今天》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

就在《今天》处于极为困难的时刻,一个朋友愿意让出他的房子,作为《今天》杂志的编辑部,那就是位于北京东四一条胡同里的一间房子,很多人管它叫76号,其实那间屋子只不过是门牌“76号”大杂院中的一间罢了。那间屋子分为里外两间,面积不大,属于北京城里最老旧的那类房子。可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总算有了一处安身立命之所。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再次运转了起来,第二期杂志于1979年2月如期出版了,而且封面改为十分漂亮的天蓝色,一男一女抬着头迎向《今天》。这确实给人以信心。

北岛是《今天》的发起人,自然是主编,副主编是芒克,还有黄锐,后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进来,其中有谿晓,陈迈平,周楣英等

人,还正式搭起了编辑部的班子,由芒克和周楣英负责日常工作。有几个女孩子自愿参加到编辑部的工作中来,从事那些繁杂的出版发行工作,而且是不计报酬的,至今我都觉得那几个女孩子是太难得了。那时正值 1979 年,那是一个与旧的时代告别、走向未来的年头,所以有人愿意奉献,用自己的青春年华铺出一条通向未来的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管你来自何方,也不管是谁,只要你没吃饭,一到了 76 号,准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你的面前。这也是一种大锅饭,但吃起来别有味道,因为来到这里的人都有着共同的心愿:不但要把《今天》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这一代人太需要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刊物了。

《今天》终于第一次走出了生存危机。

《今天》沙龙

《今天》作为一份同人刊物出现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毕竟这是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纯文学刊物,与当时出现的其它刊物,即使是有着某种文学色彩的《沃土》杂志仍有性质上的不同。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刊登在《今天》上的诗歌,当杂志张贴在街头、校园和学术单位之后,不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表示了认同,更使一些从事诗歌探索的青年文人纷纷向这份刊物靠拢。《今天》的圈子越围越大,影响逐渐向社会上幅射开来。

在办了最初的两期之后,一些人陆续参加了进来,其中有杨炼、顾城、江河、田晓青、方含、林莽等人,当然还有舒婷,舒婷在《今天》第一期就发表了《致橡树》,以她女性的笔触书写爱情,在社会上赢得了不少人的好评,可是她身在厦门,人一直未进入圈子之中,只好以诗会友。多多那时仍然蛰居在家埋头写诗,不与《今天》发生关系,直到后来几期才在《今天》上发了他的诗,他算是《今天》的一员吗?要是从发表作品的角度看他是,不过他从来没有介入

《今天》的活动,始终独处一隅,在孤寂中进行诗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多和《今天》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充其量是处在这个大圈子的边缘上。

有人献出了 76 号作为编辑部之后,又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家贡献了出来,这人就是赵楠。他的家离 76 号不远,那是一座深宅大院,其中一间不小的屋子归他居住,后来每隔一个星期的周末,《今天》编辑部都要在这里讨论作品,于是赵楠的家成了《今天》沙龙的所在地。

那时候凡是有人写了作品,都可以拿到讨论会上朗诵,可以是诗或小说,也可以是评论,甚至杂文随笔全可登场献艺,朗诵完之后再由其他人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大约得到肯定的评价比较多的作品即能刊登在《今天》杂志上。《今天》确实以诗歌见长,每次讨论会上人都以探讨诗歌为主,而且诗人都在探索各自的发展方向。北岛和顾城在意象上着力挖掘,江河和杨炼逐步向史诗发展,田晓青趋于颓废没落,他的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梦魇一般的世界。后来又有更多的诗人加入到《今天》沙龙中来,其中有个人年纪最小,不过二十出头,他名叫大春,虽然年纪不大,他在诗歌创作上却很投入,而且朗诵起诗来从不怯场。

《今天》的小说创作相对诗歌显得弱一些,作者也比较少,主要的作者有史铁生、甘铁生、陈迈平和北岛等人,基本上还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写法,不像诗歌创作那样突入了现代主义。也有人在小说上寻找现代主义的突破口,刘自立就是其中之一,他写的小说有些像德彪西的印象派音乐,迷离而又缥缈,让人难以捕捉其意境。

由于我一直研究哲学和文艺理论,就在《今天》沙龙里扮起了批评家的角色,围绕着一些文学现象,我写了几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名《试论〈今天〉的诗歌》,是探讨现代主义诗歌的,刊登在杂志第六期上。那篇文章我写得好吃力,也许诗歌是最难谈论的,因为

诗歌语言本身就充满着悖论,要想用白话把诗歌解释明白恐怕比什么都难。然而我确实硬着头皮干了一回。

《今天》沙龙越裹越大,大学生、其他刊物的编辑、文学爱好者和洋人纷至沓来,在赵楠家里开起了生日宴会和舞会,此时的《今天》沙龙不再显得那么书生气了,很像是个精神贵族们聚集的场所。

《今天》编辑部曾经将一些活动搬到社会上,分别于1979年4月和10月在玉渊潭公园举办过两次诗歌朗诵会,在朗诵会上,许多诗人第一次在社会上亮相并朗诵自己写的诗,与会者有数百人之众。编辑部还曾于1979年9月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读者、作者和编者的恳谈会,读者可以找相关的作者漫谈,从中求得沟通。

从70年代起形成的各个地下文学圈子,在1979年基本上汇到《今天》的周围,就像埋在地底下的种子,当春暖花开时破土而出,给冻伤了的大地带来了些许的生气。

《今天》与《星星》美展

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有同源之说。诗人往往会画上几笔,而画家也总能谄上几句诗,所以诗画走到一起,大约是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人的必经之路。关于这一点,《今天》杂志和从《星星》美展在1979年的碰头就很能说明问题。

大概由于黄锐是《今天》美编的缘故,所以当他和一些人也准备把他们的画公之于众的时候,《今天》可以说又多了一个在艺术上造反的伙伴。其实在绘画艺术上率先进入现代主义的并非黄锐和《星星》美展那些人,而是一个怪才,他的名字叫彭刚。彭刚并没有下乡插过队,他比老三届年龄小,中学毕业后分配在工厂当工人。彭刚学习绘画似乎是无师自通,从来没有上过美术学院,可一

动笔画起来就进入了现代主义,虽然他在绘画上的成就与凡高还无法相比,但他和凡高在艺术上所走过的路却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彻悟人生,用狂放的色彩和笔触,来表现精神上永无止境的追求。

我记得在我家里曾经挂过一幅彭刚的画,看上去颇有意境,一团团云彩从湖对面飘来,不但富有生气而且用色十分怪异,仿佛是从火车头里喷出来的浓烟,可是火车头在哪里呢?对这幅画我似曾相识,再仔细一看,原来彭刚利用了俄罗斯风景画家利维坦的一幅画,在原作基础上来了个再创造。

彭刚早熟而且早夭,他在7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现代主义的绘画创作,而且写诗,到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学的既不是绘画也不是文学,而是谁也想象不到的化学,难道他学化学就是为了研究颜料的配制吗?不会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想逃避艺术,艺术曾经那么让他着迷,现在又成了沉重的包袱,他想甩掉艺术,甚至周围的一切,最后他去了美国,但是美国并不是天堂,他也不会因为去了那里而使烦恼一了百了。在那个政治上极为压抑而又残酷的年代,文学和艺术是青年人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躯壳。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再怎么样也安分不下来,大概彭刚终于除去了身上的躯壳,结束掉自己的艺术生命,这种作法和某些热爱生命的人最终用自杀的手段来结束生命如出一辙。

我和彭刚一度很熟,那时候我正在家中赋闲,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去看足球比赛或者逛公园。后来他不见了,听人说他对什么都感到厌倦,只想过凡人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彭刚是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开拓者,他走在时代的最前面,虽然没有像郭路生那样陷入了疯狂,可也尝够了孤独探索的苦果,最后他到大洋彼岸去了,大概仍然想找到些什么,像一个丢失玩具的孩子那样不甘心。

中国有句古话曰：“不为天下先。”这句话虽然有着很浓的功利主义味道，却也道出了做先行者必然要做出牺牲的道理。彭刚是隐退了，但是到了70年代末，一批在绘画上从事现代主义创作的画家脱颖而出，其中有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人，并且发起组织了《星星》美展。第一次美展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改在美术馆外边，他们把画挂在铁栏杆上展出，美展前后只存在了不到两天便被取缔了。那是1979年9月27日到9月29日的事。

我记得很清楚，27日那天在美术馆东侧的街头公园里，人们面对着那些油画议论纷纷，这样的场面好像在哪儿发生过，是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艺术家奋起造反，最后致使警察出面干涉，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这是《星星》画家第一次举办美展。后来在1980年8月，经过不懈地努力，《星星》美展终于登入美术馆这座大雅之堂，而且先后一共举办过三次，最后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公园。这三次美展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美术的冲击，当时在社会上对《星星》美展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冲击波。由此也可以看出，当现代主义艺术来到中国时，要人们一下子接受它还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但是《星星》美展的命运比起彭刚来毕竟要好得多了。

那时候黄锐主要从事油画创作，他的画风一变再变，从最初的现实主义转到了后来的抽象主义，几乎把西方的诸多流派一下子全开了过去；马德升则用木刻表现着某种富有民粹色彩的题材，人民的苦难一度是他关心的焦点。王克平比起黄锐和马德升来不同，他用极为普通的木头雕刻出极为抽象的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显示出一种颇为奇特的东西。参加《星星》美展的其他画家还有严力、李爽、曲磊磊、甘少诚，还有钟阿城，他是以单线条的钢笔画参加到《星星》美展中来的，那时候他是《星星》的一员，并没有过多地介入《今天》的活动，可是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某种创作上的转换，

也许他钢笔画中的人物最终活动了起来,几年后钟阿城从画家变成了作家。

除了黄锐,严力是另一横跨《今天》和《星星》的人,他既作诗也画画,而且画风很有些超现实主义。在后来的《星星》美展上,每个《今天》诗人都出来为一幅画配诗,由此可见诗情画意之深厚。要在《今天》杂志和《星星》美展之间找到交汇点并不难,因为诗画同出一源,诗歌和绘画在中国历来就是难以拆分的一对,从这上面我们仍能感受到某种很强烈的传统意味,尽管作家艺术家都在反抗传统,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却又很传统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似乎秉承了前人在艺术上直觉的传统,不像西方的作家艺术家那样热衷于哲思,这事是好是坏还很难评说。自古以来诗歌与绘画在中国一直比较发达,而在哲学、小说和音乐这些领域的人文创造却难以向纵深求得发展,至少是众多的人们并不像热衷于诗歌和绘画那样倾心于哲学、小说和音乐。如果说现代主义还并未真来到中国,我认为这话也许不为过,因为其他的人文创造还没跟上来,诗歌和绘画已经作为急先锋冲在了最前面,是不是有些太凸显了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后人来回答吧。

诗人之路

国家不幸诗人幸。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终于与战争和动乱脱开了干系,从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对人生的追问自然不像先前那样执著了。可是在中国,特别是在老三届这一代人身上,情况却大不相同。就以《今天》而论吧,恐怕没有一个人是认准了当诗人的理想而后走上诗坛的,这批诗人的出现并不是大学中文系制造出来的,而是他们面临时代的贫乏和精神的深渊,“必须把世纪之夜看作那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一方面产生的命运。……这是诗人本性的必然部分,即他能够在这种时代成为一个真正的诗

人之前,时代的贫乏必须使人的整体存在和诗人的天职成为一个诗意的追问。”(海德格尔语,下同)由于这样的追问对诗人十分必要,所以诗人一再追问,在命运的驱使下,这些人终于成为了诗人。我们还以北岛那首《回答》为例,诗中这样写道: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人正是在如此不断地追问下才成其为诗人。

我和北岛在7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间屋子里,他的诗作大部分都是先让我过目提意见。在那个充满困惑的年代,我从这些诗里感受到了精神上的震撼,特别是他早期写的那首组诗《太阳城札记》,仿佛让我听到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在那个时候,唯有这种东西才能激人向上,不致沉沦。“更大胆的人使存在自身冒险,因此也使他自身大胆冒险进入语言,这样,他们便成为言说者。海德格尔不愧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人,他说着了,人要是不在冒险之中进入语言,他不可能成为言说者。如果没有这样的怀疑,没有这样的追问,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本真意义上的诗人的。

我曾经一度怀疑北岛在诗歌探索上究竟能够走多远,而他却一直摸索自己的路,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乃是家园,

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直到最近,当我看到他新出版的诗集后,我才发现他在诗歌语言的探索中着实走得够远的了。

对于多多,我不知道他对诗歌语言的探索是从哪里开始的,据他回忆,他写诗是在根子的刺激下动的笔,不像北岛那样在怀疑和追问中开始的诗歌创作,他在语言上刻意追求一种狂放不羁的意象,使痛苦、死亡和爱情这些被时代的贫乏遮蔽起来的主题敞开了。我读多多的诗,总感觉到他像个从海外归来的人,用一种欧化语言在对中国的一切展开批判;也许他是一粒沙子,在他钻进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大贝壳里之后,感到百般的不舒服,非要磨出来一颗珍珠不可,而这颗珍珠就是他的诗歌。

北岛和多多虽然都在从事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但他们所走的道路十分不同,大概这也是现代主义文学多元性的特点吧。北岛是从自身的危机出发,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世界,最后在诗歌之中实现了个人与他人的灵魂拯救;而多多一直扮演着一个超越者的角色,他仿佛从西方人的手里接过火炬从天而降,操起语言这把利剑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展开一场大批判。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最后唯有在语言中言说,用语言来改造中国人的言说方式,从而改造着中国人的国民性,除此之外,诗歌对社会改造并没有多大的功能。

还有芒克诗歌。芒克早期的诗散发着纯真的青春气息,特别是他那组《十月的献诗》,仿佛给那个垂死的年代注入了活力,使那些在政治压力下喘不过气来的大孩子们获得再生,这也是一种关注生命的现代主义诗歌样式。

人们面对这些并非现实主义的诗歌时一定会发问;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偏偏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现实主义真的不中用了吗?我曾一再思考这些问题。记得加缪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西

绪福斯神话》，讲述了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西绪福斯的，他整天把大石头往山上推，滚下来又推上去，终年不止，从而引发了加缪关于荒诞的话题。固然加缪可以引用西绪福斯来谈论荒诞，可我却从所谓的西绪福斯现象中发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西绪福斯整日推石不止，从意念上探讨固然可以引申出荒诞的话题，但要是从理想上讲，他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总是在理想的感召下向着未来奋进，由于西绪福斯怀抱着未来一定是美好的这种理想，他才不肯放弃努力，并且相信他终将会把石头推上山，关键是他过去做得不对，所以石头才一次又一次滚了回来，这其实就是现实主义的命题：即使过去谬误的，未来终将是美好的，在线性时间之中，生命在当前只能被悔恨与期盼的中空占据着，人只有追随着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直至耗尽他的生命。在现实主义看来，作为“此在”的生命在时间长河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要把生命当作供品奉献给理想。郭路生虽然是老三届中第一个歌手，在代表作《相信未来》中，他仍旧无法摆脱现实主义的羁绊，始终在悲叹理想的破灭，并指望着用诗歌在一代人中间重新燃起理想的火焰，他的心愿始终没有实现，直至最后归于迷狂。倒是北岛在孤寂中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我不相信”，粉碎了郭路生“相信未来”的理想，中国现代诗歌终于跨出了超越现实主义的一步。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出现难道是诗人赶时髦吗？不是，绝对不是。正如本文开始所谈论的老三届，那是由美好理想培育出来的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推上山巅，而后又重重地抛下来，摔得遍体鳞伤，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从生命的中空状态开始了精神探险，冒险者是有意愿之物，保持于意志之中，它自身保持着意志的方式，并且自我冒险。……靠这种意志，现代人显现为一存在物，他在对存在物的一切关系中，因而也对他自身的

一切关系中,都作为贯彻、实现的制造者而站立起来,并且把这种站立建立为绝对的统治。”于是,诗人不再追求那虚无飘渺的理想,而是将自己投入语言。“他按照其本性拥有语言而且不断地用语言冒险。”

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说是由于一代人挣脱了时间的锁链,诗人从生命的中空状态向生命的本真状态回归,在共时空间建立起生命的王国,用语言去言说,去命名,“当人比所是的一切,比自身更冒险时,人以此方式是更丰富的言说者”。

时隔15年之后,我又一次谈论起了《今天》的诗歌,我说对了吗?不知道,也许不是我说对了,而是海德格尔一言中的。

未完的《今天》

《今天》在奏完了两个乐章后于1980年底暂告一个段落,第一个乐章是由九期杂志组成的,第二乐章是由三期文学研究资料组成的,看上去很像一首未完成的交响乐,虽然不是舒伯特的那首,可也十分悲壮、激越。第一乐章的终止符停在了1980年9月12日那一天,第二乐章的终止符停在1980岁末,《今天》终于在冬天的寒风中消失了。

《今天》这首只有两个乐章的曲子一共存活了两年,从1978年起至1980年终,出自冻土而又被埋在了冻土之下,一直过去了十年才又在墙外边开出花来,正所谓好事多磨。

说起来《今天》被埋葬在地下十年是时代的不幸,可是还有更不幸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的第一批诗人。为此多多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记述的全是些最早献身诗歌艺术的殉难者,其中不乏一些当时颇为知名的诗人,诸如郭路生、伊群和根子等,他们不是为时势所迫而搁笔,就是陷于疯狂不能再写诗,但是他们在中国现代诗歌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会被忘

记的。

《今天》虽然一度销声匿迹,在中国文坛上不见了,可是在《今天》之后,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在社会上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批评界还是承认了“朦胧诗”,而“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和江河正是《今天》的诗人,也就是说,社会虽然拒绝了作为杂志的《今天》,却承认了她的诗人,唯独落下了多多。

多多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不能算是一个“朦胧诗人”,可是在十年之后,也就是1988年的12月23日,当《今天》同仁在北京团结湖的纪念集会上把首届《今天》诗歌奖颁发给多多的时候,一个解释学的圆圆出现了——社会承认了《今天》的诗歌,《今天》又褒扬了当时还不太为社会所接受的多多的诗歌,在社会和多多之间,《今天》搭起了一座桥梁,从而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重要的诗人是不会埋没的,纵使今天被埋没明天被埋没,早晚有一天他会站立于诗人之林的,正如北岛在那次集会上代表《今天》编辑部宣读的授奖词所说的:“自70年代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奖品是一套《今天》杂志,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因为全套杂志在十年之后已经是稀罕的纪念品了。

由多多来接受第一届《今天》诗歌奖应该说是公平的。在十几年的诗歌探索中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后来结集出版,诗集取名为《里程》,收集了多多从1972年至1988年的诗歌,在诗歌创作上他确实是“孤独而不倦”,笔耕而不辍,以他献身诗歌的精神辛勤耕耘,换来了累累硕果,并且慰藉了那些为诗歌殉难的人们。

《今天》的前两个乐章是演奏完了,当后面的音乐重新奏响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刺耳的音符在乐曲中响了一下,随后消失不见

了,这个音符就是顾城。他在做了太多的孩子梦之后,终于坠入深渊里去了。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和他相识的时候,他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孩子,两眼迷茫,说起话来磕磕巴巴,总是显出心不在焉的神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不喜欢戴手表,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不愿意让时间来摆布他的生活。顾城也是一个抗拒时间的现代主义诗人,他大概已经明白,只有在深渊中才不会有时间来挤压他,所以跳了下去,把让时间占据着的世界留给了其他的人。

顾城死了,他的童话讲完了。一个音符滑出了乐谱,不和谐的半音出现了,于是乐曲中出现了死神的阴影,“现代”与“后现代”开始了新的对位,《今天》这首乐曲还要继续演奏下去……

□ 齐 简

飘满红罍粟的路

——关于诗歌的回忆

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罍粟为什么开红花》,这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美丽的课文。丹柯举着自己的心向前走着,照亮了森林中的路。在他的身后,在他的血流过的地方,开满了美丽的罍粟花……

后来读北岛的《走吧》:“……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罍粟”,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壮的美。这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正上中学,与校内外的一些学友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以文会友,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群体。当时北京学生中这样的群体很有几个,互相之间也有一些多边的接触和重合。在我周围的这个群体中,比较固定的成员先后有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戎雪兰、潘青平、武嘉范、陶洛诵、张雷、孔令姚等人,男四中号称“三剑客”的赵振开(北岛)、曹一凡和史康成,还有清华附中的仲维光、宋海泉、郑光召(郑义)、甘铁生、刘满强、车宏生等。

这个群体的出现最初是在1967年。一方面,被迫中止了学业的年轻人满怀求知的渴望和对周围世界的困惑不解,从不同的角度与途径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另一方面,从领袖到学生普遍膨胀的理想主义与严酷的现实开始对撞,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喟叹。这年秋天,我以弟弟养在瓶中的热带鱼为题,写了一首《临江

仙》：

剑头凤尾翩翩舞，
清涟顾影婷婷。
静如秀玉动生莹，
彩鳞多婀娜，
锦腮自含情。

杯中有水乐便在，
何必逐浪平生。
龙门堪劝鲤兄明，
似我非无志，
终饰案头瓶。

1968年是理想主义的顶峰，夏天，我和女附中老高一的两位学长戎雪兰、潘青平一同混入水木清华，冒名顶替住进大学生宿舍，过了一段如诗似梦的校园生活。不记得她们二位当时所读何书，我自己则是一本唐诗三百首，一套中学数学课本。每日黎明即起，洗漱已毕，便携卷踱上荷花岛，开始一日的功课。那时正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一个早晨全能将字数如《长恨歌》的篇幅背得烂熟。下午骑车到体院游泳，晚上则乘着清凉的夜色，或荷塘赏月，或秉夜长谈。有一次，我们还趁着月白风清潜入颐和园，我和戎雪兰并排躺在排云殿脚下一只一底大木船的舱底，听微波拍岸，望斗转星移，推心置腹，海阔天空，人仿佛与山，与水，与风，与月溶化在一起，进入了一种宠辱皆忘的无我之境，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那是我至今难忘却绝难再有的一种感觉。

那时我17岁。17岁正是人的一生中的春天，是充满诗情画

意的阶段。但这种诗情画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很快便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不久,我们被清华工宣队发现,通知女附中将我们三人“押解”回校,隔离审查,随后便被淹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作鸟兽散。

小时候做过“击鼓传花”的游戏,在忽快忽慢的鼓声中一朵绢花或替代物在参加游戏的人手中轮回传递,每个人的心都随着鼓点的节奏忽快忽慢地跳着,鼓声停时手传花的人便是被选中的人,要表演节目。命运之神在领我们做着这个游戏,她把鼓点敲得蛊惑人心,我们在想但愿不要停在我们手里,想未必就停在我们手里,但最后的结果恰恰就停在我们手里。我们被选中成为不能升学,不能就业,更不能吃大锅饭的一代。而在此之前,升入大学意味着毕业后将得到一份月薪至少48元的工作,相当于一个县长;即使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也不难找到一份工作。从我们这一代起,这一切都没有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在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严重背离了客观规律的恶果。这是两代人的分水岭,是一条无法填平的“代沟”。这种必然性实际上早就开始孕育在我们出生之前。

从1968年下半年狂热的理想开始降温,对人生和社会的思索开始走向深化。贫穷,寒冷,饥饿,劳累……究其竟都还不是最深的痛楚,大环境的压抑最令人窒息。

这时写诗的人已有不少。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诗歌教育主要是以毛主席的词为版本的,因此起初写旧体诗的人居多。写诗不是为发表,主要是抒发情绪,把那种混杂着青春、理想、郁闷、茫然的情绪浓缩在字斟句酌之中。不过,格律并不严谨。记得那时与我有过诗词交流的有戎雪兰、潘育平,还有师院附中、二十八中、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一些同学。后来成名的大诗人当时尚未登场,想是在厚积薄发。

戎雪兰在我人生中有过重要影响。我自幼不大讨人喜欢,在文革初突如其来的急风暴雨中几乎陷于没顶。1967年我们相识,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她多才多艺,不仅国学造诣很深,而且游泳,滑冰,拉手风琴,样样都很漂亮。她有思想,有主见,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很杰出的。1968年冬天我去了内蒙,她去了白洋淀,从此便音讯渐稀以至全无。我在1970年曾有诗给她,其中有“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的句子,表达了我对她的思念的敬重之情;她回我曰“芳凄草迷归路断,绿绮久损恐难弹。缣纸虽感暖君意,无奈岁月易温寒。灵旗空扬赤子繁,朱帘待秀正辛酸。去载玉关一掬土,胜似秋山枫叶丹”。近日听说她在美国做社会学博士后,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甚至白宫的关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本来就是龙象之材。

1968冬季我到了内蒙农村。当时经历了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又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还生了一场肺炎,精神却并没有全垮。有《满江红》词一首为证: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

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纓,赴蛮鞑。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这首词一寄出,应者甚众,大约能有三十余首。可惜绝大部分都已散失。记得阎恒有“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的句子。

1969的下半年起,我大病初愈踏上归途。从内蒙经河南、甘肃、山西,辗转漂零了五个月,终于回到北京,在几个朋友家轮流栖

身。这时又写了一首《满江红》，算是对朋友们的回答：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

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躬耕来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儒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这时写古体诗对我来说已经得心应手，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但翻检几年间的四十余首作品，却没有什么满意之作，总觉得是隔靴搔痒，意犹未尽，写不出内心深处真正的感觉。这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古人用他们的语言表示自己的情怀，其形式也经历了从《诗经》到唐来到明清到民国的发展变化，成为精美绝伦的园艺盆景；我们可以将其用于玩赏，真要用于意思表达，就难免有矫揉造作之嫌。因此今天应有今天的表现形式。再过若干年，还应有更新的表现形式。

郭路生的诗就像是吹面不寒杨柳风，让人顿感情神为之一振：

燃起的香烟里漂浮过未未的幻梦
浓厚的烟雾里挣扎过希望的黎明
可如今这烟缕仿佛是心中的愁绪
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

我的命运是辗转漂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

只希望敲倒在朋友的门下
得到一点微薄的施舍.....

这些诗句在我心中一遍又一遍低吟浅唱,仿佛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溢出,仿佛是在我自己的血管中流淌,使我激动不已。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使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鱼群三部曲》等。这些诗我至今会背。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背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从那以后我便没有再写。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郭路生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其意义有如建康文学。使启发和激励了一批更为出色的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郭路生,称之为当代新诗的第一人是毫不为过的。而我自觉在美学的涵养和哲理的思辨方面都很有限,超越不了使的高度。因袭又不愿意。二是清查“五·一六”清到我头上,所有的文字材料郭受到监视,惹不起这个麻烦;三是不堪生活的重负,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特重体力劳动才勉强能够自食其力,纵有诗情也没有诗意了!

第一次读到赵振开的诗是在 1972 年前后:

把我的话语传向四方吧,
——长风的使者!
我是那漆黑的个夜里
一把黎明的火

我是那死样的沉默中
一首永恒的歌！

这几行诗引自赵振开于 1971 年夏季去湖北沙洋干校探望父亲返京时在江轮上所写的《在扬子江上放歌》。

那时正是我人生的低谷。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在完全陌生的人群中，如同陷入黄河险恶的漩涡，使我元气大伤。我想念北京，但北京留给我的也是痛苦的记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痛切地感到死的诱惑。

死去，
难道只为痛苦的解脱？
活着，
难道只为唱理想的凯歌？
……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为什么？
是因为世人的勒令，
还是我自己的软弱？
……

去他妈的吧，
尊敬的勒令者！
我不会死在您的前头，
倒担心您棺材的单薄。

我们还要亲自尝试
用纯洁与真知将人类化合；
用原子武器去征服大熊星座，
为宇宙联合国的第一届大会举杯祝贺！
.....

也许是我死的决心本来就不大坚决，也许是赵振开的这些诗将我从迷津中唤醒，我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软弱了。

这时的北京已是新诗的盛夏，涌现了许多写诗的人和许多好诗。我一直不曾谋面的伊锡群偶露峥嵘，以一首《巴黎公社》奠定了其在诗坛的永恒地位：

奴隶的枪声汇进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上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露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长音的无花果树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了孤独的剑

当时正值巴黎公社二百周年。生活在压抑之中的地下诗人们

无不有感于这个题材,纷纷拿起笔。在这些诗里伊锡群是最好的。曾写过“我从天空慢慢地下降/梦轻盈地落在我的心上”这样好诗的方含也有作品问世。但读到伊诗后,便收起自己那首,从此不再示人,成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一段佳话。

1973年初我曾回京小住,除赵振开还结识了栗世征(多多)和姜世伟(芒克),并读到他们的诗,使人顿生“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栗世征生得唇红齿白,眉目清秀如少女,诗却写得动荡不羁。他的诗也最多,我见到时已有两大本,用的是当时文具店所能买到的最豪华的那种35元一本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题着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杜琳娜或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句。见到姜世伟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总像是蒙着一层薄纱,那是在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和赵振开相约到白洋淀去探访我的同学陶洛诵,我们乘的是夜间零点从永定门始发的慢车,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宋海泉,当时他正在白洋淀插队。我们于清晨到达保定,在站前的旅客食堂吃了一道名称很有诗意的菜叫作“桂花里脊”。从保定乘长途汽车到安新县城,再从县城到陶洛诵落户的邸庄。就是这次白洋淀之行我们还到了淀头。淀头是姜世伟、栗世征和岳重落户的地方,当时只有姜世伟一人在村子里,他将我们送到端村。在那道长长的河堤上白茫茫的夜雾中,他活泼如顽童般的身影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把这个印象与他诗中的忧郁统一起来。

从这年的春天起我与赵振开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因此对他或许有比别人多些的了解。赵振开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一年的学生,祖籍浙江湖州。湖州素以产毛笔、丝网和羽毛扇而享誉天下,出过赵孟頫、吴昌硕等艺术大家,又是陈其美、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故乡。赵在家中是长子,上有严父慈母,下有弟弟妹妹,这大概是他那执著的责任感和广博爱心的天籁。他个子高高

的,有很重的书卷气,待人真诚和善如赤子。他是上山下乡大潮中的幸免者,六九年便被分配到北京六建做建筑工人,福兮祸兮这对人生来说可以是难得的一段坦途,但对诗人来说又分明少了几多体验的机会。如果应时顺势,他可以不必做一名好工人,只要利用让人眼红的八小时工作制的业余时间读读书,到1977年去报考一所名牌大学的文学系,毕业后当编辑,当作家当讲师……照样可以玩诗,玩文学,可他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硬是把自己带上了风口浪尖!

从1970年到1973年,他的诗风基本是叙事的,格律的,顺时空的,二维的,可视的。当然对于一个初涉诗歌的青年来说也不免有时失之单薄、苍白。我在他的诗里时而看到一个踟躅在雨雾中的青年,嫉世愤俗的心随着头顶的乌云在驰骋,风吹乱他的头发,掀起他的一角衣襟……时而能见到熊熊燃烧的火炬,湛蓝的大海,听到高亢的小号和咆哮的江涛。色彩是浓烈的,音调是激越的。

这个时期赵振开的作品多数未收入后来的集子,大概是认为它们的稚拙?但这些诗中已经蕴含了他的理想。且请看那时的《五色花》:“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掘回重土培在她的脚旁。我要用北斗的勺把/舀干太平洋的海水/轻轻浇在她蓝色的温床。我要收集太阳的无数金丝/编成抗寒的暖绳/缠在她那嫩绿的枝杆上。向着蓝色的未来,向着金的阳光/向着永恒而无限的空间/你开吧,勇敢地开放!……假如有一天她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有些诗今天读起来仍然感觉很美,但又仿佛句句都是不祥之兆:“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于1972年1月的《你好,百花山》是初期中的重要作品。它把一次真实的出游写成一个梦境,诗中第一次出现了“绿色的阳光”这样超自然的表象,预示着诗人开始酝酿风格的转变。

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赵振开是写诗的天才,但他敏感,勤奋,执著。当年我所认识的赵振开不仅写诗还学美术,摄影,唱歌,从各个艺术领域和艺术形式中汲取着,感受着,丰富自己,寻找着艺术创作的最佳视角、质感和旋律。我曾见他在这个时期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上没有人物,只有朦胧暮色中萧瑟湖畔的一条长椅,照片的背面有诗人的题字:多美啊,多静啊,我的心又快活,又忧伤。我想,这当是诗人与他的女友第一次互诉心曲的所在。

这个阶段的诗作大约有三十余首,其中写于1973年3月15日的《告诉你吧,世界》就是后来那首脍炙人口的《回答》的原型: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已经发现,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哼,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也许你脚下有一千个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影子无形。

我憎恶卑鄙,也不稀罕高尚,
疯狂既然不容沉静,
我会说:我不想杀人,
请记住:但我有刀柄。

近日有北岛的关注者向我提出置疑,认为《回答》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1979年,理由是“冰川纪已经过去”应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此我想我无意中留存至今的诗稿是可以作答的了。

1974年赵振开在写诗的同时,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中篇小说《波动》,并曾以它作为生日礼物赠给他的女友。我有幸较早读到它的初稿。它行文优美、流畅,语言与其说像小说倒不如说更像诗。但不知是作品的结构、叙事方式不是其中某个人物,总让我想起《多雪的冬天》。在郭路生作品研讨会上,作家史铁生曾说:我们当年也都是从写诗开始,写诗不成才写起了小说……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之辞。但是诗人更多的是灵气,小说家更多的是功力,能像赵振开这样写诗兼写小说的并不多见。我中学的另一个同学高红十当年是《绿原》杂志的编辑,她曾向我谈起《波动》发表。那是在1979年,她们编辑部本打算将其与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同时刊登在《绿原》创刊号上,但恰值胡耀邦主持召开“剧本座谈会”,给当时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泼了冷水,《绿原》创刊号也因此改了版。后来,湖北的《长江》上发表了《波动》。

1974年到1976年是他的诗完成向自己的也就是北岛风格转变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太阳城札记》、《冷酷的希望》、《日子》、《在带血的冰河上》以及《诅咒》等诗作的问世。其中后两首未见公开

发表过。在《太阳城札记》中那一节著名的一字诗(生活:网)里,他倾入了太多的内涵,自己也被这个意念困扰得透不过气来。1976年“五一”,他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三位好友一同去渤海油田海上钻井平台。在归来的船上,四人商议以海为题作诗,史康成当时的诗句是“海湾像只烟斗……”而他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望着垂悬在大海上的星空,那个无法摆脱的意念又涌了上来:“大海像一张黑色的网/星星是网结……”

的确,生活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他,这几年,姑且不论国事,在赵振开个人生活中也是多事之秋。1975年,他相处几年的女友向他作别。1976年7月27日,他最最钟爱的妹妹珊珊在湖北下水救人不幸罹难,赵珊珊生于1953年,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好女孩,死时只有23岁,1973年珊珊20岁生日时,赵振开写了《小木房的歌》送给妹妹:“为了你,春天在歌唱/草绿了,花红了/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松鼠窜,杜鹃啼/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雨珠落,水花飞/洒在如痴的小河上。为了你,风鼓云帆去远航/潮儿涌,波儿碎/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为了你,小木房开一扇窗/长眠的哥哥醒来了/睁开眼睛向外望。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没有一屑俗尘,这是在那个年代里最可珍贵的情感,是兄长对妹妹令人心颤的呵护和温柔。新近有一些文史家们的文章,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作“童话诗”或者“儿歌”,窃以为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解。1975年“十·一”是赵珊珊生前最后一次回京探亲。那首《黄昏:丁家滩》的字里行间仿佛还镶嵌着她纯情的笑脸。对于珊珊的死,朋友们震惊、悲痛,振开更是哀伤欲绝。他匆匆赶到湖北,在妹妹的遗体旁,握着她冰冷的手连连呼唤。可珊珊没有回答,宁静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来到失事的地方,把白色野花撒在河上,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她还是

没有回答。她像正葬身的那条河一样明朗、宁静，她用死否定了那个恰恰相反的世界……振开在信中对我说：“如果死亡可以代替，我情愿去死，毫不犹豫，换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容不得我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能有点价值和目的。”

至于他的那位女友，她说自己是个俗人，她没有勇气做一名诗人的妻子，只有一件事，事隔20年她才说，当年他让她织的那副手套，不是没有织，而是只织成了一只，第二只拆来拆去无论如何也织不成与原来一样。她实在不善针黹。

……月光如水。如水的月光流淌过静夜，流淌过床头，流淌过案上初绽着嫩蕊的水仙。一生中许许多多静夜已经过去，每个人都在匆匆朝前赶着，没有时间回顾来时的路，偶一回首已是老之将至。有些事不用想也忘不了，有些却永远也回想不起来了。朋友之中已有人谢世，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那一天。

□邵燕祥

避席畏闻篇

——读书札记：文字狱传统在当代

一

17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虽然思想可以长存，芦苇却随时会遭折断。这样的人手里用来书写思想的笔，不论是苇杆还是竹管，如果不是更加脆弱，也是同样脆弱；笔杆子撞在刀口上，殆矣。有因人及笔的，有因笔及人的，“一滴水可致他死命”则一，这就是文字狱。

上海书店重印了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1931至1934年编的《清代文字狱档》九辑。翻翻看，触目惊心。然而“避席畏闻”并不自清代始。康熙、雍正、乾隆不免抄袭旧制，于文字狱的传统发扬而光大之。“文革”结束至今的12年间，先后有张友鸾、刘夜烽的长文和黄裳的专书《笔祸史谈丛》多所论列。可惜只谈古不说今，对“文革”或不置一词，或轻轻带过。自然不怪这些作者们：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对“文革”中的文字狱讳莫如深？也许是怕涉1949—1966年这17年中的文祸、诗祸。17年中错误的大批判和各种批判包括在国际上批判所谓现代修正主义中的错误观

点和方法,在“文革”中有了恶性发展和集中展示。我以为如修《文革史》,绝不能回避大兴文字狱的史实和渊源。这个渊源远在千年以上了,那是中国传统政治、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文化的血腥遗产。

有人把“文革”中的“破四旧”同“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相提并论,那是轻信了林彪之类的鬼话。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说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然而他们的所做所为,不但是深化并强化宗法血统、人身依附、权力崇拜、领袖迷信等封建文化观念,并且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口号下复辟了封建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统治。哪里是“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恰恰使封建幽灵在新的形式下甚至原封不动地借尸还魂,文字狱就是其中之一。

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以文字狱始(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和1966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文字狱终(追查天安门诗词,逮捕作者和传抄者),中间还穿插若干大小文字狱案件。历代文字狱无非禁书与刑人,略读过一些稗史的在“文革”中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即使加上新时代特有的群众运动式的口诛笔伐,也并不陌生,不但因为这在“文革”后已司空见惯,而且,从“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纷纷表态,到认罪示众、一体周知的人格侮辱和杀鸡吓猴,不正是雍正朝对曾静颁行《大义觉迷录》,针对钱名世颁行《名教罪人》的旧事重演么?

“文革”中的文字狱,有殃及“集团”的,如一开始就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姚文元的檄文中所谓不管“是三家村或四家村”,意在沛公,呼之欲出,直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了。也有殃及个人的,即一些高层政治家和学术名人,甚至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普通人,也误罹文祸。这都是古已有之的。

还有古所无之的,例如一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从小喜欢诗词,有一些写得不错的,被传抄出去;按照当时的通见,似乎唯江青一人懂得戏剧,而诗词也只有毛泽东一个擅长,于是在迷狂的群众中把陈明远的作品当作“毛主席诗词”传诵和引用,终于使陈明远不能逃“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罪名。这样的案例中国过去没有,不知道外国可曾有过。

更离谱的,是把文网张到古人身上。批《水浒》,骂宋江。不过金圣叹早已被杀,施耐庵版权未定,大概矛头也并不是指向他们。“文革”中受过训练的读者倒也不大惊小怪,因为饱读大批判文章的早已知道,1967年初即周扬被关押半年之后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年8月即陶铸被关押半年之后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更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意思了。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法,古代的皇帝或老吏在制造文字狱的时候好像都还没有用过,是古人干坏事更加理直气壮,无所避忌呢,还是当代政治情况更加复杂,各派力量互相牵掣,致使多用曲笔,闪烁其词呢?

总之,这已经是政治斗争通过文字的表现,远不是“文字狱”所能范围的了。

二

在泛政治的倾向下,政治生活以外,经济、文化以至日常生活中,一事一物,一言一行,也莫不带上或深或浅的政治色彩,可以纳入一定的尺度加以衡量,这种尺度又是可以伸缩的,因时而异,有宽有严,以严为主,在据说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的阶级斗争的高峰时期,就达到酷烈的“无限上纲”的程度。何况“文化大革命”已被申明即是“政治大革命”。作为它的序幕,对《海瑞罢官》之“评”,显然不是“评”一个新编历史剧,“评”一个文人吴晗,甚至“评”的也

不是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选中吴晗作“突破口”，毋宁说是看准他和某些人的关系。

在这个战役发动之前的1965年9月，毛泽东就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的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听取彭真等的汇报时，又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里就有大文章。针对彭真，从近处看，是因为要砸烂作为“独立王国”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往远里看，则是顺藤摸瓜，根据三十年来的老关系，由彭真而直指刘少奇。

在“文革”中得与毛泽东会晤并获准在中国出版他访问毛泽东的记录，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可说是唯一的一人。据他披露，早在1965年1月25日，即主持拟订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费那么多手脚，兜那么大圈子，目标原来在此。指责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配合“单干风”、“平反风”，为彭德怀翻案；其实吴晗与彭德怀并无任何政治上的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样做，恰恰是要翻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案，翻那次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案。印证以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

先要打倒什么人，为此去找他的或与他有关的人的文字材料。吴晗不幸成为这样的由头，邓拓也是如此。如果邓拓不是先后于晋察冀边区和北京市的彭真领导下工作，主持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并在北京市委的报刊上发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那末他的这些文字虽然也会遭到横扫，但是未必会“首当其冲”的。

这是文字狱中因人而及文的一种。从历史上看，直接由最高权力者发动的多属之；为的是对付政敌，翦其党羽，当然也用来儆示士人，并藉以树立凛不可犯的权威。如乾隆发起的《坚磨生诗

钞》一案,作者胡中藻只是个翰林学士,诗不好甚至不通,但看不出什么忤逆来。只因为他是已死的满族权臣、乾隆所深恶的鄂尔泰的门生,这就犯了“可恶”罪,他的吟风弄月以至歌功颂德之词,在并非不通文墨的乾隆的判断下,竟成为“唁唁犬吠”了。胡中藻诗狱之后,乾隆还不放心,下谕严密访拿。访到退休在家的大学士梁诗正,据打小报告的说,几次“面试其心”,都一无所获。原来这个做过兵部尚书(也就是国防部长)的老文官极其世故,“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正是“岂有言谈惊四座,不留文字在人间”。十几年前“反黑线回潮”中的上海报纸曾批判杯弓蛇影的老知识分子取这种态度,可见整人者是多么情急地汇集各种文字、言论材料,好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邓拓也罢,吴晗也罢,明于知古,昧于知今;虽然在党和政府内任高级官员,毕竟还是如美国学者齐慕实所封的“高干知识分子”,白纸黑字,授人以柄,一言以蔽之,书生气而已矣。与官僚比较,书生既失于轻信,又失于执著,常常得一迂字,置身政治的漩涡或派系的夹缝,每不免于做牺牲的。

这就说到一个“冤”字。吴晗写《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最初动机,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因为毛泽东曾经提倡共产党员要有海瑞那样抬着棺材进谏的精神。吴晗一片天真的热情使他忘记了历史教训的冷峻:有哪个认真进谏的臣僚有好下场的!又有哪个皇帝的诏书上不堂皇地表示纳谏的!“文死谏”,其死必矣。

自然,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的杂文,都包含某些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其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著作中也有些独到之见,然而,可以说他们全部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受迫害的知名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像张志新那样触及个人崇拜问题,形成对毛泽

东的权威的挑战。他们遭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谴责,其实是“忠而见疑”。

这跟清朝时代的文字狱还不大一样。雍正时候,已故的明遗民吕留良和他活着的学生们,的确有过对清统治者说来是对抗性的言论,他的崇拜者曾静又有策反陕西总督的实际行动,自然会被认定是对政权的威胁。

这样的事情,即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从“文革”前宣判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利用小说反党”、为“推翻一个政权”“造成舆论”的《刘志丹》作者及有关人员,到“文革”中一系列文字狱的当事者,事实证明一个也没有。张志新也只是从目击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某些质疑,属于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包括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

因鲁迅所说的“隔膜”而产生误会的,固然是百分之百的无辜;不满于某些极左的政策及其后果,有所表示,有从极左的角度看来才是“有罪”的,因为它不利于继续大规模推行极左路线。这在“文革”前已肇其端,在“文革”中愈演愈烈。

邓拓的某些杂文,赵树理的从1964年批判“中间人物论”时就开始被批判的写于“大跃进”至60年代初期的小说,还有黄秋耘写于困难时期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等,都寄托着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注,一概被指为攻击“三面红旗”。这不仅是对理性和良知的打击与摧残,而且是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

苏东坡《寄孝奴》诗,有“公厨十月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之句,反映的是新法靠腐朽的官僚制度去推行而生的流弊,也成了“乌台诗案”中的罪状;如果说这还“事出有因”,则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都被指控为讽刺朝政就荒,简直是神经衰弱,疑神疑鬼,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荒凉既不许写,荒淫更不许说了。这已是一千多年前的故事。

三

在“文革”前的 17 年间,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不断,总是伴随着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准备——如电影《武训传》批判之于抗美援朝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爱国主义宣传运动;而对胡风的批判则直接引发了内部肃反运动。因此,这些批判尽管开始时一般以处理文艺、学术问题的形式出现,却总是很快转为政治问题来做结论。因为发动和领导这些批判的人们,是出于政治需要、当作政治问题来抓的。不是利用文艺、学术问题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就是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学术问题。有些文艺、学术领域的中层和基层干部领悟不到这一点,自然会显得工作不力,火力不足,或在事后表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而被认为书生气或右倾是当然的。

曾有人在谈到 1949 年建国后执政者以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处理文艺、学术问题时,指为斯大林—日丹诺夫模式。以为全属外来,未免看得简单。如 1948 年以东北局名义就萧军作出决定一案,分明是直接来自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翻版,但那语言和具体的罗织构陷术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早在延安 40 年代整风运动中由对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的批判开始的一场文字狱,不排除从 20 年代苏联清除反对派的斗争有所借鉴(那时候只有斯大林,还没有日丹诺夫),但也更具中国传统的特色:在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间,以文字狱为契机,起了承前启后的恶劣作用。

直到 1958 年,又把延安时期批判过的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的一些作品,作为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同样性质的“毒草”,重新发表,进行再批判时,据说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接语,指出“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这些作者是“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口诛笔伐中无坚不摧、弹无虚发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只要想打倒你,尽管你的文章俱在,无懈可击,也只须说你是“以革命的姿态”就够了,正像说“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样。

建国以后声势最大、株连最广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几乎都是最高权力者发动或过问的,其中有的演为残酷的文乎狱。开始时,除了像对《清宫秘史》是点到为止、引而不发,要等到十几年后才见其针对政治对手的端倪以外,首先多是针对党外,即一般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而主要不是用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梁漱溟的批判都是如此。

在刘少奇的“修养”体系中,是把“打击别人,始高自己”作为应予克服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体系中,据说就是要打击别人例如资产阶级,以始高无产阶级自己。从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来考察,这一类声讨式、宣判式、打扫战场式的批判和斗争,是为了树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进行领导的权威,树立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本人在包括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在内的全面的权威。

纪晓岚在乾隆一朝,可以说是个宠幸备至的文臣了,但有一次不识相,遭到皇帝的痛斥:“汝何敢妄谈国事!”,胡风上三十万言书,倒了霉;杨献珍、孙冶方和秦兆阳因立论贾祸:全都带有“妄谈国事”的性质。“合二而一”云云算不上国事,但在“一分为二”的“圣断”之外妄生邪说,其罪更不可免了。胡风是党外人士,杨献珍等是党内老干部,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认为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的成见,很深也很广,形成一种政治气氛和无形压力。“文革”前夕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他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云云。干脆利

落，一锤定音。

这个思想自然不是一朝一夕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在知识界不断开展政治运动的实践中逐渐成熟的。如对胡风的定性从文艺思想问题而小宗派而反革命集团的升级，也可以说是自己“树立对立面”的工作方法的典型吧。

在对文艺界、学术界以至教育界等知识分子状况的估价严重倾斜的情况下，对于某些多少反对官僚主义或触及困难时期世情心态的文艺作品，突破公式主义而略显创作个性或流露某些人情味的作品，通通指控为不满现实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草，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50年代后期、60年代中期的文艺批判多是这样“上网”的，反右派斗争初期的围剿《草木篇》便已作了一次示范。1958年对巴金等的批判以至重写《中国文学史》，则是“文革”所谓打倒“封资修、名洋古”的滥觞。

60年代初期，当文艺界一些老将和小卒还在惶惑不解，何以一首小诗、几篇短文，甚至是响应号召之作，竟罹文网，万劫不复的时候，在文艺、学术的战场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部署早已越过牺牲的虫沙，向纵深进展，并且显示了更鲜明的政治指向。

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的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一案，不是文艺现象，而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不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发展成株连成万人的案件；至于毛泽东就此所说的那一段名言，其影响更远在一书一案之上了。据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一案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将来的当代政治史也不能缺少相应的章节。小说《刘志丹》歌颂了革命先烈刘志丹，也描写了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按照康生等个人崇拜的逻辑，

对十年内战的历史,只能歌颂江西革命根据地,不能歌颂陕北革命根据地,只能写瑞金,不能写照金,只能写井冈山,不能写永宁山,否则,就是与毛主席创建井冈山分庭抗礼,就是宣扬‘陕北救中央’。甚至,说刘志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也被指责为抬高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本章范际燕执笔)这是当代无信史的注脚,也是李建彤获罪的根由。

清雍正时广西举人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其中有一篇《论封建》,大讲“封建”的利益,雍正认为是有意为诸王夺权制造舆论。“陆以论史获罪,自此以后,一般文人不但不敢论时事,‘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谈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尝有也’”(《清鉴》)。(岳成《皇权的斗争和文人的悲剧》,《书林》1988年第五期)以前没有以后有,不但吴晗的海瑞诸篇,连田汉的剧本《谢瑶环》,孟超的剧本《李慧娘》,邓拓等人的某些杂文,也都涉嫌借古讽今而遭挞伐。历史成为禁区,因为借古讽今正是习用之术,评李秀成的自述正所以影射瞿秋白,可收一箭双雕或一石三鸟之效。历史是旧时的时事,时事是将来的历史,以妄谈历史为忌与不许妄谈时事是一致的,何况历史与现实之间,不仅可能有虚的讽谕关系,而且实际存在着实的传承关系。古今文字狱都着眼于此。所不同者,清初的:“庄氏史案”是为了刻印明史,眼前的“《刘志丹》案”,是因为写了中央苏区以外的一个根据地及其领导人而已。

当然,田汉、孟超的剧本和阳翰笙、夏衍等编剧或插手的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为典型集中批判,也已夹杂着打击“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所谓“四条汉子”的因素,因文废人与因人废文密不可分地结合起来了。据黄秋耘《风雨年华》透露,1964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不也跟邵荃麟反对柯庆施、张春桥“大写十三年”的主张有关吗?对于某些政治上的掌权者的任何冒犯,即或只是稍拂其意,都会招致杀身之祸的。

自然,也有因“颂圣”而获罪的。周立波的散文《欢乐的节日》如实地记录了毛泽东返故乡韶山给他的父母亲扫墓的情景。这怎么会成为“诽谤伟大领袖”的“特大毒草”呢?全是因为如鲁迅所说的“隔膜”。类似的例子,《清代文字狱档》中也有,又是古已有之的。

四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乃至上溯到根据地时期,以文艺形式出现的、公开发表的抗议性文字,是一直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才有的。在这以前的所有文字狱中,不说完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冤假错案;即使“事出有因”的,也顶多有点“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式的情绪罢了。“诗可以怨”,孔夫子在理论上还是这样主张的,后来的皇帝们却不许“怨”,不许腹诽;否则是大不敬,大逆不道。司马迁的外孙杨惲,在私人书信中发点被贬的牢骚,说“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其实也就是后来苏东坡所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之类;但语涉“圣人”,使皇上多心以至不快,就是非圣无法,而犯上者必作乱,该死。

皇帝虽是天纵之圣,毕竟也不是千手千眼,能够一一查阅人们的书信或手稿吗?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指出,在文字狱的风气中,“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鞠,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转引自牧惠杂文集《湖滨拾翠》)。任你凌云健笔,遇到刀笔的株求,断章取义,索隐发微,够花接木,也会锻炼成罪,就是撞到刀口上,笔折人亡。

当代的文字狱以自上而下的权威动员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更使得文网森严,无孔不入。造成只许歌颂的政治气氛,一片怀疑

猜忌的心理,调动人性中最阴暗的感情,推广深文比附、栽脏诬陷以至逼供性的手法,把文字狱扩大到文字之外。“文革”前说有一期《中国青年》封面画的笔触中隐着反动标语,“文革”中说黄永玉书的猫头鹰眼开眼闭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捕风捉影,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然而这种神经过敏的表现,成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标志,它一开始就受到鼓励,从对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出发,又制造敌情来充实和加深这种错误估计。至“文革”而达到极端。

宋舒涛攻击苏东坡的札子,就是抓所谓“有诋毁本朝之语”,清康熙每以汉人为难统治,处处留心,都是在维护“当朝”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把“弦”绷得紧紧的,臣子要向皇帝告密举发,皇帝要“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乾隆二十年三月上谕),于是就上下呼应,到处发现讽刺、诽谤、讥讪、怨诽、怨谤、诋谤、狂妄悖谬、谤讪涛张、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不经文字狱镇压他一下,不是就有亡国之虞了吗?

假如把“文革”中各种所谓定案材料(不限于文字案件)收集在一起,就会发现制造冤假错案的技法,都来自古代制造冤狱的刀笔吏的伎俩,偶或翻新;而古代文字狱的以“莫须有”置人于死地,或寻章摘句,穿凿周纳,实在是一切冤狱手段的集萃。当代文字狱的案例,比起《清代文字狱档》来是绝不逊色的。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在文艺、学术领域的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必然导致了鸦雀无声的肃杀局面。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时就看到了这一点。有了大小屈死鬼的前车之鉴,不禁自噤。用不着像南宋毁《江湖集》版后“诏禁士大夫作诗”,或像乾隆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转引自岳成《再谈乾隆的文网》,《书林》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也用不着像明洪武十二年公然

宣布“军民一切利弊，并不许生员建言”那样，而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实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在思想文化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专政。

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不可分，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也是不可分的。有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乃有大一统的文化统治，文化领域的专制。文字狱就是这种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表现形式。有专制政治就有文字狱，不必件件都经过御批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学随术变，很难说文字狱的专利属于儒家还是法家。总之，它是过去的剥削阶级统治者惯用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统治的手段，目的是箝制言论，控制思想，使民不敢言，亦不敢思。在封建主义的最高统治者眼里，读书人是要使用的，但又是危险的，讨厌的以致可恶；这些读书的人本来同其他臣民一样应该是甘受驾驭的犬马，但他中偏偏有一些自以谓人，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甚者还要发为议论，刊为文字，“蛊惑人心”，“动摇国本”。为了防止形成朋党，成批地处置较为快捷，并且足以杀一儆百，使一般不读书的愚氓也放老实些。这样就有了文字狱，形成了文字狱的源远流长的传统。

这个文字狱传统在当代有了恶性的发展，要害在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对知识分子的宏观估计。无论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菁英政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沦为仅仅是政造的对象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他们是代表着敌对力量的嫌疑犯了；当他们被告知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等待他们的是非人的处境了。呜呼！不出文字狱倒是不合逻辑的。

或曰：文字狱的造成，还有法制等方面的原因。然而，若没有广大知识分子作为人、作为公民、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难道能够指望法制的发育和完善吗？

文字狱传统就是这样一种“国粹”。在有些知识分子为所谓传统的文化精件招魂的今天，它的带有血腥味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不

止是知识分子的千百万人的记忆。重温这一记忆是为了摆脱这一阴影的威胁,这不仅仅关系到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仅仅是知识界的事情,更不是仅仅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所能解决的。

第三輯

恩怨滄桑

□章立凡

章乃器在 1957 年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 1957 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之类的“活谥”。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或许是在历史上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 1979 年起,我不断地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有两位当年整过他的同事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 年 4 月间,有消息说,在 27 位当年被划右派的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请求对这些言论重新甄别评估;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 6 月传达的中共中央 60 号文件,父亲的名字被列在改正的 22 人之首。

—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 1957 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有类似的记述:

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态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父亲的性格。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父亲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己见,虽然周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许汉三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的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

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他的这两项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两个问题上与一些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到了后来,这一提法被截去了“政党”两字,成为他美化资产阶级的一大罪状。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

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父亲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哪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上也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二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三时,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7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此事说来话长,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春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

很不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复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并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二十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三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

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1952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法不妥,“照道

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一位中共领导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这位领导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

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四

5月20日这天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界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6月1日和2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五

6月8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

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分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成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数人用来作反宣传;有批判者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的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将你几年来乃至几十年来的文章翻出，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释，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智，似是而非，偷换概念。例如父亲的文章谈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认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到批判时就被曲解为：“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区别的存在”。经此加工，一段论述阶级关系的话变成了“否定阶级区别”。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辩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富戏剧性，诸如公报私仇、卖友求荣、夫妻反目、反戈一击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似乎也怪不得被喻为附皮之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近于疯狂地洗刷自己，与“卖友求荣”相比，“卖友求生”已算不得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种高压之下声泪交加的忏悔，与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声浪震撼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化”，边缘的泥土不断陷落，泥塘的面积不断地扩大，站在塘边呼喊的人们也纷纷滚落其中，谁无妻儿老小，一人入围，全家罹祸。求生的挣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还为之骄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识分子人格。在轰鸣狂转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知。

六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评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

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老,你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明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

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堆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七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前面提到的民建那位老先生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

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份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公的良苦用心,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三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能自辱其祖的。这段投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投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

……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 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 工商业者；3. 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八

父亲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的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9日,这篇讲话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位当场聆听过讲话的“大右派”,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6月25日这天,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

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混战,秩序纷乱。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像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公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 20 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 1949 年经周公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 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父亲专门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这两年周公处境不好,被迫做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父亲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作了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父亲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一些老前辈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此事。

接下去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例如当时各报都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回忆一件往事兼质问章乃器》一文,大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际,是他所在的游击队将章乃器、胡风、史良、邹韬奋等人救出,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战士谴责章乃器:“在最艰苦的时候,党派了自己的儿女用生命搭救了他,解放后

又把他放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而章竟“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最后他用：“这种人简直没有人味！”的粗话，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义愤。事实上，香港沦陷时，章、史二人都在重庆。

这位老战士可能是记忆有误，但历史岂是能够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 50 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九

1957 年 6 月 26 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父亲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自 20 年代他进入银行界起，就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会议期间代表们的用车是统一安排的，有一次车子因接侯外庐耽误了一会儿，开到时父亲已在家门口等

候,并指着手表对司机说,你晚了五分钟。

父亲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群弦共张”的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铄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7月7日下午3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前面提到的老先生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

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谈到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经过。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的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一连斗了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闭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跟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接下去又是一场人海战术式的围攻。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领导（即当初鼓励他鸣放的那位）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十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38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这是一种“加重处罚”的信号。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1月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前往中南海。

沉思中,车已到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早已熟悉的古老建筑。周恩来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和徐冰副秘书长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

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和习、徐二位一一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九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29日下午,国务院第69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十一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大行

其道,没有人再敢于提不同意见。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2000万人口,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25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另一位领导(即曾鼓励父亲鸣放,后来又主持给他戴帽子的那位)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那位领导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还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路上聊天时,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一次政协小姐会上,某教授(年轻时曾受父亲提携,“反右”时积极斗争他)碰巧坐在他的身旁,父亲吟诗一首赠给教授:“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

铁骨在,冷眼对豺狼。”教授大怒,反唇相讥,指控他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份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教授亦有悔悟,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8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批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法院查封财产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在此期

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的生命之火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漫漫长夜中耗尽。1977年5月13日,他在曙光出现之际资志以歿。关于他在“文革”中的某些经历,父亲在《七十自述》中已有所记载,本文不再述及。

□李硕儒

无名氏生涯记略

不知是心理年龄的老化,还是岁月使然,不觉间,已经到了回忆旧人旧事的季节。或孤影独坐,或寒夜清梦,那些往日的人和事总在眼前萦绕。前天与友人闲话,聊起现代文学和一些知名作家,不觉又牵起一段往事和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褒贬迥异却又影响颇大的作家——无名氏。

1979年12月中旬,北京虽然早已飘起仲冬的飞雪。可由于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在人们的心野里还是春风鼓荡,盎然如到处新绿。从香港报章得知,无名氏仍隐居杭州,正在从事一套七部的长篇巨著,出版社领导兴味盎然但又审慎神秘地派我赴杭趋访,并希望能带回完成稿。

我说出版社领导“兴味盎然但又审慎神秘”,是因为一方面无名氏的《北极风情话》、《塔里的女人》、《沉思试验》、《火烧的都门》、《露西亚之恋》等作品虽以独具的魅力褒贬大迥的评价从40年代风行至今;另一方面,无名氏其人又少年华发,先做过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后做过国民党书刊检查委员会的僚属,之后,即隐姓埋名不知去向。在那些运动频仍的年代,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黄色作家,有人说他才华横溢其作品的魅力万难难劫,可无论是褒与贬骂与捧他都再不回应,在那些整人与被整的名单中也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难道他已远渡重洋?难道他已不复人世?在多年沉寂与

遗忘之后,忽然得知他就隐居西子湖畔,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兴味与好奇?!可在评价纷纭之中又带“反动”二字,我以出版社的名义贸然趋访会不会招来什么麻烦?这在禁锢三十年之后的解冻初期人们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这就是领导又加“审慎”的心理依据,所以在我登车南下之前,社领导一再叮嘱:不要张扬,不要惊动当地政府或作协机关,纯属“私访”。

我那时初届中年,这些神秘与审慎反而激起我无限的兴奋。披着北京的风寒瑞雪,一路南下,当我住进西子湖畔的新新饭店时,竟觉那翠竹青松湿风细雨频添了太多的春意。我想象着无名氏的情态状貌,计划着明天的神秘造访,一夜睡不安稳。

第二天清晨,那低垂的瓦灰色的天空又飘起霏霏细雨。好在那雨薄如雾、细如丝,虽无任何雨具,仍能在杭州城里寻声问迹,遍找这位神秘的无名氏。行前,知道些情况的朋友告诉我:无名氏住在拱墅区华光桥下15号,说华光桥就在运河末梢码头处。我猜想,这河码头一定蔚为壮观,这桥也许虽经残破而尚存古雅……待到的码头,那往昔的繁华隆盛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喧嚣杂乱菜摊杂陈的小菜场了,那往时波光浩荡曾载隋炀帝江南寻盛江南寻美的大运河也已促狭浑浊只剩一道浅浅的河汊;而华光桥更是名存实亡故迹全无。我只好懵懵懂懂地寻觅懵懵懂懂地见人就问,心想也许地址不确无名氏与我却能狭路相逢。于是按照我推想出的他的状貌,凡在街上遇到清瘦潦倒又带几分儒雅的老人即上前询问,可一连问了七、八位老者,皆不得而终。时间已经将近中午,才经人指点,找到那个不挂门牌又无院门的15号。

“卜先生,有人找。”显然,这位正往院子里泼水的中年妇女是他的邻居了。可在那种年代以“先生”称谓者不是年迈的老人就是身份特异的人,听来着实有些奇怪。

随着喊声,一位身躯健挺满头黑发约摸五十多岁的男子应声

而出。看着他飘洒额际的黑发,白皙瘦削的脸庞,近视镜片后面晶亮的瞳仁,我不禁愣怔了,因为这形象与我在内心里描摩的弯腰弓背清瘦潦倒的样子竟大相径庭。虽精神如此,他的穿着却又露出几分寒怆:深蓝色毛线衣的肘弯处已经补了两块黑布补丁,一条蓝呢西裤已经渗满污垢硬硬地罩在腿上。他热情地让我进屋。这是一间座北朝南的大屋子。屋里除了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就是一张宽大的油漆剥落的木桌,桌上堆满古旧发黄的书刊,只有写作处有一角桌面,大堆书籍却靠墙码在水泥地板上。他忙着让座,一时有些慌乱,因为满屋之中除在书桌后的那把木椅就再无坐处。慌忙中,他抱起一叠棉被放在床上,下面出现了一把弹簧突现、由麻袋片紧包的单人沙发,他歉意地让我落座,自己则搬来一个木板钉的小板凳坐我对面,一阵张罗,他苍白的脸上赤红了一片,不知是因为不胜劳累还是为居室的寒怆而发窘?

我自报家门。

“惶悚,惶悚……”谦谢一阵之后他递过一支香烟,自己也燃着一支。烟雾缭绕。良久对视。一个“怪”又浮上我的脑海——难道他不欢迎我的贸然造访?抑或他多年与外界隔绝,决意不与我多谈?

香烟快燃尽时他终于开口说:“李先生,你的来访的确使我惊喜,也十分突然……”

“为什么?”

“因为,”他一阵苦笑,“整整三十年了,还从没有一位编辑或记者来访过我……”

我可以想到他的感慨和复杂心情,在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中此类事件也绝不鲜见,我绕开这个令人尴尬的话题风马牛不相及地说:“卜先生,您的身体和精神真出乎我的意料呢。”

他莞尔一笑,“你以为我会弯腰驼背,潦倒不堪?”他环顾一下

四周,眼睛直视着我,“按环境,按遭际,我是该像你想的那样,甚至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也难料定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这么健康这么年轻呢?”

“这要归功于气功,我们的东方文化。”

没想到,我们的话题竟从气功谈起。三十年前,他是个几乎濒于死亡的肺病患者,加之种种政治压力情感磨难生活负累,他几乎再难完成自己关于《无名氏全书》的写作计划。为了自己确定的写作使命,他开始坚持每天早晨练气功、打太极拳和长跑,他说,气功来自佛家的参禅,其道理虽尚未从科学角度弄清,但确实是有科学性的。气功有初悟和彻悟两个阶段(亦即俗称的入境和出境)。初悟阶段,见山不为山,见水不为水,完全达到了忘我境地。这时,工作的劳累、生活的忧烦、情感和无奈……一切的一切真可说众苦皆消。而这既可使精神解脱,又可锻炼身体,对健康十分有益。但长此下去,要么超脱尘世神游四海;要么会变成疯子,所以才说这是气功的初级阶段,不能久为;久为必入歧途;到了彻悟阶段,即可从幻境走入现实,既能以此解脱精神恢复疲劳强健身体,又回归到见山为山,见水为水的境地,这才真正做到丁古为今用、以佛家奥妙为我锻炼身体养生延年之用,要说我今日的健康皆从此而来。

“这么说,气功真该认真研究了。”

他深深颌首,又互相点燃一支香烟,“应该研究,应该着重从科学、心理学角度研究。这不光可以用科学分析解剖佛家思想佛理佛心,也可以去芜存真为我所用。……我们祖先的宝藏丢弃得太多,是到了整理弘扬的时候了,否则,真的要愧对祖先呢……”他深为感慨,在他感慨良深的情态里,我才发现了这位文化老人的深邃。

天仍然雨雾蒙蒙,灰暗的光线,古老的东方文化的话题使我们忘记了时间。闲话间隔,我们不由得看看手表,竟是中午12点多

了。

“抱歉，只顾闲话，竟忘了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附近有座小酒楼，我们去喝点黄酒好哦？”

于是，他撑起一把黑布伞，递给我一件塑料长雨衣，我们双双步入街头。路上他说，因为独身一人，他不愿自己做饭也无暇做饭，多年来总是在友人家搭伙，今天既有远方来客，是非黄酒招待不可的。这是一间江南旧式红木地板的两层酒楼，年久失修，当我们踏上二层雅座的时候，无论是楼梯楼板都嘎嘎做响，伴我们直到落座。真是一方水土一方情态，不知为什么，与他对坐此地，总想起鲁迅的《在酒楼上》和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先生既数次重复黄酒，我们要的当然是黄酒中的佼佼者加饭。此酒十分柔和，置入红泥壶中开水一烫，真是温香柔润熏熏然如入五里雾中。我们边饮边谈，不觉一壶酒已经所剩无几。他白皙瘦削的脸已一片赤红，精神兴奋更加口若悬河：

“三十年来我是第一次与文学界的朋友喝酒，真是太高兴了，酒也就多喝了些，”他摩挲自己的脸颊，似觉有些失态。

“酒逢知己嘛，”我不想失去这忘我的境态，我想使他放松、高兴，看得出，他刚刚从几十年禁锢中解脱出来，总不免有些拘谨，“卜先生，如果不嫌冒昧，我倒想与您成个忘年交呢。”

“非常荣幸，我早已经是这种感觉了。”

“那么，我们去我住的新新饭店休息一下，我的房间正好是两张床。”

“新新？”他两眼一亮，似乎想起什么。

“是的，难道有什么文章？”

“是篇美文呢！等到了那里，我再复述这个感人的故事。”

我们搭车前往。到了新新饭店门口，他不上楼，先引我绕着院落参观解说：

——靠东的那座三层青砖楼房原是国民党浙江省检察院，这没什么故事好讲；靠西的由假山、花园、回廊亭阁组成的院落原名“秋水山庄”。何以得名？原来，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有一名妓曰秋水。秋水姑娘才貌双全，艳压群芳，专事交际于名人学士之中。她见当时一小报总编辑史良才才学出众敢于秉笔直言时政，一天她说：史先生何不办一大报？也好施展你的种种抱负。良才说，这要一大笔钱的。秋水莞尔一笑：我还有些积蓄，如果先生有此愿，我愿出资相助。良才感激备至，于是《申报》在上海创刊。不几年，《申报》成为海内有名的大报，史良才也就成为报界一员宿将。为感激秋水姑娘的慨然相助，良才纳秋水为妾，并在西湖岸畔置一别墅，命之曰“秋水山庄”

“这个名字好，颇有诗意。”我沉吟着，“要是如今仍用这个名字，不知会引来多少旅客呢！”

“这是解放后改的。”

“哦，又是一段历史。”我望着他。

后来，史良才离开人世，秋水搬回上海，住在史良才在上海的花园别墅里。解放后，秋水把秋水山庄捐献给上海总工会，总工会把它辟为上海工人疗养院。又经几番演变，变成了今天的新新饭店。

人世沧桑。在沧桑的人世间，又掩埋了多少姿彩各异的人与事！我们拾级登楼，那个阴雨的下午，我们两床相对，睡了大半个下午。

第二天，仍是满天铅灰，细雨绵绵。一清早，无名氏就披着雨衣，挟着雨伞来新新饭店邀我雨中游西湖，说这将别有一番情致。我们边走边谈，从葛岭到断桥到白堤到苏堤，从里西湖到外西湖又到里西湖……散步信马由缰，谈话也无主题，往往情之所致。但既为作家与初识的朋友，不期然地，彼此就谈起自己的身世与创作。

谈着这些,他一会儿像一位历史老人,一会儿又英姿勃发,像是回到了他的少年时代。

无名氏,原名卜乃夫,又名卜宁。祖籍山东兖州,祖父原是一位乡间木匠。也是因为家境贫寒,后来举家南迁,落脚扬州城。家境若此,父亲自然没钱念书。但他天性聪颖,上了两年私塾后自学中医,竟然在扬州城里颇有名声。几年后家资渐丰,即全家迁徙,在南京城里开了一家中药店。父亲经商有道,治家更是别具苦心。他自己无缘多学,对子女却坚持个个深造。怎奈他一连生了六个儿子,却是一、三、五相继夭折,只有二、四、六留在人间。对劫后余生者他更其珍贵更不惜重金培养。对老二卜少夫(后来的老大)他着力栽培,先在国内上学,后送日本深造,终成香港《新闻天地》的社长;对老六卜幼夫(后来的老三)也令其受完整教育,如今已成南洋《华侨日报》的魁首。唯独老四卜乃夫(后来的老二)从小立志文学。他又偏偏觉得当作家不要进大学,原因是越进中文系越写不出好作品。于是,他不听父亲的安排,试图独辟蹊径,在南京高中毕业后就想当作家。可后来他东奔西突,终难成正果,这才承认没有文凭的寸步难行。他不得不匆匆北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谋了个旁听的座位。虽如此,在北大期间,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图书馆那浩瀚的书海里渡过的。1942年,不知是什么机缘,卜乃夫被国民党的报纸《扫荡报》聘为记者,不久,又调入国民党书刊检查委员会工作。因立志创作,1944年起,他辞去一切职位,开始了专业创作,至1949年5月,共创作出版了《北极风情话》、《塔里的女人》、《火烧的都门》、《露西亚之恋》、《沉思试验》、《一百万年以前》、《龙窟》等他自称为“初级创作阶段”的作品。当时,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的这些故事自然都是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展开的。

二

自古才子多情种。自然,也就自古才女多逸事。如果不嫌偏颇的话,我想要是无名氏没有那么多的情事与逸事,也许他就写不出那么多情荡荡意绵绵的一时洛阳纸贵风靡海内的小说。

不知是因为他东方才子的魅力,还是因为他少年华发名声大噪才情横溢,一次偶然的邂逅,就使当时比利时驻华武官的女儿对之倾心难舍,他们相爱了,爱得不能自拔。无论多雾的早晨,还是闷热的黄昏,他们总是双双相守。或闷热的小屋,或长江边、歌乐山、望天门,或咖啡厅、跳舞场……他们都要相拥相携,须臾不愿离开。可无名氏毕竟是作家,多思多产的作家,他年少多情,孤独寂寞对他如同自杀;奢侈无度地浪掷时间又如割他的肉摘他的心。他有些无奈。可西方少女又是极敏感极自尊,一旦堕入情网,就要爱的疯狂颠倒如火如荼,直到自私残酷,还不以为至度。何况是比国武官的女儿西方豪门的千金爱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书生,你还嫌浪掷了时间?!于是,他们从齟齬到争吵到相互折磨。终归,这场异国之恋破裂了。

“……此后,我有些不敢爱了,真的不敢了。”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

他沉吟稍许,像是在想一个适当的表述词句:“那些西方女人的爱,热起来把你烧死;冷起来把你冰死……”

四周沉寂。那些绒毛般的细雨仍然十分耐心十分从容地飘飘洒洒。远处近处湖面与树林都罩在朦朦霭霭的雨雾中。天水相连,森森天地间似乎唯有我们俩。

“……以后呢?您觉得这是一种打击,还是,解脱?”

他擦了擦那被雨雾遮住的眼镜片,沉吟良久,说:

“人是真怪,享受着那不期而来的热烈的爱觉得浪费了时间;

可一旦她离开了我,就像是天塌地陷,心也被她摘走了……”

此后的半年多他陷入孤独痛悔之中。他食不甘味寝难成眠,无论晨昏坐卧,那比国小姐的音容笑貌娇嗔恣肆和那如火的目光如花的馨香总在环绕着他刺痛着他,他有半年多的时间写不出一个字。许是命运使然,许是神灵招唤,一个偶然的机像,他又与韩国驻华武官的小姐相识。可能因为同是黄皮肤的东方人,可能因为同样遭受着山河破碎受日人蹂躏的国运,他们从心灵相通到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其父任期届满骤然携眷归国,也许他们能够琴瑟和弦?然而就在他们倾心相谈不久,命运却把她和她的家人带到鸭绿江的彼岸。江海相隔,自然给无名氏留下了绵绵遗憾。可告慰者,他把与她相处期间所谈所感者都写进了他的小说《北极风情话》中,总算以自己情场所失为文学和读者献上了一份贡品,璀璨夺目的贡品。

三

转眼到了1949年。春天,解放军铁流滚滚挥师南下,国民党偃旗息鼓仓惶溃逃。国事沧桑,卜家也不能不计议归处。其时,父亲早已离开人世,七十老母尚居南京家中。既然少夫幼夫已经分别去往香港和东南亚,乃夫自然要留在大陆侍奉老母,此其一;其二,正当此时,乃夫决定把自己的“初级创作”阶段告一段落,向“高级创作”阶段突进。其时,他的“高级创作”提纲已经拟好,命名曰《无名氏全书》(又名《菩提全书》),计划共写《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荒漠里的人》、《死的岩层》、《花开在星野以外》、《创世纪大菩提》等七部。

看看荒凉败落的“陪都”,抚抚两度失败的恋爱,他实在不愿再在这处处伤心处处失望的重庆住下去了。国事家事情场事都不能使他振作,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心情也难于实现他的“高级创作”实

验,可他是个不甘失败不甘沉沦的青年,至少在文学创作,他有资肆汪洋的才情,有独树一帜直上巅峰的野心,他要甩脱这个环境,寻找一块净土潜心创作。他想到了油画大师赵无极。

可能是因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风流倜傥一样的好友重情,当年,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赵无极、林风眠、无名氏曾经一起饮酒赋诗、临风作画、竟日竟夜,倾心相诉,欢情不散。为纪念他们的友情与才情,也曾自嘲自谑,戏称“三K”,即:“赵K、林K、卜K。”想到往日朋友间的友情欢情,几个月来脸上很少笑容的无名氏感到一阵温馨。于是他把笔投书,给时住上海家里的赵无极写了一封信。信上没有寒暄,却是满纸真情,一任倾吐。赵无极热情单纯,极重情谊。在画布上他纵横捭阖,有气吞万象之概;在世世间却既不懂世故又不问政治,活脱一个孩子,加之乃父是上海一大银行家,居家住在花园别墅里,听说昔日好友怀揣宏篇巨著的创作计划、今又陷入困顿苦闷中,他巴不得热情致函无名氏,邀其来沪共住。

无名氏捧读好友赵无极信,感触万种思念有加,他即刻整理行装离渝赴沪。

在上海火车站,无名氏刚刚跨出车厢,赵无极即拨开人众张开双臂:

“乃夫!”

“无极!”

俩人互喊着彼此的名字,狂喜地抱在一起。相抱良久,他们才平伏了自己的激动,想起提皮箱出站台,可俩人刚刚松开彼此,却见一位婷婷玉立的小姐站在一旁朝他们微笑……

“噢,只顾高兴,竟忘了给你们介绍,”赵无极现出些许狼狈说,“这是舍妹无华,”说罢,他笑望望无名氏又看看其妹赵无华,“这位自不必介绍了,你为他的《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话》不知抹了多

少眼泪……”

“哥哥……”赵无华顿时羞红了脸。毕竟是大家闺秀，又受过高等教育，时任上海电台第一位世界语播音员的无华嗔怪了一下哥哥的玩笑后，立即伸出一只纤纤玉手：

“卜大哥，久仰久仰，欢迎你来上海。”

几经情场，如今心若枯井的无名氏，竟如久坐独室的孤夫子偶见一束鲜雅清幽的康乃馨，顿时精神一爽，清瘦的面颊现出几缕潮红。他倏忽敛起自己情感的波澜，轻轻握住无华的手说：

“……谢谢大妹，真劳驾不起你也亲来车站接我……”

无名氏与赵无极虽是昔日老友，但他既没来过赵家，也不认识赵家人。不想，今日一到上海，无极就引来这位气质不凡修养极佳、美艳中见真率活泼中透娴雅的东方美女。赵家的私家汽车开进那座宽大富丽的花园别墅，仆人们为乃夫安排了他的卧房和写作间。接着自然是接风洗尘，观赏赵无极的画室和新作，还有那谈不尽的话题说不完的感慨，而且每每谈话闲聊，无华都乐得参加；其实，只有她的在座，乃夫才更加才情迸发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一见倾心的男女情愫总是如翻江倒海，用不了多久就要破堤横流的。他们相爱了，爱得水乳交融没有一点缝隙一点空间，爱得如胶似漆须臾不能离开；他们相爱了，爱得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生命……如果把爱比做呼吸，那么他们在忘我的吸入爱的琼浆的间歇总要呼出些什么的。就在这个间歇，乃夫想到了自己《无名氏全书》的创作。当时，全书的第一部《野兽、野兽、野兽》刚刚脱稿，男主人公试图在战火的撕杀中拯救自己的尝试已经演成一幕大悲剧，我何不让他到情海里去寻回自己？！在与无华的热恋中他第一次体验到爱的真淳爱的力量爱的享受，他自信以自己对爱的体验与感受是能够写好他的第二部长篇的。他虽然不忍也不舍离开他的爱，但创作的冲动与期许还是鼓励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华,我真幸福,真满足……”

“……我也是,夫,”她从他滚烫的胸前抬起头,一双秀眼晶亮地像是浴满朝露,“真像上帝又给了我一次生命……从来没体验的生命……”他喃喃着。

“我真想把这种体验写出来,写进小说里……”他抚着她柔软丛密的长发。

“我同意,夫……”她蓦地从他怀里跳起来,“那么,写吧,马上写。”

“真是个小傻瓜!”他一把拉她坐在自己的怀里,“现在怎么写得了,我们整天在一起,你都快把我烧化了……”

“是,我也什么都做不下去,”这就叫心有灵犀,也是彼此修养相近所使然,乃夫的话非但没给她带来任何猜疑而负气,反而是十分理解甚至献策献计,“那么这样,我们计算一下时间,我每天给你八个小时,就八个!”她用手比了一下八字,“我把你锁进房间让你写作,我不来,谁也不许来!八小时之外,我们就……在一起……”

乃夫感激地低头沉吟:“无论从情感还是从美学说,都有一种理论,叫距离美。我想最好我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到别处去玩味、写作……”

“啊?”修养再好的无华也被他的提议惊悚了,她久久望着他,“夫,你是不是不……”

乃夫倏然抱住她,抚着她的背:“你想哪里去了!这怎么会,怎么会?”

“那你为什么想离开我?”

“因为我太爱你,爱的痴迷……”

“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可创作是需要寂寞,甚至孤独的,”乃夫不由地敛起笑容,现出几许忧戚,“可能是生来如此,至少我是在孤独中才能进入创

作。”

无华脱开他的怀抱，支颐沉思。她想到哥哥的作画。是啊，他也是要么离家索居，要么把自己在画室里深锁经时，这才好潜心作画。她由疑虑到开解到主动为爱人出谋划策：

“……那么好，你到我家的杭州的别墅里去，写好一个单元就回来住几天！”

“华，你真好！”他一下把她揽在怀里，她双臂紧绞着他的脖子，脸扎在他的脸上，她哭了，泪水濡湿了他的面颊。

“怎么？”他惊愣了，“你还是不放心？……那，我就不走了。”

“不，夫，我不是……”

“那为什么还伤心？”

“……毕竟是离别，我……我怕我受不住……”

“小傻瓜，”他刮了一下她的鼻子，“才三个钟点的火车，说回来就回来。”

“我高兴了，”她尽力挥开那些无由的阴影，雀跃着，“你看，我笑得多么开心！”她甚至在地板上兜了一个愉快的旋转，“我马上为你收拾行装，你明天就走。别忘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可要读小说的！”她甚至已经为他们的设计而陶醉而神往，哪管仍带着隐隐的苦痛，“我还要从小说中读到你，读到我。”

“我记着，”乃夫深为她的爱心与惠心感动。此时他甚至怀疑这是真的生活还是南柯一梦“怎么可能这么可爱的姑娘就真的这么爱他——一个无家可归的穷文人！他又抱住她，他感到了那青春肉体的弹性与温馨气息的芳美的搏动……他流泪了，喃喃着：“我绝不让你失望，绝不……”

四

他住进赵家在杭州葛岭山麓的别墅。几个月来在温柔乡里徜

样惯了的无名氏突然住进这如同寺院禅房般岑寂的别墅,也着实受不住那孤独那冷寂,特别难耐的是到黄昏到深夜……静夜里,凭窗远望,似乎除了那点点波光往日的温馨往日的情话已经留在另一个世界。他眷恋那过往的温柔,他激动于那美妙的生命的投入……于陶醉伤感中他温习着幻化着那些往日的岁月。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比真实更美好更博大……于是,他把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男主角的生命。几天的寂寞惆怅使他起笔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叫《海艳》。

从外在看,无名氏清雅文弱,内质里却激荡着诗人的激情、野马般的奔突。一进入创作似乎就到了无我忘我的状态。他正写得入神,无华的信到了,此信除寄来一片绵绵思念,又问他是否忘记了别前彼此每三天一封信的相约?读到这句话他脸红了。尽管他时时都在思念她,与她共思索共生存,但这都是写在书稿里,却忘记了给她写信。他即刻提笔致信,写尽了这几天中他的生活创作和思念。由是,他们走入了一种新的生存格局:无名氏如醉如狂写着他们爱的体验人生的追索;赵无华如痴如醉思念着酿造他们共同心曲的无名氏,那三天一篇的情书往还则成了他们的爱情世界。

就无名氏说,虽然思念所爱情有所苦,但却到了最佳创作状态;对赵无华说,虽然创造了一个相爱相诉的纸上世界,却又总觉饥惶难耐。可算算别期,还不到两个月,怎好启齿招乃夫回来?她理智上尽力控制自己甚至不止一次地骂自己没出息,可情感上却愈发觉得空洞,像是被摘走了那颗勃勃跳动的心。渐渐,她茶饭不思,梦魇缠缠,每日每夜都在等着他的回归,每时每刻都一切无心,只有读着他三日一封信的时候,那失落的心才偶然狂跳一次。她急剧消瘦,不停地咳嗽,痰中泛着的血丝已经由鲜到暗……家人这才发现,惶惶地往送医院。可住院有时,情形更坏。

于是急电到杭。

无名氏接读电报，即刻返沪。

他奔往医院。他一下扑到她的身上。他只感到那瘦弱的身驱滚烫烫地一阵震颤。他抬起头，只见她面若桃腮，眼如汪朝露，她拉住他的手，笑盈盈地：

“写得顺利吗？”

“非常顺利……”他有些哽咽。相别不到三个月，她竟病成这副模样。他倏地想到“回光返照”这个不吉的成语。他感到她的红润她的奕奕都不是好兆，可她却仍在惦着自己的创作……早知今日，他真不该跑到什么杭州去写那部该死的书！他责骂自己，猛捶自己的头。

“你怎么了，夫？”无华惊望着他，“你这是……”

“呵，”他冷静下来，重又俯向她，“没什么……我是觉得我不该离开你……”他呜咽成声。

“……看你，倒像个孩子，”她轻笑着，抚着他浓浓的发，“你不是回来了吗？”停了停，她说，“我没什么病……就是想你想的……”她害羞的脸更红了。

“……我再不离开你。”他紧拥着她。

她快慰地连连点头，可已明显地无力。

少顷他问：“你能吃些什么吗？”

她笑了：“我真的很饿，奇怪，见到你就饿了……”

他急忙拿出居士琳的奶油蛋糕，老正兴即要即送的人参鳖汤和刚刚上市的鲜草莓……

她大口吃着，颇有饕餮相，而且直叫好香。

全家人听说后非常高兴，唯独无名氏，不知是忧是怕还是第六感觉的作用，总逃不脱不祥的阴影，因为他总拂不去“回光返照”这句话。果然，他每天陪侍她身边，情形却愈加不堪。除那天吃了些什么之外，几乎天天饮食不进，只靠打针输液。终于一天，她想

些什么,却光有唇蠕动再发不出声了……她脸现潮红,清丽的大眼睛却日渐暗淡,她紧攥着他的手渐渐无力,终于撒手离他而去。

无名氏傻了。他陷入极度的悔恨与悲痛之中。同赵家人一起,呆呆地陪着大家料理丧事,送她入葬,之后,即怀着那颗怆然死灭的心回到杭州。他再不能住进赵家别墅了。在一所尼姑庵他借住一间房子,整日痴痴呆呆,陷入人世生死的思辩与自己的悲苦中,他两年没再握笔。

五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 1951 年。

崛立的共和国欣欣向荣,青春进发,它像个从战火中走出的少年,虽然身上并未脱尽昔日残留的硝烟褴褛,却一面擦了擦炮火中遗下的伤痕,一面又大步踏向社会的整顿和建设。

……运动一个个接踵而至。镇反。肃反。抗美援朝……

以无名氏的经历与作品,他时时都在被收审被“运动”之列。在时代大潮的跌宕中,那杯水风波的爱情遗恨只能退隐到心的底层。他必须面对现实,面对那新鲜与纷乱宏阔与风险并至的现实。他必须解决摆在眼前的一系列新的具体问题:七旬老母已经日渐其老,先父留下的遗产已经尽被没收,二哥六弟早已避居海外且再难联络,他将家居何处?如何侍奉古稀之年的老母颐养天年?这对从来以文为体以情为魂的无名氏来说都是陌生又艰难的。纷乱和思考中他终于决定:在杭州城里租一间民房,母子相依为命,擦老母在此安家。至于他自己,既然从来都以“无名氏”为笔名,此后更要隐姓埋名不涉世事,只图稍可生存,就摒却世间一切,埋头写完《菩提全书》。

大势既定,即租了间民房接老母来杭定居。到了南京,见一位娴静腼腆娉婷婷婷的姑娘正陪侍母亲身旁,这才想起,当年阿姨匆

匆离世之后，曾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姑娘，母亲感于骨肉亲情，亲自抱养回家，于是甥女变成养女。没想到，当初那位质朴单纯少言寡语的小表妹如今已经出落得如此，且已经高中毕业。这自然也是他的亲属，且多年侍奉高堂老母身边，其孝敬功德已远远超过他们卜氏三兄弟……想到这些，他无尽眼睛渐润……

“……四表哥……”小妹见他进来，悲喜交集，轻轻喊了一声，那秀气的脸颊顿时红到耳根。

“啊，小妹……这些年让你辛苦了……”无名氏发自内心地感激这稚嫩的小表妹。

“看你们，一家人还这么生份……”母亲笑着，“也难怪，多年不在一起……这回好了，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起……”

反正家道已经败落，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即启程赴杭。

母子完聚，生计何出？无名氏即兴式地想到，除写作外，他的书法亦颇为人称道。好在新时代的杭州已无什么熟人，即使有，人人知道的只有写书的无名氏，并无人认识名不见经传的卜乃夫，更无人知道卜宁是何许人。于是他以卜宁为名去拱墅区文化馆寻了一份短工，忙时则去，闲时则罢，主要做的是写写标语书法，其它兼做打杂，以此赚几个钱买粮度日。

共和国建立后百业俱兴。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纷纷应时建立，为发展事业，上海一家幼儿园来杭州招考幼儿园老师。小妹见家计难以为继，想到自己承姨母养育多年，如今已高中毕业，决心不再深造，竟悄悄报了名，不想一举得中，于是喜滋滋地回家报喜：“……姆妈，我有工作了，有工作了……”

“小孩子家，又在胡说，”老母被弄糊涂了，“今年暑假该考大学了，谁要你什么工作！”老太太向以学问为重，既然儿子们都受到完整的教育，怎么能亏待女儿！小妹不是自己所生，那就更不能偏心，这番心意早已在老人心底铸定得牢牢实实。

“姆妈,我知道你的苦心,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呀……”小妹心里在埋怨着老母,她只知道对子女的爱,却忘记了摆在眼前的首先是吃饭问题。

“什么情况不同!我就是要你跟哥哥们一样——上大学!”老人真的生气了,她感到自己的真诚与公平已被养女误解。

小妹哭了,为养母的老迈不顾现实,也为自己的苦衷不被理解。可她不能说出自己辍学是为养家糊口的初衷,这会大伤老人的爱心,她只得佯装说自己头脑笨,成绩不好,对继续上学没有信心,也失去了兴趣,只求母亲同意她支持她。母亲这才放她去上海工作。

小妹为人笃诚,兢兢业业,几年后每月工资竟涨到60多元!她节俭度日,除每月自己留下20元生活费外,40多元全部寄往家里供养母亲和四哥无名氏。

无名氏虽然心有愧疚,新的家庭秩序总算初步形成格局。他从悲痛与变乱中寻回了宁静。他只求这份宁静,因为他需要时间,他要在充裕的时间里完成他的《菩提全书》。他赶写着中断了好几年的《海艳》。也许是因为与赵无华爱得太深,也许爱与时间本来就成正比,虽然世事沧桑,无华已在黄泉路上走了好几年,在无名氏心底埋下的那份情愫反而愈见升华愈见浓烈。他日以继夜地振笔疾书,他把他与她的种种感觉呼唤享受伤悼一并融入书中的人物……忘情处,他忽而喃喃低语,忽而涕泪涟涟……《海艳》完稿的时候,他日渐消瘦,大口吸烟又连连咳嗽,一天,他竟从自己咯出的痰中窥见了鲜红的血丝……他立即擦干那痰迹,避着老母去了医院。X光透视显示出,他患了初级肺病;对此,他亦喜亦忧。喜的是他虽已染病,可与无华正好是同病相怜。如果他也因此而命染黄泉,那么在黄泉路上他们正可以相携相偎爱得默契,这也不失一份福份。……可无名氏是无神论者,他不信有什么来世;忧的是他

那庞大的写作计划刚刚爬了个开头,后面的一座座高山大川正待他攀爬登临,他不能倒下,他要有一副钢筋铁骨!好在科学的前进已不是赵无华的时代,肺病已不是不能认识不能攻克的病症。他除与医生密切配合治疗,又坚持每天练气功练太极拳,渐渐地,饮食正常,食欲大增,人也结实起来。再照 X 光时,肺脏已恢复正常,他初次尝到了生命之战的快慰与艰辛。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无名氏已经 30 多岁,母亲见他整天伏案著书,既不交游,也不思寻偶,着实为他的婚事着急。可看看现实,运动频仍,阶段斗争愈演愈烈,儿子一直平安无事已很幸运,谁家女儿肯嫁这样一个历史复杂一贫如洗连份职业也没有的中年男人!想到这些,耄耋之年的老母不禁唏嘘。现在有她在世,尚可陪伴儿子,对他的生活起居也可稍事料理,万一有一天她撒手人寰,儿子的后半生又如何度过?……再想想小妹,更使老人担忧。她先天内涵懦弱,既不善应对社会,更无力保护自己。虽有一颗善良诚朴的心,谁又肯娶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弱女子!她今年也已经 20 多岁,该成家了。想来想去,倒不如让他们兄妹成婚。虽说早已兄妹相称,但毕竟是表兄妹,这样的关系,可称青梅竹马,知根知底。若能结成秦晋,也可以两心相通,互相照顾……老人越想越合适,在这样的年月这样的家庭,也只能如此了。于是跟儿子商量。

爱情之于无名氏已是一堆灰烬。他爱过,异国女子豪门千金他都爱过。这爱几近把他烧死也几近把他苦死。如今,她们一个个去了,去到那遥不可及的世界。随着她们远去的身影,爱在他心里已经变做一堆死灰一具僵尸。他从此不再想爱也从没想过结婚。他活着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侍奉老母,一是完成创作的高级试验,写完那浩浩七卷的《无名氏全书》。当他初听老母的动议时,竟怀疑是否在梦中,继而不禁惊詫,与小妹结婚?这有什么爱?他

是爱小妹,可那纯属兄长之爱。结为伴侣?他们有何相近之处?无奈老母苦苦相劝,想到自己生之目的既然有一半是为母亲,那就成全老人的心愿,反正这也是人生的一节过程,大家都走,自己也就随俗算了。唯独不知小妹是否同意?此事总要征得人家愿意才算。老母想想也是,于是急电催小妹返杭。小妹不知家中出了何事,接电后即星夜赶回,见母亲哥哥均都安好,那颗倒悬的心才放了下来。母亲于是与之单独谈话,这诚朴的姑娘听着母亲的动议只感到浑身发烧耳热心跳,终归流下一腔喜泪。老母慌了,慈祥地叮嘱,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愿意是我的好女儿,不愿也是我的好女儿……女儿擦干眼泪,轻轻点头说,“我听姆妈的安排。”母亲笑了,这就算定了婚,不久,兄妹俩又草草地结了婚。

六

他们结婚了。小妹的心里装满温柔装满了责任。“四表哥”之于她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从小至今,他对她从来都是如父如兄,体贴呵护,有时像对孩子一样地哄她,有时又幽默风趣绝不含一点恶意地逗她耍她。她读他的书,偷偷地读;她见过他的一切朋友、包括赵无极林风眠,她除了真切地听过他的恋爱故事,她更亲眼见过他因赵无华的猝然而去所引起的碎裂的痛苦……她尊敬他崇爱他,可那是妹妹对哥哥的爱。她以有这样的哥哥而骄傲而自豪,但他同她不是一个层面的人,她从来没敢也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能拥有他又属于他……以致新婚之夜,当她与他睡在床上的时候,她对他仍是只有敬畏甚至陌生,她几乎不敢生出甚至不敢迎接那静夜里的温柔与缱绻。他们相拥很久,静静地切切地,此刻再无动作。终归,小妹窃窃地问:

“……四哥,说真话,”她把头深埋进枕头里,“你,真的愿意么?”

“这还用问！”她的话考住了这位闻名遐迩才情横溢的大作家，他只能这样回答。

“那么……你说说你现在的心情，好吗？”

一道更大的难题！他们亲如亲兄妹，他不愿也不能骗她，可他又不能伤她的心。想想自己的过去、如今，又是多么地不可同日而语！过去，他辉煌过，堪称情场王子；可如今，他一无职业，二无钱财，三无地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敢露，与老母勉强度日的生活费都靠怀中的小妹，如果不是小妹真的心甘情愿，他是没有任何胆量向任何一位女性求婚的……其感慨的良多其心灵的迷乱他理不出头绪说不出口。沉吟少许，他深情地说：

“……想得很多，可最重要的是感激，感激你不嫌弃……”

小妹一下搂住了他。她哭了，为自己的幸福？为丈夫的可怜？诚挚？为丈夫的是感激而不是爱？她说不情。她只觉心里满满的，充盈丰润，沉实酸涩……不管怎么说，她要与他与老母相依为命。她要以自己的扎实勤恳做好工作，以自己微薄的工资让母亲安度晚年，让丈夫如愿以偿写好他要写的书……

婚假三天后，她带着这种使命这种责任返回了上海。

这场婚姻给无名氏带来了太多的联想和伤感，可同时也带给他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他觉得他从往日情场中那些异国女子的火炽与刺激、无华的那些缱绻与默契相互交织的迷离飞旋中落到实地上来了。这是个坚实的土地，在这块大地上他已经为人夫，也许不久他还要为人父了。

母亲颇为这桩婚姻高兴。在这块大陆上，她只有这一个儿子一个养女了，在这变乱频仍的年代，自己亲手搓合他们成婚，以她将近八旬的高龄乃是一件最快意的事。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此后不管哪一天她撒手人寰，都是可以安然归去的，因为她已再无牵挂，她完成了此度人生赋予她的一切责任与义务。她阴郁的脸上

有了笑容。她每天颤巍巍地买菜做饭,坐在外屋看着她最钟爱也最操心的儿子读书写书……一天,老人突然自语:“快八十岁的人了,还没见过孙子孙女……”她听说台湾的老二早已儿女成群了,可惜关山阻隔,两边视若仇敌,“……等他们是等不到了,只有等这老四的孩子……唉……”

可惜,老人没等来老二卜少夫的孩子,也没等到老四卜乃夫的孩子,在乃夫婚后两年多的一天,她含着安慰和无法偿付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 81 岁。

以无名氏彼时的环境和处境,丧事只能从简。老母西去带走了无名氏夫妇巨大的哀恸,也带走了卜氏家族所有的前世辉煌;相去相得,却也带来了无名氏与其妻的相契相得。似处不期然地,他们都意识到此后人生只有他们两个亲人了,他们必须相依为命,走到人生的尽头。

七

历史跨入了又一个年代。那时,举国成了一个“红海洋”;那时,8 亿人民成了 8 亿“批判家”;那时,举国冲动举国迷狂举国卷人一个大大的黑色幽默!就在这个庞大的“幽默”中,不知有多少人命染黄泉,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幽默”挟着“狂风”,从北方刮到南方,于是上海刮起了“红色风暴”。这“风暴”磅礴且细腻,它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碰到谁谁就得举手投降,否则就叫他(她)灭亡!“风暴”不久,就把无名氏的妻裹胁其中。问题很简单,其妻虽兢业业单纯诚朴,可其夫无名氏却是惯写“反共文章”的“反动文人”,何况他历史复杂,他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反革命史”——他做过“反共急先锋”的《扫荡报》记者,他做过国民党书刊检查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兄弟卜少夫、卜幼夫至今在台湾和东南亚从事“反共工作”,他——无名氏滞留内地不走,岂不是历史反革命

加特务加间谍,他的妻子岂不是反革命的臭婆娘!对这样的危险分子——不管她本人表现如何——岂有不揪不斗之理?!开始她吓懵了;继而她觉得他(无名氏)是他,我是我,杭州对他都无任何举动,你们对我批斗所为何来?她“认识不到”自己为什么错。于是继续批斗,隔离审查。小妹本来就单纯质朴胸无城府,几经软硬兼施的折磨与“分化互解”她被“瓦解”了。尽管她对丈夫恨不起来,但也似乎有时出现“知迷途为未晚”、“想今是而昨非”的念头。“造反派”穷追猛打再施压力,她在种种淫威下屈服了,就范了。让她批判丈夫她就批判,让她划清界限她就划清界限,终归,“造反派”让她与丈夫一刀两履行离婚手续!这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对丈夫,她的确有了一个从崇拜到认识到怀疑到批判的“飞跃”,但她毕竟是他同一个母亲养大的,除了是丈夫,他还是她的四哥,过去,她同他有“高天”与“平地”的隔膜,但他从来没蔑视过她没疏远过她,他在她面前永远是一位可亲可羡热情开朗的大哥哥;之后,他们结为夫妇,感情心灵方面的距离越拉越近,她对他几乎摸到了心之跳动。她知道他们所关注所思索的常有不同,但更知道他有学问有头脑,他想的远比她大得多深得多,他想的是民族的命运民族的文化,这些她虽不懂,可她知道他不想害谁也不想妨碍谁,他绝不是坏人。何况他正在日以继夜写一部大书,他没任何生活来源,他靠的是她,她怎么能在他正需要她的时候抛弃他,同他离婚呢?她不能接受她,她说她可以在政治立场上同他划清界限,甚至可以不见他不理他,但她不能办离婚手续,因为她实在没想过结了婚还要离婚。

造反派们刚刚露出的笑脸收回去了。他们又把她单独隔离,让她检查反省,从灵魂深处革自己的命。他们凶神恶煞地隔离她几天后,又一变为轮番轰炸,每天24小时不让她休息,最终批斗不够,还对这个弱女子拳脚相加,在血泊与恐惧中,她屈服了,终于答

应与无名氏离婚。

风暴的中心虽然尚未刮到杭州,无名氏却也闻到了山雨欲来的风满楼。很长一段时间文化馆不再找他写字了。杭州城里的一些大中学生有的已经戴上了红袖章。妻子两个多月不闻消息,每月两次的书信断了,每月一次的或汇款或回杭探视也踪迹杳然。他听说北京的风暴已经卷到上海,广播中不断传出火药味呛人的社论和新闻,他意识到妻可能出事了,接着又自我否定,因为他知道妻历史单纯,为人简单,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沾地富反坏右的边,运动再如狂风也不应刮到她的身上。可万一呢?万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创作被人发现又被人联系到她那就难免了……他已写过几次信却无回音,他想去上海看她或哪管探访一下消息又觉不能,因为在这种特殊的年代一点轻举妄动都可能带来不测的后果……他只能把门关得更紧,可他再难写作了,他度日如年,他只能等待,等待……终于,上海,妻的单位来信了,信上只说要他即去上海,别的一概没写,也无妻的只言片语,他断定妻是真的出事了!他急得撕心裂肺,他痛得像是浑身着了火,他急急地跑向车站,火车已没了车票;他又跑向码头,终归买到了一张夜船票。第二天清晨船到上海,蹿上码头就直奔妻的单位。

那家幼儿园的大门刚刚打开。一位臂挂红袖章的老看门人正在打扫院子。他喊了半天“大爷”,那人才回过头:

“叫什么叫!”他瞪了他一眼,“知道是什么时代吗?”

无名氏呆呆地站在那儿,一时讷讷无语。

“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要那么多的温良恭俭让,谁是你大爷?看你这样子就有些问题!”

“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同志……”

“叫同志还差不多,”老头杵直了扫帚,“有什么事?说。”

“……我是来找人的。”

“这么早，你找谁？”

他说出了妻的名字，他说得战战兢兢，不知为什么，他总感到妻已不在人世了……

“噢，她呀。”老人的语气中流露出无限的轻蔑。

“她怎么了？”无名氏急急的追问，两眼目不转睛。

“你是她什么人？”老人更加居高临下。

“我是她丈夫……请问，她怎么了？”

“……嘿嘿，她能怎么样？”老头点着一支烟缓缓吸了一口，像看动物园里跑出的一只黑猩猩样地看着无名氏，“一个历史反革命的臭婆娘，她当然只能被专政！”他吸完这支烟竟一声不吭，又“唰唰”地扫起院子。

“……老同志，请，请你让我见见她，可以吗？”无名氏急不可耐地近似哀求着。

“你等着吧，等专案组的人来了，会让你见的。”老头显出几分飘然，情形颇有点“独坐城楼观山景”的诸葛孔明。

“有什么情况吗？”不知过了多久，门外走来一位戴红袖章的彪形大汉，后面跟着两位同样的红袖章。

“啊，有人找那个臭婆娘。”老头献媚地跑过来。

那大汉端详着无名氏：“你是她什么人？”

没待无名氏回答，那老头抢先回答说：“这还用说，他爱人嘛——”

“呸——”大汉轻蔑地冷笑，“卜宁，不，你就是无名氏先生喽？”

“是，我是。”

“好，走吧，我们就等你了。”

“她，怎么样了？”无名氏几乎五内俱焚，因为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妻是死是活。

“她嘛，她很好，”大汉盯了无名氏一眼，“她已经决心改头换

面,这当然还需要你的配合。”

“这好说,好说……”在无名氏心上悬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这多好,她还活着!只要她活着,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他顿时觉得那天的朝阳格外地美,他跟着他们,左弯右转来到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

这小屋实在阴暗,以至那大汉打开门的霎那,小妹那原是亮丽乌黑的大眼睛不得不眯成两条缝。可能正因为她眯着眼,无名氏随那三条大汉进来时,她并没认出他。看着她蓬乱的长短不齐的黑发,眸子间织出的一网网血丝,脏污菜色的脸……无名氏只感到一阵阵眩晕一阵阵刀割斧凿般的心的绞痛,他一阵生还似的悸动欲要扑向她,那大汉只一甩手,他就趑趄趑趄地被扔到墙上。他看看小妹,小妹平静得如同没有知觉,她头也不抬,像是眼前什么都没发生。他挣扎再起,大汉喝道:

“老实点,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继而转向小妹,“写好了吗?”

她这才抬起头,一对无神的眼睛扫了一下满屋的人,又点点头。

“签好名,交给我!”

她瑟缩地掏着兜,半晌才从撕扯得掉了一半的衣兜里递出一张揉皱了的纸。

不知什么时候另一个大汉递给她一个脏污的印泥盒:“喏,摁上手印!”

她伸出食指,强烈地抖索着,半晌,才找准那紫黑色的丝棉,摁了一下,又在大汉手持的皱巴巴的红纸末稍摁了一下……她这才似乎感到了什么,她抬起眼,一对凄哀的大眼,满屋寻着,终于,她的眼神与他的相遇了,顿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流出两滴干涩的泪……她呜咽了,呜咽得暗哑:“……四哥,我对……不起……你……”

“带走！”

大汉一声怒吼，另一大汉就像老鹰捉小鸡般把她劫走了。无名氏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不知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折磨这个弱女子？他只记得她被劫走时的那用力挣脱的两臂显得那么无力又那么钢硬，他只记得她最后看他时的眼神是那么悲哀那么痛悔那么依恋那么绝望……

“你们要把她带到哪里去？”他猛省过来。

“老反革命，管好你自己吧！”

“我，不，她是我妻子！”他疯狂地大喊。

“嘿嘿，”大汉冷笑，“你已经没资格这么说话了，看看这。”他抖开那张纸。

纸上歪歪扭扭地印着他十分稔熟又十分亲密的字，她们曾经是那么娟秀，可如今已经痛不欲生痛得狼狈痛得变形痛得扭曲：

……为与丈夫卜宁划清政治界限，特提出与他离婚……

上面还写了些什么，同样是歪歪扭扭，但他已经看不清也无需去看了，难怪她那么伤心那么悔恨那么绝望……他想着她凄哀的眼睛菜色的脸，他想着她说的话：“对不起你。”他知道她是深爱他的，他能想象得到，如果不是受了无法承受的折磨，她是绝不会写这一张离婚书的。

“……这不是真的……你们把她还给我！”他歇斯底理地狂喊，他扑向那大汉。

大汉又只一扔，就把他扔向墙角：

“你还以为自己挺香么？一堆臭狗屎！要不是你的反革命罪行，要不是你那段反动历史，她会有今天？！”大汉藐视地撇撇嘴，“她恨你入骨，早已经决心同你划清界限。要是你爱她，哪怕是同情她现在的处境，你就在离婚书上签个字。你只签了字，她马上就是革命队伍里的成员就可以恢复工作，恢复自由……”

他还在说着什么,可无名氏已经再听不清,只见他那乌黑的嘴唇唾沫四溅,上下碰撞着……

无名氏回到他与她的世界:少小时他与她的嬉闹天真……成年后的兄妹之谊……初婚时的陌生与甜蜜……后来的相依为命……他琢磨着这黑大汉的话,他承认不管这大汉如何残酷如何灭绝人性,可有些话他是说得对的。如果不是自己的复杂的历史与作品,小妹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有今天的境况的,她是那么单纯那么与世无争那么孱弱无力,她不会妨碍任何人,多么彻底干净伤天害理的“革命”也革不到她头上的……是的,他该为她想,这样的年月这样的时代,最大的体贴也莫过于划清界限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可悲又可卑的是自己,他几乎成了传染病毒,成了“臭狗屎”,谁只要与自己稍一沾边,就要害上不治之症,就变得顶风也要臭个十万八千里!他恨自己,他怀着鄙夷的心情接过那张离婚书,他似乎是为救助小妹,在那张离婚书上签了字。

八

……他把自己关进自己的屋子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几天没有开门,他只是昏睡,有时睁开眼见满室沉黑,有时睁开眼见窗棂上罩着一抹淡漠的阳光……他终于清醒了,他这才明白自己已经真的是孑然一身了,老母前两年故去了,妻也已经随着那张皱巴巴的纸与他永远分离……如果他就此不再爬起,也许到他的尸体僵成干尸时才会被人发现……可他不能,他的《无名氏全书》刚刚写完三部,第四部已经开始,他要活下去,他不能不完成自己的计划……

窗外滚过一阵造反派们高音喇叭的狂啸,又是打倒谁砸烂谁,他无心去听听也不明白,他突然回忆起上海那黑大汉对他的评价,对他人生历史的鄙夷……他意识到,既然上海对他的历史和作品

一清二楚且列为打倒之列，杭州轮到他的日子也不会远了，而且只要轮到就不会轻饶他！他猛地滚下床，一种自卫的本能使他马上清醒马上恢复了体力。他自然身无长物，可他的手稿比什么长物都珍贵都重要！他恨自己昏睡得太久，他庆幸自己终于赶到噩运到来前就意识到在劫难逃的命运，他急忙拣起手稿，把它们排好页码，打成捆，之后又严严实实地包了几层塑料布，转了好久才藏到一处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所在。

一阵紧张忙乱之后，他突然感到了饥饿。于是挎着菜篮走到街上。多日不出门，街上显出更加少有的狂乱与肃煞。他蹙进一家小饭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条清蒸鲩鱼，一碗梅菜扣肉和两碗大米饭。反正今日能吃今日吃，明日忧来明日愁，既然今天尚为自由身，何不填饱漉漉饥肠。之后又挽篮上街，买上一篮子蔬菜与挂面，以后几天又可以闭门不出了。

他封笔了。像等待喜讯般地等待那随时可发的噩运。奇怪，杭州街上今天批斗一批“黑帮”，明天游斗一串“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几个月过去了，他这个被上海那大汉描绘得凶神恶煞般的历史反革命却安然无恙，从来没人问津。一天深夜突然有人敲门，条件反射般地他站起身，准备迎接那准备了好久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一想，那敲门处既没有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也没有疯狂杂沓的脚步声，相反，那声音却有些胆怯。他走向门边，轻轻拉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蓬头垢面、瘦削慌张的中年人，他细细辨认，原来是他的一位在上海教书的老友 B 君。

“乃夫……真高兴我还记得你的住址……”

说着，他嗖地挤进那陈旧的家门，“谢天谢地，你还这么自在地住在自己家里……”

他狐疑地望着 B 君，很久，才呐呐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B君自顾倒了一杯暖壶里的温开水，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才抹抹嘴说：“老天有眼，我才逃出这条老命……”

原来，他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教书，“红色风暴”骤起，他所在学校正是风源，每一批揪反动学术权威时他就首在其列，他被红卫兵皮带棍棒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即入“牛棚”。

“这几天，红卫兵们打起派仗来，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也就没人管了，我这才逃出这条命……”

“逃出就好，逃出就好……可以后怎么办？”无名氏陷入迷茫。

“唉，活一天算一天……说真的，乃夫，我倒羡慕你。”

“羡慕我？”无名氏一阵苦笑，“我还不是放在案板上的肉？人家愿意什么时候宰割什么时候开刀……”

“可你没牵挂……”B眼巴巴地望着他。

无名氏一声长叹，“谁的苦谁知道。”

“咳。”B也叹了口气，竟要一吐为快：“乃夫，我是死过一回了！等到又活过来的时候我才想通，人生就这么回事，死很容易，倒是活着太难。与其这样，活就活得好些，包括自己的亲人，小妹为活得好些，跟你离了婚，她解脱了，你也得到一些解脱……”

“这倒是，”无名氏深深颌首，“我一点不怨她，只觉得对不起。”

“这就对了！”B伸出拇指，接着又滔滔地说，“告诉你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消息，”

“什么？”

“她已经结婚了！”

“你是说小妹？”无名氏的神经被强烈地刺了一下，“跟谁？”

“别问了，”B犹豫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该告诉他。

“咳，B君，既然你把人生看得那么透，干吗说话还这么闪烁其词？”他点着一支烟，深吸一口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亲人们从死里

逃出一个是一个……”

“……从这层意义说,她是嫁对人,”B也从无名氏手里要了一支烟吸着,“绝对是嫁对人!”

“什么人?”无名氏急于知道结果

“一个操刀的屠夫,”B无遮无拦地说出事实真相,“还有三个孩子。这是造反派们为她指定的,她无力抗拒……可从另一个角度想想,也好,这屠夫是世代贫农,小妹从此也就改变了成份,免得再受折磨再抬不起头……”

他还说些什么无名氏已经听不清了。他只感到头晕目眩心痛如绞,他木木地倒在床上,眼前时而漆黑一片,时而灰白一片……他发起高热,他陷入种种恶梦……不知过了几天,他才又从恶梦中醒来,B为他煮了些挂面,他勉强吃了几口,又无力地放下那沉重的碗筷。

“……总算好了,”B兴奋地坐在他的床前,“告诉你个好消息,”可能因为过份兴奋,B的脸呈出一股嫩红。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消息……”无名氏有气无力地望着他。

“明早八点,我们就可以爬出苦海!”B兴奋而轻声地说着这喜讯的来历:原来就在无名氏卧病在床的时候,他一人去街上寻找生路。可也凑巧,他遇到一个偷渡客,说只要交出300元,他就可以偷渡一个人去香港。B认为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竟自做主张,为无名氏报了一个名额,他们已经约定时间地点,言明一手交钱一手偷渡,保证到港……

“我不去,你也不要去!”无名氏像是百病顿消,倏地坐起来。

“怎么?你不想去香港?!”B直直地瞪着他,像是看一个疯子。

“这肯定是个骗局!”

“为什么?那人很实在的。”

“你不想想这是什么年代!”无名氏十分冷静,“再说,即使有偷

渡客,也是在上海,因为那里临海;杭州是个内陆城市,谁会在这里揽客?!”

B 的一脸兴奋被无名氏的冷静分析浇灭了大半,但他仍不服气,继而又燃起信心,“也许你的分析正是偷渡客忌讳的所在。正因为上海临海他才来到杭州,免得被公安局盯上,这也叫暗渡陈仓嘛……”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要去!”无名氏斩钉截铁。

可能 B 怕无名氏阻拦,也可能怕他告密,第二天当无名氏醒来时,B 已经杳无踪影,随身所带的东西也一无所剩……无名氏为他担忧着,也为他祈祷着……一连两天,平静无事,可第三天早晨,无名氏被公安局逮捕了。原来,那偷渡客本是便衣警察假扮的。那天早晨,当 B 按时来到约定地点时,偷渡客问:

“怎么是你一个人?”

“咳,傻瓜!我那朋友不走了。”

“倒霉,又少做了一笔生意……”偷渡客稍稍迟疑了一下,“好,上车吧!”他指指停在路边的吉普。

B 也顿时一脸怀疑:是否真地上了圈套?为什么这偷渡客不先要钱?为什么他还有吉普车?……“你到底是?”

“啰嗦什么?上来吧!”车门开处,车上走下两个年轻人,不由分说把他扭进汽车,汽车风驰电掣直往公安局。

B 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就问他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问到来杭州的目的和住在哪里时,他不得不招出无名氏。

怪异的年代总有些怪异的事,无名氏的狱中生活要比在狱外平静得多省心省力得多。主审他的法官是一位解放前法律系毕业生,对无名氏的历史、著作以及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清二楚,他甚至还曾经是他的热心读者。法官说,“你过去的历史的确复杂,你的作品有些是反党的。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过去的历史;解

放后你虽没有贡献,但也没做违背党违背人民的事,按法律是不该逮捕的。但现在社会动荡,红卫兵常常有行动,与其在家里还不如在这里安全,这就是我们捕你的原因。”事情果然如法官所说,无名氏入狱后从没审讯过,也没受过任何委屈,法官的这次谈话是他狱中生活唯一的一次审讯。之后,他就或写写黑板报,或教教文化课,有时还给公安干警教文化。一年零两个月后,初起的文革狂风已经渐渐平缓,无名氏也就走出监狱,回到自己的家,奇怪的是,这时的他反而健壮结实多了。

九

那次杭州之行共逗留六天。六天中几乎天天雨雾蒙蒙,话语滔滔,或里西湖,或外西湖,我与无名氏几乎形影不离互称忘年交。在这之中我们有了理解有了信任,他终于十分放心地把他《无名氏全书》的后四部手稿交我抱回出版社(当时,他的前三部《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似的蛇夜》已在香港出版),后来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稿件悉数寄还了他。几年后的一天,突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同时报道了他去香港省亲的消息,《光明日报》并刊发了他与乃兄卜少夫在罗湖桥相见拥抱的照片,读到这些我曾暗暗为他祝福,祝福他兄弟团聚一解思念的喜悦。可不久就听说他逾期不归已往台北的消息,这是他晚年政治上的又一次失误,做为曾互称忘年交者,我不能不为他遗憾。1986年春,加拿大籍华人女作家陈若曦女士来京,一次闲谈中我问起无名氏的近况,陈女士说,他初到台北时着实热闹过一阵,欢迎会、报告会、恳谈会纷纷扬扬,可热过一阵之后,台北的读者就现出冷落,因为台湾的青年读者毕竟太年轻,对大陆和大陆生活又有太多的生疏太大的隔膜。之后,无名氏在台北又遇知音,据说那女子年轻貌美,两个喜结鸾凤后已双双相携,定居美国。此后境况如何,在写什么?已再无消息。

□李新宇

“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

——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并不顺利的整合

在 50 年代文学中考察知识分子话语并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是困难的。因为它明显地处于一种被限制和覆盖的状态。当文学家宣布自己的创作活动都是在某一权威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时候,当这种创作活动都必须为政治及其一系列运动服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工具,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当然无从谈起。然而,历史发展的复杂之处却在于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因为其自身的生机而很难像雨水打湿的头发那样可以随着政治运动的梳子而立即理顺,它存在着,而且表现出相当大的强度和韧性。

一方面,历史已经形成那样一种氛围,好像整个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已经系于伟大领袖和他必然英明的决策,无论文学家还是其他知识分子,只需要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准确无误地运动已经足够,而不需要自己有任何与指导思想不同的意见。这种思想文化状态必然极大地限制着知识分子思维的主动性,限制着社会的活力。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往往是盲目的,创作不过是按照文学写作的表面形式而进行操作,写作者只需要技巧而不需要思

考。如果需要思考的话,思考的内容就是如何以生动的形式表现既定的权威话语。在意识到自我与权威话语的差别时,文学家只能否定自我,而不可能怀疑权威话语是否正确。作家们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以速成的形式开始学习和接受权威意识形态。当作品受到批评时则往往以“不理解”、“学习不够”作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文学独特表达生活的权力已经不具备现实的合法性这一事实。丧失了自己话语表达权的知识分子已经不需要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不需要思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这一切有伟大人物的思考就足够了、社会改造的途径更不需要知识分子操心,伟大蓝图早已画就,好好学习并深入理解以便有效地配合施工是知识分子和一切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唯一的任务。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标准却没有随之完全彻底地消失。无论是在文学活动还是学术活动中,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标准仍然在以其独特的形式存在着。如果认真考察就会发现,尽管新时代以强大的力量进行着价值观念的整合,知识分子却有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很难接受社会的一般价值标准。它是彻底边缘化的,却深植于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在政治学习总结和思想改造汇报中,知识分子除陈寅恪等极个别者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示着积极的接受和顺从,但是,这一切并非完全真实,人们公开的表态和内心的真实感受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并不是说他们都在某种压力下阳奉阴违,而是他们内心世界早已存在着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够认识到其矛盾性的另一套价值和另一种精神偶像。正如在科技知识分子心中列宁斯大林无论如何代替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一样,在文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政治英雄也同样代替不了文化巨人。对于致力于思想统一与精神一致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分庭抗礼的力量,因此而必然地要努力铲平它。一些做法虽然让后人感到大可不必,但冷

静地思考,却会发现经过“五四”新文化培养的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体系的确造成着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在于一些所谓旧知识分子保持旧的世界观,而且在于它对革命队伍的腐蚀。那些从革命队伍走来的年轻的作家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只因为从事文学创作,成了作家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政治领袖总在致力于克服的一种“变质”现象。变质现象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它层面的变质在此暂且不论,单就革命战士成为知识分子之后的变质而言,是当时政治领袖非常关注而没有能够深入思考的。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其它层面上的变质往往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作用或者革命意志衰退等等,却没有看到革命战士成为知识分子之后所发生的变质的某种必然性。事实上,要防止这种变质是不可能的,——除非让革命队伍内部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都永远只是纯粹的宣传工具,而没有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永远只有列兵的本色而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因为他一旦成为作家,就产生了与政治革命要求虽不一定矛盾却不完全一致的追求。纯粹的政治家和一切局外人都很难发现这里真正的诱惑力之所在。它是一座座由大师们构成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学科,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群都可能产生自己的宗教,都可能产生自己的崇拜偶像。一旦真正进入文学殿堂,他们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向大师看齐,就像在官场总是向成功的上峰看齐一样。而那些高峰之所以成为高峰,是由于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闪耀着光辉的话语。于是,在他们接受这些文学大师的同时,观念世界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个价值体系。尽管这些高峰也同样可以为权威话语所操作,比如通过选择和遮蔽而只留下鲁迅和高尔基。但是,一旦真正走近他们,就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危机:鲁迅、高尔基也不完全是为政治运动之需要而描绘的那种模样。

所以,政治上完全过硬的“红小鬼”进入文学殿堂就开始变质,贫下中农的子弟进入大学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人,这是那个年代政治领袖一直为之苦恼的事。这种苦恼甚至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知识青年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严重后果。工人的女儿和贫农的儿子之所以同样需要接受再教育,就因为这样一个逻辑:虽然他们本来是红色的,可以信任的,但由于上了大学或中学就改变了颜色,变成不可信任的了。学校之所以具有这种非无产阶级化的“染黑”功能,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虽然在政治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阵地却没有能够完成占领,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要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就需要通过“再教育”的方式将其争取回来。这似乎很荒谬,但却很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政治领袖们非凡的头脑及其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可是,它的悲剧意味在于,这个问题是注定了无法解决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拒绝接受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精神文化的成果的传递。所以,即使到了文革时期,闹来闹去,大学还是要办的,虽然毛泽东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最后却是文科大学也照样办了起来。不办文科大学而只办理工科大学的思路很值得注意,它可以理解为接受技术层面的知识而排斥与政治的现实要求不相一致的价值体系的一种有效策略,但是,它没有能够成为现实。文学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为了防止不良的影响,无产阶级的文学曾经被筛选到只留下《国际歌》和“样板戏”,但是,即使在文革当中,作家和文学青年也从来没有只崇拜欧仁·鲍狄埃和江青,那些被批判的世界名著仍然在他们心中闪光。这就无法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无论政治上多么坚定的革命分子,只要成为知识的信徒,只要成为文学艺术的崇拜者,就不可避免地

被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所改造。这是50年代到60年代政治权威一直努力解决而终于没有解决的问题。

50年代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肖也牧，批判新红学，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每一次批判运动都是为摧毁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体系而展开的。每一次都意义重大而决非小题大作，它显示着权威话语的整合意向。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权威立场上看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确让人头疼，他们就像一些不懂规矩而又不好好接受训练的士兵，让指挥官为之费尽心机。文化界已经被认定为“文化战线”，这条战线与其他战线比起来情况特别复杂，其中虽然不乏来自革命队伍的久经训练者，但也有大批刚刚接受的新成员。新成员有各自的思想信仰和人生哲学，对于统一信仰、听从口令一时难以习惯，而久经训练的老成员也常常“旧病复发”。对肖也牧的批判从作品的“小资产阶级观念、趣味”开始^①，到批判其歪曲和嘲笑工农兵，最后让丁玲一语挑明：“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②《我们夫妇之间》的确不仅写了知识分子，而且以知识分子的概念和趣味观察生活，评价生活。这在一些人看来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对电影《关连长》的批判是后人很难理解的。然而，只要进入那个年代，就会明白，作品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也在于作者站在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上理解革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写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连长是对革命军队的一种赞美，但是，被赞美者的头脑却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赞美。尽管这种赞美会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革命军队，但这时的革命军队却已经不希望依靠穿着知识分子为其缝制的服装而被接受，因为那将意味着革命军队将被知识分子改写和重新塑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战斗到明天》等作品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也多在知识分子

的话语立场所显示的“资产阶级创作倾向”。

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起点的对新红学和胡适的批判,其矛头指向是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其实,批判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批倒这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权威。在“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心目中,鲁迅和胡适的地位是谁都无法忽视的。对于鲁迅,经过从30年代就开始的各种解释,已经使他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批判国民性到歌颂人民大众,由孤独的精神战士到遵命创作的作家,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完全彻底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变,因而已经能够很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胡适却因为远走美国而失去了改变的可能。虽然胡适其时在纽约非常孤独地过着他的寓公生活,但现代文化领袖的地位却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如果我们考察当时大陆知识界的人才结构,尽管胡适嫡传弟子不少都已离开大陆,但在文史哲各界,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仍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少数。他仍然是一个不在现场的领袖,以无形的力量影响着知识分子。

如果说批判胡适的意义是通过批判精神领袖而消除胡适的追随者及其自由思想的威胁的话,对胡风的批判就是对坚守在鲁迅启蒙主义阵地上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警告。鲁迅虽然被改写,但改写自有其巨大的局限。它必须在名实之间做文章,改写其实而仍然高举原名。这就无法避免人们在“原名”的旗帜之下进行对“原实”的恢复,甚至进行不同的解读。既然鲁迅精神是可以继承和坚持的,那么,胡风就可以在鲁迅精神的旗帜之下进行某种坚守。胡风的悲剧在于他坚持鲁迅的启蒙主义立场,这种知识分子的牢固立场使他不可能愉快地响应召唤而接受权威话语和权威话语支配下的民间大众话语,不可能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而去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胡风是老牌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他的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像四十年代延安对丁玲、肖军等人的批判,即使以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它也构不成阶级斗争,不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关系。它的意义就在于铲平革命队伍内部的知识分子话语中坚。

从表面上看,整合工程进展顺利。作家、诗人们都迅速地响应号召而走向了民间生活,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从贫下中农的立场体会获得土地之后的幸福感,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去体会当家作主之后的自豪感,从士兵的生活去获得战斗的激情。“深入生活”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必不可缺的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外在于生活,只要不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就不可能外在于社会生活。但是,5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却常常出现“没有生活”、“不熟悉生活”的问题。这是知识分子话语丢失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自身的生活已经不是生活,或者说,知识分子自己的生活不是文学作品可以表现的生活。文学作品要表现的生活是工农兵的生活,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当中去,当然就不能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获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深入生活”这个口号是适应新的形势出现的。它是知识分子获得工农兵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的一种途径。它昭示着知识分子在创作中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诗坛泰斗郭沫若示范性地写出了《学科学》、《学文化》、《防治棉蚜歌》,高唱“学科学,学科学,科学人都该学”,从内容到形式全面适应着权威的传唤,指示着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在知识分子中,文学却仍然有自身的标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的一种曲折表达。真正与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相对立的是个性化和独创性。知识分子正是试图通过这一特点的获得而使文学保持

知识分子话语的个性化表达,要求着知识分子话语的存在权和独立性。知识分子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声讨此伏彼起,非常激烈。当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更进一步地“深入生活”。因为根据权威的解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作家的创作受了限制,而是因为作家没有真正地深入生活,生活千姿百态,只要真正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就可以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人的生活很难真正深入,作家们能够做的仍然是根据政策理解生活,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与“主流”。这一切既不能让知识分子衷心认同又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越是被逼迫认同报纸社论中对生活的认识,知识分子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力的愿望就越是强烈。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努力所包含的反抗是有限的,它所反映的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对自身话语权力的一种留恋。

“早春天气”里的突围

无论权威话语是如何努力实现其精神一体化目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找着突围的机会。这个机会在1956年奇迹般地到来了。那个短暂的时光曾经被知识分子称作“早春天气”。

“早春天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带来的。而这个被当代知识分子一再称道的“双百方针”之所以能够提出,却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有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的原因。当代文学研究对其原因的论述已经相当充分,但主要强调的还是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改革浪潮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要求等。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大概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双百方针”接受者的心理状态。这就是前而所说知识分子获得自身话语权力的梦想,正是这种梦想使他们为“双百方针”的提出而热烈欢呼,同时也

赋予“双百方针”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意义。二是“双百方针”提出者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提出者毛泽东心理上的自信。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专制传统悠久而牢固的国家,自由言论往往出现于两种情况:一是权威话语失控;二是权威话语高度自信。在非失控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话语独立空间的合法性往往取决于权威的自信或者不自信。当权威自信时文化环境就会宽松,当权威感觉面临某种危机而生恐惧时就特别警惕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论。

1956年的毛泽东是充满自信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掀起,镇反、肃反和一系列社会改造工程的基本完成,大风大浪都已经过去了,实在没有必要害怕知识分子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发挥和学术讨论中的自由争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使国家权威从实用的角度考虑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所以有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说。虽然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再也不会以成为工人阶级一分子为荣,甚至工人阶级也正在以各种方式把自己打扮成白领,但在50年代这却意味着一种信任,一种被接纳的荣耀。国际的影响是重要的。从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看,当时的中国权力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已经被充分注意到。这意味着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某些教训。领导人开始以“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新思路来考虑问题,开始考虑以非武力的方式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并在稳定中求得社会的发展。其实这是必然的,也是规律性的。一个社会不能总是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一个新建立的政权如果总是依靠枪杆子和不间断的斗争来维持自身,那也太可悲了。尽管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从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但不愿意再把一切解释为阶级斗争而开始思考一些矛盾的非

你死我活性质,却是一个新的动向,它反映着国家权威追求社会稳定和谐的一种愿望。无论什么时代,统治关系确立之后都必然地希望稳定,只有感觉到严重威胁时才不得不放弃稳定的努力而展开斗争。任何一个自信的政权在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都会迅速地使社会趋于安定团结。但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坚信一些不和谐因素已经不足以从根本上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1956年的国家权威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建立这种自信。“双百方针”正是这种自信的体现。

“双百方针”的确切内涵至今缺少准确的解释。因为提出者本人的解释有不同的版本。现在人们依据的是1957年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报告。他的讲话使我们看到它的基本点是在政治上分清敌我的同时在人民内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今天我们面对“双百方针”的各种解释,都可以看到,即使最理想化的解释,也决不是无限制地放松,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已经使知识分子为之欣喜若狂。朱光潜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真诚表述:“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者是就美学里的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了,我就松了一大口气。”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谈到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③大概无须通过统计数就可以证明,“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艺界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很多人心情舒畅,不再顾忌,开始敢于反映真实的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真正的感情。甚至周扬都曾经为“双百方针”的提出而喜形于色。他看到对大斯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教条主义的批

判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个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这大概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权威话语的传达者,知识分子独立意志和自由之梦也并非能够完全消除的。他们毕竟也是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对于创作自由和个性的自由不是没有留恋。

突围的努力主要集中子三个方面:

一、反对政治干涉和束缚,要求创作自由。大量文章对文学现状表示不满,其焦点在于政治对文学过多的干涉。文学呼唤创作自由而否定政治干预,这涉及到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要求,涉及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创作自由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可以通过它而重新获得知识分子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在“双百方针”提出的“早春天气”里,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独立意志迅速膨胀。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成为新的梦想,知识分子应该获得的一切权力都成为奋斗的目标。以“探求者”文学社为代表的同人团体和同人刊物的出现可以说是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突围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它标志着那个时期知识分子获得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的一种努力。同人团体和刊物这一在“五四”时期曾经那么辉煌的文学存在形态竟然如此让知识分子难以忘记!50年代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却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寻找回那种属于自己的话语阵地。“探求者”文学社的《章程》和《启事》中闭口不谈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他们的口号是“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这里显然隐含了某种摆脱控制的倾向。

二、争取独立的批判权。今天的文学史对“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的文学现象的描述一般都注意到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化这一特点。现实主义与知识分子争取独立的批判权虽然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什么时代,国家政治对批判权的问题都是敏感的,所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这一行为本身就具

有一种精神独立的性质。但是,对现实的批判却并不一定都来自知识分子。因为权威话语自身也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自我批判。在1956年到1957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有两种批判话语,一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批判话语。前者更多地表现为对“五四”新文学批判传统的继承,更多地体现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后者多来自革命队伍内部,其根本问题是理想化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的理想化的价值目光,他们用这种目光看待革命成功之后的现实,发现它并不像革命过程中向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于是,他们就努力于这种美好理想而对不符合他们理想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这种批判基本上是权威话语自身的批判,但是,过于理想化的目光却往往来自于革命队伍内部年轻幼稚的知识分子。所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争论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指出林震的目光即王蒙的目光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目光。邵燕祥、公刘等对现实的批判就更多一些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贾桂香》等作品中所批判的官僚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热情衰退或者满足于上传下达,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观念对人的幸福生活的破坏。这些作家和诗人差不多都来自革命队伍内部,他们的创作的确意味着这些本来应该一心一意服从纪律的战士不再简单地听从命令,他们重新认识战士的职责,把战士的职责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结合在一起,找回了丢失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

三、复活文学的“人学”性质,重新确立人在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张扬个性和人道主义。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重新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口号。“人的文学”是“五四”时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最鲜明的标识,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中心命题。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强调“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体”,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

以人为注意的中心”^④。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重提“五四”人的解放的口号,但对人的重视本身已经意味着一种突破。“人的文学”与“文学是人学”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都以人为主体的,以人为对象,用人道主义的精神去观照社会生活和各种生活现象。巴人在《论人情》中指出当时的文学“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根据他的解释,“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他认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大都是鼓励人要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悲愤大多数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对社会的不合理、束缚人的才能智慧的发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的生活,足以发扬人类本性。”^⑤目的指向一目了然。这已经完全是“五四”启蒙主义式的知识分子话语。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突围中,理论上的呼唤最值得注意的是巴人的这篇《论人情》,它显示着那次突围所达到的深度。像当时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要证明一个问题的正确性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支撑。巴人引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说明,“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⑥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权威话语反复强调阶级性的做法是格格不入的。

1956年到1957年一年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映爱情生活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可以看作是对人的关心的结果。在刚刚过去的岁月里,人们往往根据政治的要求把革命事业和个人幸福对立起来,把政治原则和感情生活对立起来,个人的感情、个人的生活像个人的思想一样没有了合法的地位。在“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上,这种状态终于结束了。宗璞的《红豆》等小说之所以引起广大知识分子的喜爱,大概并不仅仅由于其艺术性,也决不仅仅因为它写的是爱情,而是那种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感在广大知识分子读者心中所产生的共鸣。作为知识分子读者,感觉到的是一种浓郁的属于自己的气息又回来了。其实,未必有人希望强

化感情上的留恋而否定两个恋人之间为政治方向不同而做出的选择。但是,选择归选择,感情是感情。只有在知识分子中,才愿意作这种区别对待。如果说以《红豆》为代表的一些爱情题材的作品意义在于把被政治要求遮蔽的感情生活重新捧到了读者面前的话,以杨履方发表于1957年第1期《剧本》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则通过一个农村青年的爱情坎坷表现了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活泼开朗的农村少女童亚男是一只喜欢唱歌的“布谷鸟”。但是,她却突然再也唱不出幸福的歌。原因是她把美好的爱情给了团支部委员王必好,而王必好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却试图剥夺她的个性和自由。经过曲折的斗争,她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自由而找到了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个作品在后来的批判中被说成是“美化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丑化了农村中的党组织”^⑦或者“在关心人和妇女解放的帽子下面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思想”^⑧。应该承认,那些批判文章虽然水平很不一致,但毫无疑问发现的问题是准确的。这个剧本的真正意义显然就在人的解放主题和反封建的主题。而这种主题正是当时极力限制的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命题。所以,当时敏感的批判者已经看到,童亚男是“穿着农村姑娘服装”,“拼命追求个人幸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化身。”^⑨

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在艾青的《礁石》、流沙河的《草木篇》、公刘的《禽兽篇》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的诗人关于独立人格的梦想。他们意识到除了作为阶级的一员而活着之外,他们还是一个个体的人。用一年多后批判他们的语言来说,他们确是个人主义思想抬头。他们开始与组织的步伐不完全一致。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除了为革命而歌唱之外还应该为自己而歌唱。他们不再满足于作阶级的、人民的、政治权威的传声筒,而是要为自己表达一点声音。只有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我们才能够发现,50年代原来

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是那样地渴望个性的解放,那样地梦想着独立人格的实现。看《礁石》中那块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的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看流沙河《草木篇》里面那棵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可以说,这不是50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写照,无论艾青还是流沙河,都没有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声音,它透露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的人格向望,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梦想。也许正因为在那种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全部独立人格的时代文化中,知识分子才如此赞美这顽强坚守而乐观的礁石,才如此赞美那纵然死了也不肯弯腰的精神。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理想,使流沙河赞美不愿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梅花,赞美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而到沙漠里开花结果的仙人掌,而看不起依附于别人身上的藤。正是这种独立的人格理想,使长风在《我对着金丝笼看了好久》中对那只失掉了自由却非常满足的金丝雀发出深深的叹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人格理想,使傅旭在《批评家的原则》中对人云亦云而没有自己声音的批评家发出叹息,使诗人们对风向针的随风转动,对作家的鹦鹉学舌等类似的行为表示深恶痛绝。这一切表现的不过是知识分子渴望独立的愿望,甚至这种愿望并不都是多么值得称道的。因为在这种独立意识中,我们不难闻到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清高气息。因为知识分子毕竟也是环境的产物,时代的思想资源的贫困也必然地造就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的纤弱。但是,它毕竟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

这一切显示了知识分子话语突围的方向。这个方向可以一言以蔽之:人格的独立和言论的自由。其实这不过是宪法明文规定

的公民的权利。从 1956 年春天到 1957 年的春天,一年多的时间,知识分子沉浸在重新获得自己话语权的梦中。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彻底的沉没。

梦的破灭与最后领地的陆沉

要求创作自由,争取人格独立,在当时的政治权威看来就是知识分子要摆脱政治的控制。允许不允许文学摆脱政治的支配和控制?允许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权威最后的表现是失掉了一年前的充分自信。于是,一场政治斗争终于平息了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的浪潮。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的突围也在强大的权威力量之下宣告彻底破产。

1957 年 6 月 19 日,毛泽东在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但关心它的人们普遍注意到,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容已经作了很大的修改。并且增加了原讲话所没有的与整个讲话很不协调的内容。^⑩在重新作的解释中,“双百方针”似乎成了为锄掉毒草而“引蛇出洞”的策略。其实,毛泽东即使在加上六条政治标准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要自由讨论,但是,这种限制却暴露了他的不自信。可以说,直到 1957 年春天,毛泽东仍然是自信的,但是,大鸣大放引发的全国局势,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纷纷发表的各种尖锐批评,也许是他本来没有预料到的。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政治权威话语的情况估计比较乐观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就过于悲观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冷静的,虽然知道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看到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接受改造。可是,到了鸣放开始出现新的局势之后,他感觉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都是一

种假象,根本就没有改造好。“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⑪他看到的是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所以有了这样一种估计:“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10%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10%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80%左右。”^⑫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惨淡经营七八年,可以信任的左派却不过知识分子的10%左右,这虽然不可怕,却足以让人伤心。于是,有了55万右派分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各个方面进行突围的作家绝大多数成了右派,作品一般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政治的力量有力地摧毁了知识分子重新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的梦想。

对于文坛的知识分子话语来说,政治运动的毁灭性打击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反右运动之后紧接而来的一个大事件是大跃进民歌运动。50年代文学出现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突围现象是从“双百方针”提出开始而到大跃进民歌运动为止。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真正导致知识分子最后领地之陆沉的是大跃进民歌运动。目前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谈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时往往因为将其分别划入不同时期而人为地模糊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大跃进民歌运动是有意识发动起来的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运动。它的意义在于:虽然反右斗争胜利了,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斗争代替不了文化争夺,右派分子虽然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了起来,但占知识分子总数80%的中间派却时时都有变成右派的可能。10%的左派力量不能保证知识分子话语不重新泛滥。所以,文学的问题必须文学解决,大跃进民歌运动事实上是解决反右之后的文学问题的重大环节。它的意义是多层次的:

一、以跃进的方式迅速进行的民歌创作以铺天盖地之势直接

填补着反右之后文坛的荒芜场景。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要那样追求创作的数量,要制订指标,规定任务,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从田间地头到部队营房,都要进行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我们才能理解某些省份搞一千万篇群众写作运动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告诉人们反右之后文学创作不仅没有萧条而且走向了轰轰烈烈的发展高潮。这证明着反右斗争的正确性,抵挡着反右斗争造成文坛萧条的现实。

二、捍卫和修补了在 40 年代开始形成、在 50 年代发扬光大、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受到冲击的当代文学传统。毫无疑问,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知识分子已经对公式化、概念化、表示了充分的厌恶,对反复歌唱的颂歌表现出冷淡和背弃,它事实上已经宣告着颂歌主题的落潮(艾青、公刘、邵燕祥、王蒙等人的创作就是证明)。大跃进民歌运动在政治上反右的战斗结束之后迅速对文学园地实行占领,颂歌主题重新高扬,大跃进民歌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美好的新生活,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声音落潮再也高涨不起来之后,来自民间大众的颂歌填补着这一空缺是很有意义的。它明显的是对走向低谷的当代文学的一种拯救。因为当时的农民虽然已经面临着刚刚到手的土地重新失去的问题,但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更多的人还处于分得土地的幸福感和合作化道路的新鲜感之中。无论如何,农民远远没有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更为敏感。所以,这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文化运动是成功的,它使歌颂文学重新成为文坛的主旋律而延续到 60 年代和 70 年代。

三、利用民间话语的形式对知识分子盘据的诗坛和文学园地进行全面的包围、改造和占领。

中国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分不开的。无论谈论 20 世纪文学还是谈论 20 世纪知识分子,“五四”已经是无法绕过的一个碑柱,在整个 20 世纪,具有自觉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非常

自觉地把自已与“五四”挂接,他们的知识系统也的确大都来自“五四”。那么,要克服知识分子牢固的自我立场,就不能不否定“五四”传统。全面否定“五四”是困难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已经证明像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左翼某些领导人的那种做法并不成功,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抽象的肯定与具体的否定相结合。大跃进民歌创作与“五四”传统是无缘的,这一运动事实上中止了这一传统,相当彻底地从诗歌创作中驱逐全部可能具有的现代性因素。当时引发的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特征之一就是对“五四”新诗传统的否定和重写。有人就说新诗自从“五四”以来就是民歌是主流,洋化的新诗是逆流。因此,大家都纷纷谈论“五四”之后新诗建设之不成功。它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太知识分子化,没有很好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有人进行过这种比较:“新诗新民歌,好比两台戏,对台对唱对比;新民歌如同海起潮,新诗如同水在滴,你把几滴水来尝一尝,嘴里尝着碎玻璃。”^⑭由此可见当时文学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彻底背离和对民间话语的崇拜。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它从严复、梁启超开始经由陈独秀、胡适、鲁迅之手建成,很自然地打下了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相对立的西方现代文化色彩。而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创作实践及其理论讨论首先是反对西化或者欧化。以民歌反对西化或欧化,以民歌作为诗歌发展的方向,诗歌应该向民歌学习,向民歌靠拢,诗歌艺术的提高也只有在民歌基础上去提高。继承“五四”新诗传统成为一种耻辱,借鉴西方经验就是崇洋媚外,诗人们纷纷放弃自己本来的艺术追求和已经形成的风格特色,而参与民歌的创作,或者说是以民歌体写他们的新诗。形式的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它涉及诗歌发展的方向。诗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虽然人们仍在讨论,而且有不同的声音,但权威的结论已经做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

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这个方向不仅仅限于诗歌,而是适用于全部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个不容争辩的声音强调着民歌——民间文化,强调着古典——传统文化,却唯独没有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位置。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确把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从诗歌创作中彻底地驱逐了出来。

围绕着民歌运动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到的是消除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努力。它是方向问题,而不是小事。讨论中虽然有并不完全相同的见解,但主导方向非常明确。这场讨论的焦点被认为是“一个谁跟谁走的问题”。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来自权威的声音立即指出“关于主流之争,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争正统、争领导权的问题。”^①

把这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家领袖要亲自关心民歌的创作和搜集;为什么民歌创作竟然成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任务;为什么大跃进还必须完成培养多少作家和诗人的指标。

由此可见,大跃进民歌运动是一个全面地推进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运动,是权威话语借助民间话语全面覆盖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运动。是彻底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回到民间传统上来的一个文学运动。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被迫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面向民间大众话语的无条件彻底归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终于全面覆没。与此同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终于彻底消失,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终于全面中断。当它重新出现的时候,已经是20年之后了。

注释:

①陈涌:《肖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 ②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肖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4卷8期,1951年8月出版。
- ③朱光潜:《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文艺报》1957年第1期。
- ④《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 ⑤⑥《新港》1957年1月号
- ⑦姚文元语,转引自於可训等《文学风雨四十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 ⑧同上书,第27页。
- ⑨同上书,第29页。
- ⑩魏绍馨先生的《当代中国文学思潮四十年》中对此有详细的比较和对照,可参见该书(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3页。
- 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1页。
- ⑬《新诗歌的发展问题》讨论集第一集第157页。
- ⑭《新诗歌的发展问题》讨论集第一集第176页。

□姚青苗

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

一

沈从文逝世后,我曾在《太原日报》上写过一篇短文来纪念他,但文疏意浅,许多想说的话都未说透,有许多可怀念之事都未提及。后来想补写一篇,但一直都没有写起,前几年看了《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中刘祖春的文章,引发了积淤心中的往事,并涉及丁玲,不顾自己的年迈体衰,笔拙才疏,把心中想要吐露的话讲出来,就正于读者和沈先生的亲友。

刘祖春的《忧伤的遐想》我读了好几遍,这是我读过记述沈从文的文章中意深情浓最卓著的一篇。祖春先生不仅记述了他与沈从文六十年来的交往,而且还描述了湘西的风土人情,使《边城》那充满了诗意的乡土文学之花,又在读者心中激荡起来,作者不仅详细描写了沈从文和他的家人及乡友们,而且诚挚地描写了他的一生,是沈从文和刘祖春传记之结合。这篇长文在当前传记文学和乡土文学中都处于卓越的地位,从文有知,当含笑于地下矣。

由“沈从文热”到“沈从文冷”,又由“沈从文冷”转到“沈从文热”。半个多世纪以来,沈从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浪潮中被折腾着。大而言之,从“五四”运动新文学发展以来,文艺领域内的思想斗争从未间断过,被批判或被斗争的人也远不止沈从文一个;但这与

“文革”中的斗争是很不相同的。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与《现代评论》之受左翼文艺界的批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沈从文只跨了边儿,并非核心人物。他既不倾向共产党也不倾向国民党,是真正的第三种人,不是杨邨人那样打着第三种人旗号的那种人。严格地讲,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讲,第三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国民党的人多着呢,但人们自觉与不自觉的倾向性总会多少有些吧?人的思想意识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吧?社会的发展与时代变化引起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很有点关系;另一方面,在“沈从文冷”时仍有少数人对沈从文热,在“沈从文热”时仍有少数人对沈从文冷。新中国成立后多年以来,民间有句俗话:“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会上无好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特别是在极“左”思潮处于高峰时期,文艺“打棍子”与“抬轿子”之风流行得很!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树而不立,打而不倒”的局面,表面看来,“打棍子”和“抬轿子”是极相反的,但实际上则是出自同一母胎。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要不是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出现,这顶“臭老九”的桂冠是脱不掉的。没有历史与时代的转变,“沈从文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顶多只能限于海外华人而已。国内以朱光潜教授为首的一些美学家,长期以来对沈从文是有好感的,虽然也有些“左太爷”与“僵太翁”对沈从文是敌视的,但现在他们也不敢像过去那样猖狂了,沈从文再也不会被打入另册了。

我在上初中时就爱读沈从文和契诃夫的小说,1930年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大战之后,阎锡山下野,在日本军阀的庇护下逃往大连租界,山西暂由商震代理省长,他是李健吾父亲李岐山的老友,李岐山已被政敌惨害多年,李健吾趁机会回故乡运城为其父开吊,健吾当时在运城第二师范、第二女师、第二中学、明日中学等校

讲演,我那时在明日中学上学,刚读冰心的弟弟谢冰季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小说《温柔及其他》,此书前边有沈从文和谢冰心的序言,当我向健吾询及此书时,他说他未看过此书,但他对我大谈沈从文,好像沈从文的作品他都读过。

1931年我离开明日中学到太原考入晋高中文科学习,寓居在南城区小五台下新满城一位满族人的院子里,身边有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的小说;也有创造社的作品,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落叶》等;也有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张资平的《苔莉》等书。当时太原海子边的书棚很多,大都是从大江书店、光华书局等处盗印的翻版书,其中有隋洛文(鲁迅)译的《溃灭》、杨骚译的《铁流》等,而令我陶醉其中的,则是苏曼殊的作品,特别是那本言情小说《断鸿零屋记》。

二晋高中当时是娘子关内的一所老古董学校,校长是张贯三的徒弟张历生,教员有乔鹤仙、姚凤九、柯璜等,此校提倡的是“书不读秦汉以下”,但张历生却大讲韩愈的《原道》,他们对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也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好在该校没有学生宿舍,是以收学费为主的野鸡学校,学生上课不上课关系不大,只要能缴学费不误考试就行了,这为我造成了一个课外读书的好机会。除了沈从文的小说之外,我也喜爱丁玲的小说集《在黑暗中》,其中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则令我特别喜爱,她后来主编的《北斗》,也成为我最喜爱的文艺刊物之一。

丁玲思想进步,沈从文思想落后,这是两人之间的最重要的矛盾。至于性格方面人际关系及生活作风等方面,两人各有其优缺点。而刘祖春和陈明则各持一端:一个代表沈从文,一个代表丁玲,都只看到各自的长处。读者所看到的,也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却比各自亲友的先入之见总要多少客观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1931年初,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之死和龙华寺的屠杀,当时楼

适夷在《文艺新闻》就揭露过,鲁迅也写过很沉痛的纪念文章,纪念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五位左翼作家之死,并且引起了国际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而刘文则说胡也频之死只引起沈从文的悼念,这太缺乏文史常识了,只这一点,刘祖春就把沈从文拔高了许多。

1933年夏,我在运城时,看到上海报纸上关于丁玲、潘汉年被捕及青年作家应修人跳楼惨死的报道,十分震惊,这是1931年初左联几位作家和一批革命青年被害后我的第二次震动。当年秋天,我到了北平,当时有几位友人和同乡从察北抗战前线回到北平,有的和我住在一起,当时日本飞机在东城一带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所言察北抗战部队中有人和日本军阀勾结的话。正如刘祖春所言,当时北平中国大学和北大各院校,对旁听的青年是绝不拒绝和干预的。当时我住在东四附近的李阁胡同内,后来迁移到石附驮街南边的前老来街天成公寓,这是一位山东大汉所开的公寓,里边住着几位从东北流亡来的青年和学生,那位山东大汉很同情他们,他们的房租欠得很多,衣食也无办法,可是那位山东大汉却尽力资助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还牢牢地记着他,他不是什么名人或烈士,他是个普遍人,有着高尚的情操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他是极不相称的。

秋风嗖嗖,我常常在什刹海边徘徊。想着沈从文小说中所描写的什刹海的景况。当时我常去北大西斋一位同乡那里,看到了刚出版不久的《两地书》,我的那位同乡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也是鲁迅崇拜者。有一天,忽然发现天津来的一位女大学生在北大西斋吊死了,她的对象也在北大西斋,出事后,那位男生被开除了学籍,当时苏北革命志士史灿棠也在北平流浪,他以“低能儿”的笔名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许多稿子,这给我的印象极深。当时《华北日报》副刊的编辑大概是杨晦,我也记不清了。史灿棠于1935年被何应钦枪决于天桥,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虎作伥,镇压

抗日志士的丑行。史灿棠被处决时,我正在太原狱中,那是 1935 年的夏天,太原极热,我失眠了许多天,心情极为震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几次想执笔纪念这位非党革命烈士,小说定名为《怒火之花》或《京华碧血》,但写了许多次都失败了,总觉得自己的笔墨配不上这位革命烈士崇高的灵魂和他那视死如归的形象。在塘沽协定后平沈通车时所发生的那次列车爆炸事件,就是以灿棠为首的爱国民族志士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惩罚与警告。

二

丁玲被捕和应修人的惨死,对我的震动很大,但我看了沈从文的《记丁玲》之后,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如果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刻的仇恨或露骨的揭露,此书能否出版就很成问题。多年之后丁玲对此书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这表明她和沈从文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远非 30 年代所能相比。那时,尽管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但友谊总还多少有一点,沈从文既陪她探监,又护送她回湖南探母,这些普通的人情和友谊,总不能一笔勾销吧。至于他们间的思想与世界观的分歧,那早就存在着的,只有他们间的关系和情况之日趋恶化,这种分歧才逐渐扩大起来。

丁玲对沈从文的《记丁玲》这本书很反感,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这是在多年之后的事。当时沈从文这本书公开发行之后,是丁玲未看到它?还是虽然看到,但碍于当时的环境,不便表示意见呢?其次,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而且此书是在丁玲被捕之后不久写的,他为什么不前不后而在丁玲被捕后不久就出版这本书呢?是不是为了丁玲在文坛上的声誉而赶出一本畅销书呢?再就书的内容来看,既看不到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评和责斥,也看不到对丁玲有多大的同情,只是客观地写了丁玲前半生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些活动罢了。我当时就胡猜乱想着沈从

文出版此书的目的,我想沈先生执笔写此书时,可能想到丁玲将要、或者已经随着胡也频的足迹走掉了!我不想,也不愿为沈先生脸上抹黑,只是在当时那种恶劣而复杂的环境中一种猜想罢了。

丁玲被捕后,各种传说和谣言很多,这甚至影响了鲁迅对她的态度,稍微有点中国新文学史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吧。

鲁迅对沈从文的恶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丁玲的有些不解或不够同情之处,恐怕和当时的各种谣言、传说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有关。

丁玲和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关系较好,和周扬一直是有矛盾的。解放前如此,解放后她对周扬的恶感更加深了。周总理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总理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只希望双方能化解这种矛盾,丁玲之被迫害、劳教与流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周扬有关的,周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解放初期,丁玲和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曾经胡批乱扫一气,碧野、王亚平等都是受批者,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也是无线上纲,乱批乱打一气,此种极“左”思潮当时不仅是《文艺报》一家,不仅滥而广,而且时间也很久。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国作协的负责人,要对“左”毒的泛滥成灾负一定的责任,当然责任不能由他一人完全承担,但他确实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不仅对丁、陈事件他有责任,对冯雪峰等和那些被迫害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的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周扬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最有特征的人物之一,这个最主要的特色就集中在一个“变”字上,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不管怎样说,他还有自己的理论和见解。抗战初期他到延安之后,自谦自贬为毛主席的“留声机”,他的工作只能起“留声机”的作用,但他聪敏过人,善于看气候、观风水,没有这点聪明才智,他的“变”术就失去了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伟大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周扬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家都还记得吧。80年代初期在广州的一次集会上,周扬痛哭失声,伏桌不起,这是他讲到他受“四人帮”迫害时失去了控制的表现。当时我也在会场上,亲眼目睹了这种情景,觉得周场真是富有人性。到良心觉醒,感情充沛时,便激动得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但我在沉思默想之后,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周扬不仅因为他受迫害住过秦城监狱而痛哭失声,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即他迫害了别人而引起了自己良心上的痛苦和忏悔。当时会场上的人很多,患肺气肿的萧殷还活着,虽然他不停地咳嗽,但也在会场上,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中,将怎样描述呢?

提起周扬来,我不由得想起他在1956年“大鸣大放”时期由北京来太原时,在山西大学游览和讲话的情景,那时他在苏联参加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回来不久,在那次大会上代表中国作家讲了许多话,并赞扬了肖洛霍夫和他的作品。回国后半年多,又赶上了“大鸣大放”,当时伴送他来山大的,是山西省委的王中青。王中青和史纪言是30年代《山西党讯》的编辑,所谓“党讯”,是阎锡山赶走“蒋牌”山西省党部而改为“阎牌”山西省党部之后的报纸,其编辑除王、史之外还有杨焦圃,他们当时都是地下党员,也都是赵树理的同学。王中青陪周扬来山大后,周扬还聘请了山大历史系教授郝树侯为他的临时顾问,因为郝树侯很了解山西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周扬当时兴高采烈,适应着“大鸣大放”的高潮,他尽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可惜当时虽然是中宣部副部长和全国作协的负责人,但他并不知道像后来刘少奇所说的,这场“大鸣大放”不过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已,毛泽东则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尽管有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跌入这次“鸣放”的深沟之中。

周扬不仅在山大“大鸣大放”了一整天,几天后接着又在他所寓居的太原迎泽宾馆召开了山西作家座谈会。当他走进会议室看

到桌上两边所摆的茶杯上印有“抗美援朝”字样时,止不住怒火冲天,指着茶几说:“太庸俗了!这样的宣传太庸俗了!”作为中宣部副部长那样朗朗的声音,至今仿佛仍响亮在我耳边。

座谈会也是在“鸣放”高潮中进行的,可惜座谈会的记录没有
在报刊上发表,作为后来的参考和思索的资料,这是四十年前的事。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大部分都已作古了,现在能提及此事和记起此事的人已很少了。

诚如刘少奇所言,一年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一次大灾难,有许多人下放劳改,或者被流放到北大荒,其中包括丁玲夫妇和陈企霞等,还有聂绀弩、李荒芜等。如果按照周扬在太原时“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这顶“右派分子”的“桂冠”戴在他头上才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善“变”的周扬在反“右”之后,作了个九十九度的大转弯,而且掌握了中国文艺界的领导权。当然,反“右”运动的最高领导者不是他,但他已由“留声机”的地位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刀斧手”的地位了。

周扬那天在山大的谈话和发表的意见很多,限于篇幅和我的记忆力,不能全写出来,只记得他听了常风的课和我的课,常先生讲的西欧文学,我讲的是苏联文学,课后他先后与常先生和我讨论了一番,和常的讨论我没有参加,和我讨论时,他赞同我对苏联文学中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批评,但他说我谈得还不够,苏联文学中的缺点比我所谈的还要严重得多。他是很赞赏肖洛霍夫的,但在苏联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法捷耶夫等则是对肖洛霍夫展开了批判的。

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人民和苏联的局势有很大响应,而且对世界也很有影响,对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也有很大的影响。

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小而言之,也是周扬的历史和思想的转折点,具体的例证就是1983年他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祭的长文,这和他后来很赞赏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的社会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是一致的,他也很同意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态度。但他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等人的严厉批驳,特别批驳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异化论”。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周扬的反批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众所周知,周扬的文章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其中包含着王若水、王元化等四人的意见。而胡乔木的文章则公开声言是集中了二十个人的意见。这两篇论文的论战,真正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双百”精神和政策,我对周扬这篇文章极为赞赏,虽然这不是无懈可击的、十分完美的文章,但它在周扬一生全部文稿之中,则是一篇最卓越、最完美、最优秀的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杰作。未来的历史,将会对以周、胡为代表的两篇惊世之作,作出公正无私的评价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新时代里,周扬在他的晚年,再不是“留声机”、“传扬器”,再不是随人俯仰,察言观色,看人眉须的“变色龙”了。周扬扑向了真理,扑向了新的时代。人的觉悟不分迟早,只要能真心诚意地向真理投诚,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其精神也是可贵的。

觉悟与不觉悟,是人们一生能否奔向真理的试金石;执迷不悟者,虽生犹痴,是垃圾堆里又臭又劣的顽石。

我们的总设计师曾说:人无完人,人应当有理想,但理想不等于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乌托邦和唯心主义的产物,是脱离现实的水中月和镜中花!凡是不现实的事物,是没有什么优劣之争的。

周扬领导我们的文艺事业时间很长,其道路曲折复杂,功过皆有,记得前几年出版社要出他的文集时,他很为难,他是真心实意不愿出版这些文稿的,因为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肺腑之言。记得在50年代“大跃进”时期,曾有些拍马者编造了这样的民歌:“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文盲,而是智深才广的周扬不仅没有反对这样胡编乱造的民歌,反而随波逐流,钦佩它和赞赏它,这不是“溜勾子”又是什么?记得我在鲁艺文学系学习时,教师中我和他接触最多,其次是克夫(沙可夫)。沙可夫是意深言拙,周扬是言意均优,深受同学们的赞扬,后来我在华大文艺研究室当研究员,一直没有和他失去联系。1949年秋华大文研室解散时,我本来说好随苏金伞去河南作协工作,但周扬认为我还是回山西故乡为好,并亲笔为我写了信给当时正在中南海开会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我是随着赖书记一行乘专列回到太原的。当我在北京车站上车时,老赖微笑地和我握手,我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但想不起此人是谁?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着说:“怎么,你不认得我了么?你还记得林南么?”他一提到林南,我才想到这是五台来的来秉敬呀,那是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之后,那时我正在太原三晋高中文科上学,因为学校无宿舍,便租赁了附近五台下的新满城巷里一家满族大娘的院子,我的同乡,当时太原的地下党员林南(又名解宜之)介绍了一位刚从北平大学八个学院中的某学院归来的大学生,他就是五台的来秉敬,他比我大五岁,非常好读马列主义的书刊,喜爱拍照,说话时好用舌头舔嘴唇,果然我在列车上看到他的旧技重演。到太原后,我被分配到省文联,隔了不到一年,便调到山大中文系工作,以迄于今。

三

沈从文和丁玲都是湖南作家,如果借用现在的“陕军”和“晋军”,那就是湘军作家中的佼佼者了。但两人不仅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文风也不一样。在沈从文的全部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湘西的乡土文学,当时文坛上还未流行着现在的所谓“追根”文学,但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一个湘西乡土的“根”。正如他

后来的研究古代服装很受许地山的影响一样,他的文风与许地山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许地山的作品很少用“的”字。“的”字被“底”字所代替,沈从文很少用“底”字,但也很少用“的”字。他读书不多,爱读的书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浮生六记》等。我在太原上学时,有时寄居在同乡友人在太原市上马街农专的宿舍里,他叫李公选,还有一位是运城明中的同学张锦露,当时凡是沈从文出版的作品,我都买下了,李公选常常讽刺我对沈从文作品的痴恋,那时社会上并没有流行着像现在的什么“沈从文热”之类的话,我对沈从文作品之痴恋,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受别人的影响。

对丁玲的作品,我读的没有像沈从文作品那样多,但我很欣赏她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的那篇《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作品是热衷乡土文学的沈从文所写不出来的。至于丁玲后期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杜晚香》等,都十分精采,恐怕也是沈从文所写不出来的。至于她逃离南京到陕北保安时,毛泽东和她谈话时所赞赏的那篇《不算情书》,更为精采;在毛泽东对它称赞之前,我已深深爱上它和称赞它了,这些作品,我认为比她在左联时代所写的力作《水》要好许多。

令人遗憾的是,在“文革”前夕,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何家槐,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了攻击和诬蔑,他恶毒地打击丁玲,把《莎菲女士的日记》骂得狗血淋头,一钱不值。我认识何家槐,他曾想攀高结贵,拍新月派的马屁,想结识徐志摩,登上诗坛的宝座。他对丁玲的侮蔑辱骂,还在“文革”尚未爆发前夕。

何家槐辱骂丁玲时,丁玲尚在北大荒劳改未归,不知她后来知道此事否?前几年在福建某地召开的关于纪念丁玲的座谈,大家都赞扬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杰作,记得山西作家马烽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丁玲在北大荒劳改时,受到了当地人民普遍的同情和帮助,这

对于被迫害的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实在是精神是最大的安慰。后来她又被送到晋东南长治郊区的农村,农民们照样给予她很大的同情和帮助,此时她还未平反,但比当年她早期流放时要宽松多了,山西作家马烽、宋谋扬也看望过她,多年来她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与人们对她的同情和帮助,这种正反的对比怎能不激动着作家的心灵呢?20年的光阴在人生旅程中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耽误了这位卓越的女作家多少工作呀!难怪丁玲在她生命的最后老是喊时间不够,老是叫着要抢时间去写作,这种政治风云给丁玲创作事业上所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她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项大损失!

四

沈从文一生不过问政治,只写他的小说,特别是他的前半生,他和丁玲所走的道路是很不相同的。沈从文靠着胡适的帮助,才登上了胡适所主持的中国公学的讲台。不仅如此,他和张兆和的关系也是依靠胡适的帮助和成全而结合在一起的。张兆和当时是中国公学的校花,年轻美丽,品学皆优,追逐她的人很多,沈从文虽然苦苦地追求她,纠缠她,但是她看不起这个小小的穷讲师,当沈从文纠缠着她无法解脱时,她愤怒地向领导胡适去投诉沈从文。但事与愿违,胡适不仅没有谴责和批评沈从文,反而极力夸奖他,说沈从文怎样好,并劝告她不要拒绝沈从文的追求。后来沈从文对她的追求终于成功了,这个美满的婚姻经历了他俩的一生,谁也不曾背叛谁,这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还是少见的。

沈从文前半生的旅途是较顺利的,但后来也迈向了坎坷之途,我早先认识他只是通讯和投稿的关系,未曾谋面,1947年到北平后,常去沙滩北大教师宿舍去看望他,有时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偕同王紫东一起去。王紫东是在昆明认识他的。王紫东从延安中科

院出来后,先后在北平创办过《新艺苑》、《海内外》等刊物,我为他的刊物写过许多稿子,紫东当时是和王东黎在一起创办刊物的。

沈从文当时在北大中文系授课,但并不受学生欢迎,特别是那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不是胡适的关系,他很可能被轰出校门。那时物价暴涨,法币贬值,沈从文的生活是清苦的,当时有位漫画家将教授称为“叫瘦”,沈从文当然也不能例外,也在“叫瘦”行列中,虽然他在中国文坛上还是很有声誉的。

1947年,当国内战争日趋激烈和国民党逐渐溃败的时候,有位常在我所主编的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撰稿的青年作者,名叫张白(又名张士恒),他聪明多才,和许多青年一样,逃离太原来到北平,在杜任之介绍下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光明日报》任副刊编辑,杜任之是我的同乡和老友,当时在华北学院工作,思想很进步。像我一样,张白也很喜爱沈从文的作品,我介绍他去看沈从文,此后他常常去沈家,成为沈先生年轻的密友之一,沈从文是胸无城府的人,将他的书信,笔记和日记之类的东西一占脑儿交给张白去看,张白有时把它们送给我看,使我认识到沈从文的确是位豁达无私的人,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对人对事毫无警惕之心,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优点之一,他的纯朴豁达是给了我最亲切的好感的,沈从文绝不是一个坏人,虽然也是有某些缺点的人,如上边我所说的他出版《记丁玲》的例子。

沈从文除了生活的清苦之外,最大的不幸是受到北大学子的冷遇,而且那些有极“左”思想的学生反对他的情绪日益高涨。刘祖春所说的因郭沫若的批评而引发了北大校园的大字报对沈从文攻击之事,那是北平解放前夕和刚解放时的事。众所周知,沈从文一生是远离政治和有意远避政治风尘的人,但北平刚解放时的那种风尘使他很困苦,他想平安,他想回避的愿望是达不到了,他想远避人家,人家却不远避他,据我所知,北平解放初期,的确有些有

极“左”思想的青年恐吓过他,这是除了北大校园内大字报之外,在解放初期引起他自杀未遂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对党是不了解的,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不了解的。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些例子,解放初期,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位青年所写的文学评论,他说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写得怎样好,艺术怎样高,而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怎样拙劣,《边城》怎样不好等等,把沈从文批得一钱不值,我实在气愤不平,想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他,作为一个读者来为沈从文申辩,但我碍于当时的环境,此文未写,但此事却积淤于我心中。这位青年作家如果说孙犁思想怎样进步,沈从文思想怎样落后,那我是没有意见的;他赞扬《白洋淀纪事》我也没有意见,但他扬此抑彼,不是从思想上,而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评价,那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沈从文是个拙劣的艺术家吗?你这样贬低沈从文,想一棍子打死他,你能行吗?我不仅要为沈从文鸣不平,而且要为广大读者鸣不平,你的思想不是进步的革命思想,而是一种违反真理的正义,极为浅薄、极为片面的极“左”思想。

五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我途经天津去解放区,先到泊头镇,后来到达正定,在华大三部文艺研究室当研究员,最初是和荒芜、碧野、司空谷及苏金伞夫妇等住在华大四部(研究部)范文澜副校长所住的那个大院里,后来又搬到校部所在的天主堂内,当时文艺研究室的领导艾青和张光年都到平津前线去了,文艺研究室暂由何洛负责,这时我不断给张白去信,叫他多多关心和照顾沈先生,沈的困难处境我也知道,并且听到一些传闻,我叫张白对沈先生多加开导,叫他不要听信传言。也不要害怕某些青年人和大学生对他的恐吓。

1949年春,我和华大文艺研究室诸同志同乘汽车回到解放不久的北京,和华大三部(戏剧艺术系)同住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分院,当时应友人李桦同志之邀在他于《进步日报》所编的副刊上发表了杂文《无题草》。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深入生活要讲实际,不能认为到工厂或农村溜了溜转了一转就算是深入生活,生活是到处都有的,所谓一滴水见太阳,这正如胡风所说过的,我和他的意见不谋而合;也如胡风所说过的“下水的人不一定是游泳家”,但我没有引用胡风的名字,却引用了杜斯退益夫斯基不少的话。此文刊出后,首先受到《解放日报》主编李亚群的批判,接着江枫等同志也对拙文展开了批判。李亚群同志给我戴了一顶高帽,说我是中国文坛上第二个萧军。此事引起了华大文艺研究室对我展开了一次大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批判会、斗争会就多了,各地都是如此。但当时则是我有生以来所受的第一次大批判,所幸会议的主持者是华大文艺研究室主任张光年同志,他认为这个批判会应当作思想上的批判,不应当作政治批判来对待。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张光年同志挽救了我,否则,我会成为后来的第二个肖也牧,因为我很软弱,没有萧军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但特别令我遗憾的是关露同志的发言,她比谁都“左”,上纲上线,把我简直当成了反革命来批判。所幸她不是会议主持者,否则,我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在中国当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少么!但我并未因此对关露同志后来的遭遇幸灾乐祸,而是对她充满着同情和怀念。

我的处境虽然很艰难坎坷,自顾不暇。但我仍关心从文先生,有空时常去看望他,并嘱张白多多照顾他。每次我见到他时,他总是向我打听丁玲的情况,显然他对于这位老友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她能挽救他,至少拉他一把。但事实与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有次我去沙可夫家里,柯仲平,丁玲都在场,大家在那里闲谈,丁玲向我询问华大文艺研究室的情况,随后她发表意见说,文艺研究室

有一个就行了,不必再有重叠的机构,因为她当时也主持了个文艺研究室。接着她满不在乎地向我询问沈从文的情况,她说:“那个沈从文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的心里冷不防被她抛上了一块砖头!我无言以对。我本来是想向她谈谈沈从文的情况,因为他与丁玲是老朋友了,但万料不到丁玲的“那个沈从文”像一声冰冷的铁锤打在我心上,把我想说的话都打回去了。

我回去把此事对张白谈了谈,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把此事对沈从文谈起,我心上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所以每当沈从文向我问起丁玲的近况时,我便敷衍过去,或用别的话来打岔。

试问,沈从文对他的朋友或熟人说过“那个丁玲”么?“那个”是什么意思?这用不着语言学家来分析和研究了,再愚蠢的无知者和普通人,也许听出这种口气的意味了。如果有人说“那个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去劳改了!”“那个丁玲被关到秦城监狱去了!”这是怀着对被害者的同情呢?还是说风凉话呢?“那个沈从文”不是一句风凉话,而是充满了对沈从文鄙视的情绪的,一点同情的意味都嗅不到。

六

沈从文在经过了自裁未遂而获救之后,在经过了的老朋友的企望与失望之后,却得到了时代和党的拯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就是他有幸参加了“革大”学习班,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所受到的革命洗礼!

北平解放以后,华大由正定迁移到北京来,改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一批很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教授和学者,被选送到“革大”学习班来学习,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沈从文也有幸来到“革大”学习班学习,这使他初步了解党的政策,了解党的英明和伟大。他不再轻生,也不再把希望完全寄托

在老友身上了。当时我们山西的一位著名学者、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许预甲教授也在“革大”学习班学习,并和沈从文是同班同学。从“革大”毕业(期满)归来之后,许预甲非常称赞沈从文的为人。许只搞历史,不搞文学,他未看过沈从文的作品,因此他不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评价沈从文的,他过去也不认识沈从文,不了解沈的历史,他只是以同学关系与沈从文交往才了解沈从文的,因此他的认识是没有什么偏见的,比之《新文学史料》中刘祖春或陈明等,是较为客观的。

我认为巴金是现代中国的卢梭。数年前我在山西的“双代会”(即省文联和省作协先后同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讲过:“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最热爱的是卢梭的品质和革命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把我所敬仰的巴金当作唯一的偶像,鲁迅是伟大的革命战士,巴老是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者。如果沈从文的品质和做人方面有问题,巴老早就和他分道扬镳了,绝不会把他看作自己一生的挚友。

如上所言,沈从文有优点,也有缺点;丁玲有缺点,也有优点,她对中国人民是忠心耿耿的。她的革命绝不是假的,她是中国左翼作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她疑心过多,这也许是多年来她从坎坷多难的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从北大荒地区的人民那样关心她、爱护她,晋东南长治地区的人民那样关心她,证明她与人民是心连心的,人民对她的热心和同情,就是对她最大的帮助和鼓励。我想起1949年秋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后,我参加了以黄药眠为团长的中国作家赴东北参观团,离京时丁玲来车站欢送大家,特别是欢送参观团中的方令孺老大姐。丁玲再三叮嘱我在这次旅行中多多关心和照顾方老大姐。她对方令孺的诚恳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对她的不满和成见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一路上听令孺大姐对丁玲的赞誉,当她谈到丁玲的不幸遭遇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七

从1947年到1948年,我在北平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创作最多的时期,也是我最繁忙的时期。最初刘布谷让我主持由他创立的“雪风出版社”,并主编《雪风半月刊》。接着,叶以群又请我在北平搞由他创立的“文联社”北平分社,这个“文联社”和我们现在的“文联”组织有所不同,它是代表全国老作家们向各报刊发稿的组织,同时我又参加了全国作协北平分会,分会负责人是马彦祥,我在分会中分管北平各院校的工作,经常组织分会诸同志到北大、北师大、燕大、清华各院校去作学术报告,参加鲁迅逝世纪念会,端午节诗歌朗诵会等活动,并参加作协分会本身的活动,马彦祥的父亲兄弟三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分别担任北大、燕大的教授,也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挚友,他家在北平东城雅室胡同一座大院,院内罩着天棚一样的葡萄架,作协分会常常在马家集会,记得《新观察》主编储安平那次就是在马家与分会诸人开的座谈会,俞平伯也参加了,大家饱尝了一顿马家蒸的包子。除马宅外,分会诸人聚会最多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古柏下,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谈天,俞老每次都要参加,彦祥更不用说了,此外还有荒芜、王冶秋、沈一帆等,徐盈、子冈夫妇也常来参加座谈。我们常常到灯市口《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徐盈那里谈天,打听消息。稍后,北平各院校学生们发起了“反饥饿运动”示威游行,北师大学生搞得更为热烈,他们还组织了个“泥土社”,请胡风作过几次报告。“反胡风运动”的狂风刮起时,没有人提及此事,使“泥土社”那几位毕业的学生幸免于难。

太庙古柏下围着茶桌的座谈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常常怀念这段历史,俞老的笑容如在眼前,荒芜也很敬爱俞老,他后来常到俞老家为俞老劈柴。

在北平那段时期,和我来往密切的是青年诗人海涛,唐山大地震时,他和爱人都罹难了。他从昆明来到北平后非常活跃,除了教书之外,还编刊物,写诗,搞创作,我和诗人沙鸥就是在他家见面的。沙鸥过去为我所编的刊物寄过许多诗稿,我认为他的诗不在艾青之下。他是继沙汀,艾芜之后四川另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前些时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他病逝于北京的消息十分悲痛。趁此机会我对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北平解放前夕,我在北平一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两兄弟》,得到沈从文的赞赏,这个《两兄弟》与我数年前在《黄河》上发表的那篇《两兄弟》虽然同题,但思想内容却不同,人物也不一样。《黄河》上那篇还有报告文学的性质,而当年在北平发表的那篇却完全是虚构的小说,而且充满着安那其的思想和情绪,想不到它竟得到沈从文的赞赏,他几次来信称赞它,这不仅没有增加我的欢乐,反而使我更为悲伤,其原因是我当时的思想正陷入牛角尖里,正如前几年我在“双代会”上发言所讲的:“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我所热爱的是卢梭的革命人道主义。”那时我徘徊于人生的歧路中,人类的自由平等是我所向往的目标。但当时那个复杂而矛盾的世界离我理想中的目标远得很呢!我的理想和希望岂不是水中月、雾中花嘛!因此沈先生的嘉奖更令我增添了苦恼,我与他的交往及我对他作品的爱好,主要在艺术方面,涉及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内的问题,我们是挂不上勾的,只不过在做人的方面,我对他还是很倾慕的。

八

张白是我和沈从文之间的桥梁。

我认识张白是在抗战时期,他在我主编的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北平解放后,他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同在《人民文学》编辑

部当编辑。当时他们的编辑部设在王府井北街中国作协大楼的楼上。我有机会便去看望他们。张白才华横溢。他给毛星当过助理研究员,当时毛星正同何其芳一起工作。毛星是四川人,是我在鲁艺文学系的同班同学,我们共同住在一个窑洞里的土炕上,还有牧虹、李又华、葛洛、蔡其矫等。张白除写作之外,还自学俄文,余振(李毓珍)主编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中就有他的译作。60年代,他被下放到山西,回到太原后,我想介绍他到山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工作,但赵宗复也计划为他安排工作,不久,张白不幸在一次车祸中遇难了。

赵宗复是太原工大的领导,“文革”开始不久,他在造反派的迫害和凌辱之下,跳楼自杀了。他是山西文革中早期的殉难者,太原解放前,他一直被阎锡山的特警队追捕,按照阎锡山同志会那帮领导者的意见,赵宗复是活不了的,但阎锡山却有极浓的封建思想,他觉得如果杀了赵宗复,对不起赵宗复的父亲自己的老友赵戴文,因此他几次对赵宗复说:当我走的时候,要带着你去见你父亲。

俱往矣!逝者如斯夫……

回忆往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愿这些老友们能够安息吧!

第四辑

“红楼”风雨

□蓝翎

四十年间半部书

—

谚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东一西相加，正好20年，一代人的时间。

《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正册贾元春的“歌词”有云：“二十年来辨是非。”辨是非要二十年，又是一代人的时间。

然而有的历史事件，20年也不一定能辨出是非来。即使再翻一番，40年，也未必就能辨出是非来。欲辨是非，必先辨清事实。事实不清，竟论是非，未免有点玄乎。

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继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1954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又发动和领导了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从而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事情的导火线是由两个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引起的。当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少数高级干部中传达，没有公开发表过。直到1967年5月27日，此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这才广为人知。而时间已过了13年，也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还要继续辨明是非。可见

“二十年来辨是非”并非虚语，辨起来不那么容易。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也为了笔者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叙述事实，请允许我先把毛泽东主席的这封信的全文转引如下：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

当对他们投降。

· ——《毛泽东选集》第5卷

一般人读了毛泽东主席的这封信，按照正常的思维习惯，大概不会产生疑义，因为这不是普通作者的著作，而是领袖的经典著作，公开发表时是作为“最高指示”的。我今天这样说也不是搞“两个凡是”。毛泽东主席的有些著作，最初的版本和后来的版本并不完全一样，其间曾经修改过。这封信从公开发表到今天，又过了27年，从未见有过改动，可见尚无修改的需要，仍保持原貌。

但是，尽管原著没有变样，而特殊的人出于特殊的需要，也会采取传统的“我注六经”的办法，作出符合自己口味的解说。比如，这封信中说：“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而江青在70年代初向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女教师大谈《红楼梦》时，那位教师问起了“两个小人物”，江青一口咬定说：“只有一个(only one)！”她的话当时是颇具“权威性”的，因此也就有人呼应。那么，究竟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历史毕竟不同于《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甄宝玉，可以把后者解释为前者的“影子”，弄得影影绰绰，捉摸不定。直到今天，“一个”和“两个”的问题，似乎仍然模棱两可，有说“一”的，也有说“两”的，像变戏法。

在这个问题上，把责任完全归在江青身上，将她视为“始作俑者”，似乎也欠历史的公允。1954年的那场批判，她是当事人之一，曾亲自到《人民日报》向有关领导人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当时的负责人两次向文章的作者详细询问了文章写作的情况。如果文章不是两人合写的，大概毛泽东主席后来写的信中也就不会有“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的这句话，两个作者的名字也就不会频繁地并列出现在全国的报刊上。但是，这个问题也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

准确地说,1957年反右派以前,文章的作者的确是两个;反右派以后,其中一位作者“不幸迷失”,所以才只剩下了一个。有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写的论《红楼梦》的专著中,曾多处提到过该文的作者。后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在几个版本中先后作了不同的变动。最初是“李希凡、蓝翎同志”,继之是“李希凡等同志”,再继之是“李希凡同志等”,最后是“李希凡同志”,从“等同志”改成“同志等”,一字之颠倒,就把另一个变成了“等外品”,既成了“等外品”,再处理掉则名正言顺。

还有一位著名的红学家,50年代初出版了一部厚厚的红学专著。到1954年批判胡适了,作者很感不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及至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两个作者奉命合写的评该书的文章,既有批评又含保护过关之意,才如释重负,一块石头落地,没有陪著胡适挨批,且写信表示感动得流下热泪云云。1973年该书拟增补再版时,作者又想起旧情,在他府上热诚相求,一定要把那篇评论当作序言印于新版之首。我为其热情所感,表示那是过时的旧作,当序言不合适,本人也不够资格,如果作为“附录”印入该书,我不反对。但这是我个人意见,还需要你同另一位作者商量,他们以后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以至该书新版印成,作者慨然寄赠,并附有复写的信件,嘱收到书后签字寄回以释念。我先拜读作者写的“后记”,发现有“征得作者李希凡同志的同意”而将那篇评论附入的话,心自不悦。这话说得很费心机,又把我从作者中除掉了。既然除掉了,又何必寄书来?“素无来往”嘛!书照收,信不寄回(到今天仍完好无损),让他心里琢磨去吧。

例子不只这一个,可说是当代文坛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因为过去没有著作权法,出于某种需要,作者的名字在书上可以时有时无而不以限制的。记得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人民日报》刚在北京创办时,连载过一部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者署名为

袁静、孔厥。书出版时署名亦如此。50年代中,孔厥“出了事”,之后再版时便署袁静等或袁静。“文革”后出版的署名又恢复报纸初载时的原样。时隔30余年,而孔厥早已成为古人,当不会地下有知了。这也近于“四十年来辨是非”,历史是改不了的。

这是事实不清的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不清的例子。

现在社会上仍在流传的那篇《关子〈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见《红楼梦评论集》,其实也不是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当年毛泽东主席看到的是《文史哲》杂志上发表的。后来收入集子的是修改稿,而且以后一改再改。这篇文章和这本书,不论观点如何,在“文革”以前,都不失一家之言,仍然活着。而1973年经过大修大改后出版的第三版,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是死的了,由作者把它弄成了“文革”的殉葬品。再提起它,实在汗颜。但是,我作为当事人之一,1957年后,没有为此公开讲过什么话,一直保持沉默,不愿触及创伤。现在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叙述,我不得不讲话了。哪怕为此而流汗,流泪,流血,用鞭子抽打自己,也得认真写出来。否则,将来个人死不瞑目事小,给历史留下迷团事大,那将愧对历史,愧在人世走一回。

究竟怎么回事?老太太抖裹脚,从头扯起吧。

二

1954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据查为18日)晚上,我从北京颐和园西门对过的马列学院(即现在的中央高级党校)返回城内,登上32路从捷克进口的“斯可达”大红汽车。车上人很少,车窗全开着。车开得很快,秋风送爽,心情舒畅。车到西直门,在门洞右边换乘有轨电车,叮叮当当,慢慢悠悠。过平安里,即进入北城的单轨线,等车坐车,更慢,但心不急,明天尽可休息。车到鼓楼东的宝钞胡同站,背着背包信步进胡同,路灯黄淡淡,一片静悄悄。没

有手表,心想不知是几点几分了。坐车又走路,肚子有点饿。路东一家小饭铺的门仍开着,馄饨锅里煮着一只鸡,热汤翻滚,白汽上升。我选个座位坐下,要了一碗馄饨,四两(16两一斤的老秤)木樨炒饼。饭足身热,回宿舍睡觉去。

小饭铺对面有一座红大门好几进的古老大四合院,原为王大人胡同一号,大门朝南。因为后来成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二部(后迁至圆明园改名101中学),三部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宿舍,遂将南门封闭,改开向着宝钞胡同的东门,同北边隔壁校院并排。大门平时到晚11点即上锁,星期六和星期天则稍延长。我一推,门虚掩着,尚未上锁,看传达室墙上的挂钟,已近12点。老校工见我回来,急切地站起来打招呼:“杨先生!刚才有人来找,您不在,留下话了。汽车刚走。请看。”他随手递给我一张白纸条,用蓝墨水钢笔竖写。现纸条已无,根据记忆,内容大致如下:杨建中先生:来访,值不在。《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看了你们的文章,很欣赏,想找你面谈。回来后请打个电话。署名王唯一,旁边有电话号码。我看完后感到很惊奇,平静的心立即乱起来,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邓拓是新闻界的大人物,久闻大名,但素不相识,找我干什么?

时间已过夜半,新的一天开始,谁料这一张纸条,竟意味着我今后几十年生活的大转折。如果说当代文坛又将刮起一场更强大的龙卷风,那么,这纸条便是吹到我面前的第一个兆头,随之将我卷起,不知如何落地?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宿舍,放下背包,用毛巾擦把脸,立即到传达室打电话。那是挂在墙上的老式黑机子电话,送话器在号码盘下方,对着讲,受话器拿在手中放在耳朵上听,用完了再挂上。电话一拨即通,接话的正是王唯一,他一直在办公室等着,让我稍候,他马上来接。我请老校工给我留着门,不要上锁,我站

在门口恭候。一辆黑色轿车开来。这样的轿车我见过,那是当时高级干部坐的。我从来没坐过轿车,连门也不知道怎么开。王唯一给我开车门,让我上去坐后排,他坐前边。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上车后才知道,王唯一是邓拓的秘书。他后来曾任《人民日报》发行处长(老干部,现已离职休养)。

《人民日报》当时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中段路西117号。我曾从门口经过,也有同年级的同学分配到那里工作,但我没进去过。据说那曾是国民党《华北日报》的旧址,被接管后新盖了一座四层办公楼,是当时全街唯一的一座新高楼(1956年后又往西延长接盖一座六层的新办公楼,即现在《经济日报》的所在地)。总编辑的办公室在二楼拐角最东头,门直对走廊,北半部隔开,有门可通,不知干什么用的;南半部是办公室。靠北面隔墙处,摆一排沙发和茶几。朝南的东边第一个大窗下,南北竖向放一张大写字台,台后靠墙放把高背藤椅,白色靠垫。大写字台对面放小写字台,我看到王唯一进来后就坐在那里,想是他办公的位子。朝南第二个大窗下横放一写字台,一位戴眼镜的干部正对着台灯看文件。(他是邓拓的机要秘书陈维仁,80年代曾任高级党校常务副校长。)整个办公室朴朴素素。正上夜班,虽有人来来往往,急急忙忙,但却静悄悄,显示了报社夜班的特点。

当王唯一把我引进办公室后,邓拓即从藤椅上站起走过来,先伸出手。我第一次见大干部,又不知为何事,心情紧张,行动拘谨,握住他的手,问了好,不知下一句该说什么。也不知为什么,邓拓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那时才刚过不惑之年,在我的眼中已是老一辈的长者了。高高的个头已穿上藏青色呢子制服,看起来似不健康。长长的瘦瘦的脸,鼻若悬胆,双目有神,声音洪亮,但却文质彬彬,潇潇洒洒一副学者风度,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邓拓把我让到沙发处,一同坐下。他大概看出了我的拘束,面

带微笑地说：“刚才王唯一去找你，说你不在学校，已留了字。我说尽快找来一叙。半夜把你找来，打搅了。”我说：“不敢当。”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毛泽东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凡，问问他的意见。”

《人民日报》转载青年作者的文章，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事。那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有一定的指导性，或者叫抓典型，带动一叙。而对于作者来说，谁的文章一经转载，即会引起轰动效应，身价倍增。据我的记忆，50年代初，《人民日报》最先转载的是河北省青年作者谷峪的小说《新事新办》，还由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写了推荐文章，谷峪因此而闻名全国。过了两年多，又转载了河南省青年作者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影响比前者更大，成了中国农民必须走合作化这条路的象征，单干是不行的，处在十字路口很危险，那会导致剥削走两极分化的老路。而我们写的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冷门文章，居然要由《人民日报》转载，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激动而又欣喜。我从学文学，特别是合并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就读以后，就萌生了成名成家的幻想，但不敢表露出来，说轻点，是好高骛远，说重点，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那要挨批评作检讨的。邓拓的话正符合我潜在的意识流，所以才回答得那么直截了当，简单干脆，不故作谦虚之态。这是真话，是心里话，是成名成家的幻想自自然然地溜出来的外化，也许一夜之间就要“名扬天下”了，这是形容中状元的老戏词了。

要谈的主要问题已解决，往下越谈越轻松越自然。刚坐下的时候，邓拓将一圆筒中华牌香烟打开，让我“随便”。我没敢“随便”，这时却不自觉地抽去一支点着了。邓拓站起来踱步（后来才

知道他腰脊椎患病,不适宜坐低处),边慢慢走动,边谈话。他说:“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我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邓拓又问到我们两个人的情况。我先简单地谈到李希凡,接着来个“自报家门”:原籍何处,个人的经历,家庭成分,家庭成员的情况等,都按照忠诚老实的原则一一如实叙述。我为什么如此详说?因为这一学期我没有正式安排课,正等候教育部重新调整分配工作,想进文学研究机构或文艺单位。邓拓听后说:“到报社文艺组(文艺部前身)来吧,文学研究所不是打仗的地方。”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后一句话。

谈话并未到此结束,又转向了题外。邓拓谈起来如何读书,如何作学问,要更好地理解《红楼梦》,必须深入地系统地研究清朝的历史。邓拓是历史学家,谈起历史来了如指掌。可是,他却没有问我为什么起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笔名,因为这个笔名正表明我对情史的无知。我最初用这个笔名时想到的只是鸽子毛,后来读清史方知道“蓝翎”有二解,一是情朝皇帝身边最低等的侍卫称蓝翎,一是情朝七品官(县太爷一级)的顶戴是蓝翎。“实在不好意思哩!”邓拓当然懂这个,但却未点破,反而把我的本名杨建中撻开,亲切地称呼我的笔名,现在想来实在够幽默情稽的。“蓝翎”而又与“同志”连在一起,算是哪一壶?不挨边嘛!后来想改也难了,身不由己也,将错就错吧,一直用到现在。

邓拓在谈如何读书作学问的过程中,还不时提到山东大学我的老师们,我现在记得的只有一点他说历史系的童书业教授是“古

史辨”派的大将,也是最早研究瓷器史和书法绘画史的,兴趣极广泛。邓拓从童书业的研究瓷器又涉及到历史上的五大官窑。我对此一窍不通,只好洗耳恭听。谈话进行了约两小时,最后让我找到李希凡,下午一起来报社,再叙谈一次。谈话结束后,仍由王唯一送我回宝钞胡同。

我回到学校宿舍,躺在床上,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意识乱流,天马行空。幸亏只有23岁,没有多少陈谷子烂芝麻可想,也没有什么光荣的革命史可忆,无非幻想着前途如彩虹,一片灿烂光明。悠悠忽忽,不知不觉,已是东方之既白,阳光临窗。遂起来给李希凡打电话,管他两口子起床没起床。

李希凡平时在西郊人民大学,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回家。他爱人在中央直属机关团委工作,住在西单丰盛胡同南边的缸瓦市胡同的宿舍,一间南房,后窗临街,窗下有棵老槐树。住房挨近大门道里的传达室。电话要通后,我听到传达室的人呼唤他爱人的名字,出来接电话的则是李希凡。我简单向他叙说了夜间同邓拓谈话的情况。他听了也感到事出意外,很兴奋。我让他尽快到我的住处来。他那里太不方便,烧壶开水还得在房檐下捅煤球炉子,不像我当教师的有吃包伙的小厨房,来了客人还可以随时加菜,在所有同时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同学中,条件是最好的。李希凡赶到我处,两人痛饮香茶,喷云吐雾,相谈甚欢,飘飘欲飞。饭后,一同到《人民日报》找邓拓。

两年后,看浙江昆剧团演出《十五贯》,当况钟在都督府门外慨叹“见大人如此艰难”时,在我心中就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我们见邓拓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当我们来到《人民日报》要见邓拓时,传达室的一位中年人以疑惑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冷冷地说:“不行!”我说:“是邓拓夜间约好的。”还是“不行”。我说:“让我用一下电话。”又是“不行”,我说:“请你给打一下。”还是“不行”。不行就

不行吧,反正得进去,另想别的办法。我们跑到东安市场里的会贤球社打公用电话。接电话的是王唯一,问“你们在哪里?”我说:“在会贤球社”。“怎么回事?来吧,我在门口等着。”有王唯一带领,传达室的那位看了看,没说什么。以后同我熟悉了,他一直对我很热情,见面彼此打招呼,无论公事私事,他都及时传达,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职责所在,多有警惕,实不足怪。据说,他在“文革”中躲到厕所上了吊,莫名其妙。惜20年后未能再相见,先走了一位历史的见证人。

我已见过了邓拓,这次谈话主要是邓拓和李希凡对谈,我在一边敬听。邓拓谈的内容比夜间谈的简略,基本一样。李希凡除表示同意转载文章外,更多的是谈他个人的情况。我和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较匆促,因为两人都正上着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我们不便再说什么,表示按期完成任务。

星期一,李希凡向学校请准了假。在一般情况下,正在就读的研究生请几天假不上课,是相当困难的,但这次有特殊原因,请假很顺利。李希凡回家安排了一下,下午赶到我处,一天的时间基本过去了。我们先研究了修改计划,随即着手修改,日夜兼程,轮流睡觉。正值血气方刚之年,精神兴奋,生活条件又方便,连续几昼夜,并不感到疲倦。星期四上午修改稿完毕,李希凡回去,由我通知报社来取修改稿。星期五,报社即派人送来两份修改稿的小样,四开大纸,边上留出大片空白。我看后改了几处技术性差错,退回一份,保留一份。

任务完成了,顿感轻松,单等着报纸上见吧!

三

在等待稿子命运的过程中,不妨回过头去叙述一下我同李希凡合作的经过。

我所以能同李希凡合写过几年文章,并前后共事十几年,纯粹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也非完全的偶然因素。有因必有果,既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也决定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由密切合作而隔膜,而恩恩怨怨,而人各有志,而最后分手!如果不是政治运动的龙卷风卷在一起,怕早已相忘于江湖了。世上不认识的人很多,认识的极少。能彼此认识,也是一种历史的缘分,尽管回忆起来有愉快或不愉快。

1949年5月,我还不满18周岁,就从一所中学的高中一年级,凭着一股热情,考进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华东大学,分配到社会科学院3部11班当学员。享受供给制待遇,算是参加工作。三部共五个班,我在的最后一个班,部主任是蒋梯云,班主任是马融(女)。这所学校原是中共中央山东局于解放战争期间在沂蒙山区创办的干部学校,1947年潍县解放后进城,不久又迁到济南,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后改为山东省委)领导。校长彭康,副校长张勃川,教务长余修。三部以前的两个部几个班的学员,绝大部分都在老师的带领下于四五月间渡长江南下,参加开辟新区的工作。老师中有著名的文学家刘雪苇、黄源等。7月间,社会科学院又成立了四部,共三个班。李希凡是四部四班的学员。部主任是董一博。华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泉城。

若干年后,一些不了解具体情况且存有政治偏见的人,总把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同等看待,未免有点高抬。“十七八岁的娃娃”能算得上旧知识分子么?其实,我们正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科班出身。我入学后,上级领导组织学习的第一篇文

章是《论忠诚老实》，让学员“抖包袱”，写自传，把在旧社会的经历毫无隐瞒地向组织上交代，以便轻装前进，接受新事物。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自己的思想总结《地主阶级的清高名士思想》，在全校的思想改造成果会上公开展览过。其实，我的家庭成分在土改时三榜定案为中农，同地主不沾边。我也说不上有什么“名士思想”，之所以那样总结，无非表明自己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梦想着出人头地，现在要同它彻底决裂，树立新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要求，自我拔高，“上纲上线”，也是一种“幼稚病”，但的确表现了自己的赤心忠诚，同以后几十年“上纲上线”的假检讨绝不一样。

根据我几十年的观察比较，华东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的方法，与现在“辅导材料”满天飞的方法大异其趣，后者乃偷懒的办法，历史的大倒退。老师先指定学员预习原著的某一部分，读不懂没关系，把遇到的问题提出来，供老师上大课时参考。老师讲课后，再结合原著讨论，提问题请老师解答。预习，上课，复习，循环前进，一部著作学完了，基本内容也牢牢记住了，以致几十年后还未忘掉，记得教哲学的老师是车载，满头黑卷发，大胡子，身体很胖，胸前挂着怀表链，站在齐鲁大学附近教堂里耶稣受难像前的讲坛上讲历史唯物主义，语言简炼，逻辑清晰，记下来就是很好的文章。猛一看，他的形象与马克思的挂像太像了。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是陶大镛。近年来，每当我从电视上看到他的镜头，便联想到他讲课时的风范。政治经济学里有很多抽象的公式和原理，凭直觉很难懂，但他能用方言很重的不大好懂的话讲得明明白白。后来有人讥笑我们只不过学了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哪知道这点“常识”也来之不易，老师们花了不知多少心血，才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十七八岁的娃娃”心中，哪有如今住高级招待所吃好饭且有种种娱乐的脱产学习班轻松舒服，走走过场罢了，真能学深学透

吗？

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了整整一年马列主义。我的思想改造属后进者，到临近结业时，才由班干事徐经泽和同学赵宏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共青团前身），因为思想不专一，又旁涉文学也。也正因此，我才由组织上决定转入文学系，进行长期专业学习。1950年5月，华东大学短期培养干部的任务结束，奉命改为设立专业系的正轨大学，三、四部的学员一部分分配到社会上工作，选留下一部分转到各系继续学习。此前已有了一个专门培养师资的教育系（后扩展为山东教育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随后又成立了俄语系、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和体育科，山东各地的文工团撤销，在此基础上建立艺术系。艺术系系主任为诗人臧云远。当今著名电影导演赵焕章即出自该系。

华东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为吴富恒，河北省人，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抗战期间在云南省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加入民盟，从事民主运动，是进入解放区较早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主中文系，近百名学员无不尊敬钦佩。教师中有新从华北革命大学分配来的著名朗诵诗人高兰教授和李曼茵教授，有教育系来兼课讲语言学的严薇青教授。学校号称新型大学，尝试用新的教学方式教课，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文学史先讲现代后讲古代，与旧大学确有不同之处。

同我一样，李希凡是从四部分配到中文系的。我是系里年龄较小个子不高学历又浅的小萝卜头，很少引人注目。李希凡等一拨从青岛来的学生很自负，看不起我这样的来自乡下的“土包子”，所以虽同系而很少交往。但却在革命集体里，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要求自己，同学之间的关系较融洽，不大闹矛盾，都感到机会难得，努力学习还怕落后，哪有闲心想别的。

1950年初秋，华东大学拟迁南京，打前站的已把临时校址选

定,学员们也准备打起背包就出发。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决定停止南迁,改为东下,同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当年冬天,华东大学东迁完毕,中文系和俄语系临时住在风景幽静的太平角私人别墅里,还经常同原苏联海军的官兵打排球篮球,中苏友好正热也。1951年3月15日,隆重地举行了两校正式合并的典礼,名曰“新山大”。历史学家老干部华岗任校长;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和古典文学专家陆侃如教授任副校长;历史学家杨向奎教授和吴富恒分别任文学院正副院长;文艺理论家吕荧和高兰分别任中文系正副主任。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山东大学以新的面貌进入到本世纪的50年代,开始了新的行程。

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是名教授云集,有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吕荧、高兰、黄公渚、谭正璧、殷焕先、孙昌熙、刘泮溪等。中文系的学生由三部分合并而成。一部分是原山大中文系解放前后招考进来的三个年级,约20人左右;另一部分是原华东大学中文系享受供给制的学员;再一部分是已撤销的原济南齐鲁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人数很少。一个系三个年级百多人,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的中文系中是空前的,但在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政治气氛中,团结起来共同提高并不难。然而也潜在着不协调的暗流。在一部分原山东大学的同学看来,原华东大学的学员有年龄不齐、学历不齐、文化水平不齐的“三不齐”的弱点,不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是穿制服的“土包子”,未免有点看不起,好像“文革”后的本科生看不起“工农兵学员”那样。原华东大学的一部分学员,自以为参加革命早,政治思想觉悟高,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不仅看不起原山东大学的学生,甚至对一些老师也欠尊重,认为他们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观点和作风陈旧。原齐鲁大学的人数少,不显眼,也不够活跃,默默地随大流,心中仍怀念着他们原母校的田仲济教授。这种潜在的思想矛盾,平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一到

关键时候,便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1951年春,抗美援朝热火朝天。青岛地处沿海,防空警报常鸣。警报解除,同学们便同全市群众一起,去捉美国飞机撒下来的带有细菌的苍蝇蚯蚓等。上级号召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保家卫国。我那个年级一次参军几十名,减少了一个班,全是原华东大学的。那时参军面临着生死考验,没有点热情和决心是不敢报名的。我也报了名,但没有被录取,大概是管人事那位老领导,看出了我近一时期的思想变化,有埋头读书的倾向,所以没有批准。我怀着极复杂的心情,在写作实习课上写了一篇送别同学参军的短文。不料发作业时,高兰老师把我的稿子留下,以他朗诵诗人的热情和技巧,在课堂上朗诵一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这次送别文写得最好的。我在系里崭露头角,当然很得意。但我没有能参军,实际上是落后了。然而,我那次如果参军走了,以后的历史将是另外的样子。有失亦有得,纯属历史的偶然。

偶然又加偶然,一年级三个班调整为两个班,我和李希凡调到一个学习小组,他是学习小组长。过去我们两个很少来往,他比我大三岁,常同年龄大的同学在一起。这时却突然开始近乎起来,彼此似乎发现没有什么不可接近的隔膜,但旁观者看得清,被讥为“臭味相投”。李希凡曾反讥说:“教条主义也比饭桶强!”瞧不起那些不认真读书的。

解放前,李希凡的学历并不高,只在河北省通县的潞河中学读过很短时间的初中,后来便到处谋职业找饭碗,生活中经历过不少艰辛酸苦。青岛未解放时,他姐夫历史学家赵纪彬教授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长,李希凡住在他家,一方面协助赵教授笔录,料理家务,一方面抽空旁听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课程。青岛解放后,李希凡进了华东大学,赵教授奉命调到新设立的平原省(原河南省黄河北地区和山东省西部的一些地区,1954年后撤销,又各划归原省),任

平原大学校长。两校合并后,一年级的基础课李希凡过去大都听过,对他已没有吸引力,他的兴趣是钻研文艺理论,这与吕荧先生的影响有关。

吕荧先生给我们讲的是“文艺学”课程,李希凡当课代表。吕荧先生在文艺界成名早,二十几岁就写出了评论集《人的花朵》,以优美的诗的语言纵论曹禺的戏剧和艾青等的诗,在抗日的大后方引人注目,被认为接近“胡风派”。吕荧先生进入东北解放区后,在大连写了《论工人文艺》的专著,表现了对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热爱之情。吕荧先生既是文艺理论家,又是翻译家,懂几种外语。他讲的文艺理论课,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世界文学史的实践,以自己的独特见解编著的,自成体系,在当时的教师中是少有的。吕荧先生讲课认真,知识渊博,见解深刻独到,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在他的影响下,李希凡专心研究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写出文章发表在山大学报《文史哲》上。我对俄国文学和苏联也有兴趣,按照文学史的顺序读名著。但我们并不轻视新的人民文艺,还经常阅读新出版的作品。有一部小说《人民的儿子》,我们读了不满意,认为太平淡,语言也贫乏,应该批评,于是研究写一篇评论文章。初稿是我起草的,李希凡在此基础上修改补充,然后由我再修改定稿誊清。稿子投寄一家刊物,但没有发表。都写了些什么内容,现在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一点,书中形容一位战士的脸,有九次用了“紫得像牛肝花”,作者过分偏爱此比喻,实在单调贫乏。

稿子虽没发表,但这却是我们相处以来第一次的合作,也是愉快的合作,无私的合作,共同提高的合作,增进友谊的合作。如果没有这次合作,恐怕也不会有以后的合作。此后,我又调到另一个学习小组,但彼此的关系仍和一般同学不同。

1951年末和1952年初,《文艺报》发起了关于高等学校文艺学

教学问题的讨论,认为教学中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观点。此讨论涉及到吕荧先生的教学,使我们从不同的侧面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此前,《文艺报》就发表过姚文元批判林焕平教授的文章,其中有很伤人的刺激语言,说什么教授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怕脸红,已开批判文艺学教学的先声。山东大学中文系有一位来自原华东大学的干事张祺,看出了《文艺报》的动向,根据部分同学反映的不太全面的情况,写信给《文艺报》揭发吕荧先生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吕荧用“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来贬低革命文艺作品。信发表后,在学校引起震动,以为出现了大问题,值得重视。吕荧先生不服,写信给《文艺报》提出反驳。

山东大学中文系在礼堂召开全系大会,名为帮助吕荧先生认识错误,改进教学,实则是两校合并后第一次批判系主任的大会。华岗校长也参加了会。但会议一开始,上台发言的同学都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言词尖锐,明确地站在《文艺报》和张祺一边,显然是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的。在这样的气氛下,李希凡作为吕荧先生的课代表,来往较多,且受其影响,自然被认为“中毒”较深者,只有检讨的份儿。华岗校长最后发言,态度平和,没有直接批评吕荧先生,只是说《文艺报》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带有普遍性,老教师要很好地改造思想改进教学。希望吕荧先生考虑大家的意见,不要背包袱。吕荧先生认为自己受到屈辱,从此拂袖而去,到北京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之约,担任了该社的特约编辑,以译著为生,直至“文革”被迫害,惨死于天津郊区的劳改农场,一代奇才化为尘。悲夫!

在批评吕荧先生的事件中,我的思想态度是矛盾的。从听他的课开始,我就非常崇敬他。但此事一出,关系重大,我也不自觉地站在《文艺报》和张祺以及学校的态度一边,把这视为立场问题。

在会上争先递条子,要求发言,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而,会议的主持人没让我发言,使我有点愤愤然。我觉得这是一些积极分子瞧不起我,甚至把我视为“中毒”者。牛脾气来了,给他们使使气。我点蜡烛开夜车,把自己准备的发言要点改写成稿子,投寄给《文艺报》,被登在该刊1952年第4号,标题为《对吕荧先生教学及其来信的意见》,署名杨建中。我当时很得意,觉得出了一口闷气,让你们看看我也非草包。与此稿同时发表的还有比我高一级的吕家香的文章,他也是吕荧先生的课代表,检查了受吕荧教学思想的影响。吕家香是全省新冒出的知名的青年小说作者之一,笔名吕山楂,影响当然比我大。

万万没想到,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吕荧先生的课了。我开始感到懊悔内疚,反复认真地思考问题。不错,吕荧先生在课堂上的确说过那句话,并且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但他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说明作家和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以启发同学们放开眼界,用有高度成就的作家和作品来印证文艺理论问题,他所说的“中”和“下”并非特指新的人民文艺。在我的听课笔记中,从未发现吕荧先生讲重要理论问题时,举过一般作家和作品当例子,都是举中外的名作家和作品。别人的反映和揭发是把这句话引申了曲解了。而我为了表现自己,也如此曲解和引申,是愧对老师的,在自己的写作历程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痕迹。毕业以后,我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减少内心的不安,也是怀念吕荧先生的教诲,又在紧张的教课之余暇,重新把听课笔记加以整理,清抄在我解放前保留下来一直没舍得用的蓝布硬封面的精装笔记本上。遗憾的是四年之后遭劫时,忍心地把它付之丙丁了。

在吕荧先生挨批判的事件上,李希凡、吕家香的检讨是被迫的违心的,而我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自己的假,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然,其间有性质和程度的不同,我是属于假“左”,李希

凡则近于假“右”。如果有一个是真,怕从此真要生分了,闹翻了,彼此不相往来了。正因为彼此都有假,不当真,不较真,不生分,未闹翻,并一如既往,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合作,一度成为战友。

历史经验证明,对吕荧先生的批判只有消极影响,没有积极作用,相反的却显示了他教学的劳绩。如果没有他给我们打下的文艺理论的牢固根基,没有其他老师们倾心以授的各种专业理论和知识,怎么会两年以后从同一年毕业的同学中,像雨后蘑菇一样蹦出几个人物来?如后来成为美学家的周来祥、古典文学专家袁世硕、刘乃昌,现代文学专家张华、徐文斗,诗人山青(孔庆珊),记者赵淮青(修身),民间文学专家陶阳等等。抛开教师的功劳,抽象地笼统地说都是党培养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那个年级只出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也不符合事实。大家彼此彼此,谁也高不到哪里去。如果连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那就是愣充大头鹅!

四

1953年,为了加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急需人才,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华东区四所重点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奉命提前毕业,分配工作。为了保证质量,学完必修课,减少选修课,免写毕业论文,因此,我们那一届成了空前绝后的没有毕业论文的毕业生。但是,我实际上是在大学里读了四年多。历史地看,先学了一年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对以后学文学、艺术和历史的学员来说,是受益无穷的。不像以后的学生,只当一门课来修,不联系自己的实际,又不大重视,只求考试及格就行。干别的还看不出来,如果搞研究或写文艺评论文章,就难免露怯了。我那些同学在当时所以成名较早较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大学生毕业分配,完全由学校决定,不同本人见面,名单一宣布,贴出红榜,开会欢送,各奔前程。

我们年级一起分到北京的有几十名,能到首都工作,大家分外高兴。但是,刚到北京没几天,便引起了一些人思想情绪的不安定。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公布名单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学是有具体单位的,可直接去报到,有一部分只注明“党群系统”,没有具体单位,待到京后再具体分配。谁知这“党群系统”的范围太大,竟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待具体一一落实,彼此对比,就觉得和实际业务水平不那么对号,有点乱点鸳鸯谱。对此有意见的同学到一起,难免犯自由主义,发牢骚,泄不平。

在公布名单的前一天,有关系较好的向我泄了密,说是将分到北京一家有名的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我心里有了底,但不露于外,照样若无其事地去海边游泳。但一夜之间有突变,把我变给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师,那家出版社落空了。据说这是由教育部门一封要一个中学教师的名额的加急电报引起的。不管怎么说,我总感到别扭。说老实话,我给自己选定的目标是当专家学者或作家,从未想当教师,所以在大学就不选修中学语文教学法的课。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于8月24日冒着大雨,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报到的。几天之后,陆续得知“党群系统”的分配情况,更感到不是滋味。

李希凡和另一位同学张华,直接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学习马列主义,在西直门外荒僻的四道口。按说,他们的分配是最好的,那时高等学校的研究生还极少,有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很难得。但李希凡并不想研究马列主义,他的兴趣仍在文学。他是最早和我取得联系的同学之一,见面交谈,也对一些同学分到新闻单位和文学团体表示不服气,我们虽有了安身之地,仍想跳出去,进入文艺界。但是,进入文艺界要凭实力,说空话不行,写不出东西来,谁会注意你?自己要创造条件,这样积累起“资本”进文艺

界,比靠分配光彩。有了共识,达成默契,心照不宣,各自努力,发奋写作,然而并未想到合作。李希凡写了关于武松形象的创造的文章,大概是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弦外集》里。我也在1953年末给《文艺报》22号,新书刊介绍栏写过短文,评介苏联的小说《钢与渣》。两人还未走向一股道。

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对我不薄。这是解放后创立的新型学校,专门培养工农干部,以备将来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校长林远,曾在远近闻名的师大附中读过书,从新华社的记者改行办教育的。刚到学校,就在满院海棠正红的小院里,单独分给我一间西耳房。南边的花厅是校长一家,左边厢房住的是新婚的教务主任,对面东厢房住着语文教研组长一家。其他教师住东跨院和北跨院。我的居住条件,在同时分到北京的同学中无人能比,都颇羡慕。其他同学,按毕业生转正前的待遇,每月工资46元,因系8月下半月报到,只补发半个月工资。我不仅没有转正一说,而且定工资66元多,并补发一个月工资,一次领130多元,够买一件狐皮礼服呢大衣的。分给我的任务是教工农班的语文课,每周12节,全是讲新课,隔一周一次作文。全班40多个学生,任务够重的。我曾给小学生和职工业余中学正式上过课,上讲台是不怯场的,不像新上讲台的教师,手足不知所措,讲了前边忘了后边。但为了给新入校的学生上好第一课,还是要认真准备,详细写好教案。试讲时,校长和教研组长都参加了。试讲完,组长很满意,只就姿态、语调和板书提了些建议。校长慢声慢语地说:好,好,这样继续下去,一定能把课教好。看来学校对我是寄予厚望的。

我想问题太天真了,以为在革命队伍里,无论到哪里,同志之间都应按组织原则说真话,不料真话却引起了反效果。到校后第一次过团的组织生活会,每个人都谈自己的思想情况。我是新来的,有啥说啥,说自己原来准备分配当编辑的,忽然改分当教师,思

想有波动,觉得有点倒霉,但还是服从领导决定的。来了以后,看到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心情已平静了,一定争取把课教好。我这是检查自己的思想,不是顶牛。团支部书记是位白面书生,平时说话先带笑,显得谦虚和气,他原是中学毕业留校的,负责管理物理化学实验室,还算不上正式教师,但却是学校的积极分子,政治骨干,是领导上信任依靠的对象。他听了我的发言,面孔一板,立即说:“什么倒霉?在新社会只有反动派才感到倒霉!”好厉害!我当然不服气,心想,你入团不一定比我早,干嘛来这一套,吓唬谁?我没有和他发生冲突,忍下了。时间一长,我发现和他走近乎的人,大都对我疏远,淡淡的,有点隔。年老的教师忙于教课,可能不了解这些,即使了解,党团员之间的事,他们必不会掺和。

更令我想不通的是课堂上的新教学法。我上课不久,全国中学和语文课,都在推行苏联专家带来的“红领巾教学法”。《红领巾》是反映苏联儿童生活的教材,有点文学色彩。苏联专家以此为范例,发明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文章的每一段找出它表现的思想,然后再把这些思想综合起来,找出全文的主题思想。我没有听过《红领巾》的教学,但观摩过老教师用这种方法讲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教师引导学生把每段的思想找出来,写在黑板上,最后用弧线一勾连,就总括出主题思想,一块黑板写得满满的,简直像图解。我接受不了,认为哪能这样分析文学作品,用来讲《林冲风雪山神庙》肯定不灵。然而对苏联的先进经验是不能持异议的,只能依葫芦画瓢,否则就是反苏,这不是闹着玩的。我想,如果这样教上三年五载,自己的脑子怕不灵了,怎么再去搞文学。准备走人吧!于是,我在1954年初向学校提出请求,希望到暑假能调整我的工作,重新分配。这在当时并非难事,一般都会考虑的。大概学校已看出了我的思想动向,同意了我的请来,但在调动前必须安心把课教好,不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我也

作了两手准备,既上课,又练习写作。

还有眼皮底下的一个现实,刺激着我对文学的追求。没来北京以前,听说北京有个“中央文学讲习所”,专门选拔解放前后几年间出现的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来学习,深造,由著名的老作家讲课,冯雪峰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水浒》的长篇论文,就是在该所作专题报告的纪录稿。所长是著名的作家丁玲。以写小说《活人塘》闻名全国的青年作家陈登科,就在此学习。文学讲习所的名气很大,不少文学爱好者把它看做神圣的文学殿堂。我到学校的第二天,雨过天晴,街道干净,想到鼓楼前的商店买日用品。出宝钞胡同口往西一拐,路北第一座红大门旁赫然挂着文学讲习所的牌子,往里看,深宅大院静悄悄,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期而遇。我不是作家,无非分之想,徒空投以羡慕的目光而已。以后屡过其门而屡有心动,便从西边的僻巷抄近绕过。但那拐角的后墙正是文学讲习所的厨房,我闻到的仿佛不是饭菜香而是文学味。人家有幸进入这里学习提高,难道自己学了几年文学,加紧努力,就进不了文艺界?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和皇帝,自己艰苦奋斗吧。天无绝人之路,就看自己走不走。虚无的幻想和绚丽的理想的绝对分界线在于脚踏实地的战斗!(这句话,我后来写进了1954年冬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一文中,但前提变了,变成了党的教育和培养。)

五

我既然有了调离的打算,就要作积极的准备,创造条件。除了坚持早晚的体育锻炼外,平时上班,认真备课讲课,及时把作业改完,在教师休息室读报纸杂志。晚上集中精力读书写作。我尽量利用学校的图书室,把新购进来的文艺书籍借来翻阅,并到北海西边的北京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填报的借阅项目是中国古代小说和

美学,主要是借阅线装书。

1954年3月3日,《人民日报》广告栏登出了《新建设》杂志的要目,其中有俞平伯先生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是在教师休息室里看到的,引起了注意。几天后杂志刚到,我一口气便把此长文读完,我为什么独对这篇文章有兴趣?虽属无意,实非偶然。

我在山东大学最后一次的中国文学史终考中,回答的最后一个试题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性质的,简单扼要地说明,它虽然概括了作者的一些家世经历,但不同于曹雪芹的自传,并举了苏联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加以论证。我不同意“自传说”,同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不大一样。感谢老师冯沅君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的豁达风度,尽管学生不完全按她的讲授回答,仍给以91分的高分,是我几年来学文学史课的最好成绩。我小时候偷看过家藏的一大叠图书供应社铅印本《红楼梦》,封面上印着黑色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对谈的剪影。看不大懂,好奇而已。解放后,结合中国古典文学课,又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新校本,才读出点味道来,有了文艺理论的基础,便形成了自己的想法,所以考试时才敢于那样自信地回答,并非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如果没有这点因由,我干嘛去读俞平伯先生的那篇文章?不仅如此,我还从工农速成中学图书室借读过棠棣出版社新出版的他的《红楼梦新证》。现在坦白地说,后来写评《红楼梦简论》的稿子时,关于清初历史的情况,我就直接参考了王耳(据传为文怀沙教便)为后者写的长篇序言,有所获益。向前辈学习并不丢人,过去不愿讲,因作者大概也“出了事”,避开了。

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李希凡从家中先到我那里,他爱人从文学讲习所了解该所青年团的工作情况后,也赶到我那里。在闲谈时,我说到了俞平伯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说,他也看过,不同意其中的论点。他说,合写一篇文章如何?我说,可以。他说,你有

时间,先起草初稿;我学习紧张,等你写出来,我趁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空闲修改补充。我说,好吧,明天我就把书刊全部借出来,开始动手。那时合作很简单,只想到文稿能变成铅字,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也不会想到谁靠谁,谁沾谁的光,更没想到会有以后几十年的的是是非非。但是,一只巴掌拍不响,如果双方的条件缺其一,也是根本合作不起来的。

星期一,我把第三期《新建设》、新版《红楼梦》、《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新证》都借出来。还偶然在图书室最后排的书架底层发现了一部红皮精装的《晚清文选》,其中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也借出来备参考。用了几天的时间阅读材料,理清思路,即动手起草。

我写初稿用的是十六开的白光连纸,学校发的,和印的写教案的纸同一品种,一样大小。时兴的蘸水钢笔,竖写,字很小,行距大,四周留较大的空白,以备随时修改。我写稿子有个习惯,先不写题目,待最后定稿时再补上;不爱“穿鞋戴帽”,“直奔主题”。初稿共三部分,边看材料边写。凡需要引文的地方,只注明引什么,待清抄时补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同时,又不能耽误备课讲课改作业。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时近四月天,我已脱下棉衣,改换春装。

初稿写完了,离星期日还有两天,为了赶时间,不能空过。李希凡那里的电话不方便,联系很困难,只好直楼送去。下午乘有轨电车到西直门,没有去那里的交通车,改为徒步。出豁口,沿着火车道往正北。北风吹,尘土飞,荒郊野外,一步一脚脏土,经过几个村,翻过一条大沟,才到了四道口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平地起灰楼,孤零零的一所大院子。我把稿子交给了李希凡,并把写作的情况告诉他,请他修改时注意。那时他只有一部损失了书皮的旧本《红楼梦》,还是研究生班的同学借给他的,此外什么资料也没有。

待他送我出来,太阳已落到了真正的“西山”(曹雪芹晚年居住地)了。

李希凡住的是集体宿舍兼学习室,两边是床,中间是长桌,周旋都不方便,更没有从容的写作条件。况且在众目之下,业余写作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所以他修改的时间比我写初稿的时间长。过了这个星期天,到下一个星期天,他才把修改稿交给我,已是四月中旬了。

李希凡的修改稿,写在黑色封面蓝横格的学习笔记本上,密密麻麻。他的字很少规整的,除了常和他接触了解其字体的,一般生人很难辨识。我将修改稿通读了两遍,对照初稿,大体上理清了他修改的文字。他修改最多的有以下几处:一、将初稿三部分扩展为四部分。初稿开头只有现流传本第一部分四、五两段中的一部分文字,第一、二、三段全是他新加的,组成第一部分。依次将后边的文字改为二、三、四部分。二、第二部分增加了对《红楼梦》现实主义性质的论证,以批评“色空观念”说的不对。增引了《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和三十六回的两段原文,以批评“钗黛合一”的不对。三、第三部分增引了《红楼梦》第一回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以论证曹雪芹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第四部分原文很少,基本未作变动。附带说几句,李希凡的文章爱引大段原文,而我一般不引大段原文,多采取夹叙夹议的办法,以减少篇幅,保持文字畅通。

最后一遍稿仍由我修改。我这次用的是从鼓楼商店买来的红方格正式稿纸。对着初稿和修改稿,边修改,边清抄,边核对引文,比写初稿进行得慢。我还发现了一个疏漏。我原来给文学的传统性下的界定是:“文学的传统性意味着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民族风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现在看来,这种界定是不全面的,但我当时写到这里却非常得意,自以为是独创见解。然而,在第三部分论述到这一问题时,却没讲民族

风格,缺乏照应。如果再补写,这一部分就显得太长,不够谐调。于是,我想出了个偷巧的办法,在全文后边加了一条注,“此处并非专论红楼梦的传统性,只为驳俞平伯先生的见解而写,故内容从略,将另撰专文论述。”后来借为《人民日报》修改转载稿之机,我才补写了关于“连续性典型”和民族风格方面的一些文字,使问题说得较为完整,并删去了那条注。等我把最后稿整理完交给李希凡,已是四月末了。李希凡看后直接寄给《文史哲》,至于他信中如何说的,我就知道了,反正该刊没有任何人同我联系过。及至文章登出,才发现李希凡在文末写的日期“五四前夕于北京”,稿子又在他手里停了好多天。

批判《红楼梦研究》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京图书馆正式发函,要征集此文和《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原稿,由该馆保存。我们复信同意,请他们直接向《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征集。如两原稿仍存于该馆,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叙述此文的写作经过?因近读刘济昆君的《中国文坛游记》一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3年8月初版),发现其中有作者的《专访李希凡》,并附有合影照片。关于此文的写作,有如下问答:

刘:您和蓝翎合写的评论《红楼梦》的书,主要是谁执笔?

李:那本书第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其他是蓝翎写的较多(66页)。

李希凡在他主编的《红楼梦学刊》1993年4期上又说:“无论我怎样富于幻想,也从没有幻想过因为写了两篇文章而为毛主席所重视。”

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读了这些说法会有何想法?我岂不成了此文挂空名的作者?也可以用当事人之一的話,证明江青说的“只有一个”并非空言。这里不排除访问者记录有误的可能。如果

无误,李希凡对自己的谈话是要负历史责任的。他究竟写了一篇还是两篇?说得自相矛盾。我所以要把别的事放下来,先写出以上的经过,就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别无它求。幸亏我没有死于1957年那一劫,幸亏我现在仍然活着,否则就“死无对证”了。我不怕和他打官司,此前他还有一封辱骂我的长信,比这厉害得多。如果对簿公堂,那可是铁证。法律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但搞政治污蔑和人格侮辱则是犯法的!

六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写作经过和投寄《文史哲》的情况,根据我自己长期埋藏心头的记忆追述如上。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它下一步的命运吧。

《人民日报》已将此文的小样排出,我便白天等,夜晚盼,高兴而又焦急地期待着刊出。星期六过去了,星期天过去了,星期一也过去了,还是没见到,有点心凉。好事多磨,“磨”在什么地方?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等到了真实信息,邓拓通知我们此将由《文艺报》转载,中国作家协会会和我们联系。我有些失望,但未灰心,《文艺报》转载也很好嘛。紧接着,我便收到陈翔鹤的来信,约我们去他那里,一起去见冯雪峰。

中国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一座很有气派的老式深宅大院。作协下属设有古典文学部,陈翔鹤即属该部,负责编《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版。编辑部在西厢房,里间是他的办公室,外间是专职编辑的办公室。我们是晚饭后去见他的,他在办公室等着。陈翔鹤正当中年,我们已把他尊为老前辈了。人很和善,操四川乡音。他谈话不多,说明约见的目的,就是去见冯雪峰,遂带领我们步行去冯家,一路边走边闲谈。

冯雪峰时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他住在现北京站北面的方巾巷,后门即苏州胡同,离作协和《文艺报》不远。他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室就在北房。我对冯雪峰景仰已久,读过他不少文艺理论著作的杂文。他有长者风度,对小青年谈起话来和蔼可亲。他只说我们的文章《人民日报》决定不转载了,由《文艺报》转载,至于什么原因,却没有说。冯雪峰将我们文章中的错别字和用词不当以及标点符号不妥之处一一指出,并随后加以改正,然后,拿出一份转载的“编者按”拟稿,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我看到有“用科学的观点……”的词句,感到评价过高,表示实在不敢当。他说,不必客气。文章决定转载在《文艺报》第18期。谈完此事,冯雪峰便谈起文艺创作的事,还涉及到茅盾30年代的小说。陈翔鹤不断插话。我们敬听,气氛非常轻松。等从他家出来,已十点多。他送出门外,怕我们赶不上电车,一定要雇三轮车。我们坚持不要,走出了苏州胡同。走了不远,李希凡感慨地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鲁迅的作风。”

同冯雪峰谈话的第二天,我希他写过一封信,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表示想到文艺界工作。因为《人民日报》不转载,我的工作调动也可能受挫,心里不踏实,才向他提出的。冯雪峰很快回了信,让我安心,组织上会很好安排的。(红格八行书,毛笔字,我一直珍藏着,反右时付之丙丁。)接到他的信不久,学校即通知我办调动手续,去《人民日报》报到,落实了邓拓原来的决定。我是10月中旬调到报社文艺组的。才风闻此事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有关,非同一般。

当冯雪峰同我们刚谈完转载文章的事以后,陈翔鹤立即提出,约我们给《文学遗产》也写一篇文章。我们表示,8月间已寄去过《评〈红楼梦研究〉》的稿子,不知收到没有。他一听很惊奇,说,还不知道,回去找一找。稿子很快发表在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专版。事后我们才知道,设在陈翔鹤办公室外间的编辑部,平时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处理日常来稿,一位是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的夫人金玲,一位是刚分配来的我们同年级的同学郝寿亭。来稿多,人手少,只能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摆起来,一件一件处理。像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的稿件,又没有什么时间性,几个月内能得到处理就算不错了,似乎说不上有意压制谁。

这一篇文章的合作更简单,轻车熟路。第一篇文章写完后,言犹未尽,觉得有必要再写一篇单独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李希凡给第一篇文章加的标题有“及其他”三个字,实际上并没有“及”于“其他”,文题不大相符。但时间已到六月,学校面临考试,都很忙,遂约定暑假期间动手。

7月1日放暑假。我办理完学校的杂务,便跟李希凡夫妇去京东通县。他家在东南城角下的武定庵,独门独院,五间南房,二间东房。院里有枣树。已挂青如豆大。我住在南房最东头的门里间,白天看材料,傍晚到城墙上乘凉闲聊,夜间写稿。我因为还要回山东老家,所以第一稿还要由我起草。

此稿比第一篇短,却分为五部分。其实第一、四、五的文字都很少,重点在第二、三部分。我只想先把重要的论点提出来,早点完稿,文字上也很少讲究。我大概只用了三四个夜晚就把初稿完成了。我感到最得意之笔,是提出了“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的命题,认为是超越了红学界的前人。我是在天将黎明时,想起了俄国评论家杜勃洛留波夫的名文《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才下此断语的。他这是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大雷雨》的女主人公的比喻,我曾用他的观点写过评古诗《孔雀东南飞》的稿子,并请冯沅君老师批改过,后来觉得那个稿子没写好,观点用到这里更合适。我提出这个观点有点冒险,直到今天仍争论不休。稿子写完,在末尾署日期处有

一句话：“7月7日（记不清了）黎明初稿于通县东南城角下。”李希凡看了大笑道：“人家还以为趴在城角下呢。”拿笔勾去了。

我写完初稿即回山东。临返京前，老家发大水，断了交通，只得绕道河南省，经开封到郑州转车返京，已9月初，学校上课两三天了。李希凡什么时间改完寄出的，我已记不清，更不知道改动的具体情况。及至刊出，才发现他补充最多的是二、三部分，后边没怎么动，不仅全文结构比例不匀称，文字上也很少加工。后来在作协召开的大会上，新华社一位跑文教的记者对我说：“我喜欢第一篇，这篇有的论点没讲充分，文字也较差。”我淡然一笑。怎么说呀，说什么呀，不好说嘛。少一道工序也。

按照一般的情况，两个青年作者的文章，一篇已经转载，另一篇也已发表，我的工作调动问题也解决了，大概不会有我们的什么事了。但是，谁知道这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龙卷风。

我刚到报社文艺组时，负责领导文艺组的是袁水拍和田钟洛（袁鹰），负责领导美术组的是华君武和苏光。分管文学艺术的副总编辑是林淡秋。他们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看文艺评论稿件。当时还准备调李希凡来，但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不同意放，故迟至1955年初才调来。文艺组的负责人没有向我透露过任何有关毛主席的指示，而是理论组的一位负责人沙英，初次认识时无意中，毛主席称你们是“小人物”、“新生力量”，使我感到震惊。待接到作协将于10月24日召开会议的通知时，才感到事情刚刚开头。

为了配合作协会议的召开，由田钟洛起草经林淡秋和袁水拍修改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发表在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邓拓上夜班时把我找去，说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俞平伯，并谈了俞平伯的一些情况，要我起草一篇有战斗性的文章。我当时正住在本司胡同的九人一室的集体宿舍，

办公室全组人在一起,写不成稿子,袁水拍就让我关在他的办公室工作,晚上在大办公室睡沙发。但资料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连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的前身)和《胡适文存》都借到了。李希凡不能来共同工作,他看了初稿,没有大改动,前后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我夜晚向邓拓交稿时,他没提具体意见,只说火药味还不够,于是在原稿旁边加上了“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句话,问我:“怎么样?”我说:“好。”急稿发排,第二天(24日)见报,这就是两人署名的那篇《走什么样的路?》,而这篇文章当时最不容易被人接受的恰恰是邓拓加上去的这句话。“复杂的阶级斗争”,还能不是政治问题?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我们合作的道路上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如果说,在这以前,我们写文章的态度只是为了表明个人对《红楼梦》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见解,对事不对人,即使言辞上有不够谦虚或失敬之处,也是“少年气盛”缺乏修养的表现。那么,在此以后,就是自觉地以战斗者的政治姿态出现,仿佛真理就在自己一边。当仁不让,片言必争。而且不少文章都是奉命而作,或经有关负责人大量修改,有一定的背景,自然也增加了文章的政治份量,使人感到有来头,非个人意见。关于这些,李希凡自己内心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但我对自己的思想活动则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过去不政讲,不愿讲,在迫不得已作检讨时,讲的也是真假难辨,且流露出诉委屈的情绪。时过40年,垂垂老矣,无所求也,倒可以从严解剖一下自己的心态了,让读者了解自己,让历史了解自己。

在这以前,我换过几个学习和工作的环境。在相处的一些人眼里,我是个不显眼的小萝卜头,不大关心政治,行动自由散漫,不大合群。但我自己却不这样看,认为自己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并不

少,读的其他书籍也不少,关心的是天下大事和世界风云,区区身边小事,何足道哉。如果随大流跟着跑,能跑出名跑成家吗?因此,我有我的想法,有自己的一套,不会轻易改变。这是什么?不就是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吗?眼下,自己已被推上了战场,而且充当打冲锋的角色,再那样下去不行了,要当一个像样的打冲锋的战士。我曾经先对一位好朋友后又对一些人讲:“过去,在我的脑子里,党的关怀是抽象的,现在,则变成具体的了。”老朋友一笑说:“不简单,大有进步。”其实,我这话里仍有消沉的一面。当我修改李希凡为《中国青年报》起草的那篇《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时,心里感到阵阵的悲凉。文章确定的基调是党把我们两个青年团员引导到战斗的路上。但是具体到各自单位的党组织,谁引导过我?团组织谁引导过我?不仅不引导,反而是冷落甚至阻拦。事情出现以后,人民大学的吴玉章老接见过李希凡,还表示要送他去苏联深造。而我在师大工农速中得到的则是冷遇。9月间,《文史哲》杂志刚到教师休息室,恰好校长打台球休息,我告诉他发了篇文章,请他指教。他只轻“唔”了声。等社会上已沸沸扬扬了,学校党、团和行政上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既无肯定表扬,也无关囑,若无其事。我一进学校就心冷,待调动通知一到,收拾收拾简单的行李,一辆三轮车走人。学校对我如此,完全可以理解谅解。学校最讨厌不安心教学的人,若是热情对待我,岂非鼓励这样作,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同时,我还这样想,既然《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对我都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有毛主席的关怀,可见我并非都错了,何必再计较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的看法,如果我都按他们的意见作,哪能会有今天?我已走向了战斗的路,只有“向前,向前,向前!”任凭别人说短长!

七

1954年7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拉开了。出席会议的有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翔鹤、林淡秋、袁水拍、田钟洛、俞平伯、李希凡、蓝翎等70余人。26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及28日的《文汇报》,分别报道了会议的情况。11月14日的《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摘要发表了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发言,后来还修改成文章单独发表,如何其芳的《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等。

作为刚踏进文学门槛的青年作者,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面对众多的文学界的前辈和著名人物,心情是很不平静的。经过介绍,他们都以赞许的目光同我握手,自己也感到很荣幸。据我的感受,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在。我等小辈,才疏学浅,欣闻宏论,茅塞顿开。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指定要我们发言。按常情,李希凡的名字署在我的前面,又比我年龄大,理应由他来讲。但是,我让他讲,他就是不愿讲,一定要我讲,在这种露脸的时刻,表现得够谦逊的。迫不得已,我只好站起来,全身紧张地讲了几句。一是,我们参加今天的会,是虚心来学习的;二是,我们一向敬重俞平伯先生,文章的观点不同,但没有扣帽子的想法。事后一想,后一点说法显然与当天我们文章的调子不大一致,帽子不是已经扣上了吗?“复杂的阶级斗争”还不是帽子?

此处正可插叙一小事。李希凡在这次会上不讲话,可是,以后凡是两人共同出席的讲演会,他都一定要先讲,只有在天津南开大学那一次例外,因为我病了,方先讲了几句,然后坐下来休息。也

按常情，“开锣戏”本应我先唱。他说，他怕讲着讲着没词儿了，时间短，不好散会。他说，你上过讲台，可在后边兜着。难道我是“巧言”之士吗？硬着头皮撑大轴罢了。此后若干年，遇到类似的场合，我能目中无人脸不发红心不跳哇哩哇啦混侃一气，就得益于此，练出了“嘴皮子”功，像演员似的，也是一大收获。

时过3天，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事态在扩大。

袁水拍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作协理事。但是，根据他行事惟谨的作风和文风，绝不会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如此大的口气。其实，袁水拍只起草了一个初稿，排出样子送审。毛泽东主席对送审稿作了重大的修改，连现在的题目也是他加的，并写了袁水拍的名字。袁水拍为此甚感不安，也不好说什么。

袁水拍的文章发表后，批判运动全面深入地展开，报刊上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多次扩大会议，各协会的负责人和文艺家大都参加了。结合着对《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和胡适思想的批判，检查各协会所属刊物的工作，特别是重点检查了《文艺报》的工作，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至1955年初，此事暂告一阶段。社会上的批判仍在广泛地开展着。待1955年夏天，又转向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并引向了全国性的肃反和审干，已不单是思想文化范围的事了。实际上，这些环节是相互连接交叉在一起的，由批判俞平伯而批判胡适，而检查《文艺报》，而肃清“胡风集团”，一步接着一步，形成了远

远超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开始,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人民日报》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进行的内部机构大调整,准备改出两大张八个版,其间不到两年时间。在这期间,由于领导的表扬和社会舆论的宣传,李希凡和我似乎成了文学青年中的风云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或象征符号。我自己既有感恩知遇的一面,也有得意洋洋的一面。我们共同的表现可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除了完成正常的编辑任务,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个人写的文章外,总共合写了20篇文章。1956年中交稿1957年1月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收入了其中的16篇,其余的散见于其他书刊中。

我们合写的文章,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评论不同见解的,共六篇;一类是正面阐述对《红楼梦》有关问题的见解的,共10篇;一类是同以上两方面无直接关系,只一篇。既然有些文章是在批判运动中产生的,又处在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就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无论功也罢过也罢,都算在个人的名下,也难以自安。如今事过境迁,为了对历史负责,自应有个交代,对事不对人,提供真实的情况,让对此有兴趣的人自由评说。

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几篇文章的写作情况,还有几篇需要特殊多说几句。比如,由我起草的《“新红学派”的功过在哪里?》,是邓拓布置的任务,要给“新红学派”一个概括的评价,既有批评也有肯定,否则不足以说服人。再如《正确估价〈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也是邓拓布置由我起草的。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都很大,须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论述。但由于这是布置的任务,时间紧迫,报纸的版面又有限,只能概而言之,仓促成篇。虽署两个人的名字,其实是经过了多层的修改程序的,有他人的精力花在其中。这还是一般意义的布置任务和完成任务,而另一些文章的写作,情

况比这复杂得多,需要分别叙说。

由李希凡起草的《胡风在文学传统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是报社布置的任务。但这篇文章的小样送审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大量的修改。如果把小样和修改样找出对勘,就可看出我们实在没有那样高的理论水平。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在运动初期,成了重点冲击的对象,似乎排出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应该说,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是只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但是,这功劳不能记在我们的名下。在政治运动中,要保护谁,如何保护,是由最有权威的人说了才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如果地位稍逊,说了不但不会生效,弄不好连自己也会牵进去,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奉命作文章,我感到是领导上的信任和培养,非常光荣,因此乐于服从,尽力而为。但也遇上过非常尴尬的事,不得不违心而从。批判运动持续到1956年初,胡乔木突然提出文学研究中有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简单地给作品中的人物贴阶级标签。他举出冯沅君的《谈刘姥姥》作重点例子,并指定让我们写文章,要有服从真理的精神,打破情面,不要有思想顾虑。胡乔木是分管《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他的意见是必须执行的。报社的领导既向我们传达了他的意见,没有什么条件好讲的,不想写也得写。但是,冯沅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再横冲直撞,也不能批评我们的老师啊!

领导上说,这不要紧,乔木同志表示,如果有什么问题,冯沅君那里的工作由他出面来作。据我们所知,冯沅君先生和她丈夫陆侃如先生,解放前几十年一直坚持进步,追求真理;解放后,热爱党、热爱新社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努力在教学中运用新的观点。即使在个别问题上有欠妥之处,但也不算上典型,怎能在那种情况下,拿她当批评的靶子?然而,上命难违,必须执行。这是我们合作以来写得最不顺畅的稿子。李希凡起草时写得很苦,我修改时也很苦,勉强把稿子凑成了,还不到四千字,标题为《从〈红楼梦〉人物刘姥姥的讨论谈起》。两人苦笑,摇头,叹气,无可奈何!小样打出后送胡乔木审阅。送审样退回,四周改得密密麻麻,改排后一个整版还容纳不下,超出原稿两倍。原题变为副标题,新加的题目是《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看来胡乔木还是很重视此稿的,以后又反复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直至他出差到了南方,还来电报补充。他的修改处当然没有人敢变动,但有的地方显然忽略了作者的身份。如在本文提出问题后转入正面论述的地方,加上了如下的话:“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得不作一些常识性的说明”。这怎么像两个青年作者的口气?如果照此登出,我们岂不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人物。因此我们不得不向胡乔木提出,请他再作修改。大概他也觉得那样说欠妥,于是又改成现在读者看到的那段较为谦虚的文字。就这,我们还是挨了不少骂,被有些人认为是反咬老师的中山狼。这篇文章收在《红楼梦评论集》中,仿佛鹤立鸡群,其实有三分之二是我们冒名的,根本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

一部《红楼梦评集》,署名的是我们两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集体的合作。

在报社工作,奉命作文章,有乐也有苦。乐了可以说出来;苦了只能闷在肚子里,不能说,不敢说,这是机密,不可泄露,哑巴吃

黄连吧！如今来个竹筒倒豆子，全倒出来，浑身轻松。

关于正面论述《红楼梦》的那些文章，除少数写于1954年末，其它都写于1955年到1956年初。1955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舒芜，已向我们约定，并签了约稿合同，让我们将有关《红楼梦》的文章編集，交该社出版。我们拟定了计划，准备一年完成。我们按计划篇目，分头起草，交换着修改，好像流水作业法，进行得很快。这期间，李希凡成了大忙人，又是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又是较长时间出访欧洲几国，有些文章都是他先赶快起草后就交给我。我不仅把两个人的日常工作都担起来，还要利用业余时间把修改稿完成，寄给有关文艺刊物，同时还要起草另外的篇目。起初兴致满大，后来兴致渐减，近于心灰意冷，赶紧把出版社的任务完成算了。由李希凡起草的《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真可谓“草”稿，零乱地写在笔记本上，要点罗列，尚不成片，就匆匆出国。我费了好大力气参照草稿写完，也懒得再投寄刊物，直接和已发表的文章编入集中交出版社，使彼此的合作划上第一个句号。时在1956年中，我已暂离评论组，调副刊组筹备改版后的杂文专栏了。

新社会是提倡集体主义的，在写作上也是提倡集体创作的。但是，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终生不渝的合作精神，是很难长期愉快地坚持下去的，特别是对于涉世不深而又有私心杂念的青年作者，这一关是很难过去的。而对于正处在积极合作状态下的青年作者，有关的领导者只要在名誉待遇上表现出稍稍的倾斜，便会使这种合作中断或夭折。我和李希凡由积极的合作急转直下地变得貌合心不和，就是由此而造成的。

八

1957年初，李希凡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弦外集》出版了。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心有灵犀，我日常用的一个短文底稿本

的第一页就写着这三个字。1957年末,也就是根据这个本子里的底稿,把我抓出来定为“右派分子”的。

1955年,李希凡送我一张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期间接见他的照片,背后有签名和题字:“代表着你的光荣。给我的战友蓝翎。希凡。”而送我评论集时的题词,却是一句颇费思索的话:“弦外之音不可弹。”什么“弦外之音”?我那稿本上写的“弦外”指的是作战之外的短文章,如影评、书评、杂文之类。他这里的“弦外”,大概暗含着警告。至于要警告什么,我也不知道。说穿了吧,这句话本身就是“弦外之音”,他只一颗忠心,而我可能怀有“二心”,要不然,怎么会有“弦外之音”之喻,言为心声嘛。

李希凡写这句话也并非偶然,而是彼此间出现潜在矛盾的结果,责任也不全在他身上,是由诸种客观因素不断刺激出的反应。1954年底,批判运动正热火朝天,我们正齐心协力并肩战斗,总共才写了六篇文章。那时李希凡还没有正式调进《人民日报》,但经常来。有一次下饭馆后走到报社大楼的台阶下,他若有感慨地轻轻对我说:“看来邓拓对你比对我好。”我听了感到意外,说:“何出此言?别神经过敏,造成误会。”因为我晚上都在办公室读书写作,这里有暖气,宿舍里小煤炉不大顶事。邓拓每天夜班都在办公室,楼上楼下,有了什么事,即把我找去布置。并让向李希凡转达。这谈不上有什么偏爱。李希凡说的就指的是这些事。但李希凡又说我对他的工作调动不积极。怎么回事?当我调报社后,即同时着手调李希凡,但受到挫折,校长不同意。李希凡很着急,向我透露了此事。我的确说过:“那有什么办法?吴(玉章)老的话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慢慢等着吧。”李希凡的话就是由此联想出来的,对我始有介意。

介意也是会转移的。李希凡的介意很快即消失,调来了。我的介意却同时产生了,一直存在了40年到今天才转化为文字。

1954年底,李希凡突然被宣布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的委员,属团中央系统的代表。事先没有人问我谈过此事,也没有作我的思想工作。我承受不了,认为这是有意抬高一个压低一个,以后就不好再合作共事了。李希凡为此一再向我解释,说他事先也不知道,他虽是代表,其实也代表了我,代表了我们的同学。我当然听不进,因为这不是他能决定的。我有不满,但无具体对象,愤愤不平而已。紧接着,他又作为报社两名代表之一(另一位是老记者季音),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我更感到承受不了。这无异向世人表明,我是“附骥尾以增光”的人物,是沾了李希凡的光的。没有他,我写不出那两篇文章来,没有我,他必能写出来。其实这是想当然的扯淡逻辑,而在我们两年前,安徽的青年作者白盾,已单独写出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被《文艺报》退回,1954年11月12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可见,合作是偶然,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必然性。如果我真是侥幸沾了李希凡的光,只有窃喜感激才对,干嘛还要有意见,不服气,闹情绪?

外界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据报刊上的动态和一些传闻,可能推测我消沉了,沉默了。而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我的确因思想问题受到批评和帮助。我在私人的信件里流露过志满意得的情绪,有人得到了这些信,如获至宝,立即打印出来送给有关领导,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那里也送了。胡耀邦看了有几处批示,指出我的想法不对,让团组织帮助我提高认识。团组织的负责人在生活会上逐条念了胡耀邦的批示,我作了认真的检查。问题就此结束,事后也没有再提起,仍一如既往地工作写作。(反右派时,又有人将这些材料印发全国,作为“罪证”之一广为扩散。实际上,划我为“右派”与此事毫不相干!)但是,另一方面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我是怀着诉委屈的心情在组里行政会议上流着眼泪叙述的,旁证

是有的。当时《工人半月刊》(《中国工人》前身)送来一本苏联小说《穿过暴风雨》，约我写了一篇评介文章。这类水平不高的作品那时翻译得太多了，我都没有写评介的兴趣。但一读此书，却正打动我心，引起了共鸣，于是写了《站在劳动战线最前沿的人》，发表于该刊1955年22期。这本小说写的是一对火车司机，在特大暴风雨中，驾驶着机车穿过一段最困难的弯曲坡道。事后，接受鲜花和受奖的人，恰恰是出力最少的一位，而那一位却冷冷清清地呆在机车里。我写评介是借题发挥，在行政会上谈此心情，更不是认真检查，好在同事们了解我，也没深究。即使严加批评，我也不会真正接受的。出了力反受歧视，我心里够窝火的了。

对于青年的教育，多年来一直强调要正确对待名利关，别在这个关口栽跟头，贻误前程。这当然是对的，特别是对参与集体活动或合作的青年。但是，这里必须确立一个前提，把关者(亦即引导培养使用青年的人)应该大公无私，赏罚分明，作真正的伯乐。如果这关设置得歪歪扭扭，前边还有陷人的暗坑，望而后退的当然是失败者，盲目前进的自然跌下去，除了特许的，谁也不落好。没点顽强劲，也许就此被毁灭。历年来许多青年在此跌跤，难道全怪他们？面对如此退亦难进亦难的关口，我如果退下来，责任全在自己。如果我跌进去，那责任并不在我，天地鉴察，于心无愧。我跌进了陷阱，但却爬上来前进了。

为了表明我并不是依附别人的人，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先后用石冰、竹芒、庄颐梦、何弃、莫干河、公羊庚、拓跋已、司徒癸、字文壬、司马龙、朱未木、慕容乙、公孙丁、孤烟等笔名，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和杂文。我要走自己的路，谁愿说什么让他说去。

1956年1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稿件，突然来了两位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让立即填表，交照片，办理列席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的证件。他们连盖照片的钢印也带来，没有坐下

来就把手续办完了,此前,新华社已发表了出席会议的名单,2月5日,又发了一条,其中才补上我的名字。直到今天,我也不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自然也高兴,心理稍有平衡感,但并没有多大的开会热情,仿佛觉得这是一种安慰。

第二天,李希凡高兴地领我步行到北京饭店报到。我被分配到社会科学界组。这个组都是长辈学者,不认识,只记得同翻译家杨宪益和政治学者杨班清交谈过几句。小组很少开会,大都同文艺组在南池子的政协俱乐部联合召开。大组会可热闹!尽是文艺界的名流。女歌唱家喻宜萱主持会议,参加会的有侯宝林、傅抱石、连阔如、丁果仙、李再雯(小白玉霜)、徐绍清等几十位,济济一堂,有说有笑。我是只听不说,还没忘自己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我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整天泡在会上,时到时不到。在别人看来这是一种荣誉,其实,细想起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徒有虚名而已。无奈苍生想不透,多被虚名误了。我不就曾为此而心不自安过吗,青年人的业务水平有高低,工作成绩有大小,采取实际的奖励就可以了,何必用什么“委员”或“代表”的头衔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能保证这种办法都起正面效应吗?

我说这话,不是发没当上委员的牢骚,因为我还真当上了别的委员。当政协会议将要结束时,由郭沫若在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念了委员的名单,举手表决,鼓掌通过。前后不到十分钟,我就成了该会的委员,而周围举手鼓掌的谁也不认识我。我看看身后,正坐着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代鼓练傅其芳。事后,也没参加过该会任何活动,只收到过几次舞会票,而我却是从来不会跳舞的,白白浪费了。这不也是徒有虚名的头衔吗?等我再过一年多戴上了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的“右派”帽子之后,这些空头衔也就自动消失。

这次会议,我也没有白参加,欣赏了一场最高水平的京剧晚

会,开了眼界。以致现在每听到说谁的演出达到如何高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则不以为然。那晚演出的是三出折子戏,裘盛戎的《探阴山》,谭富英的《南阳关》,马连良和张君秋的《南天门》,正值他们演出的鼎盛期,满台有戏,炉火纯青,掌声不断。试观今日的京剧界,哪家剧院能拿出如此的硬戏吗?京剧不景气,于此可见一斑,还不值得反射自问吗?

这次会议,无意中 also 给我留下难忘的历史纪念。2月4日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与会的部分代表,并设宴招待。在西厅等候的是文艺界人士,由茅盾持名单逐一引荐介绍。按姓氏笔划,丁果仙排在最前边,我排在蓝马后边,最后一个。等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等接见到后边的人时,前边的已悄悄地进入宴会厅。我激动地等待着,仔细地观察着。我看到刘少奇同小说家张恨水谈了不少话;女舞蹈家康巴尔汗恭恭敬敬地将维吾尔族绣花帽献给毛主席,端端正正地戴在毛主席的头上。当我向周总理握手时,还没有等我说话,他就笑嘻嘻地说:“《文艺报》上的漫画,我昨天看了有你们”(这是指该报当年第一期上的《迎春图》,由华君武、方成、英韬、沈周衡、张仃等集体创作,画各界人上喜迎新春的姿态。)我说:“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刘少奇同志关切地问我:“你们工作的条件怎么样?”我回答:“很好。”“有什么困难吗?”“没有。”当我向前一步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时,茅盾介绍说:“蓝翎,后生小子。”我说:“我代表青年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说:“谢谢你们。”其实谁也没有委托我,我不过按当时的时尚,谁也不好意思把这当成个人的荣誉,都说这是大家的光荣。正在斜对面的《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高粮的闪光灯一亮,抓拍了这一镜头,留下了历史的纪念。我加洗了六张六寸的送人,两张24寸的装镜框保存。1989年《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时,拿去印纪念册和展览,后来竟不翼而飞,不知落入谁手,何意而为?连报

社保留了几十年的底片也同时不见了。怅怅！幸亏我还有两张一大一小的，没有被“贼”偷跑。否则，写起回忆文字来，空口无凭，难免伪造之讥。

那天的宴会实际上成了文艺演出会。我们那一桌在入口处，离中心较远，但场里的活动都能看得着听得见。那桌的主人是曾任过 19 路军副军长的陈铭枢，当他问到我的名字时，我说：“读小学语文课本时，就知道 19 路军，在淞沪保卫战中英勇抗击日本鬼子。”同桌者谈话很少，似乎也顾不上吃，转身观看演出了。赛音朝克图穿着蒙古族服装，朗诵了他当场写的诗《我握着毛主席的手》：“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像婴儿抚摸着妈妈的奶头……”丁果仙清唱晋剧。徐绍清和彭俐侬为同乡毛主席唱湘剧《拜月记》。侯宝林站到中心桌前，说了一段单口相声，毛主席听了，发出爽朗的笑声……在我极有限的经历中，感到这种气氛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散会后，我没有乘坐大会的汽车，面是一个人步出中南海，一路走，一路回忆自己 20 余年的经历，直走到王府井报社办公室，躺在沙发上仍激动不已。一个青年作者，能得到同代人梦寐以求的殊遇，今后还能不好好干以涌泉相报吗？除非铁石心肠的人才无动于衷！

两个月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走在“双百”的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集中精力编副刊的杂文栏，也是个人业余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心无预悸，更无余悸。那时的杂文栏，被公认为解放后办得最好的，作家动员之广，文章发表之多，质量之高，实属空前。当然，这是集体的成绩，我只是尽了一个责任编辑应尽的责任。到年底，因工作需要，我又调回评论组，李希凡已任组长，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同时兼顾杂文方面的一些业务。

1957 年 1 月，《红楼梦评论集》出版，标志着我和李希凡合写

文章的结束。样书没有及时看到,我即下农村了解情况,准备多走一些地方。可惜天不作美,被洪水围困在山东微山湖。待我返回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已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公开批判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集团”了。我立即投入繁忙的反右派社会活动,连报社内部运动的事也很少参与。谁知社会上的活动刚告一段落,天刚转冷,突然从背后扔来绊人索,将我捆翻在地,搞得晕头转向,诉冤无门。罪名莫须有,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拿我来凑百分比,以便划运动胜利的句号。(关于此事,我已在一篇文章中有所追述,并将再写一长文叙述,故此处从略。)

政治运动,别人怎么批判我,尽管不愿接受,然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但,李希凡从小组会到大会,都一口咬定我是“混进共青团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忘恩负义”。使我非常恼火。我忘的谁的恩,负的谁的义?有一点真凭实据吗?在肃反审干中,只听说过有“混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没听说过有混进共青团的阶级异己分子”。团章规定青年满15岁就可申请入团,即使思想再不纯,还有公民权,当啥“分子”也不够资格。这是李希凡创造的独一无二的词。团员是党的后备军,但套用来一顶后备的帽子,实在稀奇,没必要。我们是老同学,彼此都了解,用这顶大帽子以示批判的深刻和彻底划清界线,太离谱。我当时心想,“说我是‘混进共青团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入团时你还没有入团呢,连这点‘混’的本领都没有,自傲什么!只这一句话,就把若干年的真真假假一笔勾销!

《红楼梦评论集》的出版,既标志着我们合作的结束,也标志着分手的开始。从此仙凡路隔,人鬼殊途。冠盖京华,他走他的阳光道;墨面河南,我渡我的奈何桥,阴山背后走一遭!

九

转眼又是5年。1962年春夏之际,我已过“而立”之年,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半“立”着由河南省商业厅调到河南省文联,任《奔流》杂志社编辑。李希凡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的下落,主动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北京正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作家出版社准备再版我们的《红楼梦评论集》,问我有什么意见。

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事。自从掉进“迷津渡”差点过去以后,我闭口再也不谈《红楼梦》了。曹雪芹在人生的道路上翻过跟头,因而大彻大悟,写出了千古绝唱《红楼梦》。而我由谈《红楼梦》进入文坛不久即栽跟头,方醒未悟之际,俗缘累身,欲再借《红楼梦》复出被勾掉之名,故慨然同意。至于彼此间的旧事,可以暂置一旁,半部著作权仍坚持所有。

再版修改的事我未具体插手,也没到北京来,只是在信中表示,应按一般再版的程序,作个别的文字改动。如过去涉及金圣叹的地方表现偏激,需有所补救,其余论点一律不动,以存历史的真实。李希凡修改完写了《重印版前记》,稿子我看了,签了名,时在11月。书正式出版于1963年3月,是为第二版。我的名字又正式出现在自己写过的书上,被别人讥讽的“半本书主义”仍然存在。

但是,我的想法又太天真了,社会上的偏见仍未消除。有的作者在重版的书或文章中提及此事时,我的名字仍为“等”字代替,仍属“等外人”(《红楼梦》中有“槛外人”之语),并没有因摘掉“右派”帽子而入“等”内也。倒是李希凡表现得慷慨大方,将作家出版社的重印稿酬240元左右和收据一并寄给我,用做搬家费用。很够意思!这在当时,还是顶用的,对于处在困境的我,是不小的支援。但是,到了90年代,他给我的“绝交书”中却旧事重提,说是如何背着组织和家庭支援我,以示我忘了旧情,对他不起。可是,他在盛

怒之下却忘了,那钱还有我应得的一半呢!如果要讲旧事,1954年未进文坛前,他经济上最困难,《文史哲》寄来的稿费他全用了。我说过什么吗?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世间常说人有“健忘症”,其实“健忘”的常是另一面,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大概永远也忘不了的。人到绝交时,居然念念不忘旧日的狗肉帐,已入市井之见,算得清吗?文人,文人,何清高之有?脖子上时时挂着“通灵孔方”也!

清朝早期,已经没落了的宗室英亲王阿济格的后代敦诚赠曹雪芹诗中有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我过去读此诗,也感到旧时代的世态炎凉,殊不知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有人以“残杯冷炙”为施大恩大德,可悲可叹!

古代未达时的贫哥们或贫姐们儿也曾相约“苟富贵,毋相忘。”我对这句话不大相信,证之以历史,从陈胜、吴广到刘邦,从朱元璋到洪秀全,都已从极贫极贱变成了富极贵极之人,谁作到了?恰恰相反,富贵的程度同相忘的程度正好成正比。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阔脸就变。”阔的程度同变的程度也是成正比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里也是如此。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文人都可算做穷文人。在“文革”前,即使极少数有三两万积蓄的文人,也算不得富贵人。但是,也不可否认,少数善于看风向紧跟的人,在政治运动中,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以真理的保卫者或化身自居,手拎棍子,四处出击,恨不得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打遍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虽不富不贵,然有权有威,令人望而生畏,若不慎被其一棍抡倒,也是很难翻身的。政抬运动中的群众斗群众,表现于文坛则是文人斗文人,一斗,贫贱富贵俨然“楚河汉界”矣,胜者焉能不骄不傲?文人之间的忽亲忽疏,忽远忽近,忽好忽

坏,忽敌忽友,大率缘此而生,非全由个人禀性也。这是历史的悲剧,每个人只充当了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角色,还够不上我负天下或天下负我的大人物,干嘛反表现出一副叱咤风云的英雄架势?

十

转眼又是十年,十年河北,十年河南。

1973年,“文革”之火仍炽。刚开始时,号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已经进行了七年,到底“底”在何处,谁也不摸底,茫茫复茫茫!不过,我已经随着河南省文联的“斗、批、散”下到底,在西华县西夏公社当社员三年了。

十年不见两茫茫,不思量却又思量。又是李希凡给我来了信。说作家出版社要再版我们的《红楼梦评论集》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还要重印胡适、俞平伯等关于《红楼梦》的书,作为反面资料内部发行,供参阅。但他没说此事的来头,只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接到这封信,比十年前接到那封信时,思想活动复杂得多。“文革”风暴,“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于曾有“右派”前科的人,日子更不好过,提心吊胆,靠边呆着,随时等候被揪出批斗。幸好,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主席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世人皆知当年曾有过“两个小人物”。我虽已入另册,但那段历史事实仍保留在毛主席的著作中,23年后得以见到,在精神上自然得到了支撑,稍有踏实感。好心的朋友也给我以鼓励和安慰,说我的问题说不定将来会有另外的解决。这当然只是幻想。这封信的确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我的作用。在群众组织林立相互斗争的时候,有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还想拉我支持他们那一派。我免除了被揪出批斗的恶运,也没有被抄家,反而跟着群众组织走过场,自由地读马列著作和历史书籍。一下乡,更逍遥。也凑巧,那附近就有个逍遥镇。是逍遥公社所在地。眼望逍遥,乐

得逍遥。李希凡的来信打破了我的逍遥游！

首先考虑的是要不要参加这件事。“文革”前几年，毛主席多次谈到过《红楼梦》，我都是听传达报告时陆续听到的，但久已无心于此，听了也就忘了。毛主席的信发表后，却引起了我的诸多回忆，并上书一封，陈述自己感激之情，检讨过去的错误，表示愿意好好改造。我明知这种一般平寄信件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的心意却表达了。毛主席的信是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发表的。既然“两个小人物”的史实仍照旧，那么，我作为其中的一个，理应参与旧作的重版，否则，等于对抗“最高指示”，吃罪不起。同时，在此以前，毛主席又谈过《红楼梦》，说要看五遍。社会上在大禁“封、资、修”的情况下，又可以公开读《红楼梦》了。我如果参加旧作的修改重版，就可以减少自己处境中的麻烦。

但是，我也有一个大顾虑。当时社会上偷偷流传着一份江青同美国人维特克谈话的记录稿。就是在那个记录稿里，江青坚决否定“两个小人物”的存在，肯定“只有一个人”。我如果贸然去北京，不是有点危险吗，那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是有毛主席的信在，李希凡要我去北京，恐怕也不是个人的决定。最后，下定决心，去，去比不去好。

从2月24日春节过后到4月11日之间，我同李希凡有三次书信往还，具体商量此事。我表示，对文艺方面的情况我不大了解，凡属思想理论上的问题由他决定，我只作具体的文字工作。李希凡同意，遂成行。4月13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直住到10月14日离开，整整半年的时间。

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夜，在李希凡家里，我们曾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时，李希凡已从河南叶县《人民日报》社的干校调回北京，站出来工作了，虽然对立面对他不怎么样，但他上边有线，非同小可，也奈何他不得。而我仍在河南乡下当社员，彼此身份地位

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一样。

李希凡说:“出版社原来只同意由我一人修订旧作重版,我不同意。书是两个人写的,如果只让我一个人署名,宁可不出。”我认为这话说得够意思,是想拉我一把,对处境将有所改变。事实证明,他说的话是有根据的。我后来在出版社的楼上看到过三份打印的出版计划,在《红楼梦评论集》项下“作者”一格,分别印为“李希凡”、“李希凡等”、“李希凡、蓝翎”,说明其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李希凡说:“过去,我和何其芳在文学典型问题上有争论。他的文章很容易发表,我的稿子还要中宣部的一位处级干部审查,很注意删掉一些表现态度的词句,太不平等了。现在要公开回答他,把事情彻底讲清楚。他要回答,也不能那么自由了。”所以,在修订的过程中,李希凡才写了那么多同何其芳算总帐的文字,口气也着实不客气。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李希凡有部分相通的心声。这也是有来由的。

1957年的《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发表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1959年压缩为该社新版《红楼梦》的序言;1963年单行本再版。此文公开发表前,曾由文学研究所打印分送,并召开讨论会。我们被邀到会。我在会上发了言,认为人物名字的流行,可以看做一种社会效果,但不能作为判断文学典型的唯一尺度,并举出了武大郎、马大哈作例证。(李健吾还插话,举出了姜太公。)1957年第1期《文学研究》(即现在《文学评论》的前身)摘要报道了我的观点:“蓝翎分析了人物流行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认为何其芳对这两方面都作了简单化的了解。艺术效果可以是评价人物的出发点,却不能当做结论。他认为何其芳片面强调的结果,成了‘共名论’。”不客气地说,在当代“红学”史上,我当属敢于同何其芳发生争论的第一人。李希凡同他的分歧,则发端于此前的关于阿Q典型性的

争论,进而引深到关于《红楼梦》的争论。

但是,历史往往不是一次就显示了它的全貌。当时我们收到的何其芳的打印稿只有正面论述《红楼梦》的前八章。以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却多出了后边的五章,全是批评当时评红文章的观点的,包括“市民说”和“农民说”,批评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我不久即入另册,已无兴趣于此。这次为了修订旧作,才把这些资料找来看。如果当时收到的是全部打印稿,我是绝对不会去参加讨论会的,即使去了,也不会单讲什么武大郎和马大哈,当说别的了。当然,这还限于观点的不同,可以各有其说。但是,最使我感到屈辱的是,在他这部著作不同版本里,凡提到我的名字的地方,依次印为“李希凡、蓝翎同志”、“李希凡等同志”、“李希凡同志等”、“李希凡同志”。我虽然不是“同志”了,但仍是公民,仍有自己的著作权,怎能用这种方法将我的名字一笔勾掉?这是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吗?如果说李希凡是想借此机会以了同何其芳的夙怨,那么,我则是为自己争“名”,表示历史的客观存在。

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旧作,并非轻松愉快的事,对周围的环境必须有一定的戒心,对接触的人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李希凡告诉我,报社和出版社的情况都很复杂,派别对立,军宣队也管不了,因此,要少走动,专心干自己的事。李希凡仍坚持日常工作,隔几天到出版社来一次,我有时晚上也到他家里去。基调由他确定,具体的工作由我来作,但也不像过去合作时的融洽无间。

出版社的工作条件太差了。招待所在办公楼下,一个大房间,摆满了床位,人来人往,干什么的都有。洗洗涮涮,会亲友,购东西,收拾行李,白天干不了工作,晚上睡不成觉。我只好躲到阅览室工作。好在不久就搬进了院内旧平房院的小房内,住两个人,才算稍微安静些,能坐下来工作了。

出版社分管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是老作家严文井,他刚“解放”不久,从干校调回来的。他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20年未见,竟“自报家门”。我却仍认识他,深表感谢。具体负责日常和我们联系的是杜维沫和王思宇,老熟人,热情相待,工作严肃认真,又非常客气,因此心里踏实许多。

我将260多页近18万字的旧作,剪贴在一大摞八开的新闻纸上,自己先在文字上修改一部分,交给李希凡,等他修改后交回来,再给他另一部分,并把他修改过的再看一遍,然后交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并不动手,只把有问题的地方贴上铅笔纸条,共同商讨后再由我们改。双方流水作业,定稿一部分就发排,看校样,工作认真,一丝不苟,技术性的差错很少。直到看完二校样,才知道比旧作多出100多页近10万字。那么,修订本都有哪些重大变动呢?概言之如下:

第一,既然是以“文革”时流行的思想观点审视旧作,不合尺度之处自然很多。不修订不行,但又不能全改。如关于“人民性”、“人道主义”和“人性”等问题,只好作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并在文后的“附记”中作些检讨或说明。又如,一些不合时宜的引文(如别林斯基、杜勃洛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尽管删去。但是,这个大前提就错了,一改已非本来面目,且似乎有“超前意识”,难免有欺世之嫌。而在这个大前提下所增强的“战斗性”,其实就是大批判式的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批判,和旧作的精神大不一致了。这些变动,不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不出来,了解历史情况的人一看便知,变历史戏法也。理论文章能像狗皮袜子那样反穿正穿都可以吗?

第二,在部分文章的后边,共增加了九条“校后附记”。其中有几条具有自我检讨的性质,或是必要的情况说明,或是同别人(如周汝昌)商榷的。这有的是我起草经李希凡修改,有的是他起草经

我修改,都未署名。另几条是涉及到何其芳的观点的,都是李希凡起草的,并单独署上他的名字,这是为了将来万一争论起来,不把我牵扯进去。这些文字我都看过,也改动过个别字句或笔误,但基本观点则一字未动。然而我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第三,书前增加了一篇长达 46 页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场尖锐的斗争》(代序)。这是我利用改稿看校样的空闲时间,边读书边起草断断续续写成的,企图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概括地梳理自《红楼梦》产生以来,围绕它所展开的文学研究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 18 世纪的脂砚斋讲到 20 世纪的 30 年代。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代小说的“续书”现象,估计一般读者看到的机会很少,所以对《红楼梦》的多种“续书”说得较详,也把这作为阶级斗争的现象看待。如果在“文革”后把这些材料写成红学小史,可能还有点历史参考价值。但写于那种阶级斗争疯狂的时代,自己已是被阶级斗争斗倒了的人,思想上仍然中毒如此之深,当然就无可取了。

第四,书后增加了一篇长达 42 页的《三版后记》。“后记”开头的部分是我起草的,先讲明我们走过的路,写了 1954 年合作时及以前的情况,至于引起后来的变化,“皆为始料所不及”。写完这句话我就停笔了。李希凡问:“怎到不往下写了?”我说:“再往下写就该骂我自己了,何苦呢。”他说:“好吧,我继续往下写。”以下都是他分小标题写的同何其芳的争论,我一点没掺和。最后由他个人署名。但是,其中有一段话,出版后遭到一些人的误解,认为李希凡不够朋友,公开和我划清了界线,说什么“蓝翎有他自己的错误,1961 年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对此后的一些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参与我和何其芳同志的争论。”其实,这话并不是李希凡写的,而是我为了日后的设身处地加在他原稿上的,免得将来何其芳把我捎带上,使自己的日子更不好过。李希凡为此受屈,实在抱歉抱歉!

以上讲的都是大要,还有不少小地方,无需要多费笔墨。但我敢以人格保证,我讲的这些话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修订本的全部原稿,现在仍保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发稿档案柜里,那是白纸黑字或蓝字或红字的铁证,有的还是用“永不变色”的墨水写的。

十一

《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于1973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从前两版都是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这次改变了规格,提高了一个档次,且分平装和精装两种,印刷质量超过了前两版。原准备与此书同时出版的还有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因该书增补太多,直拖到1976年4月,才分上下两部分出版,并有大字竖排的线装本,为红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版本。

“文革”伊始,郭沫若为了表示坚决拥护,说他的书应当全烧掉,然“文革”来了个消灭封、资、修的全面大焚烧,没有烧掉的也不敢流行了。新书出版困难,旧书重印更困难,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旧作的重印,尤其困难。我们的旧作之所以能够修订重印,当属“特恩”允许,但我至今也不清楚究竟是谁最后决定批准的。那时社会上正广泛地兴起评红热,此书又以“新姿态”参加进来,用当时的眼光看,作者都又站起来,属于特殊待遇的人物了。

但是,对我个人说,似乎什么也没带来。在出版社,掐算着工资和粮票过了半年困难的日子,谨小慎微,唯恐出事,最后只得25本新书,仍回河南农村当我的社员。要说有收获的话,就是在出版时得以会见或结识了一些新老作家,如陕西的魏钢焰、辽宁的李云德、天津的蒋子龙、湖南的罗石贤、河北的宫克一、飞雁,以及后来成为红学家的周雷、胡文彬等。尤其是已故的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多年难中重相见,仍以厚情慰我,待我如小弟,闭门谈红,且亲自下

厨房掌勺,以拿手的炒肉丝和仿曹家的“老蚌怀珠”鱼相赏,令我至今难忘。

评红热遍神州,评红资料铺天盖地。仅我看到的有限范围,有时发现,自己仍在“等”外。更令我不愉快的是母校山东大学的一些校友。1973年,《文史哲》筹备复刊,知道我们正在修订旧作,于是派中文系的教师,我们的同窗老友袁世硕专程来北京向我们两人约稿。我们念在旧情,将“代”序和“后记”两稿都交给他。但他非主事人,回去交差完事,而复刊的第一期却选登了李希凡署名的“后记”,显然认为登我参加写的稿子不合适。这是不念旧情的势利眼,用着校友的名字时,把你摆在台面上为母校争光,用不着时,让你一边凉快去吧!事后一想,好事,免得“文革”中招害人也,没欠下愧对《文史哲》读者的良心债。

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都有不同见解的争论。这些争论,对于文学本身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和政治斗争直接搅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文学本身的发展,且会对暂时被权势压倒的一方带来种种厄运,而使后来者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评价历史,作出更符合事实本身的公允判断。历史证明,对不同的文学见解,只有采取“百家争鸣”的方法,才能真正促进文学本身的发展和繁荣,舍此,则有百弊而无一利。

我和李希凡合写前两篇文章的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先生不同的学术见解,并无别的意图。但却因此而被卷入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龙卷风,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使年轻的作者出了名,走向了文坛。然而,时过20年,作者都已过了“不惑”之期,却并未真正“不惑”,出于迎合“文革”的需要,又自觉地重改此二文和那本书,能够原谅吗?“文革”之后,人们常批评刘大杰不应该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旧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本是他壮年时写的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专著,曾经受到过

毛泽东主席的好评，一修改，也就埋葬了这部著作，成了悲剧。与之相比，《红楼梦评论集》的修订出版，不是很相似吗？而人们却给了过多的宽容，很少公开提出批评，为什么？作为当事者之一的我，内心是难以自安的。这样的错误，绝不是仅仅用什么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或教条主义，就能把历史责任轻轻开脱掉的，至少是作人有亏有愧吧！如今又过了“花甲”，如不趁思想尚清晰之时进行反思，不知哪天，“悬崖撒手”，离开人间，那将不仅抱恨终身，世外难以真正安息，也会受到后人的责难的。

我写其他文章的时候，心情一向是愉快的，而写此稿时，则心情相当沉重，为了减轻思想上的负担，又不得不如此作。今年恰是《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40周年，不知文学界或红学界会不会有什么举动？我放下别的事赶写此稿，也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半本书”40年的遭遇写出来，从文坛的一个角落看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自己是个极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但我经历的却又是急风暴雨，时代使然。因此，我有意地回避对某些事件和某些人的评价，只尽量客观地提供事实，让别人去评说。

我写的虽然是个人的经历，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李希凡，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实在没有办法。“文革”后我从河南调回报社，又同他共事多年。他调出报社后，由于我的一篇杂文《变脸》，受别人挑唆，来信将我痛骂，表示彻底决裂。即使如此，我回顾历史时，仍据实而写。至于他有什么看法，写出了什么文章，那是他的自由，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京剧《四进士》里的宋士杰说得好，回家吃得饱饱的，准备打一场热闹官司也。打官司也是如今文坛的热点之一，不管是大人物或小人物。但是，打官司总比大批判强，棍子派不上用场。其实，文学史上的一切争论，也可视为打官司，但裁决者不是法官，而是千古的人民群众。有理者是不会怕人民的！

□李希凡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关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辩正

1994年10月初，我收到了《黄河》编辑部谢泳同志的一封信，及载有蓝翎的《四十年间半部书》（以下简称“蓝文”）长文的1994年第5期杂志。我以为，在“蓝文”刊出之后，才向我宣布：“论战双方有绝对平等的权利”，这是明显地迫我应战了。看来，于情于理，我都已别无选择。

我与蓝翎实在算不得是什么“论战”的双方，“论战”什么呢？难道是为了争夺毛泽东主席曾经表扬过的我们那两篇文章的“发明权”？！抑或是分割我们“儿童团时代”合写的那本《红楼梦评论集》的著作权？！难道年过花甲的白首老翁还要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非把年轻时合写的著作撕扯成一人半部不可！难道不这样作，就脸上无光，心里闷得慌，“愧对历史，像在人世走一回”（引自“蓝文”）？不知为什么，心中挥之不去的苦涩，竟让我想起了唐·吉珂德与风车的那场大战……

通读“蓝文”，不胜感慨，我终于读懂了这40年间埋藏在他心底的恩怨是非究竟是为了什么；也终于读像了那或许应称为“蓝翎情结”的真正内涵。那不加掩饰的、深深的怨和恨，溢于言表，令人触目惊心，仿佛社会也欠了他的债。强烈的欲望使他“介意”的事太多太深，似乎一辈子心理都难于平衡，不平衡又要求平衡，求平

衡总要找出气筒。只不过我以为,蓝翎既已自觉一生都在“真真假假”中挣扎,那么,在这“最后”的平衡中,总该真而不可再假了。令人遗憾的是,蓝文在涉及我与他的部分,还是在搞“真真假假”的把戏。精心编造了不少似是而非的“事实”与“情节”,回顾历史之名,行泄私愤之实,贬损别人以抬高自己。真可谓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直面蓝翎之所为,我只想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靠空言和编造,而靠真凭实据,“辩正”与我有关的事实真相,以正视听;并立此存照,留待有心的人们去公正地评说。

关于两篇文章和一部书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百年诞辰,我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一篇题名为《遥远的记忆——关于毛主席和我二三事》,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缅怀毛泽东》(上卷)里;另一篇《毛泽东与〈红楼梦〉》,是答记者问的形式(也是回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同志的提问),辑在《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一书中。《中国文化报》和《红楼梦学刊》先后转载了以上两文。它们也同时辑在我个人的文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1993年1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里。这两篇回忆性的文字,在所有涉及蓝翎的部分,我自问均符合“客观、理性、公平”!“对事不对人”的风度,也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对此敢负“历史的责任”。

在《遥远的记忆》一文的开头,我写过这样一段话:“……但无论我怎样富于幻想,也从没有幻想过,因为写了两篇文章而为毛主席所重视,并掀起了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对此,近十年来已有了太多的海内批判和海外诽谤。然而,于我来说,往事总是美好的。”

读了这篇文章或读了这段引文,恐怕任何思维和心态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读出蓝翎是“挂空名的作者”(见“蓝文”)这层意思来,而只会认定那是李希凡个人回忆毛主席关怀他成长的文章。何况,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多次提到“蓝翎”的名字,谈到我们的合作,万万没有料到,这样几句话,也能致蓝翎“死不瞑目”(见“蓝文”)的“悲愤”,实是难以理喻!如果不是因为活得太寂寞,蓄意要制造点耸人听闻的“事端”或说是“轰动”效应,又当做何解释呢?

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到的“两个小人物”是人所共知的史实,《红楼梦评论集》前后三版,书上都赫然印着两位作者的名字:李希凡、蓝翎。现在又有著作权法的保护,蓝翎大可不必为什么——“我是附骥尾以增光的人物”,是“沾了李希凡的光,没有他,我写不出那两篇文章来,没有我,他必能写出来”,“直到今天,‘一个’和‘两个’的问题,似乎仍然模棱两可,有说‘一’的,也有说‘两’的”等等的“扯淡逻辑”(引自“蓝文”)而唠叨不休。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人们早已淡忘了,没有兴趣了,何苦非要为“一个”还是“两个”“正名”一番!自己煞有介事,别人不以为然,岂不貽笑大方?是自己的孩子,谁也抱不走的。至于世人的所思所想,那可就是神仙皇帝也勉强不得的事了。人的一生可作的事很多,实在没必要如此小题大作,把自己那点陈谷子烂芝麻的事看得太重,疑神疑鬼,搅得自己这么不得安生。

给蓝翎搜寻到的“一个”或“两个”的证据,还有香港刘济昆君《中国文坛游记》中对我“专访”时的两句问答:

刘:“您和蓝翎合写的评论《红楼梦》的书主要是谁执笔的?”

李:“那本书第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其他是蓝翎写得较多。”

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当时回答刘先生的原话是:“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是我写的,其他是蓝翎写得较多。”我在读过刘济昆君的“专访”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提出了他文中有几处疏漏与不

够准确之处,也包括这句“是我写的”。刘先生表示,再版时将给以弥补。一位记者的“专访”,出现一些错处或有所发挥,本是寻常之事,似乎蓝翎自己也吃不准那句话是否准确,不得不说上一句——“这里不排除访问者记录有误的可能”、本来还不能确定“事实”本身,却先来兴师问罪,岂不令人费解?为了这点事由也要“死不瞑目”,不是太轻贱自己了吗?

说《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主要是我写的,讲得虽冒失了些,但也是据实而述,倒是后半句“其他是蓝翎写得较多”,蓝文虽未提出异议,那却是一句客气话。现在翻开《红楼梦评论集》的目录,细看那 17 篇论文的题目,认真回忆起来,除王国维那篇有特殊情况,未及写出初稿外,其它文章我自问做的工作并不比蓝翎少。既然这句话已被蓝翎“咬住”不放,而且他对我们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又讲得那么“多”,那么“细”,那么“头头是道”,我也只得讲讲不掺假的真实情况,并介绍点实际材料,也好去伪存真,对“历史”有个交代。

(一)《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写作经过,“蓝文”明示,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是他看到的,是他谈起的,而我那时“只有一部提失了书皮的旧本《红楼梦》,还是研究生班的同学借给他的,此外什么资料也没有”。然后又描绘了一番他自己如何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写作。其潜台词无非是说此文是他写出来的。甚至追溯到他在山东大学中国文学史终考中回答《红楼梦》一书的性质时,就不同意“自传说”,同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不大一样,并说冯沅君先生给了他 91 分的高分。恕我直言,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包括 1954 年合作写批评俞平伯先生的那两篇文章时,都未听他谈起过,真是高才不露!至于说“同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不大一样”,我就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冯沅君先生,“淦女士”也,是受鲁迅赞赏的一位 20 年代的大胆而敢言的女作家。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冯

先生,艺术感觉之细腻,在山大是有口皆碑的。冯先生虽已逝世多年,但我们同班的大多数同学还健在,恐怕也还没有人患上“健忘症”或“老年性痴呆症”,反正我没有听到她有《红楼梦》“自传说”的“讲授”。

蓝翎为了渲染我时无书籍,无资料的困窘之境,甚至连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部的所在地,都描绘得十分荒凉凄清,真可谓“心思细密”!但他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是解放后既有老区传统又是新创办的全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它不仅拥有众多的在国内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几十位苏联专家在教课。“在西直门外荒僻的四道口”,刚刚建起的环形四面楼,是新兴大学的教学楼,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建筑物。它就是今天的财政金融学院。不要说图书馆,就是阅览室,也有几百平米,摆满了全国出版的报纸和学术刊物,载有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简论》文章的《新建设》杂志,我就是在阅览室看到的。不能因为我是个穷研究生,连我的母校也要受牵连。在学校里,我们的精神食粮很充实,马列主义原著,都是学校发的。对于这样的学习环境,蓝翎现在这样贬它,当时他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呵!蓝翎几时到过我们的图书馆?难道堂堂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部的图书馆还不如一个工农速成中学的小小图书室?说这话也不嫌牙碜!至于什么他在北京图书馆内办借阅证了,能借线装书了,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我们倒是有过借阅证,只是时间得推移到1954年10月以后,那是我们应邀到北京图书馆“讲演”,提到过去借阅困难,丁志刚老馆长请图书馆发给我们的,是特殊待遇。一个工农速成中学的小小教员,当时能在北京图书馆办这样的借阅证?果真如此,就不会有黄肃秋的文章(黄文说俞先生“垄断”,自然是过分——笔者)了!当时我是真坐过北京图书馆的,能借什么,不能借什么,我一清二楚。在这些问题上编故事,只能弄巧成拙。

为了编造得像真的一样,“蓝文”连我当时写作用的笔记本的颜色,他用的稿纸的样式都写到了,却唯独把那些重要情节遗失了,“真事隐去”了。譬如:关于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学观点,我们曾议论过多次,据我的记忆,第一次提出俞文时,蓝翎尚未看过。议论也是有内容的,没有共同的观点,没有提出一个粗略的提纲,只像“蓝文”所叙述的那样:他说到“俞平伯先生的那篇文章”,我说:“我也看了,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什么观点——笔者),于是,我提出了“合作写一篇文章怎么样”(当时到底是谁急着想合作?——笔者),就由他去“起草初稿了”。如果真这么简单,这算什么合作?那干吗要合作,他蓝翎自己写就是了。为了证明他这段“故事”的真实性,蓝翎还拉出我妻子作在场的陪衬,这都是无中生有。我妻子当时已近临产,正在家病休保胎,已不外出,而且她是国家机关团委的干部,文学讲习所隶属中直团委,完全是两个系统,她去讲习所干什么?

(二)资料当然要查阅,但学术观点的形成更要靠长期积累,这是常识,何用嚼舌!关于四部古典小说的历史评价和研究论著(也包括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我在大学时就读过,早有不同意见,而且对于《水浒》的评价问题,我是在大学毕业前就着手写商榷文章了。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1954年第4期发表的,是我同张政烺先生商榷不同看法的《略谈〈水浒〉评价问题》,文末注明着“1954年元月重改于北京”(见拙著《弦外集》第122页)。在批评俞先生“红学”观点的那两篇文章发表前后,我同茅盾同志、宋云彬同志商讨不同看法的《〈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读豹子头林冲》、《〈水浒〉的细节描写与性格》也陆续在1954年度的《文艺学习》、《文艺月报》上发表了。按照蓝翎的“扯淡逻辑”,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一点资料没有,这些文章岂能写得出?而且我不知道,在我们合作前,蓝翎曾单独发表过任何谈论中

国古典小说或是别的什么文章。

(三)《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我说了“主要是我写的”，而没说是我起草的，这也算不得对历史不负责，而要影响到“死无对证”。合作本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撕扯不开谁占多少份额的。我在回答刘济昆君时未及深思脱口而出，说了这话，也毫无必要。不过，既然说出了，总是言出有因。我自以为，在改写此文时，我阅读资料，梳理观点，增补内容，扩充题旨，都是下了大功夫的。“蓝文”不是说，他只写了不到一周，在我那里却耽误了近两周么？人不是机器，我又要上课，又要蹲图书馆查阅资料，改写文章，近两周就有近两周的“劳动量”。笔耕者的收获与欢欣尽在其中，这用不着多解释。

“蓝文”特别强调对此文的“最后一道工序”，写得很细。还特别表明，“比写初稿进行得慢”，其意无非是我的二稿给他造成了困难。他这“最后一道工序”，究竟改了多少，过去我没有注意，幸好“蓝文”所谓的那个“字体不规整”“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本还在，我特别对照铅字本仔细勘察了一遍，的确有润饰，有修改，但在这篇 9000 余字的长文中，不过二三百个字而已，结构、观点则根本未改，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加炫耀之处。

顺便说几句，我的笔记本纸张很粗劣，是黄皮并非黑皮，现在皮已多半不在，但其余均保存完好。这个笔记本留有三篇论文的初稿：第一篇是我个人的文章《试谈巴特曼诺夫的形象创造》（曾获得中国人民大学 1954 年暑期论文比赛二等奖）；第二篇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二稿；第三篇是《评〈红楼梦研究〉》二稿。这个笔记本上我们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篇文章，都留有蓝翎修改的潇洒的笔迹（只不过字体虽好，写在这个笔记本上也一样不规整）。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二稿中，除我改写的，凡要成段采用蓝翎初稿的，有两处均注有“参考草稿一段加上”和

“见原稿”。如果必须证明蓝翎的“最后一道工序”才是珍品,那就请蓝翎把他的16开的白光连纸初稿拿出来,和这“密密麻麻”笔记本的二稿,以及铅字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看看究竟哪一稿更充分、更坚实。但我想,这同“对历史负责无关”,现在的读者也没有兴趣搞清楚这半本书或一本书主义。自然,《黄河》编辑部如想发表,我可以提供原件。

(四)关于《评〈红楼梦研究〉》,“蓝文”一再摇头慨叹,说了一段话:“我写完初稿即回山东,临返京前老家发大水,断了交通,只得绕道河南省,经开封到郑州转车返京,已9月初,学校上课两三天了。李希凡什么时候修改完寄出的,我已记不清了,更不知道改动的具体情况。及至刊出,才发现他补充最多的是二、三部分,后边没怎么动,不仅全文结构比例不匀称,文学上也很少加工。后来在作协召开的大会上,新华社一位跑文教的记者对我说:‘我喜欢第一篇,这篇有的论点没讲充分,文字也较差。’我淡然一笑。怎么说呀,说什么呀,不好说嘛。少一道工序也。”

“儿童团时代的文章”,当然有很多缺点。第一篇就那么好?冯雪峰同志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前接见我们时就曾说过:“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我当时很同意这个批评,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过:“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以上引的这两段话,均见拙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第101~102页)。第一篇的论点就真充分展开了么?人责有自知之明!

《评〈红楼梦研究〉》的确没有写好,责任在我,我没有梳理好观点,加重了一稿堆积材料的缺陷,改写时也没有找好中心思想的贯串。在1954年给《文史哲》编辑葛懋春的信中,我也曾谈到“此文写得太粗率”。但那位新华社记者未看重它,毛主席却没有轻视

它。对此文批语最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卷 511—512 页)。我认为,它虽然粗糙一些,但比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毕竟资料丰富了些,观点也展开了些,而且联系了胡适的主观唯心论,也把论争的意义阐发得更深刻了些。人总是从“儿童团”开步走的,有经验教训都可以总结,却没有必要以今天的“高明”另有用意地为当初的“走法幼稚”而后悔“自责”。

当然,蓝翎发了那么多一摇三叹的感慨,无非是要证明,此文的一切缺点,都是因为少了他“最后那道工序”。果真如此吗?他真不知道我改动的具体内容吗?我不想给他扣上什么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帽子,夸大其词,没什么意思,但也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这次重看我那笔记本上的二稿,我看到了蓝翎的十余处改动,俨然在册。白纸黑字,《评〈红楼梦〉研究》恰恰并未少了蓝翎那道工序。为了帮助蓝翎“回顾历史”,不妨举几个改例:

(1)加引了《红楼梦》第一回的两句引文:“其中虽大旨不过谈情,亦是实录其事。”

(2)在“反对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下面,加了“反对世俗的金玉良缘”。

(3)把不通顺的“我们在批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曾经给予批评”一语中的最后几个字改成“曾有过详细的论述”。

(4)把引用胡适谬评《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的引文用笔勾去,移至最后一段,并大字标出:“删去。”

好了,不必再引下去了。据我看,这几处改动,使有些语句更明晰了。我承认,我那时语言文字上不如蓝翎生动、精炼,但我也喜欢他在学术论争的文章中使用杂文笔法,凡我看到的,总归要改掉。所以,我认为,《红楼梦评论集》中的多数文章,更接近我的写作、论战风格。

回顾历史,应实事求是。不要先找一个假设性的理由,(这不

曾经是我们对胡适的批评么!)见到一根稻草,就赶紧抓住,然后发挥想象,把自己送到宝塔尖上,把别人踩到烂泥堆里。我看,蓝翎最好是到北京图书馆把那寄到《光明日报》的原稿拿出来,郑重其事地核对一下,那是不是李希凡的笔迹?究竟少没少他那道工序?不要像变戏法那样,自己抹了一脸粉,转过头来却是满面黑。反正我的笔记本上保留了蓝翎那道工序的笔迹。

我本无意撕扯这些旧帐,也是撕扯不清的。拿笔杆的人,谁靠谁,谁沾谁的光,都是长久不了的。其实,办法简单得很,那就是拿出比《红楼梦评论集》更好的“一家之言”的著述来,以证明自己独立的价值,它就会使得万喙俱息。否则,空口说白话,发牢骚骂街,都是不顶用的。我相信蓝翎是有才能的,只是迄今为止,他所自诩的“大量占有资料”的研究力作,我尚未看到。刘济昆君曾问起我,蓝翎的代表作是哪一本?我看过的只有三本小书,实在拿不准,只说了一句,大概是《了了录》吧。

(五)关于《红楼梦评论集》三版的问题,“蓝文”讲了很多,又是我打破了他的“逍遥游”了,又是揣测“上面的精神”了,又是“良心”谴责了,总之,讲了一大篇。我的回答只有三点:(一)我同意蓝翎的意见,它已“死去”,因为它是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下修改的。从我来说,是受批斗搞乱了思想,急于同所谓“文艺黑线”划清界限。本来历史就是历史,不应该也不必要对过去的论文进行重大修改。(二)其中夹杂着我的“私愤”,主要是对何其芳同志一些观点的批评,既不适时,也不应该,因为论战双方并不平等,何其芳同志当时无法答辩。(三)该书“三版后记”是我个人署名的,蓝翎曾提出共同署名,我考虑到何其芳同志反批评时会给他带来难处(面并非“蓝文”现在所说的,他改了几句,要撇清自己)。各文“附记”,都是我起草的,虽有蓝翎的改动,但责任在我。《红楼梦评论集》三版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文革”后已受到尖锐批评。另作三点

说明:(一)请蓝翎来京改书,我不知道有什么“上面”的精神,是出版社找我,叫我修改。我提出,两个人的书,两个人修改,我不能剥夺蓝翎的权利。出版社曾要我个人出面邀请,我认为这不符合组织手续,蓝翎凭我一纸书信也请不下假来。我找了严文井同志(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请出版社出公函邀请蓝翎来京改书。(二)凡我的事,蓝翎都要拉上什么“非同小可”的“上面有线”,现在牵涉到他了,就又出了个“上面的精神”。我明确奉告,从来没有人向我交代“上面”对蓝翎有什么精神。我看还是不必自作多情啦!两次再版,两次改书,都是我李希凡的“精神”,从来没有任何人“指示”什么。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李希凡从没有忘掉这是两个人的合作成果,有些人的所谓“李希凡等同志”、“李希凡同志等”,对我没有产生过影响。(三)错误就是错误,都和“良心”挂钩,那也不符合事实。蓝翎当时对《红楼梦评论集》中17篇论文的修改稿,也包括他起草的代序《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场尖锐的斗争》,都贯串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也很切合“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精神”,正如“蓝文”所说:“修订本的全部原稿,现在仍保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发稿档案柜里,那是白纸黑字或蓝字或红字的铁证,有的还是用‘永不变色’的墨水写的。”如果蓝翎认为,这也是他“违背良心”写的,那他可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一生真伪复谁知”了!

关于“抖囊脚”与“鲜花和受奖”

蓝翎认为,他与我的合作“纯粹出于历史的偶然”,我也有同感。不过,既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那偶然的合作便早已汇流到历史的必然中去了。当事人“据实而写”的回忆录,向来极受社会的欢迎和称道,但打着“对历史负责”的幌子,歪曲事实贩私货,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个人的经历或说历史,是客观生活的真实记录,它决非可以凭人主观臆造、随意编排的“故事”,也绝对容不得别人去任意修改涂抹。因为那些伪造的细节与小事拼凑起来,也必然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格格不入。而本文与蓝文之辩正,自然也无法脱离那些被不厌其烦编造过的细节与小事。如前所述,蓝翎为了强调在合作中他那道“工序”的至关重要,极力渲染我的“学历不高”和才疏学浅,以示“接受鲜花和受奖的人,恰恰是出力最少的一位”(引自“蓝文”)的不公道,甚至还越俎代庖地写了我的简史。与其让人别有用心地胡乱编排,还不如自己真真实实地写出来,也好与“蓝文”两相对照,避免将来“死不瞑目”的遗憾!

解放前,我的确有着一段辛酸的生活经历。我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华北不久,家中的经济支柱——父亲得了中风偏瘫,大哥和大姐又都去了“大后方”参加抗战,二哥患脑膜炎病逝,家里只剩下老弱的父母、二姐、我和幼弟。那时,我刚考入通县潞河中学上初中,为家境和生活所迫只得辍学,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到处谋职业找饭碗”。先后在北京华宝西服店当过学徒,在白纸坊印钞厂作过童工,在石家庄市图书馆作过图书管理员。……抗战胜利了,给我带来的仍是贫穷和失业,我梦想上学而无门……1947年,我为了求学来到青岛大姐家。青岛解放后,军管会文教部长王哲同志(“文革”前曾任山东省副主席)亲笔写信送我上了济南华东大学。1951年,华大与青岛山大合并,我继续在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又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班,先后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和哲学研究班学习……我想,也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才对使祖国和自己获得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有着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感情。

我在青岛姐姐家寄居的两年,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47—1949年。我一方面在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课

程,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一方面笔录姐夫赵纪彬的著述。而并非像蓝翎所描述的那样:“料理家务”“抽空旁听”,这种本末倒置,大概也是他贬人的小花招吧!我一个刚满 20 岁的毛头小子能料理什么“家务”?不过是扫扫地、买买菜,送外甥去幼稚园而已!至于烧饭之类的真正的“家务”,从来都是姐姐做,老实说,我至今尚未学会。

当时山大文史系主任是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他是赵纪彬的挚友。因此,我很受优待,他发给我的旁听证,既是免费的,又是凡文史系的课程都可以去听。两年间,我听过的课程有:杨向奎的中国古代史、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丁山的古史考辨、陆侃如(古代部分)和冯沅君的(中古部分)中国文学史、萧涤非的魏晋南北朝诗、殷焕先的《说文解字》、赵纪彬的哲学概论等等。学得好与不好,另当别论,借一个时髦的词儿,当我上山东大学中文系时,虽是“不高的学历”,却有着学习过大学文科许多基础课程的“含金量”。

一个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最好免开尊口。赵纪彬根本不是“蓝文”中所说的历史学家,也从没有教过历史课,更没有做过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只是在解放前夕,因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被地下党护送到胶东解放区。青岛解放后,又随军管会返回山大,担任过山大校委会常务副主任。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有与侯外庐、杜守素等合著的《中国思想返史》,他自己则著有《论语新探》、《哲学概要》、《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困知录》、《困知二录》等哲学与思想史专著;前几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赵纪彬文集》。他的《论语新探》曾受到毛主席的肯定。他还是 1924 年的中共党员,在 20 年代就领导过濮阳、内黄地区的农民运动。30 年代初,曾担任过河北地下党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开始,转向文化工作,曾以“向林冰”的笔名参加过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论争,代表一派意见。他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在百科全

书中留名。以蓝翎的“博学多才”，真不该把他是哪方面的学者都弄错的。赵纪彬的生活道路虽然累经磨难，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自学成材，在40年代就已应聘为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教授。他曾希望我靠自学走他的路，可惜，我的志趣在文学。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思想引路人，而他的大量藏书，也使我有了探求传统与革命文化新知的优越条件。我终生都要感谢他，不是因为有机会到他身边，还不知会走上什么道路，说不定也会像有些人那样，为生活所迫，或上当受骗，跑到什么三青团或青年军之类的去处“找饭碗”了，给自己的历史抹黑。

赵纪彬因长期坐国民党的监牢，患有神经质的手颤症，这就是他的著述需要口述由我笔录的原因。我笔录过他的《论语新探》、《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中国思想通史》中他执笔的有关章节，以及两本《困知录》中的部分论著。作他的笔录，对于我这个“学历不高”的年轻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它强迫我必须去熟读中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赵纪彬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著述都是在夜间进行，经常要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但也正是这“笔录”，为我奠定了古代文史知识的根基。因此，要讲读书、修养、积累，在山大入学时，有高中一年级“高学历”的蓝翎，要差得远呐！

“蓝文”说，在我们的合作中，我无书籍、无资料，甚至说我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这种贬人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姑且不说，我若无资料积累，何由而产生对俞文的不同意见（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破旧的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那是我人大哲学班同学张钊当时送给我的）；何由而有《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前面的概括和后面的“补充、改写”？说实话，讲读马列，并非自我吹嘘，早在蓝翎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报效”的1947—1948年，

我就大量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如《资本论》第一卷、《剩余价值学说史》、《马恩文选》两卷集、《列正文选》两卷集、《斯大林选集》(马恩列斯选集均系时代出版社出版)、大连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前辈革命学者艾思奇、胡绳、许涤新、薛暮桥、王亚南、于光远的有关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的专著。在文学方面,1948年,我就已读完《鲁迅全集》(第一遍),以及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和胡风的1948年以前的全部文艺论集,我的老师吕荧的《人的花朵》。而茅盾、老舍、巴金小说,田汉、曹禺的戏剧,则在我“找饭碗”时,就已读过。至于四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也包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远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是我的读物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阅读的进步刊物,是每期都送给赵纪彬的臧克家主编的《文讯》、胡风主编的《七月》,而苏联革命文学,更是我狂热搜寻借阅的对象。为此,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毕中杰同志(现已离休,在北京),曾向我提出警告,深怕因此而引起国民党特务对赵纪彬的注意。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今天要写篇文章或什么“回忆录”而追加、编造的,其中大部分“事实”都写在我1956年的人党申请书上。自然,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很难完全读懂马列原著,但它们毫无疑问地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讲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蓝翎恐怕还要迟好几年呢!这也正是王哲同志为什么要在青岛刚刚解放就写信保送我去华东大学学习的主要原因。天可怜见,“上帝”保佑我这穷孩子独有的机缘,我从此走上了“人间正道”。

也正是在这两年里,我结识了山大文史系的几位“学兄,学姐”,像今天尚在编辑《文史哲》的吕慧鹏大姐,以及在1954年曾经担任《文史哲》责编,并大力支持和发表我们都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葛懋春同志。当时他们都是山大进步的反蒋学生运

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赵纪彬曾是他们的“精神后台”,我也和葛懋春等人很接近,也谈得来,友谊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更加密切。这也算是我们那第一篇文章,在《文艺报》未加理睬,而《文史哲》却欣然接受的原因之一吧!现在,葛兄已重病偏瘫在床,或者因为有什么预感!前几年,他突然把所有我给他的信,全部复印一份寄给我保存。“蓝文”中说:《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清稿,“李希凡看后直接寄给《文史哲》,至于他信中如何说的,我就知道了。反正该刊没有任何人同我联系过”。仿佛这里面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好在这封信还在,没准以后还能派上用场。何必装得那么清高,得了便宜还卖乖,合作写文章,不就是为了发表么?

在山大中文系学习的几年中,我不认为自己学历不高,就不堪造就。山大校刊《文史哲》,本是专家学者们的阵地,它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就是我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见拙著《弦外集》)。那本是我1951年写的文艺学课程的一个学习报告,是吕荧先生推荐给华岗校长,才交由《文史哲》发表的。我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如何,老师同学都在,自有公论,靠自吹自擂,只能徒增笑料。我也不必隐讳,那时有些课程已不能满足我求新知的渴望。因而,在大学期间,我基本上仍是大量的阅读。我除了担任吕荧先生的文艺学的课代表外,同学们又选我当了世界文学的课代表。这是一门新课,黄嘉德、张健两位老师过去都是教外文系的课,教中文系的世界文学,还需要摸索经验,所以经常要了解情况,以制定教学大纲。当时,我虽读完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但对整个欧美文学,还涉猎得不多;苏联革命文学虽看得不少,却不熟悉俄国文学。除果戈里的《死魂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屠格涅夫的《罗亭》外,其他就读得很少了。为了补课,只好加紧阅读。于是,就得了一个称号:“啃大本

本,教条主义。”有的同学居然还在小组会上提出批评。但现在看来,得益的还是我。正是这段“啃大本本”,使我大量阅读了欧美和俄国的文学名著,受益终生。只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把它啃完。“蓝文”在叙述这样一件小事时,也要撒点胡椒面,删除“啃大本本”,只提教条主义,以示我天生骨子里的“左”,真是煞费苦心了。

我也不想隐瞒,我当时思想有点“狂”,在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和作品的评价上,与老师,甚至最尊敬的老师,都有些很不一致的看法。不用说别的,对《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评价,我就和我的姐夫赵纪彬(他长我22岁),有着不一致的看法,常有争论。我以为这很正常。“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几十年来,无论对母校、对老师、对校友,有难处,或需要我尽力的,也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能做的我都是尽力去做的。“蓝文”中提到了我们几位有成就的同学——刘乃昌、袁世硕、周来祥、陶阳等,那是客观存在,我希望蓝翎说的是“真心话”,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嘛!同窗好友们的著作和成就,都给我以启示和激励,我至今和他们都保持着同学间的亲密情谊,常有书信来往,真诚互助。蓝翎有么?如果说“一阔脸就变”,恐怕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更合适吧!在蓝翎未与我“相立于江湖”之前,我也是尽己所能真诚相待的,即使在他被划“右派”之后。“蓝文”中以不少的文字,提到所谓的“狗肉帐”和“残杯冷炙”,我不想在这里多说那些跟他在信中已结过的“狗肉帐”。只想问一句,我寄给你(包括寄给你妻子的)的“残杯冷炙”只这一笔么?而《红楼梦评论集》却只有过一次再版的稿费。

老师就是老师,尊师在情。但有人打着尊师的招牌,却想达到别样的目的。蓝翎在《变脸》中,就利用一位老师的一篇文章的由头,大说了一番恭维话,其目的就是要把棍子打到我的身上。有些人的“脸”确实是变幻无常,生疮的舌头也能生花。蓝翎大概忘记

了他过去是怎样嘲笑这位老师的了。他大概也没有料到,老师目盲心不盲。在他那篇《变脸》发表后,我很快接到这位老师委托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的电话,劝我不必计较,千万不要同他公开论战,影响不好,我很感谢老师的关心和爱护。我让那位同学及时转告,请老师不必为这事操心,只要蓝翎不打上门来,我就不会与他公开对峙。是呵,为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何以面对曾以有了我们这样的学生而引为自豪的的母校、师长和关注我们的校友们呢!但这次不同了,我只能应战,也请老师和校友们谅解吧!

蓝翎对我们的合作经历,有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那是他的心思,我不予评论。但是,我在起草那篇《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上》时,讲到党对我们的教导和培养,感情是真诚的,至今初衷不变。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那时的存在;没有共产党的思想之光,我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事业,当然有个人主观的奋斗,可如果没有党所领导的大时代的变革,“个人奋斗”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党的思想武装,我们不可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又怎么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而“名扬天下”(引自“蓝文”)呢?《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至今对这场“有其消极的方面”的批判运动的评价,仍然是“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而今,当年“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陷入了怎样的矛盾啊?一面在那里力争他那道“工序”的辉煌,一面又忙着同这场批判运动划清界限。怎么就“前提变了”呢?大概是他蓝翎变了“前提”吧?为了讨好当代某种思潮的需要,赶紧往过站,赶紧洗刷自己,其实连共产党都可

以不参加,免得日后有退党之烦或砍头之忧!如果说这种人“善于看风向紧跟”(引自“蓝文”),恐怕才是恰如其分的吧!我则无怨无悔。

在事业上,本来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即使在与蓝翎合作的当时,我也有自己研究的课题,从未认为,写作只有彼此相靠,永不分离,也从未想到过躺在《红楼梦评论集》这本书上。“蓝文”说,他为了证明“并不是依附别人的人”,“两年的时间”,“写了不少杂文和文艺评论”。而我从未认为,自己在依附别人,所以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1955年上半年,开会任务太多,而又要抓紧时间完成《红楼梦评论集》的写作,下半年是出国了一段时间,1956年上半年,整理《红楼梦评论集》交付出版(“蓝文”说,我在后期的写作中,只是起草,都推给他,可真是人咀两张皮,只能随他说了),我自己又在清理思想,申请入党,完全停止了除《红楼梦评论集》外的个人写作。1956年下半年,工作与生活走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作自己的事了。我仍继续走自己的学术与文艺问题探讨争鸣之路,与何其芳同志讨论阿Q问题的三篇论文,与戏曲界讨论《琵琶记》的两篇论文,以及评论康濯同志小说创作的长篇论文,都是这时写的。这不是随感而发的杂文,也不是一篇作品的评论,前五篇完全靠长期的资料积累,后一篇也要靠现实资料的全面掌握。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过无任何资料而写出的文章,我没有这种“天才”。在《阿Q正传》的讨论中,我反对离开时代、历史、阶级而谈什么“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在《琵琶记》的讨论中,我不赞成简单化地用“封建伦理说教”的帽子全盘否定这部古典戏曲名著。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在鲁迅研究界就有不同意见,但在这场论争中,我是一家之言。关于《琵琶记》,那全盘否定的意见,当时虽出自几位戏曲研究专家之口,现在却早已消声匿迹了,《琵琶记》仍活在当代戏曲舞台上,并上了电视荧屏,还得了几项大奖。蓝翎或许

又说我这是“假右真左”，但我也要问一句，他在这两年间写出过这类“一家之言”的论文么？

《红楼梦评论集》于1957年1月出版；同年5月，我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弦外集》（新文艺出版社，“蓝文”说，他有过一个短文底稿本，也叫《弦外集》，我从来没看到过，也相信那“弦外”与这“弦外”，绝不是同样的“灵犀”）；1959年出版了《论“人”和“现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了《管见集》（作家出版社）；同年，还出版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随后，在1962年出版了《寸心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出版了《题材、思想、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

既然是“抖裹脚”，关于《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我要多说几句。它是《红楼梦评论集》的姊妹篇。此书出版后，仅1961和1962年，就四次重印，印数超过“文革”前《红楼梦评论集》两版的总数。“文革”后又重印过两次。我们的《红楼梦评论集》主要是写于1954、1955年间，《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除前面讲到的1954年的三篇关于《水浒》问题的文章外，多数则写于1958年和1959年，我自认为，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代表作。它曾是60年代国内外中文系古典小说课的主要参考书之一，1962年日本《东京大学学报》上曾发表过入谷仙介对此书的专题评论，苏联也有过专文介绍。我想，作为“一家之言”，此书达到了我重新评价除《红楼梦》外其他三部古典小说的目的和心愿。

这些书的文章当然也有好有歹，甚至速朽的文字，或如蓝翎所说“假右真左”之类，但就《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来说，我所批评和不赞成的，则都是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把文学作品等同于历史的简单化的倾向。我写这本书，仍像写《红楼梦评论集》一样，靠得是长期积累，而不是临时抓点材料。“蓝文”说，有人认为，他“是附骥尾以增光的人物”。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

议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表露过这种意思,纠缠这个,有什么必要呢?但我敢说,从50年代与蓝翎开始合作时,我自己就有个独立的存在,而且是沿着《红楼梦评论集》的路子走下去的,时刻表明着没有蓝翎,我也能行,或许更好。就从“文革”后的这段时间来说,我在编辑与行政工作之余,已写出了170余万字的论著: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两本鲁迅研究专著——《〈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三本评论与研究文集:《文艺漫笔》(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文艺漫笔续编》(199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199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以“《红楼梦》艺境探微”为题旨的一本尚未完成的论著,已写出22万字的论题,均发表在全国学术刊物上,曾应人民日报社的约稿,编选了其中8篇,题名《说情》,收入它们的《百家丛书》(1989年出版),这些红学论文仍然坚持1954年提出的基本观点。如果讲自我感觉,它自然比《红楼梦评论集》高明一些,我写它,也正是为了要弥补“儿童团时代”的粗糙和浅露。

研究学问,讲究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岂只对研究四部古典小说我早有自己的构想,就是两本鲁迅作品的论著,虽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却积累、酝酿于50和60年代。我已出版了除两本选集和《红楼梦评论集》外的14本著作,共计300多万字,自信并未只靠《红楼梦评论集》那“半部书”而“名扬天下”。我倒想问一句,在《红楼梦评论集》之后,蓝翎有哪一本书,能与之相比可称为“一家之言”的论著?哪怕是可称为“一家之言”的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找后帐,编故事,自说自话,哪个观点是他首创,哪段新意是他写的,空口无凭,把他独立写出的真货色拿出来让大家瞧瞧。承他相赠《断续集》、《了了录》、《金台集》或者还有其它,但那恐怕没有一本是《红楼梦评论集》的“同类”!

为了 40 年前的两篇文章,或者说“一本书”、“半本书”,何至于痛苦到“哪怕为此而流汗、流泪、流血,用鞭子抽打自己”(引自“蓝文”),这么闹腾,岂不活得太腻味了!

自然,引起蓝翎“死不瞑目”的怨恨,使蓝翎非要讲清楚不可的,说开了,无非是那两篇文章,或者说那本书,没有他的“工序”不行,他出的力最多,我靠他,我沾了他的光,却成了接受鲜花和受奖的人。这是领导上不“大公无私”,无“赏罚分明”,不是“真正的伯乐”。总之,得把这个“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首先要说明的是,写最初那两篇文章时,谁也没有想到过会有鲜花和奖,它的出现,使我手足无措。我曾找过当时的领导袁水拍和袁鹰同志,说明这会使我和蓝翎相处出现困难。他们都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个人间的事。至于为什么这样决定,我无权问也不知内情。“蓝文”不是说,他和邓拓同志的关系很融洽么?邓是当时的总编辑,我当时则和邓拓同志接触很少。总不该是邓拓不大公无私,无赏罚分明,不是真正的伯乐吧?当时政协通知我报到时(1954 年 12 月中旬),我能不能调到报社,还没有决定下来,我只是拿着临时出人证,被借调来写文章的,并未参加编辑业务,而蓝翎却是在 10 月间就已调去。所以,“蓝文”所谓的“有关领导者”的“偏心倾斜”在人民日报社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在报社还是客人,并非工作人员。那么,这错选驽马的领导究竟是谁呢?我是二届政协共青团代表小组成员,组长是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后来政协开会当然就很熟了,还曾去他家吃过两次饭,听他讲长征经历,但当时却根本不认识他。他总不至于有什么偏心“倾斜”吧!不过,我倒记起一件事来,1954 年 10 月,那场批判运动起来后,我们也成了忙人,好多地方请我们去作“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次“困窘”,我一向对在大庭广众讲话十分怯场,但又推辞不掉。大概是 11 月的一天,中央团校请我们去讲,我简直不知自己在场上

讲了些什么。后来听蓝翎说,耀邦同志率领团中央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就坐在最后一排听。我的不知所云的“讲演”,总是比蓝翎的“压大轴”逊色得多了!团中央书记处不会因此而错选我这驽马当他们第二届政协的代表吧?

我以为,还是不要把这样的事只归过于所谓有关领导吧!那时的组织路线就是这样,很注意干部的政治历史清楚,社会时尚和共青团又非常推崇个人道德行为,这可能就是干部路线中的所谓“左”的表现吧!其实,蓝翎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毕业分配工作时,就已如此了。否则,为什么已分配好的单位会有突然改变呢?而且改变的也不只蓝翎一人。

“蓝文”说,在邓拓同志当时对他和我的态度上,我出现了“介意”,还举了“例子”,我自问尚还不至于那样窄狭。当时我在上学,不好请假,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都是蓝翎先见,我后来才见到的。而且我那时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岗位,并非《人民日报》,而是文学研究所。为此,我曾写信给周扬同志,并收到了周扬同志的复信(原信已在1994年第10期《学习》杂志上发表)。后来还是听蓝翎讲,毛主席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要我到《人民日报》来。可不知为什么,拖了近两个月还未解决。人民大学研究生部通知我回校参加考试,我又没有工资,很焦急是实情,但我怎能为此而“介意”蓝翎呢?他不过是刚到单位的小萝卜头,对这件事哪能说得上什么话,我再蠢也不会埋怨他。蓝翎大可不必因为自己有“介意”,也必须先给我造出一个“介意”来。邓拓同志从1956年直到他去北京市委的60年代初,都是我的直接领导(签字付印文艺评论版),每周总有两次骑自行车送取大样。他惜别《人民日报》诸战友的诗,我至今仍能背诵,“文革”中有个别人把它作为反党诗来批判,无非是自己心虚,急于同他划清界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邓拓同志是位忠厚长者。“文革”前,我每逢春节去袁

水拍家拜年,都要去看望他,他有些要查找的文艺书,也打电话来要我帮他查找,我们中间从未出现过什么“介意”,不劳蓝翎费心。

“蓝文”说他自己曾“因思想问题受到批评和帮助”,说那与划他“右派”无关,但那恐怕也反映了人品问题吧!当时(1955年),我正在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不知情,回国后才听说。“蓝文”还讲到,耀邦同志在信上都有批示,但批示了什么他没讲。要说那只是“在私人信件中流露过志得意满的情绪”,就太简单了吧?它们充分表现了蓝翎善于编故事的“才能”!哪是什么“志得意满”?那分明是编谎话吓人,那时你已不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而是24岁的成年人了,扯那样的谎,难道今天都不觉得脸红嘛?!什么“写于中央领导接见的汽车中”,哪位中央领导当时接见过我们?真不害臊!这样的编故事的信有好多封,它们寄到当时的农村会产生什么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其后还发生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事,但他既然“真事隐去”,我也不便说得更多了。只不过,看了他这次在长文中又编了那么多回顾历史的“故事”,倒使我想起了这段旧事,真是积习难改啊!

“蓝文”中所谓“鲜花和受奖”,就是两件事:一件是二届政协委员,还有一件是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除此之外,我没单独参加过任何全国性的会议,所有文艺界的会都是两个人共同参加的。什么时候我也没有认为,我独得了蓝翎眼中的这两朵“鲜花”,是心安理得的。但蓝翎心里明白,决定这些事,事先既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我也无力挽回。所以当二届二次政协会议宣布蓝翎为特邀代表时,我心中真有一块石头落了地的轻松之感。自然,从今天蓝翎的情绪看来,他还是认为我夺了他的“头筹”,心理仍不平衡。1956年,又发生了另外的齟齬的事,单位内反应强烈,我除去陪着挨骂,能辩护什么呢?我是预备党员,党支部给我的任务是帮助他,蓝翎已在那里

写“半间房随笔”(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被分配在一间宿舍里),他感情上和我有了隔阂,我怎么帮助他呢?正如“蓝文”所叙述的,他对所谓“有关领导”的“倾斜”,有如此强烈的情绪,能接受我什么“帮助”呢?我只能在使他为难的生活问题上,为他多尽点力,谁知“反右”大潮一来,急转直下……

鲜花是要枯萎的,奖品也没有“终身制”。“蓝文”大不满意的这种什么“委员”、什么“代表”的奖励,很快也就停止了。二届政协换届,我也早已因超龄而退团。而且自1956年我辞去与华君武同志一起出访捷克后,即1957年后就再没有受委派出访。“文革”中才知道,这也是事出有因。但我当时既无自觉,也未“介意”,因为单位的历届领导都对我很好。这方面我的确比蓝翎幸运,因为我还保有工作和写作的权利。而且除编辑工作和社论、短评、评论员文章等的写作外,还要赶些作品评论的任务,有时也因版而需要发表我的论文,那都是几近一版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七八篇。如果说,《人民日报》给我扬过名,那不是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而是在其后的20多年里。尽管在40多年的文艺道路上,我有过不少失误和遗憾,但忠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严肃、勤奋地写作,是我矢志不移的努力方向,即便到了今天的老耄之年,仍是老骥伏枥,初衷不变。

抖起这种“裹脚”来,实无太大意义,但既然世间还有那本无多少“裹脚”积存,却也要借“回忆录”的形式抖得人真假莫辨的“主儿”,我也就只好奉陪,抖一抖,比一比了。不过,还是就此打住吧!

关于“政治诬蔑”和“人格侮辱”

我与蓝翎相识40余年,对他的为人是心中有数。前些年,总觉得他在1957年后遭遇坎坷,心中难免有怨气,对他的种种不友善之举,从不计较,只用“难得糊涂”淡然化解。也许正是因为我

一贯的隐忍,被他视为软弱可欺,才会演变到今天的变本加厉,一再发难。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也是依据事态的性质而定的。两年前,他那篇影射攻击我的杂文《变脸》在《济南日报》(1992年4月11日)发表后,我的“忍”字只能画上句号了。我想,只要我活着,还不是一个“植物人”,我就必须接下他“劈空掌”。“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我当时的反击,仅限于给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和给他本人写了一封长信,在他自己面前,抖搂了一下他的“裹脚”;当然,也是出于人自卫的本能,说了一些想说又该说的话。蓝翎在他这篇长文中,曾多次提到这封信,说是他手中握有我对他“政治诬蔑和人格侮辱的铁证”。我欢迎他把那“铁证”公开,但需要全文发表,不要断章取义。因为我在信中讲的都是事实,我对此负责到底。倒要看蓝翎是否有这份决心和勇气了。

“蓝文”煞有介事地写道:“搞政治诬蔑和人格侮辱,则是犯法的。”这只能使我想起“贼喊捉贼”的成语!翻看一下他的杰作《变脸》,究竟是谁在“搞政治诬蔑和人格侮辱”就一清二楚了。现摘引蓝翎《变脸》中的一段文字于下:“……‘两而派’惯于抢占上风头,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和你本是伙伴,手拉手称‘亲密的战友’,一看风头不对,立即站高冈落井下石,把‘战友’推入‘右派’的队伍。几十年一过,伙伴的‘右派’得改正,却又大言不惭说自己是‘漏网右派’。当右派所受的屈辱,并不下于文王被囚,左丘失明,孙膑刖膝,太史公下蚕室,毫无荣耀,硬往这里挤干什么?不过,这一挤也露出破绽。其个头比伙伴高,福体比伙伴重,为何小的被捉住,而大的竟‘漏网’?谁能说清这‘网’是怎么织的?‘两而派’的漏洞处处有。‘文革’时已堕为‘江东子弟’,不久,又自称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鬼才相信!”真是恨怨之情跃然纸上,它即使算不得“铁证”,也可算是明证了。

“蓝文”说：“他（指李希凡）调出报社后，由于我的一篇杂文《变脸》，受别人调唆，来信将我痛骂，表示彻底决裂。”这是很拙劣的抵赖，我用得着受别人挑唆吗？他文中奚落、侮骂的“个头高，福体重”的“伙伴”（引自《变脸》）何所指？凡与我和蓝翎有一面之缘和熟悉点情况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蓝翎的暗箭是射向谁的。光载有《变脸》的这张报纸，我就收到三份，有同班同学寄来的，有山大校友寄来的。难道不指名就可以逃脱诬陷的“罪责”！“文革”后，我一共出了11本书（包括一部重印书和两本选集），我的言论和著作都是公开发表的，“两面”在哪里？“假”在何处？可以公开批判嘛！既已“相立于江湖”，何不学学江湖好汉的气概，与其用这种隐晦的战法，何如指名道姓的叫阵，骂也骂得痛快，听也听得明白，好汉做事好汉当嘛！

回想与蓝翎这些年的恩怨是非，也只能发一句“既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慨叹了。有人曾问起我，蓝翎那么怪，你们当初怎么合作得来？这是解释不清的，或者因为当初还谈得来，洞察力所及，也未曾窥破他日后的怪；再者，那时的杨建中，也非现在的蓝翎，我这个长他几岁的人说话，他还能听进去。由谈得来感情融洽而有合作，虽偶然却很自然。80年代初，他平反回京，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共事，思想感情虽有距离，总还能和平相处。他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聊聊天，谈谈文艺现状，所见也还略同，并未见其对我的“左”有拔刀相向的“江湖相立”的情势。当然，背后也常听到冷嘲热讽，因知其人，一笑置之而已，倒也相安无事。1986年，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后，传来的骂声虽多了些，然已脱离，更不在意。岂料“六四”风波后，突然增温。我虽调离原单位，却仍住在那里的宿舍，老同事、老邻居，几乎隔两天就有人告诉我，蓝翎又在骂你，碰见谁都要骂几句，近乎疯狂。我琢磨，可能是由于“意得志满”又遇挫折，心理又有了失衡所致，于是，我不幸再一次成了他泄愤的对象。我

不禁要问：你蓝翎的升迁荣辱，与李希凡何干？几年来，我对你“远避之犹恐不及”，“麻烦”却偏要找上门来——杂文《变脸》又出笼了。

“蓝文”还谈到他 1957 年被划“右派”的问题，说“李希凡从小组会到大会，都一口咬定我是‘混进共青团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忘恩负义，使我非常恼火。……这一句话，就把若干年的真真假假一笔勾销”。“忘恩负义”我是说过的，至于“混进共青团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又是他蓝翎把在共青团受到的批判，移花接木到我身上了。但这显然已比《变脸》中的诬陷退步多了。《变脸》中则指称，我这“个头高，福体重”的伙伴“站高冈落井下石”，将他推入“右派”的深渊。我确如“蓝文”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拙于言词的人，不要说他的批判会，任何批判会我都很少发言，更不会是他批判会上的积极分子。而且，蓝翎专案组的负责人，在搜集、揭发蓝翎的问题时，是把我和他，还有一个“林希翎”连在一起的。有关蓝翎的批判会，我是能躲就躲，批判大会也是被递条子点名要我上台表态的，我能有什么“咬定”？当时团组织的一位领导就说过：“李希凡和蓝翎划不清界限”。好在当年亲历的多数同志都在，也包括搞他专案的人，都生活在他身边。蓝翎明知事实真相，却硬是要栽脏到我头上，其实也只能骗骗不知情的人，一旦“西洋镜”被拆穿，就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划蓝翎“右派”的“罪状”不少，但没有一条是李希凡提供的。作为“证据”，最多的是他自己那些杂文，我多数没有读过，因为他用了各种笔名，也不知哪是他写的。蓝翎明知道，坚持把他划成“右派”的，并非一般人物，他是好汉，就去点名算账，何必拿一个并不相干的人，当“假想敌”和出气筒？表面上气势汹汹，剥开来其实还是个“软蛋”。反“右”初期，蓝翎不是也很积极吗？批判“丁陈”，文艺界领导不也要我们一起准备过一篇发言吗？只不过，时间已

到,本单位党组织已不允许我们在这种场合联名露面了!

“左”的政治运动的确在扭曲人性,痛定思痛,应当深刻总结,党要总结,个人也要总结,但那不该是散播仇恨。在反“右”斗争中,我也曾错误地把一些作品当做右派思想来批判,错误地把一些好同志,如鲍昌、刘绍棠的文艺观,当做右派文艺观来批判。凡错了的,我公开道歉,能写文章的,我都已写在文章里。

“蓝文”在津津乐道地描绘了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逍遥游”后,却深深遗憾于李希凡的挨整不够。他写道:李希凡“已从河南叶县调回(不是‘调回’而是干校轮换——笔者)北京,站出来工作了(我是普通编辑,用不着‘站’——笔者)。虽然‘对立面’对他不怎么样,但他上边有线,非同小可,也奈何他不得”。这话当然颇有深意,但比之他在《变脸》中指我为“四人帮”的“江东子弟”又要退步了不少。

蓝翎不是非常鄙视“棍子”和整人么?不是反感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么?这就令人费解了!当时我不过是个小萝卜头,虽为评论组长,却不在“官册”,“对立面”究竟要把我怎么样才合他的心意呢?据我所知,在帮助“对立面”整他过去的“伙伴”李希凡的问题上,蓝翎可一点也不“逍遥”,那用我所熟悉的字体写成的厚厚的一叠“揭发材料”,其中心意思有两点:一是揭发我1957年也有不少“右派”言论(蓝翎平反回京工作后,闲谈中我曾提到“文革”中有些人说我是“漏网右派”)。这已成为近些年来蓝翎讥讽奚落我的百谈不厌的话题。他恐怕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我说的这“有些人”里是否包括他,当然更不会反省他“文革”中写材料,揭发我这些言论时的用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笔者)。二是在批评《红楼梦研究》的合作中,我出力最少,却掠取了“鲜花”,因为我是“文艺黑线”看中的“红人”。这份材料是一位所谓“对立面”的好心人拿给我看的,很快就收走了。所以,“蓝文”今天的心声,

是早在“文革”中批斗我的大会上”就已传出了。只不过,那时的“对立面”不愿公开引用曾有“右派”称号者的“揭发材料”,只能用生疏的枪法打出,实在是减色多了!此事我以前并未计较过,无论是1973年蓝翎来京修订《红楼梦评论集》期间,还是80年代初他平反回京后,我都从未提起过。我以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责个人。我自己在“文革”中也给领导贴过大字报,说了很多胡话。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直到今天,蓝翎对我在反“右”批判会上的发言仍恨声不绝,耿耿于怀,那他在“文革”中对我那么长篇大论的“咬定”,又算什么呢?特别是在“文革”后并无“政治运动”的胁迫,他仍持续不断地向昔日的“伙伴”射出诬陷的“子弹”,又无一不是企图在政治上撂倒他,什么“四人帮”的“江东子弟”,什么“假马克思主义”“两面派”之类的“咬定”,究竟该让人如何“人帐”呢?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谈到“人负我”或“我负人”的问题,真不知“巧言”之士的蓝翎该怎样来自我解嘲!

“蓝文”所说的“上边有线,非同小可”其用意是很明白的,就是要给我拉上一条“四人帮”的线,一定要按上一顶政治帽子,“整人”才算过瘾,才能找回心理的平衡和失落。蓝翎当年不是正在河南的村子里“逍遥游”么?何以有那么灵通的信息,莫不是也拉上了一条什么“对立面”的线?反正只要不让李希凡活得顺心,跟谁都能搞“统一战线”。

什么“线”,什么“非同小可”,无非是指“文革”前,江青曾找我谈过两次话,以及“文革”初期,在我挨批斗最厉害时说过“保”我的话,这些事国内外已有所披露,因为它们涉及毛主席,我不想参加这种“大合唱”。现在蓝翎一再别有用心地大作文章,我就有必要如实叙述,将真相说说清楚了。

1964年8月的一天,林默涵同志(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文

化部副部长)打电话给我,说江青要找我谈话,叫我在报社等候,中南海会有车来接。在此以前,我不认识江青。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她对当时文艺界的意见;并以毛主席的名义,批评我在文艺界精神麻木,缺乏敏感。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时,批评我与吴晗同志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论争是“书呆子气”,说《海瑞罢官》是为“三自一包”鸣锣开道等等。对江青讲的很多问题我听不懂,也不理解《海瑞罢官》与“三自一包”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听了她对文艺界一些领导人的“意见”,更觉得糊涂。我认为,这是他们领导之间的事,不该和我谈。两次谈话内容大致相同,后一次更侧重于对文艺界的“意见”。当时,我也没细想她找我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以为,还是像1957年毛主席给袁水拍同志的信中那样,看到了我文章中的什么倾向,提出批评。没过多久,我就参加“四清”工作队下乡了。1965年回到工作岗位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江青曾向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谈到,她找我谈话时,我精神状态不好。于是,我的老领导胡绩伟同志,虽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却没有忘记向下推托“罪责”,他在“文革”开始的一次党员大会上,就连讽带刺地说:“批判《海瑞罢官》,中央不是没有找我们,中央找了我们,我们不行嘛!”据后来在批斗会上一位党委副书记“交代”,他们准备抛出来的第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名单,我名列前茅。只不过,他们的计划未及实施,自己就先被“造反派”揪出“示众”了。自然,我也是躲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后来毛主席的讲话也传出来了,意思是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找不到人写”,这更加重了我的“罪名”。本部门的大字报,已不针对“当权派”,而是对着我了。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对立面”,即使有些好心的同志同情我的处境,也无法公开讲话。给我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罪行”主要就是不听江青的话,没写批判《海瑞

罢官》的文章。随后,是批判我在文艺界的所谓“罪行”。什么“周(扬)林(默涵)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不管挂不挂得上,一律加冕。紧接着,是送进“牛棚”改造,我和我的副总编辑李庄同志在一起劳动,为印刷厂运送卷筒纸。每筒纸约两吨,完全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或是从汽车上推下,或是凭力气几个人一鼓作气推上汽车,有一定的危险性,推不好,卷筒会滚下来砸伤人。当时我还年轻,少年时代又当过印钞工人,练就了一膀子力气。却难为了李庄同志,他已五十几岁,腿脚不大灵便了,终于在一次事故中压折了腿。后来戚本禹的一篇文章第一次公布了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我也就被放出了“牛棚”。这自然并非“造反派”所情愿的事。我仍继续挨批斗。可以说,在“文革”中,给我开的批斗会和给我贴的大字报,远远超过部门的领导。我确实被批得晕头转向,只得写信给江青,“深刻检讨”我没有承担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罪责”,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

1967年秋,本单位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自报公议”,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变相的批斗会。据“造反派”传出来的信息,要把我“文革”前出版的六本书逐篇文章进行批判清算(这里自然也有蓝翎的“贡献”),以证明我追随文艺黑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因为我只承认跟黑线走,而不承认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了给我罗织更大的罪名,他们还向我大哥李锡嘏(一个普通的县医院保健医生)逼供,七天七夜不给水喝,让他招认,在我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时,他就把我发展成“国民党特务”了。他没有挺住“文革”的磨难,不及60岁就去世了……那“批斗会”已开了七八天了,晚上还要准备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人民日报》秘书室突然来人通知我,“中央文革”邀请一部分文艺界人士看样板戏,名单中有我。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那邀请自然是江青批准的。被邀请的几乎都是受

冲击、挨批斗，又过不了关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反动权威”们，我认识的和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天津老作曲家王莘、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电影摄影家钱江、李文化，京剧界的名演员谭元寿、马长礼等，接见时，周总理也在座，还讲了鼓励大家的话。江青点了每个人的名，都胡乱批评了几句，也讲了“保护过关”的话。又过一些时，日本文化界访华团来北京，我接到请柬陪同周总理接待来访的日本友人，出席这次接待的，除了我，还有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近代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还有两位自然科学家我记不起名字了。总理曾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来访的友人；此后，我还曾接受邀请，出席过周总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宴会。蓝翎故作神秘地说的“非同小可”的线，恐怕就是指这些“殊遇”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对江青的反动本质没有认识，一直把她当做毛主席的夫人来尊重，对于没有听懂她的话，也感到很内疚，并十分感谢她的“批评和帮助”。但是，不管我对江青怎样没有认识，我毕竟没有写她授意的批判《海瑞罢官》和所谓“两面派”周扬的文章，江青这条线是挂不上的。其实，现在蓝翎想做的，粉碎“四人帮”后，我所在单位的某些人，都是曾经做过的。“文革”初期批评我“不听江青话”的老领导，“文革”后又来抓江青黑线了，于是，我又成了批判会上的重点。“文化大革命”就是有这样的滑稽戏：“文革”初期，领导因我“不听江青的话”，准备把我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文革”中，“造反委员会”，因为我“不听江青的话”，把我作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揪斗；“文革”后，领导恢复工作了，又要来抓我身上的江青“黑线”了！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什么时候该批斗该检查的都是我。终于，把我这个糊涂人也批“觉悟”了。第二次从干校归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在中层干部会再作一次检查。我不想再温良恭俭让了，我立即声明：“无论大会、中会、小会，我都不再作检查，

随便你们处理。”批来斗去，总得要落实政策。因为党已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没有事实根据，是不能给人定罪的。于是，我的老领导胡绩伟同志又让我“站出来工作”了，先是没有“官阶”的负责人，协助袁鹰同志主持副刊和作品版；1983年正式任命为文艺部副主任，1986年调离《人民日报》前，又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但我自己却义无反顾地非要离开《人民日报》不可了。

曾几何时，那些自诩为“毛泽东革命路线正确代表”的人们，在“文革”后一变而为“反毛”、“非毛”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是越走越远，终于堕落成依附于“金元和指挥刀”的麾下，跑到国外，靠骂共产党、毛泽东混饭吃的“风云人物”，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李希凡决不作危害党的事业的败类，也决不作损害毛主席声誉的忘恩负义之徒。历史的经验教训自有党来总结。我还是我，改正错的，坚持对的，忠于毛泽东思想和自己的信仰，努力做好党分配的一份工作，献身于我挚爱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蓝翎不觉得现在再把我“补充”为“四人帮”的“江东子弟”，已为时过验了吗？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的，这用不着蓝翎操心费神！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13次、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蓝翎手里有什么“铁证”，可以向党揭发么！否则，“搞政治诬蔑和人格侮辱则是犯法的”（引自“蓝文”）！

如果逐篇翻阅一下蓝翎这些年来发表的杂文，当不难发现，他确实念念不忘于我这“一度成为战友”（引自“蓝文”）的人，尽管他那些调侃式的谩骂并无回应，但他却自以为得计，骂兴丝毫不减，这也可算是当今文坛的一个“奇观”了。我一直保持沉默，不愿与他公开闹翻，其原因很简单，只是不想让人看笑话，只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罢了！

“蓝文”在最后郑重其事地写道：“其实，文学史上的一切争论，也可视为打官司，但裁决者不是法官，而是千古的人民群众，有理

者是不会怕人民的。”我很赞成。这也正是我要把这些“事实”与“历史”写出来，公之于众的原因。

1994年10月16日，是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作40周年，又恰恰是我外孙女慧可的8岁生日。15日清晨，我备了一束鲜花，携女儿、女婿并慧可，一起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在接待处张同志的陪同下，从行进中的长长的行列旁边步入纪念堂，他介绍说，纪念堂管理人员不多，每周天天开放，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实在忙不过来。张同志很热情，还在毛主席座像前为我们拍了照片。我同慧可一起把花束置放在毛主席的座像下，行了三鞠躬礼。我肃立着，过去的一些往事重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酸楚的惆怅！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当不会责怪于我，当能够理解我被迫无奈的苦衷……

这些天来，拉拉杂杂写了不少，总算说出了压在心头而又该说的话，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正经事，来打这场实在没意思却又不得不打的“笔墨官司”，以了结这段“对历史负责”的公案！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当我准备写这篇辩正文字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孟子的这句话，使用它作了本文的题目。

编后记：

1993年夏天，韩石山先生去河南参加西硖笔会，遇到蓝翎先生，知他正在写回忆录。回到太原，石山先生将此消息告诉了我。作为编辑，我知道蓝翎先生当年的经历，当即决定向他组稿。1994年春天，我和石山先生赴京办事，亲自拜访了蓝翎先生，决定了刊发他的回忆录。6月间，石山先生再次赴京，将《四十年间半部书》

取回交我。发稿之前,我曾有一信给蓝翎先生,大意是认为这篇文章很好,作为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蓝翎先生有反思历史、解剖自己的勇气。我原曾想将“蓝文”直接寄给李希凡先生,征求他的看法,由于事先来和蓝翎先生商量,又担心周折过多,可能会影响文章的刊出,所以最终未和李希凡先生联系。

10月间刊物出版的当天,我即给李希凡先生写信并寄了两册《黄河》。这封信我留了底,现抄出如下:

李希凡先生:

您好!

寄上两册《黄河》杂志。内有蓝翎先生《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因事涉先生,理当奉告,并作如下说明:

一、我们与蓝翎先生素不相识,只是偶然听说他在写回忆录,所以特约此文。

二、我们认为所有参与过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论争的人,都应本着向历史负责的态度,为今后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提供第一手资料。

三、我们认为蓝文有这方面的价值。

四、先生如有辩正、答辩、反批评性文字,无论长短,本刊愿及时刊载。

五、论战双方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对事不对人,诸家论见,容各不同,但必需要以客观、理性、公平的风度行事。

六、先生如赐文稿,因有论战性质,本刊一字不改,一句不删,并奉呈二校清样。

七、有关蓝文的一切答辩事宜,涉及刊物方面,请直接与我本人联系。

希望能得到先生的回应。

谨颂

文安

谢 泳

1994.10.5

李希凡先生见信后很快复信给我,决定写文章答辨,我立即回信表示欢迎,并请李先生相信我们做人办事的原则:决不在论战中有任何偏袒。作为一个刊物,为论战双方提供版面是我们的基本宗旨。我们不计较论战双方的政治观点,只要双方能属守论战的基本原则,我们均表示欢迎,我们甚至认为为了使论战文章写得漂亮,对于适度的讽刺、挖苦、调侃、幽默等做法都予以鼓励,否则笔战不是太乏味了吗?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蓝翎、李希凡两先生间的论战虽然只是就一件具体事情而言的,但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篇文章中读出更多的东西,至少从中了解5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对于当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我们恪守论战的基本规则,在蓝翎先生文章刊出前,我未与李希凡先生联系,同样在刊出李希凡先生文章时,我也从未和蓝翎先生打过招呼。如果今后蓝李两先生还愿就此再写文章,我们还愿提供版面,我们希望这次论战真正成为有理性有风度的自由论辩。

谢 泳

□宋谋场

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曹雪芹画像有两幅。一幅是王冈绘，原藏李祖韩家，有照片流传，“文革”中被抄去，下落不明，只余原手卷中的部分题诗在上海发还抄家物资时出现。另一幅是陆厚信绘，河南博物馆 1963 年 2 月以 5 元人民币的代价自商丘人郝心佛手中购得，现藏河南博物馆。30 多年来，关于这两幅画像的真假问题，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陆绘，我极力为之辩护的也主要是陆绘，但两幅画像有一定的联系。我至今以为所有人证、物证远不足以否定两幅画像像主之可能是曹雪芹。因此，我愿意尽量客观地叙述这一场大争论中的亲自经历，请大家予以评议。千万不要随声附和，轻率地否定这两幅画像。

最早提到曹雪芹有画像流传人间的专著是 1953 年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书中提到，1949 年初，陶心如对作者说，1932 年，他曾在一蒋姓友人家见过一幅曹雪芹行乐图立轴，上方有李葆恂题字。1935 夏，又在一李姓友人家见到一个手卷，画面结构与立轴完全相同，左上方有“壬午三月……”题字，幅后还有曹雪芹同时人的题诗，再后有叶恭绰的长跋。周汝昌认为很像得记录，但当时语焉不详，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再次提到这幅画像的是 1959 年出版的吴恩裕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中的《考稗小记》，就说得比较详细了。《考稗小记》明确说藏

主是李祖韩,像后题诗的有皇八子永璘等八人。图右下角有“旅云王冈写”字样,照片曾刊于《美术周刊》云云。但藏主李祖韩秘不示人,外间只有照片流传,并被1957年10月版的《红楼梦》删去题签,据以制版,作为插图。

大约在1956年左右,朱南铎根据周绍良与李祖韩的多次谈话所得,写成《曹雪芹小像考释——兼谈曹雪芹的生平及经历》长文,1962年曾在内部传阅过。朱文基本倾向于画像确为曹雪芹肖像,考释也很细致。但到此文作为朱南铎的遗作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公开刊出的时候,却加上了周绍良的一个附记,对此画像又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李祖韩“有意作假”,“故弄玄虚”了。

就在朱文内部印出传阅的时候,又一幅曹雪芹画像在河南博物馆被发现。原来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从西安回来路过郑州,顺便到河南博物馆寻访文物,发现了一批画像中有一幅曹雪芹小照。他立即拍了照,北京王士菁写信,托他转请在北京的红学家鉴定。最先报导这个消息的又是周汝昌。他在1963年8月17日《天津晚报》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幅画像,认为是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周汝昌的文章立即遭到刘世德(时生蓁)的反驳,并在《天津晚报》展开争论。刘世德是因为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脸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愈楚江照》,便认为像主一定是俞瀚。至于画家题记称“雪芹先生”,那是俞瀚也号雪芹先生的缘故。周汝昌则认为,俞瀚从无雪芹之号,且江南寒士,也不可能与满州显贵尹继善有题记中所说的“通家之谊”。所以,“这幅像很大可能是曹雪芹,而绝不会是‘俞雪芹’”。而第一次把王绘与陆绘联系起来考虑的则是吴恩裕。1963年10月,他把他的《有关曹雪芹八种》扩展为《十种》出版,《考稗小记》也作了增订,提到这幅新发现的陆厚信绘的“雪芹先生小照”这样写道:“细察其眉目平正,鼻下端较阔,与王南石所绘者似为一人,惟较王作稍早耳”。

到此为止,我尚未介入这场讨论。周汝昌与刘世德的争论,也没有深入展开,就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直到1973年,周汝昌才又在刚复刊不久的《文物》第二期上旧“画”重提,并首次刊出陆绘小照及题记和对脸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的照片。为了解决题记与尹集诗题的矛盾,他认为尹诗原是题俞楚江行乐图的,此系借用。当时我正下放在湖南双峰原籍劳动,读到周文并看了照片,颇有些不同意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认为尹诗不是题俞瀚行乐图而是径题曹像的,诗意并不要求画面上出现“云树”“青山”衬景,画家题记与尹集诗题的矛盾,是尹集诗题有误。这些意见,在《红楼梦新证》1976年增订再版时,周汝昌把它作为一条附注刊出了。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虽有某些需要修正之处,但认为诗画是一体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尹集诗题有误这一根本点我至今还以为是正确的。这一条附注的发表就是我介入这场争论的开始。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场争论竟会引起这样大的风波,牵涉面这样广,延续时间这样长,思想准备很不够。

促使我奋起为这幅画像的真实性辩护的动力是《文物》1978年第5期上史树青的文章。他以文物鉴赏家的身份,在亲自察看了画像以后,断然宣称:“这一开册页除尹继善的题诗以外,其他皆有意伪作,伪作时间约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新红学派’盛行时期”。这可真把我刺激起来了。就在当年8月,我专程去了一趟郑州,通过当时在郑州大学教书的蓝翎的介绍,到河南博物馆看了画像,并与博物馆有关同志座谈,还看到见过此像的专家们包括郭沫若两封亲笔信在内的许多书面意见。博物馆的武志远与郑新来告诉我,据画像的出售者郝心佛谈,此像是从河南商捕宋莘后代的手中收得的。他们还告诉我,郝心佛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收破烂的人。他们对他说的话并不相信,认为郝心佛是故神其说,信口开河。蓝翎也不相信此画是真,认为我为此画像辩护没有必要。但

我却想寻根究底,从郑州回来又专程赶到北京,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有关俞瀚的资料和《尹文端公诗集》。从北京回来,便仔细对照吴恩裕,周汝昌、郭沫若、史树青等人的意见,写了一篇题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辨》的长文。

我以为,史树青的“敬空”说和彻底否定论根本站不住脚。因为,20年代到40年代“新红学派”盛行之时,并没有任何一位新老红学家曾说过曹雪芹与尹继善有任何关系。作伪者不可能异想天开,见到一幅俞瀚行乐图,就往曹雪芹身上打主意。辛辛苦苦画一幅与题诗对不上号的无衬景单人坐像不算,还要画蛇添足,给题上五行题记,给曹雪芹凭空添上一段与尹继善有“通家之谊”,被“罗致幕府”的经历,这种设想实在太离奇了。但史树青批评周汝昌时,指出尹继善与俞瀚的交往始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此时雪芹早已去世,尹继善借乙酉以后的诗,题癸未前已逝世的曹雪芹画像,决无此可能,却很有道理。不过,周汝昌说尹继善诗中有“白门云树”、“坐对青山”字样,不应该是题这幅无衬景的单人坐像而应该是题另一幅有衬景的俞瀚行乐图,此处只是借用,为史树青所首肯的,我却不以为然。因为,“白门云树”显然是用杜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典,借指南京的朋友而非实指云树;何况,“白门云树望中遥”,诗句明说“望中遥”,当然不必在画幅上出现;至于“坐对青山想六朝”云云明说“坐对”,“青山”在坐姿画中人对面,不在画幅中出现更是完全合理的,怎么能说此二诗不能题无衬景单人画像而非题有衬景的行乐图不可呢?我重申此二诗即径题此像无疑,画像也不可能是俞瀚。因为除了俞瀚从不闻有雪芹之号以外,我还从查得的俞瀚资料获悉,俞瀚的相貌是“长身锐头,玉立峨峨”,乙酉与尹继善结识时已届垂暮之年,是个白晰纤长的老头子,与画中的黑胖中年人相貌完全不符。而曹雪芹乾隆二十年后不在北京即弹铗豪门那几年,恰好四十多岁,年龄与画中人相

同,而且画中人那黝黝丰腴的神采,也与裕瑞所说的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正合。雪芹的父、叔是怡亲王的下属,《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就有避怡亲王父、祖名讳的怡府本,曹家与怡亲会关系密切;而尹继善年轻时曾作过怡亲王记室,是在作记室时被雍正赏识才获得荣显的。雪芹作为尹继善的晚辈被招入幕,被画家称为“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也完全合情合理。这种解释的唯一障碍只是这两首无上款的题画诗在《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作《题俞楚江照》既然俞瀚的年事,相貌均与画中人不符,如果画像不是后人伪造如史树青所料,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我经过查对,得知尹继善的诗集不是自己编的,而是先由袁枚编成八卷。又搁置了若干年,连袁枚都去世了的嘉庆五年,才由尹子庆保增订为十卷刊刻。这种经过多年多手编纂的遗集,部分诗题为编者擅加而造成讹误是在所难免的。关于这两首诗的诗题至误之由,我在这篇文章里也作了几种推测。我还建议召开一个鉴定会,请权威的文物鉴赏家与知名的红学家出席,采用专家目验与科学手段相配合的办法,先判定文物的真伪,然后再研究像主是不是曹雪芹。

正当这篇文章《山西大学学报》准备发排而尚未刊出的时候,我又一次到北京看资料,从友人处得知香港《文汇报》1979年4月2日至5日连续四天发表了梅节的《曹雪芹画像考信》,陈毓黑、刘世德的《论曹雪匠画像真伪问题》长文也在稍前的上海《学术月刊》1979年2月号上发表了。他们一致认为,陆绘虽非赝品,但画中的“雪芹先生”却绝非曹雪芹,而可能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客俞楚江,并且把王绘也拉扯在一起,即两幅画像的像主都是“俞雪芹”。我首先针对梅节的文章写了《曹雪芹画像考主质疑》交给香港《文汇报》于5月30日发表了,文章也涉及陈、刘。这时,《山西大学学报》那篇文章还没有刊出,这是我正式介入这场争论的前哨战。

在这篇前哨接触的论文中,我先说此像之绝非俞楚江。因为俞瀚乙酉初识尹继善时已届暮年,而且“长身锐头,玉立峨峨”,与画中人年貌不相当。如果把两幅画拉到一起,王绘作于乙酉前四年壬午,反而比四年后陆绘显得苍老得多,就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要说江南市衣无从与满州显贵有“通家之谊”,俞楚江从无雪芹之号这些早已被周汝昌指出的老问题了。然后再说此像之可能是曹雪芹。第一,曹雪芹晚年可能到过南京,在1962年此像尚未被河南博物馆购藏之前,周汝昌就在《雨花》第8期《曹雪芹与江苏》一文中提出了。周汝昌的根据是敦敏“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那几首诗,而梅节的驳议却非常脆弱,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他说“别来已一载余”是雪芹住在西山,离城太远,久未进城,不能作为已离北京远游的证据。但同住西山的张宜泉不是也写过“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怀曹芹溪》吗?这又怎么解释呢?而且脂批中也有过“缺中秋诗,俟雪芹”这样的话,如果乾隆二十一年以后雪芹从未离京远游过,这也不可想像。还有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自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这种诗句,也显然是雪芹此时正在弹食客铗,叩富儿门的证据。如果雪芹一直枯坐黄叶村闭门著书从未离开过北京,这样说就简直是无的放矢了。第二,我还特别指出“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诗中的“雅识我惭褚太傅”一句,“褚太傅”不可能是敦敏自况,一个30来岁的落拓王孙,对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曹雪芹决不能这样用典。“别来已一载余”证明雪芹确曾离京幕游,而“褚太傅”则恰恰是指这次幕游归来的幕主,这个人必须年长位尊。如果雪芹此时正从江南尹幕归来,“褚太傅”指尹继善,这用典就最贴切不过了。

文章发表后,梅节又在9月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一方面也承认他原先考虑不周,我的论难对像有启发,但他还是坚决不同意我的结论。尽管他在他文前的按语

中声明,我那篇《山西大学学报》上的长文他还没有读到,但他还是仅仅根据我在《文汇报》上驳他的那篇短文,就指责我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了。对手的文章没有仔细读,对手的名字总要清楚吧,但他却把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成“宋谋瑒”。粗心到如此程度,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对这篇《随便拉关系》我没有作答,我想等他读了我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那篇长文并弄清我的名字以后,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时再说。但后来我的文章发表了,他终于没有反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弄清楚争论对手的名字了没有。

那一次我在北京阅读资料的收获颇大。我从细读《尹文端公诗集》得知,尹继善曾与很多位幕僚诗酒赓和,集中留下名字的,有不少人却没有如陈毓黻、刘世德、梅节他们所估计的那样一定会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中留名。仅仅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这一段,与尹氏唱和最多的曹西有、宋宝岩、陈光岳、娄毓青,在袁枚的集子中均只字未提。他们常以曹雪芹没有在尹集中留名,袁枚没有与他交往过的记录来断定曹雪芹不可能游过尹幕,仿佛凡是尹幕中人袁枚就非认识不可,否则就绝无可能。这一发现至少彻底否定了这种假设,现实情况远比他们那“一刀切”的设想要更复杂得多。这次读《尹文端公诗集》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卷五的《初冬游摄山和曹西有韵》七律六首之后,接连读到两组尹继善北京入觐时写下的16首七绝。第一组六首,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入觐时在傅恒导游下遍历皇家园林,南旋时傅恒又赋诗送行,他的次韵之作。另一组十首,题为《过忠勇公第即事》,是专门赞叹傅恒园林之美的。诗中不但提到“回廊曲槛”,“画栋”,“飞霞”,“翰墨”“天章”,“红栏曲水”,一派《红楼梦》中的荣国府气像;而且还有北京很罕见,《红楼梦》中却有的“竹径松阴”,“阶前桂树”,再加上“平泉花木”,“绛纱”,“日影”,简直是一座呼之欲

出的大观园。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五首居然这样写道:“面面轩窗景自殊,偶凭粲者寄清娱。金钗十二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金钗十二”本来也可泛指姬妾,不一定与《红楼梦》联系起来。但尹继善在这里并不是凭吊某一王侯故居而是赞美傅恒园林,如果“金钗十二”借指傅恒姬妾,就简直是当面咒他没落了,怎么能说傅恒的姬妾“人何处”,“只画图”呢?加之前面还有“漫将游戏当繁华”这样不同寻常的句子,仿化傅恒的园林还与某种游戏文字有关。于是我想,把这首诗解释为傅恒园林的某一处“面面轩窗”之上,画着“景自殊”的“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金钗十二”的图画,不是更合情理吗?面这些人物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是水中月,是镜中花,是并不在人间的,所以说“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这就非常合适,非常得体了。

傅恒家事本来与《红楼梦》创作也有过一点关联,不过后来被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乃至张忠勇家事说淹没了而已。批本《随园诗话》曾有过这样一段批:

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这个批者似乎也跟永忠的叔叔弘沅一样,是个惊弓之鸟,怕书中有“碍语”而并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要不然不会说《红楼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这样的昏话。但他记录的这两个“戏云”,却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乾隆五十五六年间《红楼梦》尚以抄本流传的时候,社会上就流传着《红楼梦》写的是傅恒家事的说法了。这一组诗的被发现,还有庚辰本《石头记》十六回说到贾琏这个被凤姐戏呼为“国舅大人”的奶妈赵嬷嬷的时候,行间有一条

“文忠公之妣”朱笔五字夹批,意思是说这个赵妣妣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文忠公傅恒的妣妣。这条朱批过去长期被红学家们所忽视或误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傅恒生前封一等忠勇公,死后才谥文忠。这条批语不仅要把庚辰本的朱批年代下限延长到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傅恒逝世以后,还说明这个批书人是傅恒的亲属,否则不会称“文忠公”而不冠姓氏,并且他也认为《石头记》中是夹杂有傅恒家事如《随园诗话》批者所闻了。

我把我这些发现告诉了冯其庸与胡文彬,当时他们正在筹备《红楼梦学刊》,他们都鼓励我写文章。我也就写了《金钗十二人何处?》《文忠公之妣》等几篇短文,交给《红楼梦学刊》,在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几篇短文后来都引起过一些争论,傅恒家事说的研究也因此取得一定的进展。此是后话。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近两年,拨乱反正的工作越做越深入了,上海开始发还部分“文革”中抄家物质。消息传出,李祖韩生前秘不示人的那幅王冈绘曹雪芹小像手卷上的部分题诗又回到了他家属手中。这是从手卷上剪碎下来的三个片断,计有皇八子永璘五律二首一件,观保七绝二首一件,谢墉七律二首陈兆化七律一首合一件,这些遗物被李名胜捐献给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文研所工作的邓绍基、陈毓黻、刘世德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先后写成了专文。邓绍基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介绍得相当详细,也比较平实客观。陈毓黻、刘世德的《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诗》就不同了。他们致力的还是他们的“画像辨伪”工作,继已经发表的三篇长文之后,这篇“四论”先论定新发现的四人题诗所题乃王冈绘的《幽篁独坐图》,而像主则绝非曹雪芹而可能仍是俞瀚。不过,他们也发现他们过去坚持的结论有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了,在这篇“四论”中相应地作了一些修改。例如原来他们推测尹继善乾隆三十年乙酉人都,俞瀚并未随行,现在却

改说俞瀚也同入都,甚至“秋初即已先行前往”了。他们还说乾隆年间有两个俞瀚,一个是大兴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一个是绍兴人,布衣;人尹幕的是后者。他们的文章六月初就写好了,我是在八月间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见到的,也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陈毓黻与刘世德。会后,我写了一篇《“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辨》与他们商榷。他们的文章与我的文章先后在《文学遗产》季刊1980年第2期和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我的文章的结论有两个,第一,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第二,像主可能是曹雪芹,这是针对陈、刘二位援引谢墉题诗及陈兆仑题诗的上款否定曹雪芹立论的。我以为,谢墉题诗的内容及题诗时间都不足以否定这幅《幽篁独坐图》像主之仍可能是曹雪芹;陈兆仑题诗上款作“题为进老学长兄”而不是作“题进老学长兄照”,这个“进老学长兄”可能只是画像的藏主,也不足以否定像之可能是曹雪芹。其实,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众所周知,这幅小像原为立轴,是李祖韩购得以后才改装为手卷的。手卷中的题诗,仅从现存的三个片断板心高度参差不齐这一点看,在装成手卷以前,就未必与王绘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从题别的“幽篁独坐图”的诗中拼凑来的,说这四个人都是题这幅王冈绘的《幽篁独坐图》,还未免有点武断。即使这些题诗中有的确实是题另一个人的,也不足以否定已迷失的王绘画中人是曹雪芹。而另一方面,胡适在1961年还发表过一篇《所谓曹雪芹小像谜》,他是亲自见过小像及其题跋的,他还记得乾隆时题咏者中有陈兆仑与秦大士。现在发现残留片断中果有陈兆仑题诗,可见胡适的记忆力相当可靠。李祖韩屡次说过,乾隆题咏者除一人署雪琴外,余均署雪芹。这话胡适是知道的,如果他的记忆中竟无一个题咏者提到雪芹,他不会没有印象。在他的文章中他也和陈毓黻、刘世德、梅节等人一样,认为另有一个不姓曹的雪芹,

可见他一定是见过那些乾隆题咏者至少有几位是提到雪芹了的。我甚至这样想,这个被红卫兵抄去后只有三个片断残余留下来的手卷,和原图一起被盗画人剪去的那些乾隆间诗及后人题跋,正是署有雪芹上款的。恰恰是因为这四个人的题咏上款不作雪芹或无上款,才被这位盗画人剪下来废弃了。如果这个推测还有一点道理的话,根据这四个人的题咏来判断像主的是不是曹雪芹,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后来陈、刘二位又写出了他们的“五论”,说他们终于发现谢墉这两首诗是题金梯愚的《幽篁独坐图》的,我也没有再作答复了。

王绘毕竟迷失了,我真正关心还是陆绘。

那几年中,我只要路过郑州,就总要到河南博物馆看看,找武志远和郑新来,问他们是否找到了郝心佛的下落。我一共去过三次,哪一次都不得要领,他们总是说他们很忙,没有专门抽时间去调查等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严格保密。

河南博物馆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情况,我就转向中国红楼梦学会呼吁。1982年红楼梦讨论会决定在上海召开,我写信给筹备上海会议的胡文彬、徐恭时等,建议把陆绘借到上海让全国包括上海的文物鉴赏专家来鉴定一下题证及画像本身的真伪,然后再讨论是俞是曹。胡文彬、徐恭时都支持我的意见,向河南发出了邀请。出乎意料的是,河南博物馆竟以画像已调查清楚确系伪作为由,推辞前来上海。在一再敦请下,才由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和他们的调查报告,珊珊来迟,大会开幕后一天才到。

上海会议以前,关于这幅陆绘大体上有四种意见。

一、俞雪芹说。首倡此说的是郭沫若,他在看过画像后给河南博物馆写信说:“寄来雪芹画像已接到,但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理由是“尹继善所题的诗,在《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题为《题

俞楚江照》。”支持此说者有陈毓黻、刘世德和香港的梅节，他们写了许多文章，证明俞楚江与尹继善有“通家之谊”，是尹继善与之“诗酒赓和”的心腹幕僚，芹生江上，所以楚江又号雪芹云云。此说的支持者是不怀疑题记有伪的。

二、“敬空”说。主此说者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他从文物鉴定的角度入手，认为除尹继善题诗是真迹外，其余半开本是白纸，是当年尹继善题诗时为了表示谦虚留下的“敬空”。整个半开连画像带题记都是“20年代到40年代‘新红学派’盛行之时”一个作伪者“利用前半开白纸补画”的“伪作”。理由是“小像和题字墨色浅淡上浮，书法、图章均极粗略”。

三、周汝昌则坚持以为画的是曹雪芹，是尹继善借题俞楚江照的两首诗重题此像，才产生了矛盾。我大体上赞成周说，认为，只要画像不伪，题记非添，画像就不可能是俞楚江。因为年貌不符，身世不合，问题是出在《尹文端公诗集》诗题有误上。

四、冯其庸的改头换面说。冯其庸本来赞成我的意见，但1980年到河南博物馆看了画像以后，他的观点变了，先是给我写信，后来又公开发表了文章，他的《梦边集序》当时已经在《艺谭》1981年第4期刊出。他是在已经知道俞楚江的年龄、相貌都与画像不符才去河南的。因此，当他看到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皴擦水迹”便认为“改动后面部又上了一次色”还“用须眉笔重勾了一下，”“醒了一醒，”这幅画已经“改头换面”。面为什么要“改头换面”的原因，则在于原画的俞楚江“是长身锐头，换句话说高个子尖顶”，“必须把头部改动一下”，才符合文献记载的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他不同意史树青的“敬空”说；对题记有怀疑，但也认为未必伪，“不能指斥这个俞楚江竟有一个字叫雪芹”。

除了这四种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当时尚未形诸文字的“后题跋”说。这是我在北京时启功对我说的。他根据清代单幅无衬景

画像很少在画面上题跋的常规,怀疑这五行题原来是另一开纸上,是作伪者临摹缩小,移植过来的。他还告诉我题记是不是后题跋,画像是不是伪作,只要见到原件,辨别并不十分困难。但他没有见过原作,所以只能推测,也不想写文章。后来我在杭州西湖西泠印社壁间见到一些清代印人小像,题记的确是题在另一开上。所以我对启功的话有点相信,想设法让更多的文物专家见见原画像,听听大家的意见,先别忙于作结论。

1982年10月23日下午,河南省博物馆的代表,副馆长韩绍诗,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讲台上,手举着他们馆藏的《曹雪芹先生小照》原件向大会宣布,这幅画像的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的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他带来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及许多照片,声称他们的调查在三年内进行了三次,共计30余天,调查了60多个单位,走该了100多人次,几经周折,最后才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武志远竟三下商丘,却向我坚不吐实,瞒得我死死的。但韩绍诗的报告本身又有许多明显的漏洞,过分戏剧性的情节也曲折迷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当即作了个辩护性的发言,周汝昌也提出了质疑,并要求对画像作科学的鉴定。次日上海各报发表了新闻,除《新民晚报》的林伟平以《红学诗画两疑案》为题作了客观平实的报导以外,《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唱出了画像是伪作,20年悬案可下定论的调子。紧跟着《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也刊登了类似的消息。但在我和周汝昌等人的坚持下,大会秘书处还是派人持画像找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定专家以及市公安局核对笔迹的同志鉴定去了。大会闭幕前一天,鉴定的初步结果传出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定家认为,陆厚信题跋与画像是一体,与尹继善题诗的墨色、印色均无显著不同,无法说明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这个消息韩绍诗也知道了。大会闭幕,《新

民晚报》又发表了《文物鉴定专家提出最新见解,雪芹照题跋非现代人所作》一文,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河南博物馆的调查人报告,原来说会后交《上海师院学报》发表的;我也决定专门去一次商丘,重新调查一次,并答应写出调查报告来交《学报》同期发表。但后来我的调查报告写出来交了稿,周汝昌也写出《精华欲掩料应难——“雪芹小照”公案初剖》,《曹雪芹小像真伪鉴定纪实》也由翁敏华、高雪芳整理出来了,都在《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刊出。河南博物馆却借口调查报告还要补充修改,不肯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刊出,把稿子抽回去了。他们还要组织第四次调查。

我是1982年11月3日中午到达商丘的,持着韩绍诗在上海给我开的介绍信径找商丘县文化馆。由文化馆的施长河陪同,当天下午就在县城北关肖水口202号陋室中找到了郝心佛。郝心佛当时83岁,右眼失明,除两手有点抖,耳朵有点背以外,显不出其他老态,口齿非常清楚,反应也极敏捷。施长河说明我的来意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他的“作伪”经过,和韩绍诗在上海所说基本相同。他告诉我,他“作伪”的经过,已经写成文章,交给商丘县文化馆了,要我去找来看。我顺着他的言谈,问他们“作伪”时有没有改过画像头部,他说没有。他说得很肯定,说是因为谁也不知道曹雪芹长个什么样子,根本用不着改。我把我带去的冯其庸的《梦边集序》读给他听,又给他看。他认为那是他们误解了陆润吾的手势,陆润吾应该是捂住五行题记商不是头,头部绝对没有改过。那时陆润吾还在世,但已经不会说话,而且神志也不清楚了,所以我没有去找他。不过我还是间接通过他儿子陆代营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说是1963年朱聘之拿着《雪芹小像》找过他父亲,可能对画像的头部加工过。当天和次日我也见到据说是画像原藏主俞侗庭的孙媳妇井氏以及井氏的儿子、儿媳俞振国和孟繁英。井氏是个没有文化的70岁的老妇人,非常健谈,一见面就说画像不是曹雪芹

而是她们的老祖宗“楚江公”，并说这个“楚江公”祖籍绍兴，后来在徐州做过大官，她们俞家在徐州还有家庙。俞振国也说这幅画像画的是他们家“楚江公”，他小时候就见过，并不是武志远来商丘以后才见到的。只有孟繁英谈得比较朴素，她说她是当年三四月间武志远带来原件才见到的。并氏说五行题记原来没有，那是郝心佛、朱聘之他们添上去的。她也坚持头部没有改过，说正是因为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没变，所以事隔20年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她们家的原物。这个并氏讲话有个特点，每个问题都回答得非常肯定，比如她说她们家的“楚江公”在徐州做过大官，有七兄弟等等。我告诉她，我读到了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俞楚江是“布衣”，从没有做过官，而且“少孤贫”，不会有七兄弟。她根本不听，仿佛怕我骗她似的，坚持说你们不信可以去查，反正不是“曹雪芹”。俞振国是中学教师，当我问到，他父亲既然如此珍重这幅“楚江公”画像，他小时候随便翻阅一下便遭到他父亲的斥责，为什么后来又以五斤小麦的代价便随便出卖了呢？他想一想回答说，他父亲是俞侑庭抱养的。大概是由于这才不重视这幅祖宗遗像，如果他曾祖父在，一定不会让出卖。

郝心佛《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一文的初稿，施长河也找出来交给我了。此文当时尚未刊出，文中提到画像原装一册三十余页，有木夹板，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全本倒数第二面才是画像及尹继善题诗。最后一页，是楚门张鹏为画像题的七言绝句四首。他全文引出了这四首诗，与韩绍诗在上海给我看过的抄件大体一致。这四首诗，后来被河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以及徐邦达等人解释为与俞楚江身世正合，我却大以为不然。这四首诗的神秘出没，以及郝心佛亲口对我说的闪烁之词，使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应该彻底弄清楚。所以我先把这四诗全抄在这里：

先生肝胆世人知，何用描摹面目为？丝绣平原金铸范，偶从图画一窥之。

万壑千岩忆旧音，移家冀北又空群。诗裁书格无双誉。勘正风骚树一军。

君是伯牙我子期，咸连端属望山师。石函已得神仙秘，玉轴还留宰相诗。

吴门仙吏汉时梅，促若听莺判下才。今日风流谁比拟，白公堤上白公来。

对这四首诗我当时是极为怀疑的。我曾当面向郝心佛提出：为什么俞瀚几十首律绝他一句也记不得，偏偏这张鹏的四首七绝，除“今日风流谁比拟”一句原稿括注“此句已忘之”以外能大体不差地记住？是不是他自拟的？他对于我提出的质疑理由，无法否认，但他笑着说他的诗做不这么好。其实，从那一次交谈中我了解到，郝心佛是个相当有文化的人，并不如武志远所说的只略通文墨。他也会作诗，和梁漱溟有交往，他还出示梁漱溟在1980年11月、12月给他的两封信，又给我看了《赠刘修撰春霖》、《赠学者梁漱溟》、《思弟炳章》等诗，诗也写得不错，只是常犯孤平，与这里的“君是伯牙我子期”相似，诗风也有点相似。因此，尽管他否认，我还是有点怀疑是他拟作的。我把我采访商丘的所见所闻很快就写成《调查札记》交《上海师院学报》，《调查札记》中将梁漱溟的信、郝心佛“揭秘”之文及诗都引用了。同时，我还另外写了一篇《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寄当时正在讨论此公案的《北京晚报》，但《北京晚报》未采用。我是怀疑这四首诗的真实性的。因为俞瀚的生平，经过陈毓黻、刘世德的努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他是布衣，并不如郝心佛、俞井氏所说的做过徐州知府，“吴门仙吏汉时梅”就文不对题。这个莫须有的张鹏与尹继善有无师生关系姑且不说，

俞瀚是布衣,与尹继善无师生关系是肯定的。他因金辉推荐到过尹幕,尹继善也欣赏过他的《金陵怀古》诗,但“卒无所遇,卖药虎丘而亡”,硬要说什么“成连端属望山师”,也不伦不类。我也托人查阅了进士题名录,查出张鹏是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十八年已经死了,去世时尹继善、俞瀚尚未出生。这就使我更加相信诗系伪托。我把稿子寄给《北京晚报》的同时,也及时写信给郝心佛通报,并告诉了韩绍诗。时隔两月,韩绍诗即带着这四首诗的原件到北京开鉴定会去了。这个鉴定会我没有参加,徐邦达、周汝昌参加了,胡文彬还给我寄来了这两首诗的原件复制件。据说原件甚旧,字句无大异,只“成连端属望山师”句下多了一条双行夹注,有上款,作“随园学长老先生清照”,下款为楚门同学弟张某,某字挖去,连名章也挖了。只剩下半边“鸟”旁。原件的来历,郝心佛元月四日来信说“又经程德卿加上了张鹏四首绝句,更招来不少麻烦”,把它推到程德卿头上。待我去信详询时,直到4月15日才又改口说:“承询张鹏诗的原件,前些年赠与商丘市广场刻字处喜爱书法的胡大建临摹,去腊借来,转借河博摄片以证余言之非虚”。这已经在韩绍诗去北京开鉴定会以后,与韩绍诗的说法口径一致了。不过,据徐邦达说,这个诗页是郝心佛“从阁楼中找出来归之豫博”者。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闹不清楚。诗页上款的“随园”二字,从复制件上看不出破绽,上下一气呵成,见过原件的周汝昌、胡文彬也说没有挖改痕迹。但郝心佛却说,“随园”二字及“吴门”二字是他请程德卿挖改的,程德卿在《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一文中也这样承认。对此我很不相信,曾致函程德卿提出我的怀疑,并请他再写几个“随园”“吴门”试试。以此触怒了他,一再反唇相讥,甚至把红卫兵语言“勿谓言之不预也”也请出来了,仿佛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在他手里似的。他在《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见《中原文物》1984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某学者为了要促使郝心佛改

变证词，“自1981年11月以来曾对郝心佛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这个“某学者”就是指我。1981年系1983年之误，不知是不是故意留下伏笔，也不必计较。但所谓“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嘱咐他如何动手”三事却完全是他恼羞成怒后的血口喷人。为了剥夺他“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众的权力”，我倒要把他“不拟在”他的“文中披露”的“其中种种详情”先在这里“披露”一下。

所谓“馈赠银两”，是因为我在我的《调查札记》中全文引用了郝心佛《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当《调查札记》在《上海师院学报》发表得到几十元稿费以后，我知道他生活十分贫困，就从稿费中分出十元给他。他收后曾于1983年4月15日复函表示感谢。我觉得，见到他那种困境，我就是出于怜老惜贫之心真的“馈赠”一些“银两”，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何况还只有十元之微，而且是采取分稿费的名义赠送的。

所谓“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是从他给我看两封梁漱溟亲笔信引起的。从那两封信以及郝心佛的口述，我知道他曾当过冯玉祥部下的少将军需官，他夫人魏雁令是北师大1930年毕业生，是梁漱溟的好友魏朗斋的妹妹。他曾向梁漱溟求援，希望梁漱溟代他向统战部反映，为他觅一个文史馆员待遇。我看了梁漱溟的信，觉得他这要求既是出于无奈，也不无理由。我确实给当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周汝昌写过信，问他是否能与梁漱溟联合向政协反映一下。郝心佛本人也再次给梁漱溟写了信，并又把梁漱溟的复信抄给了我，梁漱溟也答应只要周汝昌领衔具名，他愿署纸尾。正巧这一年我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郝心佛得知消息后又写信告诉我，他还认识一个河南省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徐道蕙，是商丘人，他写了份履历，要我开会时找到徐道蕙面洽，设法帮助他银

脱困境。6月到北京开会,我找到了徐道蕙拜徐道蕙为他设法。这在我也不过怜范叔之意,也不知后来徐道蕙帮忙达到了目的没有。不过,据韩绍诗说,商丘县已经改善了郝心佛的待遇。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想说出来也不会丢我什么人!

至于“嘱咐他如何动手”,就更是程德卿的无稽之谈。我无论当面对郝心佛谈还是别后给他去信,都是一再指出他的言词不合情理之处,并明确道出我的怀疑,例如那四首诗,我就曾怀疑是他代拟的。但郝心佛复信,一再语无伦次,仅仅这四首诗,一时说迷失了,一时说送给了胡大建,一时又说从阁楼中找出,1983年元月四日的信竟说是“程德卿加上的”,实在弄得我莫名其妙,所以劝他讲实话,不要再制造迷雾了。6月6日,在他获悉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突然主动提议:

关于“雪芹小照”事,我打算函河博暂不发表,或请先生代我撰述一文。自觉老耄昏聩,前文是别人的代表,弄的是非颠倒,阴错阳差,此案可就此结束。

我当时读了觉得可笑,连忙回信拒绝,我不能德他“撰述一文”。并且也从这封信中才知道他那篇《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是在他“自觉老耄昏聩”的条件下“别人的代笔”。这个“别人”是谁呢?我当时就猜想是程德卿,只是由于证据不足,还不敢十分肯定。果然,程德卿在读了我的《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之后,又一次“不打自招”了。他在他的《伪“雪芹小照”的再辨析》一文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解释:郝心佛信中所说“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句绝句”一语,“其本意是指其初稿原无张诗,是经我的手加上去的”。又把“代笔”委婉地说成“誉清”初稿不敢断然否认。只承认“于是他背诵着,我记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真是

扭捏之态可掬。现在他居然说我嘱咐郝心佛如何动手,岂非血口喷人。要说做小动作,也只能说郝心佛在程德卿的导演下,曾经做过一些小动作,这一次又要求我帮助他也做小动作,被我坚决拒绝了!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说成是我嘱咐郝心佛如何动手呢?

程德卿还在他的《再辨析》中指责我说:我没有见过张诗原件和他本人的毛笔字,所以对“随园”“吴门”是否经过挖改,“没有资格说长道短”。而我偏偏在7月26日至8月19日短短24天之内,一次给他本人写信,两次给郝心佛写信,还跑到河南博物馆对人说,提出种种疑点,这就要被他“叹为观止”了。其实,除我在河南博物馆的那段话是他歪曲原意精心编造的以外,我那三封信的中心思想是不相信“随园”“吴门”四字是程德卿所写,那件所谓张鹏题诗来路不明。我的信中还有几句直截了当的话他不敢摘引,这就是我大体上这样说过,如果他程德卿、郝心佛真有如此天衣无缝的作伪伎俩,能到一个公开场合上去当众献技,一个洗去原字,一个对客挥毫,在:“张鹏原件”上再挖改四个字,还能做到“随园”二字的水平,瞒过众人的法眼,我就低头认错。否则我是无法相信他在给我的公开信中所吹嘘的陆润庠假冒名画的神技和他与郝心佛所招认的合谋作伪伎俩的。尽管我那时确实已经从香港《文汇报》上读到徐邦达的《悼红影议》和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从更多同志的来信中知道所谓张鹏原件在北京亮相时的反应,从《悼红影议》中还知道徐邦达也认为这“随园”“二字系洗去原有字后重书者,书法极劣,显与诗字等不同”了。

对书画鉴赏我是个完全的外行。原来我坚信画像左上方的五行题记为真,也不过和陈毓黻、刘世德一样,是相信郭沫若和多数鉴赏名家的意见。在上海会议上见到韩绍诗提供的朱聘之手迹复制件以后,我也觉得这五行题记确与朱聘之手迹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也曾想起启功对我说过的“后题跋”说。只是会议临结束前传出

五行题记非现代人伪作的消息,《新民晚报》作了公开报导,紧接着黄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曹雪芹的头像》也明确地说“画像本身与题句还有对页尹继善的题诗,都无疑是乾隆时代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看一看再说。1982年11月初旬从商丘回来写《调查札记》至18日脱稿,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被《上海师院学报》发表时删去,但后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照原稿刊出了,我现在摘录如下,以见我当时的慎重态度:

而且,画像本身的问题其实也没有最终解决。不能因为河南省博物馆的第三次调查彻底否定了他们自己前两次调查结果,和多数专家认为画像确为乾隆时旧作,就完全不考虑史树青、冯其庸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意见,例如,据施长河反映的陆润庠次子陆代营最近的意见,就与郝心佛的文章大相径庭,而于其庸的“改头”说有利。赵冠五虽然已经逝世,但如果在商丘或郑州终于找出一两幅陆润庠伪造的人物画,并经过对比鉴定确与这幅画的画风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安知史树青“敬空”说不重占上风呢?凡是属于学术性的讨论,属于百家争鸣范畴的问题,是不能机械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

但文章寄出不久,我就知道所谓“张鹏原件”在商丘出现并送到郑州来了,又“只限借看一天时间”云云,我想索看一下复制件也办不到。这是韩绍诗1983年1月3日的信告诉我的。紧接着《河南日报》1月9日就发表了程德卿致我的公开信。这封信本是程德卿1982年12月6日给我寄来的信,信末还有个附记,说他是11月15日因病回家,接到河博通知,叫他写篇稿,于20日寄往郑州,他写完未誊抄就寄出了,所以不能抄底稿给我看,叫我去审阅《中

原文物》好了。这封信在《河南日报》发表后,我曾校对过他的原信,修改了多处,但原意无大改变。我写信问韩绍诗,韩绍诗回信说,他对此信一无所知,《河南日报》公开发表也不是他代投。而我在1月23日针对程德卿的公开信写了一篇《“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兼答程德卿同志》。投寄《河南日报》,《河南日报》既不答复,也不退稿,甚至连续写信询问,也终于石沉大海,不理不睬了。后来只好与投寄《北京晚报》、《光明日报》都不肯刊登的《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一起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发表,才在1983年7月的南京全国红楼梦讨论会上与大家见了面。

韩绍诗在北京举行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尽管韩绍诗不通知我,我还是陆续知道了一些会上的情况。这个会是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史树青主持,《雪芹小照》和“张鹏原件”都带去了。韩绍诗在会上的报告,就是在上海那个报告的基础上针对我的《调查札记》和周汝昌的质疑作了些弥补之后于元月份由武志远执笔定稿的。这个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三下商丘调查的经过。武志远、陈松林和郭久理1979年11月5日至9日的第一次调查,是在史树青的“敬空”说发表以后组织的,并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时通知了史树青。因此,1980年2月21日史树青给我写信:“关于陆画曹像……已由河南博物馆调查清楚……河南博物馆将有文章发表,证明鄙说完全正确”。第二次调查,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参加的是武志远和郭久理,则是在冯其庸到郑州用放大镜仔细察看了画像之后首创“改头”说的同一个月,而结果又恰好与冯其庸的意见相符。第三次调查的时间是1982年3月31日到4月17日,参加人还是武志远和郭久理,却是程德卿的一封信和郝心佛的《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和程德卿的《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这两篇文章吸引去的,结果就出现了在上海会议

上亮相的“突破”性的成果。没想到一出场就遭到挫折,也以不敢发表。于是,又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就个别问题作了些补充调查,实际上是针对我和周汝昌的质问作了些弥补,才最后定稿发表出来。

这篇几经修改的《调查报告》仍然存在着许多漏洞,于是,我又写了一篇《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对《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一一作了剖析。我指出,修改后的《调查报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实地站在冯其庸的“改头”说的立场上,不像韩绍诗在上海宣布时那样游移不定了。但包括郝心佛和井氏在内的所有证人都说头没有改,郝心佛1980年元月4日给我的信,就是说“张鹏四首绝句”是“程德卿加上”的那封信,还特别嘲笑程德卿说:“程德卿好武断,硬说题签是我写的,硬说画像上有改动。我说实在没有改动,俞振国母子也说没有改动,今上海书画鉴定专家及裱画师傅均说头部没有改动,他还要立军令状,我看诸葛亮非杀掉马谡的头不可,他还自诩其眼界之高明,岂不是笑话吗?”后来徐邦达的《悼红影议》也就画像与尹继善题诗“都是二百年前之笔,一无可疑;对头部四周的水渍之痕,徐邦达的解释也和画家戴敦邦的解释一样,是有人用双氧水洗过的缘故。郭若愚虽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他曾用双氧水洗过许多旧画,大都不再留痕迹,而估计是陆润庠自作聪明在画像头部作过某种加工。可是,他也认为“画像依旧是原作,虽然经过涂改,但基本画容未变”。看来现在文物鉴赏专家的意见是比较统一的了,即画像头部未曾改动或者虽经水洗而面容未变,即从来就是这个胖呼呼的中年人模样。而如果这个结论能成立,画中人不是“长身锐头,玉立峨峨”的瘦老头子俞瀚就毫无疑问了。问题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只能从《尹文端公诗集》诗题有误找出路了,而这是我早在1978年就很好地解决了的。

其次,《再辩护》关于画像在左方的五行题记也说了不少意见。

我当时虽然认为题记确实与朱聘之的手迹非常相似,但仍有怀疑,是主张用可靠的科学方法鉴定一次。后来读了徐邦达的《悼红影议》,他提出的四点看法又一次使我想起启功的“后题跋”说。我对文物鉴别是外行,我决心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恰巧这时在南京会议上又爆发了一场“印章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徐恭时在大会上发言,说他和郭若愚等人发现题记下面“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请大家注意。当时《小照》原件正在南京展览,辨认是很方便的。粗粗一看,的确像个“信”字,稍像辨认,又分明是个“倍”字。因为印章的左侧印得很轻,土旁不明显,但右边作“音”是明显的。而我早就知道,据说陆润吾有个叔叔陆厚培,如果印章真的作厚培而不是厚信,那么,“后题跋”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我又想陆润吾既是作伪老手,总不至于连自己叔叔的名字都搞不清吧;郝心佛说朱聘之、陆润吾、程德卿都是经常交往的商丘朋友,这五行题记是他和朱聘之、陆润吾三人合谋捏造的,由朱聘之携往陆润吾家用印,难道都不知道这个印章是谁的?正当我犹疑之际,赵国璋拿来了新出版的《古玺文编》,指着51页上的“信”字古文,右侧正作“音”,一个年轻的篆刻家汪可夫也说古“培”字的右侧不能作“音”,有根有据,徐恭时不能解答,问题又搁浅了。但我倒是寻根究底的,碰巧郭若愚也与我有通讯关系,我也知道他是一位红学辨伪健将,就写信请教他。这时,同在南京开会的黄进德告诉我,按用印的常规,名章在上,字章在下,而这题记的用印却是字间“艮生”在上,违反常规。等到《中原文物》1984年第四期出版,郭若愚、潘德熙都有文章详细谈“陆厚信”之确为“陆厚培”,“艮”与“培”字有点联系而“艮”与“信”却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倒真有点像程德卿所说的“溃堤蚁穴”,我觉得“后题跋”说是应该承认的了。

但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可能是曹雪芹。

事情还得从“后题跋”说的最初被提及时说起。对于我来说，那是启功早在1979年5月26日告诉的。启功当时并没见过陆绘，但他是最初向吴恩裕提供王绘照片的人，又是知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见多识广，所以向他请教。他当时是从清代单幅无衬景小照惯例画面上无画家长题跋的常规说起的。他当时认为画像像主可能是俞瀚，题跋是后添的。但他并不认为题跋是凭空捏造，而认为很可能是从另一开移植、缩小、过录来的，“雪芹先生”应作；“楚江先生”，是过录的人擅改以冒充雪芹画像。当时关于这幅画像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俞雪芹”“曹雪芹”上，“敬空”说我和启功都不赞成，“改头换面”说尚未提出，郝心佛、程德卿、俞振国母子等人物尚未出场。因此，他的“后题跋”说给我印象很深，后来在我的文章中也屡次提起。特别是在史树青发表《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认为此像是苏州沧浪亭石刻张问陶小像的摹本以后，我特别想看看清代的小幅肖像究竟是怎样题跋的。1982年在上海讨论陆绘真伪是非未定之际，恰巧归途路过苏杭，我不仅到沧浪亭上觅张问陶石刻像，也到西泠印社见了大批石刻印人小照，张问陶像与陆绘画中人丰神迥异，张像拱肩缩背，神情冷漠，陆绘潇洒飘逸，奕奕有神，根本是两回事，看看也就算了。西泠印社壁间的印人小像，却切实地证实了启功确是言之有据，那些印人小像也是与陆绘相仿的无衬景小幅，确实没有一幅在画而作题记如陆绘的。题跋都在另一开上，与画像大小相同，合成一副。从那时起，我就有点相信后题跋说了，只是一时还不能判定这五行题记之是否现代人所作，所以回来写《调查札记》时还不肯贸然从原来的立场下后退。后来从朱聘之手迹与题记相似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徐邦达又说谢稚柳曾亲口对他说外界所传他说题记非现代人所作是误会他的原意。我相信徐邦达不会造谣。特别是印章的风波平息下来以后，潘德熙、徐邦达都以极有说服力的行家里手之言写了文

章,证明印章确为“陆厚培”而不是“陆厚信”,五行题记之为朱聘之后添就可以不待中子激活分析法的科学手段也能证实了。人在事实面前是应该承认过去的误断的。正像史树青在 1983 年 2 月 28 日报告会上修正自己的看法,放弃“敬空”说,冯其庸也不再坚持“改头换面”说一样,我也愿意公开声明,那五行题记确系后添,陆厚信是朱聘之不识古篆造成的误会,这幅画像是乾隆时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画家画的。

但承认“后题跋”说,承认五行题让为朱聘之所书,并不等于这幅画像的像主就是俞楚江而不可能是曹雪芹。

此像之不可能是俞楚江,我过去提出过“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四点理由,现在否定了题记非原有,“身世不同,生平不类”两点不存在了。但“年龄不合,相貌不符”两点还是很显然的。自从徐邦达的《悼红影议》,刊出以后,“改头换面”说的首创者冯其庸也偃旗息鼓了,只有程德卿一个人还在他的《再辨析》中坚持“画像本身确实改过”“不能以任何人的话为准”。他引用我给他的信,回答我说的“如郝、井确系端人,又确未被人愚弄,则自当以彼等所言为准。”而认为郝心佛、井氏的话都不可靠。他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引用徐邦达的《悼红影议》特别是在谈张鹏诗作非近代人伪作这一点上很起劲,但偏偏徐邦达谈画像头部确未改动那一长段,他又讳莫如深,一字不提了。这就是程德卿的逻辑!

我在《再辩护》一文中,曾不客气地指出过:程德卿不是局外人。这使他恼羞成怒,在他的《再辨析》中对“某学者”也就是我进行人身攻击,指斥我“自 1981 年 11 月以来,曾对郝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他要“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世,勿谓言之不预也”!满纸红卫兵语言。对于他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诬蔑,前面我已经作了回答。这里我只补充几个事例,来证明此人言词的全不可靠。

第一,他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报》致我的公开信上说及画像题签时写道:

“说题签为郝氏所书者是我。1980年豫博第一次来访我,在令我看此文物前,问我认得郝的字迹否,我以认得相答。而后取出文物,我一见题签便说:‘这就是郝心佛的字。’说题签为朱聘之所书者是郝,上月初您访问他时,他亲口向您如是交待。我这次因病回家治疗,郝氏来我家相叙,介绍了您访他的事,当他提及向您说签为朱所书时,我即反问他:‘题记既是聘之写的,题签还让他写,就不怕人家看出破绽?’他对此问无以置答,乃曰:‘已经二十多年,我现在也有点糊涂,是记错了。’”

公开说郝心佛曾向他承认“是记错了”。但事实却是我前边引用的,1983年1月4日郝心佛还嘲笑“他还自诩其眼界之高明,岂不是笑话”,根本没有向他认错。更妙的是,最后大家从字迹辨认上一致认为那题签确系朱聘之手书,韩绍诗也不得不改口,他程德卿也不得不认账的时候,他又想出了新的绝招,请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1980年11月,省博物馆来人访我时,我们的谈话是以郝心佛为中心内容,当他们叫我看题签字迹时,一因这字迹很眼熟,二因当时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所以便说是郝心佛的字。”

没有办法强辩了,还要捏造出理由来掩饰,只能越抹越黑,越遮越丑。“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字迹很眼熟”,就可以信口开河,“就是郝心佛的字”,让韩绍诗在上海跟着乱说吗?“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就满口说的也是郝心佛;但当郝心佛当面向我说明,并指出“先”字的长撇正是朱聘之的习惯笔法,我又把这一点写进了《调查札记》,程德卿也早读到而且多次论难了,不是还“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的时候,该脑筋清醒一点了吧?为什么在修改后的《揭发‘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及给我的公开信中还一口咬定是

郝心佛写的,甚至还造谣说郝心佛当面向他承认“已经二十多年,我现在也有点糊涂,是记错了”呢?

第二,我在《再辨护》中指出他不是局外人,他大动肝火,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局外人模样,说1964年郝心佛拿着张鹏诗页找他改写四个字,“改写时郝已将原字擦去,他叫我写啥我写啥,别无所知;1982年11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叫我写啥我写啥”,真是推得一干二净。但他自称其所以要对画像的真伪“初探”,“追踪”,不辞劳苦,是因为“自家虽感到其中有问题,但又不知实情;若袖手不前,于心不安,问心有愧”,完全不是那种“叫我写啥我写啥”的不问原委的人物,这矛盾又怎样解释呢?他那篇《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与郝心佛的《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本来是一母孪生的姐妹篇,郝心佛在给我的信中也承认过他那篇文章“是别人的代笔”。但程德卿却只承认“为他誉清《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初稿”而不承认是他“代笔”。那所谓张鹏原件的四首诗,郝心佛在给我的信中明说是“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首绝句”,明说是他加上去的。但程德卿却只承认是他劝郝心佛加上去,“好让世人多了解些与画像有关的材料,于是他背诵着,我记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时间在1981年8月底,大体上与河南博物馆《调查报告》中所说的1981年9月收到他一封来信,接着又收到他和郝心佛两人的文章相同。如此说来,这四首诗的原委至少在1981年8月底以前已经知道了,怎么又说一直到“1982年11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呢?

第三,在《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一文中,程德卿说郝心佛在冯玉祥逐溥仪出宫时,有“一太监潜携《三希堂法帖》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出宫时,为之查获”。郝心佛本人也有此

说,并写了篇《快雪时晴帖历险记》,在《文物天地》1983年第一期刊出,还特别写信告诉过我,信中对《编者附记》颇致不满。那本《文物天地》我也找来看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请看吴景洲的专著《故宫盗宝案真相》第16页的《扣留书画放出元宝》一节:

溥仪夫妇以及两老妃的应用物品,夹带一些珍珠宝贝都运出去了。仅仅在溥仪的铺盖之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同一卷仇十洲画的《汉宫春晓图》,不客气地扣留下来。

《快雪时晴帖》是“三希”之一,夹在溥仪铺盖卷内企图潜携出宫是可能的。随便落入太监之手携出宫门为下级官所截获,只能说是郝心佛或程德卿的欺人之谈。我所以把这个细节也揭举出来,也不过是要告诉包括河南博物馆调查人员在内的一切人等,程德卿们的言谈不可轻信。

现在还是回到这幅不知名画家画的无款识的乾隆时代的小照为什么仍然可能是曹雪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

前边提到,我发现尹继善《过忠勇公第即事》等组诗后曾写过一些文章,探索曹雪芹晚年的行踪。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八辑上发表了《曹雪芹与尹继善、傅恒交游考》是联系这幅画像的题记谈开去的。我因为尹集中有许多与曹西有、宋宝岩、陈光岳、娄毓青等幕友唱和的诗,而这些人在《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中均不曾留名,从而推测袁枚是有某种担心而故作“烟云模糊之笔”。曹西有可能就是曹雪芹,而宋宝岩则可能是宋荤的子侄,正因为他是贵胄子弟作幕,所以在南京能筑有私人小园林“竹深留客处”。当时曾传说这画像原是一册,刘世德在上海会议上还当众说过他见到的有八幅,画中人或坐或立,估计都是尹继善的幕僚,而郝心

佛原说画像是从商丘宋萃后人手中购得,我曾猜测画像册大概就是宋宝岩的所有,是由他带到商丘来的。但后来我专门查了《商丘宋氏家乘》,宋萃子侄中没有宋宝岩其人,就没有写入了。但对于曹西有之可能是曹雪芹,我是写入了的。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的附注中也有此猜测。我们当时作这样的猜测并非没有一定的依据,文章具在,这里不重复了。后来陈毓黻、刘世德从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中查到:“曹庚,字西有,一字鳧川,上元人,乾隆庚辰举人,工绘事,有《且想斋集》。(西有能诗,兼工绘事。子含辉,亦有名。)”在他们的《五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中提出“曹雪芹绝非曹西有”的论断。其实,《国朝金陵诗征》的这条材料,高阳早在1978年就引用了,又被收入1981年10月出版的胡文彬、周雷编的《台湾红学论文选》。不过,高阳写文章时我和周汝昌还没有提出曹西有可能即曹雪芹的推测,高阳引用此条,是想证明尹继善很宽厚,对幕友尊礼有加,来反证曹雪芹不曾入尹幕罢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国朝金陵诗征》的材料只是孤证,朱绪曾又是道光间人,也可能传闻失实,总之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即使曹西有确非曹雪芹,也不能说在那段时间里曹雪芹不可能和宋宝岩等人一起入过尹幕,不能说尹继善那两组诗和《红楼梦》之间没有蛛丝马迹,不能说傅恒家事和《红楼梦》没有关联。

仅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和某些脂批分析,曹雪芹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曾出京幕游是可以肯定的。五行题记如果是从另一开移植,如启功所说,但“雪芹先生”决非改写,因为“长身锐头,玉立峨峨”的60岁的瘦老头子决不可能是画中人这幅形象,只有曹雪芹才能是这个年龄,这副模样。而且,俞楚江与尹继善也决没有题记中所叙的那种关系,有这种关系的也只可能是曹雪芹。再者,从《过忠勇公第即事》等组诗成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看,那是尹继善奉命入觐,所以题记中不曾说及离任惜别之语,也是合情合理

的。按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计算,丙子才42岁,正值盛年,所以神采奕奕。这样,尹继善那两首题诗也好解释了。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尹继善奉命入觐,广大幕僚包括曹雪芹在内都留在南京,所以说“白门云树望中遥”。“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也可以解释为尹继善久客南京又得北归时的口吻。这两首诗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尹继善入觐南归前在北京题的,和《过忠勇公第即事》等组诗的写作时间大体相同或稍前。此时俞瀚与尹继善还不相识,无由题俞楚江照。是这部画册辗转流入俞瀚之手,编辑尹氏遗文时,由俞瀚的家属把这两首诗抄出寄往,编辑人不明真相,见诗自俞瀚家流出,就擅自加了诗题。我过去以为这个编辑人是袁枚,现在想再作一点修正,因为袁枚编的《尹文端公诗集》是八卷,而且尹集增订为十卷出版时袁枚已经去世了,这个编辑人是庆保委的另一个人,对尹氏的幕府更加不熟悉,错拟诗题的可能性更大。

在《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的再辨护》一文中,我原稿中本来还举过两个编辑遗集时误拟题目的实例,被《中原文物》删掉了。我那是从徐邦达的《鉴古琐记》中读到的。《朱文公集》卷八十一有《题曹操帖》一文,实为钟繇《贺捷表》题跋,只因为跋文原无题目。被编者误题为《题曹操帖》了。《勾曲外史集补遗》中的《题赵仲穆竹西图为杨元诚》,这个“杨元诚”,据徐邦达考证,是杨瑀之字,与杨竹西杨谦实为两人,毫不相干,题目是毛晋刻书时强加上去的。可见这种原无诗题的遗诗编集时被强加诗题从而致误的先例是有的。现在画像上的这两首尹继善题诗恰巧也没有题目,而尹集编者又认为必须代拟诗题,由于不明真相,只根据诗自俞瀚后人抄来这一点便误题《题俞楚江照》,不是完全可能的吗?《调查报告》引用陈毓黻、刘世德的话说“《题俞楚江照》这五个字,是尹继善自己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亲笔写下来的诗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尹继

善根本没有写过诗题,何亲笔之有!

反对这种推测的唯一根据就是有人坚信郝心佛和井氏母子的话,认为既然他们都说是俞瀚,是“楚江公”,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事实并不如此,他们的话很不可信,他们的话,不但互相矛盾,而且他们自己说的也前后矛盾。比如画像的装帧,郝心佛说是全本约 30 来页,内容多为俞瀚所撰之今体律、绝,后署“俞瀚书”,全本倒数第二页才是俞瀚像,末面是楚门张鹏为此像所题七绝四首。而井氏却说面像在第二面上,再前面只有一张空白纸,画像后面也是空白纸,拖拖拉拉一长串,一个字也没有,还说夹板的封里有一个粉红色纸条,还记得纸条上有个“俞”字,又比如郝心佛原说夹板上有个题签,写的是“徐州知府俞公……”后来又说,“是徐州府里小官吏,不是知府”了。我也曾写信请教过杨霁云,回信告诉我“中国的册页从来没有前是诗文后有画像的”,不知徐邦达、史树青、郭若愚根据他们的经验是否同意这意见。如果这个意见是经验之谈,那郝心佛所说,我恐怕又与他侈谈的从太监手中截留《快雪时晴帖》一样是神话了。至于井氏母子之言,则正像程德卿在觉得他们的意见对他的观点不利时所说:“当年一个没文化的妇女和一个稚子,对当时不曾留意而 30 年后仍未觉察到的细节,能说得准确不误吗?”而且,郭若愚在他那力排众议、独创新说的《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目验记》中所说“此像决不是俞瀚,更不是曹雪芹”,“也许就是俞侗庭的父或祖”,“尹继善的题诗是后人的摹本”云云,实际上也是以否定井氏母子的话为前提的。因为俞侗庭的父或祖,无论如何也不会唤作“楚江公”。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来,是想向红学界的朋友们提醒,这场延续了 20 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且不要急急忙忙就想总结经验教训,更不要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随便对我和周汝昌肆意嘲笑,这样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对学术空气的活跃都不利。我这样讲是有根

据的。

《红楼梦研究集刊》是红学界一个有影响的刊物。它的主编、副主编就是参加画像真伪争鸣的主角。1986年10月出版的第十二辑登徐邦达的《悼红影仪》而不登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刊登河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程德卿的《画像之谜的经过》、郝心佛的《画像之谜》，而独独不登我的《画像调查札记》。在《编后记》中还说“这个曾经盛传一时的所谓曹雪芹画像，其本来面目应当说是昭然若揭了。回顾学术界的这一场历时20年的讨论，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的”。但郭若愚的《目验记》最近还提出了全新的意见，怎能说画像的“本来面目”已经“昭然若揭”？问题还远没有澄清就企图作含糊的片面结论，不正是很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吗？

吴颖是红学界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写了些有学术价值的论文。1986年2月，在《汕头大学学报》发表压卷第一篇的长论文《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居然长段引用程德卿“勿谓言之不预也”那些吴颖自己也知道“是不可取的”“打官司”式的语言，实在“令人浩叹”！那程德卿“不拟在此文中披露”的“种种详情”，我前面已经一一“披露”了。如此“馈赠银两”，如此“为其谋求爵禄”，如此“等等小动作”，你不要哑然失笑吗？当然这《中原文物》有责任，但你吴颖也无奈太匆忙了吧，为什么不了解一下真相然后再发言呢？

后 记

这是我11年前为出席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大会上散发了，但一直未公开发表。那次大会后由张锦池、邹进先编选的研讨会论文选集也没有收，甚至论文选集后附的存

目也未列入。

但“曹雪芹画像”之谜,事实上并没有解决。198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千古之谜——中国文史500疑案》一书的269页有一个辞条《“曹雪芹画像”孰假孰真?》,对此就有简单的介绍。

前几年周汝昌在山东《齐鲁学刊》又重提此案,我也在山西《晋中师专学报》重提,但都没有引起重视,倒是《河南画报》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来了劲,于1995年用很大篇幅,分两期连载,“左图右史”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曹雪芹画像”的报告文学。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很快也摘要转载了。以致引起张中行先生在1995年第8期《读书》上发表文章,说这是俞瀚画像,还称赞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搞调查的同志是什么“福尔摩斯”。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张中行谈俞瀚》,指出张先生连《河南画报》的原文都未看,只凭《文汇读书周报》的摘要就下结论做得太轻率。但文章寄《读书》却客气地退稿了,还是发不出来。

这才使我又想起了这篇《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这篇《亲历记》对争论的起因及其曲折起伏的过程有说细的叙述,今日重看,仍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黄河》愿意刊登,只想补充两点。第一是职业画家的意见,戴敦邦出席了1982年上海的《红楼梦》研讨会,看了画像原件,曾对我说,这种画部傅粉带写生意味的肖像画,康熙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是受了乾隆年间郎世宁画风的影响,戴敦邦认为这幅画像的艺术水平很高,不是一般仿伪者所能达到。第二是我最近与商丘胡大建取得了联系,他寄赠了一张所谓“张鹏题诗”的彩照给我,原件还在他手里。他说郝心佛在河南博物馆三次调查时说了假话,题诗中的“随园”二字根本没有挖改,程德卿的书法水平不入流,原件具在,可以覆按。其实,这幅所谓“张鹏题诗”四绝句的内容,处处与袁枚的生平身世相符,而与俞瀚这个并非尹继善门生的布衣寒士风马牛不相及。这张纸质、开本与

“曹雪芹画像”完全一致的所谓“张鹏题诗”的出现,证明原册页至少还有一幅袁枚画像,而决不是如井氏所说的全册页只有俞瀚一幅画像,其余全是俞瀚的诗。何况,当“曹雪芹画像”的照片在《文物》杂志 1973 年第 5 期作为周汝昌文章的插图最初亮相时,周汝昌加了一条小注,引最初发现此画像的上海文物局长方行给王士菁的信,说他在河南博物馆看到的是——一本册页,画像有多幅,像主或坐或立,各有题诗,大概都是尹继善的幕友。刘世德在上海《红楼梦》研讨会上也曾在大会上当众说过,他最初在北京看到此册页时,记得是八幅。周汝昌在给我的信中说,当时黄苗子也见过,是多幅而不是一幅。但是,1982 年在上海讨论时,方行不肯出来作证;周汝昌说他保留着方行寄给王士菁的原信,又找不到了;而刘世德又立即否定他自己当众说过的话,说可能记错了云云,弄得扑朔迷离。现在这幅所谓“张鹏题诗”的重现,至少可以证明一点,井氏、郝心佛、程德卿等人确在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调查的“导演”下说了假话。

这幅画像。199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红楼梦之谜》也有专文介绍。文章是魏绍昌写的。他说我已经把对陆画的研究与“自己的学术观点结成血肉关系”了(见该书第 361 页)。他在行文中把我与周汝昌等量齐观,说我们对陆画是“力主全真”。其实,我从 1978 年作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最初介入争论时起,就与周汝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写《争鸣亲历记》时,更接受了启功的“后题跋”说,连画家是不是姓陆也不再坚持了,怎么还“力主全真”呢?不过,我与周汝昌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还是一致的,即画像像主只可能是曹雪芹而决不可能是俞楚江俞瀚,《争鸣亲历记》原文具在,我坚持的只有这一点。

前两年,我从'94 莱阳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得知,《争鸣亲历记》中涉及的许多当事人,像吴颖、郝心佛、陆润吾都已经作古

了。最近又得知,当时代表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的“福尔摩斯”武志远,井氏之子俞振国,也都逝世了。了解内情的人越来越少,我和周汝昌是争论中的绝对少数派,而且意见还不完全一致。现在张中行又取代了吴颖的位置,像当年徐邦达以权威的身份轻易“鉴定”所谓“张鹏题诗”的上款“随园”二字系挖改补写的一样,也轻率地出来表态,随意判定画像像主不是曹雪芹而是俞瀚。尽管他们的结论漏洞百出,互相矛盾,但成见难移,高名可畏,看来这个问题一时还难于澄清。这次把《争鸣亲历记》重新发表并补此《后记》,目的也只是希望引起红学界和文物界更多的人士来关心,继续探讨,使曹雪芹的风采重现人间。

第五輯

尘埃落定

□黄昌勇

寂寞孙大雨

第一次见到孙大雨,是在1994年的春天,记得我从复旦大学南区穿越市中心,来到吴兴路一座高层,据说,这里都是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驻地。孙大雨平反后有关部门给他安置在这里,其实,孙大雨居住的也不过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楼房。实话说,这次见面,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其时孙大雨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穿一身蓝布中式服装,大的面庞已显松弛,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的思维也已处在混沌状态,前尘往事在他深邃的记忆中只能永久地埋藏了,只是他偶尔用纯正的美式英语谈及关于莎士比亚、新诗格律的问题在提醒我:岁月的流徙,并没有带走他在他心灵深处的刻痕,他虽然不能用清晰的语言向人言说,可留在他内心的人生悲喜剧却仍在一幕幕收合开启。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段让人怀念让人心惊的历史,我悄然离开,带着深深的遗憾。据说,在我之前,除华东师大的陈子善先生来访过,少有研究者问津。孙大雨生于1905年,是亲历五四新文化而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加上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他理应归于文化老人的行列,试看文革结束后,无论是留在大陆,还是蛰居海外的文化老人,大都受到研究界和读书界的包围与垂青。有人戏言,因为这些文化老人而成就精神和宝贵遗产的作用,当然客观也将这些已在人们视线中消失或渐渐模糊的

身影又清晰地拉回到前台,他们的精神创造也一度填补了几十年的文化荒漠所留下的空白,有的甚至形成了当代文化热点而持久地为人关注。

然而,孙大雨,这位文化老人是寂寞的。

1997年盛夏,在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攀骏先生一见到我,就说他正在忙于《中华文化通史》最后的三校,恰好遇到一个问题,即孙大雨是否健在?我告诉他孙大雨于本年1月5日辞世,因为当时仅上海的两家报纸在很不显眼的位置发布了简短的消息,远在北京的攀先生自然不得而知。顺便说一句,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成了显学,据说从事这方面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员达数千人,其中教授级的就有千人以上,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还没搞清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史料,孙大雨也不例外,且不说他作为典型的新月派诗人或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及他新诗格律理论的独特贡献未被充分注意,就是他的生平著作的基本情况在一些文学史著及专门著作中也语焉不详——对于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来说,孙大雨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写这篇文章,离孙大雨逝世不过一年余,一年来我时时有想写他的冲动,却又不知道如何去下笔,接到孙大雨逝世的讣闻,我再次穿越上海市中心,赶到龙华为他送行,那天寒意袭人,天还刮着大风,有点凄凉的告别仪式让人更添寒意:来告别的百十人大都是他的亲友和一些学生,没有学界名流,更无达官显贵。孙大雨躺在鲜花丛中,安详的面容一如我几年前第一次也是他生前我唯一一次见他那样显得若有所思。

孙大雨寂寞地走了,此后,也没有流俗般在报刊上读到纪念或回忆的文章。

他还要承载身后的寂寞。

回顾孙大雨的一生,我们更多地只能现代史籍中来爬梳他的

人生轨迹,其实他的前半生并不寂寞。

1930年秋天,26岁的孙大雨完成了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学业,谢绝了加拿大麦古尔大学为期五年的高薪聘请,回到了黄浦江畔,他开始在武汉大学等国内名校任英美文学教授,并成为新月旧侣新朋重聚中的重要一员。集诗人、学者、教授于一身,年轻的孙大雨可谓春风得意,他的为数不多的十四行诗及未完长诗《自己的写照》赢得一片喝彩,徐志摩、陈梦家、梁宗岱、苏雪林等诗人、批评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且不说他的未完长诗,就是他的一些短诗也气派不凡,有的俨然是大家手笔。

孙大雨回到祖国,但他或许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国家很快就陷入了灾难的岁月,八年抗战中,他同其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历经转迁的磨难,至抗战胜利前,孙大雨基本上是作为一名学者安身立命,只不过他教书之外,主要的精力已转向了莎士比亚的翻译及中国新诗格律理论富有成效的探索。

岁月的动荡,生活的变迁,近十年的时光流失磨洗着他的青春和年华,孙大雨未能做出与他才华相对应的更多的实绩,但他还是作为一个学者,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收获。

其实,在孙大雨回国的最初十余年中,表面上平静的人生现实已掩藏不住他与生活作战与世俗对抗可能给他带来的潜在的创痛与隐忧,孙大雨性格悲剧的因子在此时已经开始发芽增长。我们从他不断应聘又不断被解聘不得不南北转徙于各高校的事实就可感觉到,孙大雨穿行于世俗的人世之网中的愚倔和单纯。

1933年下半年,孙大雨应时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梁实秋邀请,来到这里教授英国文学,可是一学期结束后,孙大雨竟没有收到下一学期的聘书,原来孙大雨无意中得罪了他的清华学长,新月同仁梁实秋,因为孙大雨不同意梁实秋用散文翻译作为诗剧的莎士比亚,竟在课堂上随意给予了批评。梁实秋长孙大雨三岁,那

时他虽然以新月理论家而为人所知,但远还未赢来他“雅舍”时代的声誉,又加上年轻气盛,不能容纳孙大雨的直言也是能够理解的。

也是在青岛,孙大雨结识了京派文学的重镇小说家沈从文,殊为可惜的是我们已无法知道两人交游的史实,仅从沈从文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理解的深厚,沈从文在这篇短文中似乎已指证了孙大雨在青岛的遭际,更是对他此后人生命运沉与浮的最早预言。

1934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开设“人物志”,其实就是以名人写名人,列入其中的大都是近代以来学界的翘楚,时至而立之年的孙大雨侧身其中,而且是沈从文执笔为他“画像”即《孙大雨》一文。

“十分粗率的外表,粗粗一看,恰恰只是一个人的坯子。大手大脚,还在硕长俊伟的躯干上,安置了一个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沈从文接着这样写到:“然而这个毛坯子的人形,却容纳了一个如何完整的人格,与一个如何纯美坚实的灵魂!多才,狂放,骄傲,天真。倘若面对这样一个人,让两者之间在一种坦白放肆的谈话里使心与心彼此对流,我们所发现的,将是一颗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说的美丽的心”。或许因为经过文学表达的润饰,或许有中国史传传统扬善隐恶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的作家也许给予了他笔下的人物过多的赞美,但是如下的叙写则能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的敏感,他的笔触直指人物内心和灵魂,把那人生悲喜的根子在这里都作了传神的展示。

在沈从文的眼中,孙大雨比许多人认识“美”,而许多人比他更明白“世故”,孙大雨是一个“有脾气有派头的人”。他继续写到:他身边那些温顺,中庸,办事稳重,应对伶俐,圆滑如球而抹油,在社会上处处占上风的人一提及孙大雨就是“大雨吗?”话语里埋伏了

点嘲诮,不同意的神气酿在嘴角的微笑里,沈从文解说道:“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平素就是怕魔鬼,怕高山,怕风刮,怕打雷的人”,因而,孙大雨在他们面前简直是一种“恐怖”。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去引证,只是我深味于沈从文的精到,“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也是我半个世纪后第一次见到孙大雨的印象,谈及孙大雨时那种嘲诮的神情我也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人那里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实在是深重的,这让我们不时重温鲁迅先生关于“隔膜”的话题,人生有许多纠葛和悲剧也许就是以此为由头的。

孙大雨为人直率,绝不同虚伪和懦弱谋妥协,这使他时常陷入孤立的境地。沈从文说他常常在课堂上与大学生舌战,在大街上与人作战,少数理解他的朋友对他这种精力耗费的用途无一不感到忧虑,而这少数的朋友中就有徐志摩和梁宗岱。沈从文说,没有他们,孙大雨回国后的成就也许难以取得,甚至“也许早就绝望自杀了”,我们难以知道这后一句话又隐藏了多少难堪的人生事实!”

孙大雨这种充满人世应战的精神其实也在一步步使他从诗人,学者,教授的生活圈局淡出,导引他走向人生的另一方也许本不该由他领略的峰巅。

走向峰巅的孙大雨与国共关系的离合是很有意味的。

1941年底,孙大雨来到大后方的山城重庆,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次年,他又加入国民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孙大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书生到政治。客观地说,此时的孙大雨对国民政府还是投了信任的一票。然而大后方的四年现实,以孙大雨的性格与处世原则,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任。他批评,他痛骂,表示对当局的憎恶,他拒绝陈立夫请他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

1945年底,孙大雨回到上海,应聘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次年,闻一多被暗杀激起他的愤怒,经罗隆基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

民主同盟,后又参加了“大教联”(“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简称),他走出了象牙塔,以实际的革命行动把政治的砝码移到了中共的一方。

1949年,孙大雨欢呼胜利的到来,因为,这里还有他的一份并不容忽视的功绩,他积极地送独生女参军,一方面任教复旦,一方面成了社会活动家,各种委员,主任的头衔纷至沓来。

政治的独木舟决不会是一片坦途。

孙大雨在迎来他的人生峰巅时就已削就了下滑的万丈深渊。

隐患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埋下的。

1949年5月27日,这个让孙大雨记忆常新的日子,正在参加一个聚会的孙大雨等接到“大教联”开会的通知,他赶到会场,原来是原“大教联”成员李正文随部队回来了。久别重逢,他们想的是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不想,穿着军装的李正文匆促地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会,这使孙大雨等感到莫名和吃惊。结果,“大教联”中的民盟成员在干事会中全部落选。

1957年,孙大雨在他那次近乎卑乞的检讨中承认这次落选对他打击很大,而当时的批判者也一口咬定孙大雨之所以“血口喷人”正是因为这次落选而怀恨在心。

不管怎么说,此后孙大雨开始了近十年的持续不断的上告上海“反革命分子”也是实情。

今天看来,孙大雨的上告的确带有一些喜剧色彩,也许一开始人们把这看成笑话,因为,被孙大雨列入“反革命分子”名单中的大都是上海市及复旦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普通教师,当年,孙大雨在向中央递送上告的八万言书时,罗隆基极力劝阻过他,陈毅也不止一次出面调解劝说,然而,孙大雨一经起步,就不再回头,他性格中的执拗,倔强在此展露无通。

看看孙大雨是怎样开这份名单的,他说:开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的根据是从他十多年的回忆里,从朋友们自思想改造运动几年的经意和不经意的谈话中,陆续收集起来的,收集名单中的人的历史,事件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等等,每一个人多半有二、三件证据,多的有十件八件。例如,他这样判断数学家、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苏步青教授为反革命分子。他说,就在潘汉年反革命案公布的某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苏步青,他向我招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当时我认为他心虚了,我就肯定他是反革命分子。孙大雨后来还说,他当时将一些人与潘汉年集团联系起来,本意并不是说他们是反革命,只是说他们作风很海派。

孙大雨说他这样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其实很难说孙大雨服膺过带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例如他在讨论文学的阶级性,坚持的却是人性的文学观,他只不过是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而已,这也只能说在长期的政治斗争的磨练下,孙大雨也沾染上了一些有悖于他本性的圆滑,今天我们读他当年登在报纸上的长篇检讨书,谁也不会读出那里面有他出自真诚的悔过来。同那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孙大雨也不过是想就此过关而已。

谁都清楚,“反革命分子”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轻者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程,重者可以人头落地。孙大雨毫不吝惜地把这一顶顶帽子送给他人,这里有严重的宗派情绪在作怪也有他性格的偏执甚至发展到病态的因素,同时他把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与幻想带到了严肃的政治生活。同后来人们对待他一样,把“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标签贴到他的身上,都是从一点因由到无限上纲,左的流毒泛滥成灾,孙大雨同样没能摆脱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共通的人格特征。

细细想来,孙大雨开反革命分子名单也是对自己内心忧愤的一种非理性的排遣,“大教联”突然政选带给他的巨大刺激,在他看来那种不平等的待遇,没有论功封侯加爵的愤懑集淤于心,恐怕只

有将对手彻底地打翻而后快,还能有什么比“反革命”更具威慑呢?

孙大雨走向极端看来也有其必然性。

孙大雨同样没有摆脱传统人士的心态,他也走上了上书直言的老路就是那惶惶的八万言书,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与他同一时代的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聂绀弩后来有咏胡风的诗句:“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读来让人无限感慨,而孙大雨是用八万言书换来二十八年的磨难,同样让人感喟万端。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上书者不绝如缕,但沿袭而下的大多都是血腥的结局。

要不是沉闷的1957年夏季的来临,也许孙大雨个人的命运要重写。此前,他与他的众多对手们只是打了个平手,这些矛盾只被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

也许孙大雨对十五年前解放区那场影响深远的整风不甚了了,也许他对解放以来针对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没有警觉,对“高价征求批评”(《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语)感奋不已。6月7日,复旦党委邀请孙大雨参加整风座谈会,他说:“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我就是走在路上跌脚,摔死也要来的。”孙大雨的发言不外乎还是尽人皆知对上了他的名单的反革命分子的指控;6月8日,他的长篇发言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上海乃至国内各大报纸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点明批评孙大雨是“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此后孙大雨被内定为极右分子;他在报上作了近乎卑谦的检讨,几乎把所有的过错都承揽在自己头上。但是,人们要打落水狗,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和资格,又被推上被告席,以诬陷罪判处六年徒刑。文革中,他又一次被投进监狱,且加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孙大雨四处控告别人为反革命,到头来,这顶帽子却实实在在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孙大雨跌入人生的低谷,饱尝炼狱之苦。

大致而言,孙大雨把自己的人生盛年压在了政治的天平上,在政治的滩头上历险,他惨痛地失败了。

书生政治!

我想起了孙大雨的新月同人,民盟战友罗隆基,他比孙大雨多懂得些世故,以堂堂的政治学博士的渊博来应对活生生的政治实践,最后也同样触礁,横遭厄运。人有时可以有个人的自由抉择,但更多的情况下命运却都是时代来铸就的。总结孙大雨的一生,是性格的悲剧的起因还是时代悲剧的使然,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思索。

除了狱中的日子,除了被批斗的时光,除了长期被监督劳动的一个个白昼,在那数以千计的夜晚,青灯之下,黄卷之中,孙大雨在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越过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回溯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梦幻,诗人复活了,只不过带着如许的沉重:再度进入莎士比亚的迷幻世界,只不过外界条件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屈原、李白、乔叟、弥尔顿,他在一座座中西文化的峰山之间穿梭、游移、淘洗、沉醉,架起了一座座文化之桥。

孙大雨当年曾经庆幸自己走出了象牙塔,而今,重进象牙塔,他心头该会有别样的滋味。

春去春又归。

1984年夏,在胡耀邦等的亲自关注下,孙大雨错划的右派得以改正,此前他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被摘去,当年的判决也被撤销。孙大雨要求工作:“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他用一句典型的孙大雨式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然而,复旦的大门对他却紧紧地关闭。从1945年来到复旦到1958年被开除,十余年间,孙大雨人生的峰与谷都与复旦血肉关联,撇开政治观点的分歧乃至个人之间的恩怨,复旦也该有海纳百川的襟怀,一部复旦校史,怎么也绕不开孙大雨在复旦的人生刻痕,而我们却在复旦出版的几

种《教授录》中觅不到孙大雨的名字。事实上,作为一个文化人,孙大雨只能增添复旦的荣光,他被拒之门外,这是一件殊为可惜的事。

文革结束后,孙大雨已是古稀老人,他要抓住生命的尾巴,日夜不辍耕耘,然而时间老人囊囊可闻的脚步已经步步近逼,到九十年代初,孙大雨已不能再伏案思索,他硕果累累,八部诗体莎译,一部屈原诗选英译,一部古诗文英译,虽然未能完成自己全译莎剧与英译屈原夙愿,却足以构成一座文化的丰碑。命运或许就是不公,或许是孙大雨暮年的攀援恰值商品大潮的巨浪侵袭,或许当年人事关系的阻隔,孙大雨的著述的出版困难重重,他以及他的文化业绩也少人问津,报刊上难得见到他的一丝消息,似乎寂寞还与他相影相随。

其实,孙大雨并不寂寞,因为不论人们识与不识,那座文化的峰峦已清晰地刻上了他的名字。

□张耀杰

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

曹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直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盲点话题;然而,不对这些盲点进行揭示和梳理,曹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将永远会模糊下去。出于对历史负责的动机,本文打算对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进行一番尝试性的描述。

飞向新时代

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艺史上的创作者,大凡是集政治情结、艺术情结与情爱情结于一身的,或者说是集多重身份与多重人格于一身的人物,从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郭沫若、田汉直至曹禺,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曹禺身上还异常明显地存在着另外一个双重性的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的既需要别人拯救又偏偏要对别人替天行道的“救星+罚罪”情结,他终其一生的人生与戏剧,都没有走出过“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道设教的思维模式、人生模式和戏剧模式、情节模式。

南开中学时期的曹禺,在参与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的同时,还曾伙同几个喜爱文学的同学,在天津《庸报》上办起过一个名叫《玄背》的文学副刊。1926年9月,《玄背》第6期开始连载曹禺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至第10期载完。这篇小说是刚刚17岁的作者第一次以曹禺为笔名发表的文艺作品,也是他有案可查的第

一次发表作品,堪称是他的处女之作。据作者本人的说辞,它是在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的直接影响之下创作出来的一篇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小说所采用的故事情节其实就是传统戏曲传奇和文明戏的“情爱+救星+罚罪”的老旧套子:“一个强毅的孤女,与一个青年互相爱慕,后来她的叔父侦知,希她与另一个青年贵族订婚。她踌躇是遵从老人的希望呢,还是逃走呢?这样独自寻思,又不敢详告她的爱人,虽是佯与那青年决绝,只求多给时日与这贵族交友,她无日不与恶魔来往,也无日不在窥伺。至终为侦知,这奸狡的骗子原已有妇了。她将他的恶行函告他的妇人,这贵族终归回到他的妇人那里。”小说的结局是,在身为有妇之夫的日本贵族青年野村三郎“为他的夫人带回国去”之后,那个“强毅的孤女”,有着高贵的法国血统的看护(护士)小姐梅璇,在救星式的朋友谢文伟的精心安排之下,与沉沦在“今宵酒醒何处”的情海之中不能自拔的男主人公夏震,在客船上再度重逢,并奉献出满腔的柔情蜜意——“不要难受,我可怜的小哥哥,你就醒在爱你怀内的吧!”〔原文如此——笔者注〕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其实都不过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道设教的思维模式和情节模式的一种推演,尽管其中也不乏“政治+艺术”的艺术追求。在《雷雨》中被剧作者斥为“阉鸡似的男人”的周萍,在周繁漪与四凤的眼中,竟然成了救星;而在周萍与周冲眼中,既纯情又性感的四凤,竟也成了救命的灵药和精神上的引路人。剧中出场的八个人物打着形形色色的大好名目对别人进行情欲的追逐与人性的杀伐的结果,却是一场由宗教化的“天”上的“雷雨(雷公)”所主宰的“绝子绝孙”的宗教罚罪的当场兑现。在《日出》中,曹禺虚拟性地把现实社会分成为此岸性的“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间地狱,和彼岸性的“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的阳光天堂,这种宗教性的观念却并没有能够落实下来并

贯彻到底,兑现在剧本中的却是一个宗教化的神秘人物金八既损不足又罚有余的宗教罚罪。《原野》中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仇虎,对焦家实施了一场“一网打尽”“绝子绝孙”的复仇式罚罪,一心想带花金子飞向梦幻中的黄金天堂的他自己,在实现了复仇计划之后,却在充满宗教神秘的“黑林子”中鬼迷心窍以至于自裁身亡。到了《蜕变》一剧,曹禺的艺术追求一旦与政治直接地挂起钩来,便一下子由以“情爱+救星+罚罪”为核心的神道设教的思维模式和情节模式,演变成了以“政治+救星+罚罪”为核心的神道设教的情节模式。剧中的丁大夫,原本是以精神反叛者和自我放逐者的面目出现的,当她在伤兵医院里大闹一场准备出走时,是官大人和大救星的梁公仰及时出现挽留了她,并对她给足了面子,同时又对前任院长一帮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丁大夫于是也就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第四幕,在丁大夫充分展现了她不可替代的医术专长与精神魅力之余,由营长李铁川率领的已经康复并准备开赴前线的一营伤兵,列队于医院花园之中,喊出了震天价响的“丁大夫万岁!抗战万岁!伤兵母亲万岁!”的高呼声。在这一营伤兵连同着包括官大人梁公仰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和医护人员的铺垫抬举之下,成贤成圣的丁大夫当仁不让地凌空而起,发表了她修成正果的神圣宣言,这神圣宣言的最后一款,则是以颇为神圣的名义,把自己拥有独立人权的活生生的儿子,大包大揽地贡献了出去——“……(突然庄严地)在你们面前,我现在立誓,我把我的孩子也献给你们共同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回答丁大夫这番神圣宣言的,是“突然爆炸似的大家欢呼起来:‘丁大夫万岁!’‘丁大夫万岁!’”。1943年4月,由中共人士主持下的中国万岁剧团在三青团中央团部为蒋介石献演该剧时,这几句“丁大夫万岁”的台词,还曾被改换成为跳加官式的“蒋委员长万岁”,丁大夫作为精神牌坊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至此被运用到了一个极致。^①

曹禺与政治的缘份,并不起于《蜕变》一剧的写作与演出。早在1917年,不满7周岁的曹禺,就曾经有过为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圆光”的经历。这一年的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实力派军阀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之职,段祺瑞便跑到天津通电全国,表示拒不承认黎元洪的此项免职令。保皇派张勋的辫子军乘虚而入推行复辟。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黎元洪和幕僚们无计可施,却想出了靠“圆光”来预测政周的鬼把戏。与黎元洪同为湖北人的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时任黎的秘书,由于这一层关系,曹禺小小年纪就有了为大总统效劳的机遇和荣耀。所谓“圆光”,就是把童男子曹禺和另一名童女子一起关在一间黑房子里,让他们把一张白纸贴在墙壁上,然后点上蜡烛在白纸上来回照看,并说出从白纸上看到了什么东西。这种以童男童女的灵性可以交通神灵为依据的“圆光”,其实是民间宗教中类乎于巫婆神汉装神弄鬼的一种迷信活动,却为曹禺绽露其表演才能实现其表演欲望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圆光”过程中,当大人们问他看到了什么时,他煞有介事地描绘说自己看到了打胜仗的千军万马,而且还从军帽上看出率领千军万马的首领就是大总统黎元洪。与曹禺同时圆光的另一名童女回答大众们的则是什么也没看见的老实话。曹禺在“圆光”中所预言的胜利当然不会算数,张勋的辫子军很快便把黎元洪赶下台去,拥戴清废帝溥仪重新当起了皇帝。21天后,新帝制又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所推翻。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重新执政,黎元洪通电下野,冯国璋当上了大总统,中华民国新一轮的武装割据、军阀混战由此开场……

无论是早年的黎元洪“圆光”,或是《蜕变》一剧的为蒋介石“跳加官”,曹禺都没有能够真正像《蜕变》中的丁大夫那样凌驾于一切众生的头顶上去成贤成圣修成正果。只有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曹禺才算是有了为官为僚修成正果的出头之日。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结束,1月31日,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于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撤离了古城北京(当时的名字还叫北平),第二天,也就是中华民国38年2月1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至此,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一个新中国新政府的缔造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已经在上海与方瑞同居的曹禺很快得到了来自于现实中的彼岸世界的福音,这福音的名称不再叫得救,而是叫“解放”。这“解放”还有一个在当时叫得同样响亮的别名,是曹禺《日出》中的李石清和《正在想》中的小窝瓜也曾采用过的,叫做“翻身”。不管怎么说,能得到这份福音是曹禺天大的福份,因为能得到这份福音的国统区文化人,在当时还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人。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要安排他和方瑞到解放区去。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曹禺与方瑞于1949年2月秘密抵达香港。到香港后由中共香港工委委派胡绳的夫人负责接待,并被正式告知,这次赴解放区是应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邀请,去北京参加正在拟议中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月28日,在乔冠华的具体安排下,曹禺、方瑞一行27人乘外籍豪华客轮华中轮从香港出发,同行的有柳亚子、郑振铎、叶圣陶、赵超构、马寅初、王芸生、陈叔通等人。老牌革命家兼诗人柳亚子,当时曾即兴赋诗一首,其中有“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其喜向光明”的诗句,颇能代表同行的文化名流们对于光明的神往之情。

由于途中有国民党舰的尾随监视,华中轮临时改道驶向南朝鲜,然后才折转来于3月5日抵达山东烟台。解放区迎接他们的自然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热烈氛围。3月6日,从青州

远道赶来迎接的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还安排了京剧演出。3月8日乘车北上在莱州停留期间,又参加了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观看了当地军民演出的花鼓戏和评剧。一行人由烟台到达济南后,由当地军政最高领导人许世友亲自出面设宴招待,邓颖超还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其规格之高可想而知。在这种高规格的欢迎中,曹禺所体验到的想必是一种志得意满如愿以偿的好感受好心情,也就是为了大夫和阴兆时在“蜕变”后的“艳阳天”中所虚拟演练过的那种成贤成圣成正果的辉煌之感。难得的是,直到1958年,曹禺还保持着这份好心情,并在其《迎春集·后记》中,写下了比柳亚子的诗词更富于诗意的——一句话——“日子过得快极了,像坐了神仙的飞车一样”。只可惜,这一行27人中到了1958年,已经颇有几个从这“神仙的飞车”上被抛下了地狱。

初为官人

曹禺一行人于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京,曹禺、方瑞被安排在北京饭店。虽然没有他个人的正式宣誓和官方给予他的正式委任,从这一天起,他已经成了一个公家人、一个官人。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里,这才是为一切人特别是寄生性最强的文化人,在人间的此岸世界中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正果与归宿。《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一直空悬着的宗教化的天堂净土精神家园的彼岸世界,只不过是得不到或守不住此岸的这一正果和归宿的人们,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的心理补偿或精神胜利罢了。即使是今天的文化人,也难能走出这样一个比古长城还要坚固玄妙不知多少倍的鬼打墙式的怪圈套。

中国以儒教为正统的官本位的宗教或礼教文化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其中最为讲究的无过子政治艺术,而真正把这门艺术提

高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之境界的,大概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助手们。来到北京之后,作为一个还没有进入正常轨道的新成员,曹禺的工作日程已经像演戏一样被幕后的政治艺术家们铺排停当。3月22日,他参加了由华北人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艺协会主办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家的首次大聚会。这次会议是作为全国文艺界大团圆的标志载入史册的,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早已经被中共官方认定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人的又一个文化旗手和精神领袖的郭沫若,提出了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倡议。3月24日,根据郭沫若的提议,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曹禺等42人被推举为筹委会委员。3月29日,曹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由于法国当局只给8个人签发入境签证,包括曹禺在内的中国受阻代表与其他国家的受阻代表一道,于4月2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国民议会会场,与巴黎和平大会同时举行了会议。会议闭幕后,中国代表团于5月初赴苏联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访问,这是曹禺这样原本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民间文化人与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其间自然免不了有些隔膜和碰撞。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发生在洪深身上的一段小插曲:对于担任团长的郭沫若,苏联方面给予了相当高的礼遇,安排他一个人住了一个大套间,其他的一般团员都是两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憨直倔犟又落拓不羁的洪深老夫子就怎么也想不通社会主义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失望窝火之余,便拿出了曹禺《艳阳天》中阴魂不散的阴兆时那种争是非的大架式,演戏般扬言要从楼上跳下去,搞得当了真的郭沫若等人神经紧张了好几天。直到乘火车离开苏联临近国境线时,恢复了幽默感的郭沫若才给洪深开了句玩笑——“你现在还可以跳下去。”洪深则答之以“我不跳了,你奈我何?!”

5月25日,曹禺随和平代表团回到北京,这正是上海解放那一天。出访期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没有与会的曹禺当选为青联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6月15日至19日,曹禺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6月30日又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议,并当选为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到了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会议历时18天,有文艺界代表842人参加。郭沫若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开幕式当天,曹禺在会上也作了题为《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的发言。发言中,他毫不含糊地因循着为国人更为他自己所惯用的神道设教式的情绪化的思维逻辑和抒情逻辑,在政治原则的“神道”之下,为“我们”做了大表态大定位:

……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

7月6日,第一次文代会被戏剧性地推到了最高潮。这天下午7时20分,正当周恩来作长篇大论的政治报告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会场,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在代表们的欢呼、掌声中即席讲话。在当天的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作出了意味深长的一个指示:“代表们,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文艺方向,

……”大会主席郭沫若心领神会,不失时机地站到话筒前大煽其情:“诸位代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承周副主席给我们作了6个钟头的报告,又承毛主席亲自来参加,来指导我们。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让我们高呼几个口号。”随着这位高唱过《女神》、高喊过“雷电颂”的诗人振臂高呼,会场上震天价响的是为在场的大多数人的第一次,以后却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司空见惯的万岁声——“一切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创造人民的文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知道在场的曹禺有没有由眼前的“万岁”声联想到1943年4月23日的另一幕,也就是中国万岁剧团在三青团中央团部演出《蜕变》时的情景。

7月19日,文代会闭幕,曹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与丁玲、何其芳等人同为全国文联编辑部负责人。7月24日,全国剧协成立,田汉当选为主席,张庚、于伶为副主席。曹禺为常务委员和编辑出版部负责人。9月21日至30日,曹禺作为青联代表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曹禺,一度参与并负责政协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所踏上的正是一条循着在自己剧本中反复虚拟过的“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人生模式和情节模式走下去的人生之路。

思想改造运动的启动

在1949年3月24日成立文代会筹委会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风、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人。由于胡风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也就是由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茅盾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报告中便得以单列一节来批判胡风及其同人的文艺思想。

而且这批判的锋芒中已经暗含着一种杀机：“1944 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种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作为对于包括胡风们在内的“我们”的一种警示，茅盾报告中还另有一番上纲上线的警语：

但我们必须警惕到：

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明新与旧的不同。……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初为官人，曹禺当时似乎是正保持着一种成贤成圣成正果的单纯和自信，正是出于这份单纯和自信，他于 1949 年 12 月 31 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在呼喊着我们》的短文，以人民的名义把自己和整个戏剧界打在一块儿进行了一番剖析：

我不相信只是熟悉几本理论书籍以及仅仅和批评家交换些意见便可以展开今后的戏剧工作。……对于一个新社会的意识需要先有克服自己的勇气作为基础。过去，我们戏剧界中潜在着多少卑劣的商品思想，英雄主义的作风和宗派性质

的惰性,但这未必真是我们致命的伤痛。致我们命的将在我们日后万一脱不去这些旧习惯、旧思想以及披起了新语汇的皮毛之下的种种封建行为。

我,幸运地踏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更幸运的是在这时代里我们握有文化建筑中一件重要的武器,这武器是人民交与我们向旧世界作无情的斗争的。在这斗争中,如果我们不能先克服了自己的种种缺点,我们早晚被人民所摒弃。

剖析之余,曹禺对于自己和整个戏剧界的过去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在此前提之下展望了未来:“无疑问的,我们的优秀的戏剧工作者,在以往的劳绩中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成功。我们将以更光辉的行动来发扬这种进步的倾向,为着人民在号召我们!迫不及待地号召我们!”

乍一看,曹禺这篇短文不啻于对茅盾的一番警示的照抄照搬,仔细玩味一下,却不难发现,曹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来自于国统区的自己,无形中已经被打入另册;也没有意识到茅盾以对于胡风们的批判,如果套在自己的《雷雨》、《原野》、《北京人》上,也颇为合适。联系到曹禺早在茅盾发出“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的警示之前,在《日出·跋》中就有过“为将来的阳光爱惜着”的梦想:1946年赴美国讲学之前,他也曾向“高高在上的人”表示过“谁能够将老百姓作事,谁就能在新中国组织里存在”的意见。应该说,他在这里借着茅盾的话所发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

真正把曹禺与胡风扯到一块的是何其芳。何其芳是曹禺的一个老朋友,当年都算得上是以周作人、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为中心的“京派”作家群中的新秀。还一同获得过天津《大公报》的1935年度的文艺奖。他于1938年奔赴延安,很快便成了延安文艺

界的一个代表人物。1942年延安整风后,他两度到重庆,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负责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钦差大臣之称。胡风在其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对何其芳有过绝妙的描述:“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不但是胡风,就连在反胡风运动中颇露过一手的资深老党员陈白尘,直到1985年还在与何其芳们争是非:“抗战时期戏剧大繁荣,是党领导戏剧事业最为成功的范例!但由于一两位‘钦差大臣’式的人物,‘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对重庆剧运指手划脚一番,于是‘抗战文艺右倾论’便流传三十余年,至今不衰!当时戏剧家们都是在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下进行创作和演出,不知其‘右’何指?”^②

不过,在当年那样的政治氛围中,真正敢于与钦差大臣公开叫阵的,只有胡风几个人。连胡风自己终其一生也没能想明白,自己是步陈铨与王实味的后尘,正在启动一场针对整个文化界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算达到高潮的、于冥冥之中早已被注定了的在劫难逃一网打尽的宿命。1945年,中共文化界的冯乃超、茅盾、蔡仪、冯雪峰、黄药眠等人就曾对胡风们展开过一次大批判;1947年,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内战爆发,由重庆转移到香港的部分中共文

化人,专门编辑出版了两本《大众文艺丛刊》,来对胡风们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围剿。到了1949年11月,何其芳把他几年来写下的文艺批评以《关于现实主义》的书名结集出版,并在该书“序言”中直接请出了至高无上的毛泽东的神位,把自己与被他称之为“先生们”的胡风们之间的分歧和论争,一下子提高到了圣战式的极限高度:“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1950年4月,不甘示弱的胡风,在其论文集《为了明天》所写的“校后附记”中,借“先生们”的典故点破了何其芳的一网打尽的用心:

……我对“先生们”这说法有一点厌恶的记忆。……当五位左翼作家被杀之后,王平陵污蔑左翼作家,“先生们”“先生们”地造了一通谣言,说了一通昏话。当时鲁迅就“拆通”了他,指出他“大有一网打尽之概”。这一点记忆,沾在脑子里总不大容易消退。

就在何其芳对“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47年2月的《关于〈家〉》一文。文中他同样是以替天行道的圣战式的架式,对曹禺改编的《家》上纲上线大加批判。基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之必须解决已经提到当前的日程上来,地主家庭子女婚姻问题就成了枝节问题”的绝对戒律和天条,他认定《家》的改编“重心不在

新生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去了”。而这些“恋爱婚姻的不幸”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症罢了，忍痛把痛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在否定了《家》的不具备社会价值或政治价值之余，何其芳倒是手下留情，像曹禺对待他笔下的方达生、丁大夫、花金子、愫方、瑞贞、高觉新一样，为曹禺的“艺术”指出了网开一面的新生之路，也就是经毛泽东钦定的一条真理和大道——“不与粗服乱发的老百姓相结合，艺术就将不能生存，不能发展！”

1950年的曹禺，并没有直接介入何其芳与胡风们之间的圣战与反圣战，但是，白纸黑字的一篇《关于〈家〉》，难免要给刚要享受成贤成圣成正果的“艳阳天”的他，在心灵深处抹上一团阴影。更何况，早在1947年前后，也就是何其芳对他的《家》进行批判和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决战的同时，与他颇有些瓜葛的李健吾、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在中共文化人集团作战的大围剿下，已经纷纷落马；最后还劳动郭沫若亲自出马，以一篇《斥反动文艺》来宣告中共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切对于曹禺来说，也绝不会没有影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对于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政策，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既定国策。没有接受过官方承认的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要想在新中国取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就必须贡献出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去接受改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在当时叫做“向真理投降”，而且是不由你不投降。这也不由笔者不想起周作人于1927年针对高长虹的发难而发的感慨：“古时皇帝是不准人说他，现代‘青年’是不准人不说他，……其专制则一。”当然，同为周作人的学生，毛泽东早已不是青年，更非高长虹所能比拟，颠扑不破的只是“其专制则一”的五字真言。

从思想改造的意义上说,最有建树或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是罪孽最深负担最重的知识分子,也自然最为迫切地祈求着能及早通过“向真理投降”以获得拯救与新生。这个道理在曹禺写于南开中学时期的《杂感》中就有过明白的表述:“改正观念似乎洋车夫还可教些,因为教授的博士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很自以为教人者,非可随随便便为人教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有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经典概括。于是乎,朱光潜率先投降了,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自我检讨》。然后是费孝通,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他的《我这一年》和《解放以来》两篇文章。接下来是冯友兰,他于《人民日报》1月22日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不管这些文章背后有没有政治操作的背景,它们只能算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序幕。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很快就响应号召,设立“批评与检讨”专栏,其它报刊也纷纷效法;一时间,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文坛上的热门话题。仅《文艺报》一家,从1950年5月至1951年4月,就先后涉及到了三十多位作家。这其中就有曹禺发表于1950年10月出版的《文艺报》3卷1期的《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题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曹禺所谈的却主要是对于自己过去的《雷雨》、《日出》两部剧作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而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以使我逐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疮脓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既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又深感痛心,曹禺便颇为当真地

着手按照钦定的文艺观、社会观、政治观来改写自己的旧作。《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了明确的阶级或政治的身份，在周朴园的背后，新添了一个直接听命于“英国顾问”的省参议员乔松生，以乔松生为直接后台的周朴园也就成了兼官商与买办为一身的双料的资本家。鲁大海则成了真正的工人领袖，同周朴园生过两个儿子的鲁侍萍，也把个人恩怨转换成了阶级仇恨，全剧的大结局也因此变成了繁漪咒周朴园和周萍“两个东西”去死，四凤随母亲“昂然而去”和周朴园听到“工潮扩大，开枪也弹压不住”的报告“颓然”倒下。《日出》中的金八成了日本人办的仁丰纱厂的总经理，小东西成了被金八杀害的进步工人傅荣生烈士的女儿，方达生则成了与纱厂工人田振洪、郭玉山一同营救小东西的革命者。该剧的大结局也相应地变成了方达生等革命者大获全胜的大团圆。《北京人》中的“北京人”则被一笔抹杀，袁任敢关于天堂净土精神家园式的“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的希望”的描述，也换成了“只有劳动的人才能改造生活”之类的政治教条。

经过改写后的三部剧作，于1951年8月由开明书店收入《新文学选集·曹禺选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出版曹禺剧作。在该书“序言”中，曹禺表白说自己之所以要改写，是因为“以我今日所能达到的理解，来衡量过去的劳动，对这些地方就觉得不妥当。”自己“改得很费事，所用精神仅次另写一个剧本。”对于改写的结果，他一方面认为“可能又露出一些补缀的痕迹，但比原来接近于真实。”同时又自相矛盾且模棱两可地留下了另一个话头——“小时候学写字，写不好，就喜欢在原来歪歪倒倒的笔划上，诚心诚意的再描几笔；老师说：‘描不得，越描越糟。’他的用意大约在劝人存真，……”这两个“真”的真假难辨，正是曹禺的高明之处。在他看来，糟不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奉献出了一份接受改造的“诚心诚意”。

正是因为留下了一个“存真”的活话,一旦政治气候有所改观,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便顺理成章地恢复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原貌,“前言”中也只是淡淡地交待一句“除了一些文字的整理外,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

一个在几个月前还“不相信只是熟悉几本理论书籍以及仅仅和批评家交换些意见便可以展开今后的戏剧工作”的剧作家,竟然会拿自己最心爱的作品开刀以实践别人的理论和意见,这在曹禺绝不是一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其中必然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可以从胡风有“三十万言”书之称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里面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950年3月14日,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讲的是接受遗产等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陈亦门同志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态度激愤得很,把这归作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曹禺当时虽然身兼数职,由于被划入小资产阶级的类别之中,所成的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名正言顺的正果,这大概是他应中共之邀从上海来北京之前始料不及的。而曹禺又太渴望于方达生式的“为将来的阳光爱惜着”的修成正果,就不能不经常纠缠于“被人民所摒弃”“人民便会鄙弃你、冷淡你”的忧患意识之中。

另外,当时的曹禺还有一个最为切身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他与郑秀之间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问题和他早已与方瑞同居的情爱问题。关于曹禺(万家宝)与郑秀之间的恋爱与婚姻,作为见证人的李健吾,在写于1939年的题为《时当二三月》的一篇散文中,在谈论巴金的同时曾有过涉笔成趣的描绘:“从《这不过是春天》起,几乎没有一出戏不是他(指巴金——引者注)逼我的,从我的案

头抄去的。他的理由是‘我爱家宝的戏，也爱你的戏，我都要’。他不写戏，至少不私下写戏，像家宝那样信口所之，兜起我的疑心。巴金是一个不追女人的男人（想想家宝那副做爱的可怜相——朋友都为他担心，然而，滚你们的！他幸福了，有情人成了眷属，如今添了一位千金），说话会可靠的，一个闹恋爱的人一定在朋友面前扯谎……”^①曾几何时，曹禺这个“追女人的男人”已经冷淡了与郑秀的关系移情别恋，爱上了颇具古典神韵的美少女方瑞，并把她的影子印在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和《家》中的瑞珏与鸣凤身上。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娘家，曹禺曾经从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未能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便再一次提出离婚。1997年12月13日，于曹禺逝世一周年之际，曹禺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召开，文学史家董健先生在当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曾透露过当时的一个细节：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一笔钱，离婚之事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帮助曹禺解决了这笔款项，曹禺于感激涕零中当面跪倒在周的面前，表示“今后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对于自己作品的否定与改写，就显得更容易理解了。

《明朗的天》

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宣告成立，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曹禺、张庚，教育长光未然。该院是以原华北大学第三部文艺学院为基础，合并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组、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等单位所组成，毛泽东亲自为该校题写了校名。在戏剧学院工作的这

段时间里,曹禺正式开始了他配合形势的思想改造,不断和师生一起到工厂里体验生活。7月25日,他又与赵树理、古元、鲁黎、胡丹沸、贾克、秦兆阳等人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下乡下厂活动。8月1日出版的《人民戏剧》1卷5期上,还发表了曹禺的《关于工厂戏剧辅导工作——给友人的信》,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书信的形式,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英雄主义”,认为在进工厂就要“做工人的小学生”,“只有完全把自己忘却了,才能搞好工厂的文艺活动”。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委员会”成立,曹禺与田汉、丁玲等158人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1月16日,曹禺参加在京文学工作者举行的抗美援朝座谈会,并与茅盾、丁玲等145人签名发表了《在京文学工作者宣言》。11月19日,曹禺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前进,英雄的人民》,歌颂“英雄的人民”抗美援朝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不愧为天生的战略家,在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又在酝酿着一场征服和改造国人、特别是文化人的思想与灵魂的规模更大的大战役。上海电影厂的《武训传》无形中成了这场战役的导火线。该片于1950年底在全国公映之后,赢得了各种报刊颇为一致的叫好之声,从而招来了毛泽东关注。195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这篇社论为标志,在毛泽东的周密部署之下,一场比延安整风来势更猛的文艺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批判文章发表——7月20日,由江青负责的调查组写出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开始连载;8月26日,身为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夏衍以主管领导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曾对《武训传》表过态叫过好的郭沫若、田汉等人也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检

讨。甚至于北京凡是观看过《武训传》的共产党员,都纷纷在大会小会上承认错误、反省思想,大有人人过关的意思。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辞中对自己发起组织的思想改造运动所取得的胜利表示满意,并提出了更进一步扩大战果的要求:“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而后在全国铺开。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的动员报告。12月5日,这份动员报告以《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明确指出文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要“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其主要内容为: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紧接着,《人民日报》上出现了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一年以前曾经表过一次态的和尚未表过态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这一通栏标题下贡献出了灵魂表白起了忠心,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曹禺。

1951年春天,新婚不久的曹禺与方瑞一同到安徽农村去参加土改。返京后正赶上这场由《武训传》引出的更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2年5月24日,他的《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他汇报了自己在土改中的思想改造,说是“在那短促的期间,我曾有些错误的认识,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同时对于自己出身于半官僚军阀家庭也表示了痛苦,对于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再一次表示了忏悔:“一

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很难忘怀于自己多少年来眷恋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蚂蚁绕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那样一块黑乌乌的地方。”

在这样的大气候大局面之中,曹禺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一份亟待改造的忏悔与赎罪的心情,于1952年初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当面向周恩来表示自己打算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戏。周恩来对曹禺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并作出了必要的部署。不久,曹禺便在北京市委的安排下,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并确定协和医院为蹲点单位。“整整三个月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和医院的专家、教授交上了朋友。三个月之内,他做的笔记有二十本以上。”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组为专业话剧院,由原北京人艺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而成,曹禺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任副院长。改组后的北京人艺很快便组织全体艺术人员分别到工厂、农村进行为期数月的深入生活,并创作出了一组反映工农生活的时事短剧。此后还上演了老舍的《春华秋实》和《龙须沟》。1953年9月24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为适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文艺政策做了相应的调整,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作出了新的评价。这在周扬所作的《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主报告里有集中的体现。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而“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曹禺则在大会现身说法,作了题为《要深入生活》的检讨发言。他首先表示“四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点东西。应该

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接着,他把自己的没有作品归因于没有真正深入生活和认识生活——“两年前,我在淮河的短短一段生活就是这样,我收集了一大堆材料,但是我没有能够根据这些材料写出东西来。”在谈到“如何认识生活的问题”时,曹禺还表白了自己的一份苦恼:“很使我苦恼的,是我的政治学习太差,像大家时常提起的,十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来研究一个人或分析一件事,确定一个是非,或者从一团复杂的现象中,看出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虽然我经过文艺整风,并且决心以后不脱离政治,但是今天,一到实际地走上创作的行程上,我是痛切地感到我还是脱离了政治。”

在文代会期间,全国剧协、作协等协会也分别举行会议。剧协会议上根据文代会提出的对“五四”新文艺的继承问题,进一步讨论了“五四”以来的优秀剧作重新上演的问题。文代会之后,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文艺界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氛围。1954年2月19日,上影剧团以强大的阵容在上海大众剧院上演《雷雨》,标志着建国后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的曹禺剧作的演出已经解冻。这年3月,采用原版《雷雨》、《日出》、《北京人》的《曹禺剧作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销路看好,6月份便开始再版。曹禺本人任院长的北京人艺也于6月30日公演《雷雨》,仅首轮演出即超过五十场。这对于曹禺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他用4月初到7月中旬共三个半月的时间,创作完成了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

比之于当年的抗战宣传剧《蜕变》和时事宣传剧《艳阳天》,《明朗的天》更为严格地遵循着“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道设教的情节模式和编剧套路来进行写作。其最为突出的表现自然是政治性的主题明确。在第一幕第一场的大幕拉开之前的舞台提示中,剧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这个戏就是企图讲一讲中国

的知识分子在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改造思想,逐渐放下旧思想的桎梏,终于开始向新知识分子的道路变化着。”也正是因为主题上的过于直白明朗,抹掉了《蜕变》、《艳阳天》中曾有过的那一份“阴魂不散”的灵动之气。在此之前,剧作者曹禺一直是“升到上帝的座”(语出《雷雨·序》)上来进行他的既委曲尽情又文以载道的神道设教式的文艺创作的,天神地鬼地狱天堂都在他一个人的掌握之中,使他得以尽情推演他的“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抒情逻辑,以抒写他潜意识中既有的近乎于天生的“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人性情结和思维模式。《明朗的天》则不然,它与其说是一次文艺创作,不如说是一场政治操练,比起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主题先行”的命题创作更富于政治性。它的思想干脆就是至高至上的毛泽东思想,它的直接后台则是周恩来。而曹禺自己不惟没有了“升到上帝的座”的超然,连思想带命运都已经交到了所谓的“人民”的手中。若干年后,曹禺是用仇虎在原野黑林子里曾经遭遇过了鬼打墙式的活见鬼,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可怜相和狼狈相的:

你要知道,当时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喽。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造。〔曹禺与田本相谈话记录,1982年11月30日〕^④

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我那时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的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看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曹禺与田本相谈

话记录,1984年6月3日]

绝妙的是,终究改造不掉自己神道设教的宗教化根性的曹禺,偏偏借着剧中身为共产党员的新院长董观山,变戏法般渲泄出了自己的一腔根深蒂固而又不吐不快的拯救与罚罪的极端情绪:

我们也正在谈贾克逊的问题。(忽然)我倒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对江道宗、凌士湘)你们两位都记得吧?在《镜花缘》这部小说里,有个人叫林之洋。他漂洋过海,到了一个地方。他看见那个地方的人,个个都披着一块头巾,又和气,又可爱,他想这些人真是好极了。(娓娓动听地)可是等到他跑到后面,把那头巾一揭开呀,想不到底下还有一张脸!这张脸可不同了,青面獠牙,像个鬼似的,一着见林之洋,就喷出一股毒气!林之洋这下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些人都是有两个脸的!那么哪个是真脸呢?我看后头那个是真脸。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也就是这样。

很显然,再不能公然以“升到上帝的座”上替天行道的高姿态大架式渲泻其“救星+罚罪”的宗教情结的曹禺,无形中已经把他的“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道设教的思维模式和抒情逻辑,纳入进了新时代的政治宣传新轨道之中。

《胡风在说谎》

做为北京人艺的院长,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人,曹禺自然可以享受他从前在梦中才能享受到的让别人围绕自己团团转的一份特权。《明朗的天》采用的是由他口授,由女秘书吴世良记录的方式来写作的。刚开始进入写作阶段,北京人艺就由副院长焦菊隐挂

帅组织了强大的演出班子,于1954年4月21日起到北大医院、协和医院去体验生活。剧本还没有定稿,便开始在这年9月出版的《剧本》和《人民文学》第9期上同时连载,并预告全剧为四幕八场。当第10期载完时,只有四幕七场,剧作者在“附记”中交待说,他“觉得第四幕缺点最多,也太长,非大删改不可,修改以后,……原来的两场戏成为一场戏了。……时间与上期幕表上写的,有了出人……”。

对于《明朗的天》的演出,中共领导层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1954年12月14日,胡乔木、钱俊瑞、田汉、贺绿汀、苏井观一行人在曹禺的陪同下,观看了人艺的彩排,并进行了座谈。正式公演后,周恩来也观看了演出,还在与人艺演职员的座谈中肯定了演出的成功。作为一部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相配套的剧作,该剧的演出自然也会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赢得一致的好评。12月18日,《明朗的天》由北京人艺正式公演,一直演到1955年2月25日,历时两个月盛演不衰。此后,曹禺又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由四幕七场改定为三幕六场,还于1956年3月1日至4月5日参加了文化部在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包揽了多幕剧演出一等奖、多幕剧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刁光覃饰演的凌士湘)和舞台美术设计一等奖(辛纯等)四项大奖。

《明朗的天》完稿之后,曹禺又转入了散文的写作,说是“要写北京,写这个和平的首都,这个世界的眼睛注视的地方。”比起剧本来,这些散文更适合于曹禺把自己无论如何也改造不掉的“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道设教的思维模式和抒情逻辑,纳入到为新时代歌功颂德的轨道之中。写于1954年9月的《北京——昨天和今天》中,应该说是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之间流行着两个字:“翻身”。这两个

字的意思是说被压迫的不受压迫了,在黑暗里的见着光明了,不平等的变平等了,不幸的变成幸福的了,遭受过各种痛苦压榨的人已经获得了扬眉吐气的自由日子了。对农民说,翻身就是获得了土地;对工人说,翻身就是从奴隶变成主人;对知识分子说,翻身就是摆脱了失业的忧愁和随时因一句话而被捕的危险。从地狱里走到地上,又重新见到阳光的人,或者会懂得这种我们叫做“翻身”的感情。

单就经过改造的曹禺来说,他的“翻身”多多少少总还有那么一点成贤成圣成正果的意味。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他作为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是他修成正果的最高标志。这种靠着别人的“解放”得来的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法律保障“翻身”,与《日出》中李石清不择手段的“翻身”和《正在想》中的小甜瓜寄托于老窝瓜的“正在想”的梦想中的“翻身”,虽不太一样,却一样地不够牢靠。正在曹禺为自己阳光天堂式的“翻身”放声歌唱的时候,“随时因一句话而被捕的危险”已经注定要落到和他同为湖北籍的人大代表胡风的头上了。

打从“左联”时期开始,文艺界对于胡风及其同仁们的混合着学术、人事和政治多种成份的大围剿从来都没有终止过,而且这种精神性的大围剿,也绝不限于胡风同仁的身上。路翎在其史诗性巨著《财主底儿女们》所贡献出的最具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所在,同时也是对于蒋纯祖的人生追求和精神探索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所在,就是革命队伍内部对于像蒋纯祖这样的进步青年的集团性的精神奴役、精神强暴和精神虐杀——“在这个演剧队底内部,有一个影响最大的带着权威底神秘的色彩的小集团存在着。这个小集团底领袖显然就是剧队底负责人王颖;……这个集团常常对某一个人突然地采取一种态度:对这个人,他们原来是很淡漠的,

但在某一天,他们以一致的态度,包围了这个人,说着类似的话,指摘着同样的缺点,使这个人陷到极大的惶恐里去。”——关于蒋纯祖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钱理群等人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说:“……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演剧队,又看清了党内不正常的家长式统治;……这个人物从社会层面上可以看作是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仍未能与人民结合,没有找到光明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同时表达了作者于极度动乱的对生命的不可重复的深刻体验。”在笔者看来,蒋纯祖对于王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对于他及其他进步青年的集团性的精神奴役和精神虐杀的抗争和反叛,是自有其合理性的;他对于“人民底原始强力”和“个性底积极解放”的执着与追求也是至诚至真的。尽管他并没有能够最终战胜自己的“自私地为了光荣”的个性,从而败坏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所从事所服膺的诸项事业,他拼死追求走向与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的殉道精神,却依然是闪光的、辉煌的。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过,发生在文化界内部的精神围剿,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而且惟有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参与下,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由曹禺在其《雷雨》、《日出》、《原野》中所推演过的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式的连环套。事变的发端缘起于两个不相干的“小人物”。1954年9月,《文史哲》杂志发表了蓝翎、李希凡合写的学术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引起了毛泽东显然是学术之外的极大兴趣。他委派江青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周扬等人则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只在《文艺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转载时还由主编冯雪峰亲自写了一个对双方意见各有褒贬的“编者按”。鉴于周扬等人这种挑战其绝对权威的行径,毛泽东于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及其它相关人员写了《关于〈红楼梦研

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

在毛泽东没有写这封信之前，文艺界已经感到了压力，10月5日至7日，全国文联召开第二届全委会议，会上就对以简单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官僚作风和文艺批评中缺乏自由讨论现象展开了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的信在小范围内开始传阅的同时，其精神也传达到了整个文艺界。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讨论会，开始对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展开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又把冯雪峰抛出来充当了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的活靶子。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青年宫开始召开连续的联席会议，听取《文艺报》正副主编冯雪峰、陈企霞的检讨，并展开对于《文艺报》的批判运动。

不得其志的胡风早在1954年7月22日就向中共中央呈交了有“三十万言”书之称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时候又乘机把一腔怨气撒在了当年与自己一道追随在鲁迅身边的冯雪峰的头上。他在11月7日的大会发言中，除冯雪峰外，还连带着点出了胡适、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生者与死者的名字，还特别指出朱光潜、俞平伯诸人“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的。这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措辞，随后便报应到了他自己的头上。在12月8日的联席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扬做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一下子把枪口指向了胡风。郭沫若、茅盾不

点名地指出“青年中也有坏的分子”，更网罗了路翎、阿垅（即陈亦门）、吕荧、牛汉、绿原等一大批胡风的追随者。

联度会议之后，冯雪峰被免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胡风则在高压之下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逐级呈送到毛泽东手中。事情并不就此打住，1955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1955年1、2合刊上，以“对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的意见”的通栏标题，发表了姚文元等人的五篇文章。随这期《文艺报》免费送出的还有一份《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也就是有“三十万言书”之称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和附件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2月5日至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展开批判。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标志着这场文化界的运动已经正式升格为政治运动。5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组成胡风专案组，其中负责文字材料的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五人小组，个个都是写批判文章的一把好手。5月13日，由毛泽东决定，《人民日报》在第2、3版分别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由舒芜根据他与胡风之间的私人信件整理而成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前面，毛泽东亲自写下了一大段编者按，说是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一同发表，为的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6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风予以逮捕的决定。而在实际上，早在决定之前的5月16日，公安机关已经不尽合法地逮捕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在

随后的全国大清查中,所触及到的人员达 2000 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 78 人,被撤消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的 61 人。

何其芳收入《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的一篇《关于〈家〉》,早已于无形中把曹禺牵扯进了主流派文化人与胡风同仁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曹禺对此一直保持着缄默。作为文联常委和作协理事,曹禺参加了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到批判冯雪峰和《文艺报》直到批判胡风的全过程。不知是继母去世,他和方瑞于 1954 年 12 月去天津奔丧的缘故,还是他抱定了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一开始也并没有显出姚文元和五人小组的那份战斗热情。直到 1955 年 1 月 30 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随《文艺报》出版发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展开批判之后,曹禺才开始有了不俗的表现。

1955 年 2 月 21 日,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在说谎》,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文章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地介绍出了自己的写作动机:“这几天我读了胡风的《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他的文章很长,我来不及仔细地读:但是我发现有一段文章(114 页—115 页)引用我修改《日出》的事情,作为他攻讦何其芳同志的事实根据。我想我有权利对胡风说几句话,……”为了证明胡风的说谎,曹禺又抄录了胡风文章中与自己有关的如下文字:

例子之四,一个剧本,写的是抗战前上海没落社会的人物,他们被所谓金融家和大流氓头子控制着,有喝血者,有醉生梦死者,有追求新生者,有被牺牲者。这被牺牲的是一个穷苦的女孩,受不住凌辱,自杀了。解放以后,作者重新修改了。怎样改呢?那女孩没有自杀,被无产阶级救出来了。这当然光明起来了。中国无产阶级底心肠真软得很。或者说真冷得

很,居然美化了抗战前的旧中国历史,居然不让这个女孩用自己的尸体为无数万的旧中国屈死了的姊妹们呼一次冤,向那个穷凶极恶的封建流氓社会作一次控诉!……

这样的修改,如果是照理论批评家的意思,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

《日出》中小东西的死远远算不上是“为无数万的旧中国屈死的姊妹们呼一次冤”,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中国宗法制男权社会的纲常伦理的执迷与牺牲。曹禺改写后不让小东西自杀即使不成功,也说不上是“美化了抗战前的旧中国历史”。胡风的这种极端情绪化的上纲上线强词夺理的文风,与批判他的人之间并无二致,满带着的以绝对真理自居的党八股的霸气。胡风的“美化”之说其实也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学术批评的范畴,如果这种说法被人接受或承认,也足以置人于死地:更何况这里所牵涉到的何其芳们又是在文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主流派,摆在曹禺面前的还有一个划清界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单是为了开脱和洗清自己,曹禺的有所表示也无可厚非。

针对着胡风的说辞,曹禺从四个方面展开他的论证。第一,自己的《日出》原本就没有写好。“发表以后,多少年来,我总觉得没有写好,我没有能把新的力量在戏里表现出来。……解放以后,这个感觉更强烈起来,……”。第二,《日出》的改写也是错误的。“我修改不好的原因是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并不接近、也不了解当时的革命力量,修改中对于当时革命情势也没有加以研究,而我偏偏要描写一些所谓代表光明的人物,其结果必然是写得不真实,以至成为反历史的”。“这个修改本最后由于我个人的意见,就出版了。后来,读者是知道的,我渐渐认识了修改的错误,我又把那三本戏

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第三,对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的错误的修改,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周扬、何其芳倒是一贯地正确。“在修改的时候,我记得周扬同志听说我要修改,曾经不止一次诚恳地劝我不要改动,还是把原来的面貌保存下来好,我没有考虑。那时我想,修改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就这样修改。”第四,胡风“气愤填胸地替我打抱不平”,是“横蛮而又伪善的行为”;他的一副“替天行道”的面孔是虚伪的,他对何其芳的指责用的是“逻辑的天罗地网”——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何其芳同志等叫我改的,那何其芳自然犯了错误;如果是我自动改的,那就证明,何其芳等的“理论棍子”把我“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于是,何其芳等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因为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等理论的“照明之下”,何其芳等无论如何是错的。

至此,曹禺颇为雄辩地证明了“胡风在说谎”。不过,事实终究是胜于雄辩的。这事实就是:在改写《日出》之前,曹禺在《我对今后创作的认识》中明明写着自己正在“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在谈自己刚刚完成的《明朗的天》时,他甚至唱出了“创作属于人民”的高调。把《日出》的修改单单说成是‘由于我自己的意志’,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曹禺对于胡风人格上的指责,所揭示的其实是他与胡风、与何其芳、与周扬、与大多数以革命自居的文化人之间的一个共同点,绝非为胡风所独有。单就《日出》来说,剧中对于“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一网打尽,所遵循所推演的正是一个“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教设道式的“天罗地网”。眼见着小东西、陈白露们牺牲了自己,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面孔却没有切实际的行

动的方达生还在喋喋不休地标榜陈白露太聪明、自己是个傻子,所透露出的也正是剧作者的一份自欺欺人的虚伪。曹禺在这里所推演的其实就是鲁迅早在1929年就已经点破的一种人格虚空的变戏法——“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随着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曹禺又接连推出了《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谁是胡风的“敌、友、我”》、《极其巨大的胜利》等大批判文章。如果说《胡风在说谎》中还有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成分的话,这几篇就纯粹是落井下石的政治表态和挟私报复。对于胡风当年措辞尖锐的评《蜕变》、评《北京人》,曹禺是耿耿于怀的,直到这时他才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胡风写文章一向是晦涩难懂的,里面仿佛有许多话要谈又不愿谈出来,使得读者可以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猜想。我一直认为他的文章落笔就必然不通顺的。现在我才明白,只有当他不能够称心如意地写出他对党的仇视和痛恨的时候,他的舌头就仿佛拴上了一根绳子,疙疙瘩瘩,说不出甚么通顺的真心话来……”最为不堪的是,落井下石的曹禺竟然把一腔私仇公愤扩大到了胡风家人的头上,说是“甚至他的老婆,当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了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

反右运动中的大显身手

1955年8月,曹禺在《戏剧报》上发表的《极其巨大的胜利》一文,是专门为总结自己参加反胡风运动的“体会”而写的,他的体会归结起来只是一点,那就是“必须更要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对共产党和人民耿府做到绝对的忠诚老实”。在这一年的11月

份,他又在《北京文艺》第10期上发表《必须认真考虑创作问题》一文来作为他的国庆献礼,文中再一次于他所特有的极其强烈的生存恐怖和生存忧患的层面上总结他对于创作问题连同胡风事件的“认真考虑”:“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我们难道不深深觉悟到,党的文艺队伍不是应该整顿么?……历史也多少次证明:那些脱离人民,脱离政治,缺乏对新事物的强烈喜爱的人,必然会堕落在腐朽的个人主义的泥坑里,被时代所淘汰。”

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像胡风那样被淘汰,这时的曹禺正在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反胡风运动的大获全胜,中共的文化政策也再一次趋于宽松。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要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彭真等到会接见与会代表,陈毅还到会讲了话。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与科学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阐述毛泽东所提出的“双百”方针,并强调在文艺创作题材上,党不要加以限制,应该非常宽广。随着“双百”的贯彻执行,又一场被称作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在这种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曹禺与老舍等入于4月23日至27日,还出席了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一时间老舍、曹禺俨然有文化界新旗手的架式。这年7月,曹禺终于被接纳为中共党员。12月又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与茅盾、老舍、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一块当选为作协书记处书记。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

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月底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大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莅会作长篇发言,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逐步展开,并号召帮助党进行整风。一时间,有“引蛇出洞”之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进入高潮。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形势急转直下,5、6月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子变成了“中国的天空上黑云乱翻”;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出尽了风头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转眼之间就成了反革命。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专政对象的规模空前的反右派运动就这样全面展开。入党不久的曹禺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这场争杀之中。他以前用以写戏的天神地鬼天罗地网天诛地灭之类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变戏法,批判起人来竟然比写起戏来还要得心应手。

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从吴祖光身上打开了缺口。为了罗织他的罪名,田汉等人擅自把吴祖光大鸣大放中在文联座谈会上一个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曹禺立即作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专时期与自己比邻而居的老朋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象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的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了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

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这一款倒不失为吴祖光的原意,只是吴祖光的原话说得更更有韵味罢了。奇文共欣赏,笔者转录如下

又一次,一个在中学读书的邻居的女学生对我说:“演戏真好玩,平常不敢说的话在戏台上都说出来了。”

多么有趣的话呀!一个“多礼的”社会是不允许我们说出真心话来的;然而戏剧常常为我们道出心事,说真话,说心里想说的话;自然,真的就是美的……

今天的社会是新的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了,但是奇怪的是和我在1943年所提到的“多礼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于在戏剧里也难看得见真话,看得见心里话了。

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像胡风那样冒犯了牵涉了他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原来,在这一年三月份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曾提到一个创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怎样”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吴祖光不仅认定这是曹禺的“口是心非”,而且还是他(当然不仅仅是他)“剧本写不好”的一个根源。曹禺虽然不断表白自己的作品没有写好,甚至于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忏悔说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卖“狗皮膏药”,却容不得别人说自己的作品不好。于是,他就拿《明朗的天》为例反驳道:

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

《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做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齷齪、太无耻。……

紧接着对于吴祖光的批判,曹禺又积极参与了周扬等人对于丁玲、陈企霞的清算,扮演起了《艳阳天》中被斥为“马屁精”、并挨了替天行道的阴兆时两个耳光的马弼卿的角色。8月1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曹禺在题为《我们愤怒》的发言中,一边表白着“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党员,各方面知道的很少”,一边就搬出“一个党员必须忠实于党”的绝对天条,针对丁玲干起了揭发人隐私的勾当:“我和她在莫斯科时,她得了斯大林奖金,她很高兴,我也为她高兴。她对我说:‘以后要写几本好书了,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地多写几部。’一个作家想写出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书是应该鼓励的,但是我觉得她的口气里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味道。……”也就是从这篇发言开始,一贯神道设教的曹禺,像他笔下的梁公仰、丁大夫、高觉慧、阴兆时、董观山那样,以成了正果的精神牧师的身份向别人招起魂来:“我衷心拥护党对你所进行的最后挽救的政策。一个人把自己那样齷齪的过去坦白出来,彻底丢开,绝不是从此毁灭了见不得人。而是从此才能得到党的信任,我们的信任,才有一天能回到我们中间,做人民当中的作家。……”随后,在批判丁、陈的《灵魂的蛀虫》一文中,曹禺所惯用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式的思维方式和抒情逻辑,一下子便演变成了上纲上线霸气十足的党八股。诸如“我们绝不允许这样一个反党集

团在文艺界兴风作浪”、“我们现在争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要不要团结的问题”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句子比比皆是。一个文化人人格的虚空和脸谱的善变,于此即可见出一斑。

经过批胡风、吴祖光、丁玲的几番演练,曹禺在批判萧乾时,对于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旧戏法的运用,已经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被曹禺《日出·跋》称之为“好心的编辑”的萧乾,是与他交情最深也最急于划清界限的一位。没有萧乾在《大公报》上为《日出》精心策划的一场集体批评,曹禺能不能在文坛上站稳脚跟,都很成问题。而早在1948年3月,身为中共文化人最高代表和旗帜的郭沫若,就在一篇著名的《斥反动文艺》中,以红、黄、蓝、白、黑几个极具刺激性的字眼为朱光潜、沈从文、萧乾定了性。郭沫若所谓的红、黄指的是沈从文:“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所谓的蓝,指的是朱光潜,“我们在这一色的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所谓的黑,指的就是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是受他麻醉着了”。

曹禺写于1957年8月的《斥洋奴政客萧乾》,正是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在反右运动中的一个翻版。只是曹禺所摆出的已经活脱脱是你死我活天诛地灭的架式。一上来,极妙的一个比喻,便透出了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学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接着,曹禺翻出了

这位老朋友的老账：“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进而运用《明朗的天》里中共院长董观山用过的典故，再次为萧乾传神写照——“《镜花缘》的‘两而国’里的人都有两个脸，前面微笑，后面喷着毒气，萧乾就是这种两面三刀的‘好汉’”。发人隐私出卖朋友是曹禺在《艳阳天》的马弼卿身上才开始启用的戏法，在批丁玲时已经实战演习过一次，在《斥洋奴政客萧乾》时更成了置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了，在辩论会上，我们已经习惯于看见右派分子‘乖乖地’坐在我们面前，像一只落水狗，没有以前那样八面威风了”。这是曹禺写于1957年9月的《从一只凶恶的“苍蝇”谈起》一文的开场白。这里被斥为“苍蝇”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资深演员戴涯，他同样是曹禺的老朋友，与唐槐秋同为中国旅行剧团的创始人和台柱演员之一。这位周朴园的扮演者是把《雷雨》演遍大江南北的功臣之一，大抵也是最早引领曹禺到下等妓院为《日出》收集素材的中旅演员中的一个。1936年，戴涯还与马彦祥、曹禺等人组织中国戏剧学会。1943年8月20日，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资助下赴西北旅行的曹禺和陶孟和到达西安时，也是戴涯出面代表西安文艺界举办茶会招待他们的。在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鸣大放中，戴涯站出来发了言，说是人艺处在“离心离德，毫无希望的僵尸局面”。“党越领导越乱，文化部和北京市委下来的都是官，飞扬跋扈顽固不化，整人治人，群众是挨整的老百姓”。一到反右运动中，大鸣大放的戴涯自然成了曹禺笔下的“苍蝇”和“落水狗”，或者说是成了曹禺过足神道设教的旧

戏瘾的材料。在反右的大旗下，共产党员曹禺又从旧戏《阴阳河》中搬来了为自己用惯了的神道设教的旧式武器：“有一出戏叫‘阴阳河’，指的是人死后进入‘阴曹地府’之前的一道险恶的河水。我小时候看这出戏，模糊记得，人的灵魂渡过去便成了鬼，转过来还有希望变成人。这些右派分子大概已经浮沉在‘阴阳河’里，离对岸不远了。……”从这一段神道设教中，曹禺所总结出的竟然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的道理，仿佛是在鲁迅在天之灵的引导之下，曹禺终于实现了“政治+艺术+情爱+救星+罚罪”的神道设教与党的政策的接轨贯通：“党告诉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右派斗争，我们必须趁胜追击，彻底地把右派分子打垮。”

在写于1957年10月的《巴豆、砒霜、鹤顶红——斥右派分子孙家琇》一文，神道设教的曹禺故伎重演，就像周朴园对繁漪、鲁侍萍对四凤、曾皓对愫方那样，对“抱着‘资本主义牌位’，一个人‘守节’”的女教授，施以诛心之术外加人身攻击。

……她是中央戏剧学院民盟右派阴谋小集团的中心人物。我想仅就她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发言，从一两个地方谈一谈。那个发言的题目叫“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这个题目十分像胡风那种佶屈聱牙的句子。这位女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旧约圣经里的先知召唤人们忏悔的圣洁模样。绕了半天，中心的意思不过是要推翻共产党，让她带领着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她表面看去像是一块丝光糖果，里面却是巴豆、砒霜、鹤顶红。她伪善到了极点，这个“法里赛”！

针对着孙家琇对于国立剧专和中央戏剧学院的褒与贬，曹禺连带着还把自己供职多年的国立剧校也臭骂了一通：“南京剧专是

国民党党棍张道藩、余上沅和二陈系统的人办的。我在里面看见国民党人横行霸道，党气冲天，特务横行。进步师生被逮捕，被殴打，被陷害，哪里谈到什么学术空气！”与此同时，他却又绝口不谈自己偏偏就是在国立剧专写出了《正在想》、《蜕变》、《北京人》等剧作，其中的《蜕变》还颇有些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嫌疑。

当胡风们一个个被推进了曹禺神道设教的“阴阳河”的时候，曹禺的题为《迎春集》的散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有以上提的批判文章。在写于1958年3月的“后记”中，曹禺还春风得意地对“我们”的“神仙”生活进行了一番描绘：

日子过得快极了，像坐了神仙的飞车一样。

工作、学习、劳动、开会、看戏、旅行、听报告、参加热火朝天的各种运动——生活仿佛是一道愉快的泉水，晶莹闪耀，奔腾过去。我们在歌唱中，在战斗中，过着忙碌而又充实的日子。

清晨起来，新鲜的生活立刻像春风一样迎面扑来，我觉得年轻了，仿佛又回到少年读书的时候。一切都像重新做起，而天地却与以前迥然不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舒展、人人都能够扬眉吐气的时代里。

若干年后，曹禺终于在1986年10月18日与田本相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对自己当年的“神仙”日子进行了一番非正式的反思：“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很伤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时，我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比起多少年后的这番反思来，十年之前被曹禺斥为“马屁精”

的马弼卿的“假情假意”，反倒来得更地道也更为真实：“（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极其难能可贵的是，直到垂垂老矣的1991年，曹禺在题为《雪松》的一篇散文中，终于通过把同为神灵的中国的孙悟空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丽儿进行比较，透露出了经过人世沧桑的他，对于集政治情结、艺术情结、情爱情结外加宗教式的救星情结与罚罪情结于一身的自己，连同着自己笔下像丁大夫那样的“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①却偏偏修成了正果的牌坊人物的一种反思与彻悟：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那个缥缈的精灵，压在松树的裂缝时熬过十二年痛苦的岁月，被老人普罗斯彼罗（prospero）解脱出来。这个温柔善良的精灵，无所不能，滚火、降水、腾云驾雾，凡是老主人的吩咐，她立刻办到。……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向往，就不同了。

注释：

①参见拙文《〈蜕变〉的首演及其它》，文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1期。

②陈白尘：《中国话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重庆雾季艺术节

上的讲话》，文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年第 1 期。

③文载 1939 年 3 月 22 日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转引自韩石山《李健吾传》，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④引自田本相《曹禺传》第 378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第 1 版。本文中所引曹禺与田本相谈话，均出自该书，不另加注。

⑤语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 版。

□王芝琛

两极决斗中的《大公报》

在《大公报》的历史中，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是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

重庆谈判·马帅调停·政协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大公报》既满怀对即将来临胜利的喜悦，也深为今后“国共相争”而担忧。1945年6月1日，《大公报》社评《着急两点》说：“目前大势之好，正好黎明后的朝曦，霞光瑞气，蒸蒸日上，光明之来，如迅雷闪电，速不可当。大势如此，已是必然，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国家的统一与团结，便能把握一切，而无问题。”但如何把握住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大公报》紧接着在6月13日社评《胜利逼人》中说：“为了统一与团结的问题，我们曾经一再呼吁一个原则，就是：要变不要乱。”“什么叫乱，就是自乱步骤，甚至演为内战”。“我们希望朝野上下，全国一致，都要有一个坚决观念，就是：反内战。”

对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大公报》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23日社评《读周恩来的信》就提出希望：“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尽管初衷是为解决国共在抗战的摩擦与冲突。日本投降甫定，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函电公布当日（即16日），《大公报》社评《日本投降了》

中说：“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是”。“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千年大计！”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抵重庆。次日《大公报》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昨日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毛泽东先生来了！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见，与目前国运的关系极其远大”。“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真诚中带有几分“稚气”。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签字，11日毛泽东飞离重庆。12日《大公报》的社评《团结会谈初步成就》：“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说出满意与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目了，所以此刻谈到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得有极大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谈判结果叫《大公报》“一时难以说出满意或失望”内涵《大公报》几分窘境。谈判尚未结束，北方局部地区已乒乒乓乓开打了，《大公报》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表现，可一言慨之“毕竟是书生”。

“重庆谈判”话音未落，内战硝烟四起。当时，美国一方面“军援”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派出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对于马歇尔的来到，《大公报》又表现出热情与希望。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抵上海，22日飞重庆，21日《大公报》报道了马歇尔抵沪的消息，且发表了短评《欢迎马歇尔将军》，22日，又发表《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亲自撰写的同样题目的社评：“我们敢于友邦重要使节

到达中国之日,唤起国民,共同注意;要求各关系方面,觉悟愧悔,立止兵争,诚意团结,实现民主,力行建设。”1946年1月7日成立了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调停小组。1月10日,国共正式签署了“停战令”,国共双方各向自己的军队下达。11日,《大公报》特刻“停战令下”四个大字的新闻标题,并发表了《欢迎停战令下》的社评:“停战了!停战了!我们重言申明一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氏昨在政治协商会议席上说:‘我们在先烈的昭示之下,在中山先生的遗像之前,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这话对极了,这正是国家与人民的需要。”兴奋的《大公报》还把马歇尔大大地赞扬了一番:“马歇尔元帅是中国和平的接生婆,全中国人民都特别谢谢他!”

1946年1月10日。正当国共双方签署“停战令”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指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大公报》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极力赞同的,但也流露出不少担心,在当日发表的《勉政治协商会议》的社评中说:“我们特别警告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位代表,无论你代表的是哪党哪派,都必须以国家为重,不得执拗于各自党派的利益。”经过努力,在政协会议上终于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应当说,协议本身是有利于人民和民主,而不利于独裁和内战。《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席了政协会议。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次日,《大公报》发表《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的社评:“政治协商会议得以终获成就,各党派的态度妥协,都值得赞美。”“由今天起,各党派都要痛感责任,忠实于其本身的任务。”当时《大公报》确实想得太简单了,就在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就发生了“沧白堂事件”。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又发生了“校场口事件”,种种迹象表明,政协决议是不可能完全贯彻的。

“停战令”下了，“政协决议”通过了，照理说，内战应该熄灭了，起码也应有所收敛。事实非也，双方“战事”愈演愈烈。铁的事实，使《大公报》开始清醒了，在1946年5月20日《我们反对武力解决》的社评中说：“停战令颁布了，人民是多么喜欢，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通过了，人民又是多么喜欢！报纸刻大字，出号外，满街放鞭炮，这喜欢，几乎超过日本宣告投降之时。曾几何时？现在竟幻灭了！忠厚的人民，我们实在太忠厚了！忠厚的人民，我们实在受了骗！说‘政治解决’，高叫‘民主’，图穷匕首见，还是武力解决！还是打！打！打！‘民主’、‘民主’，真是天晓得；中国的民主希望，已被你们打成炮灰了！”

反对召开国民大会，胡政之被逼参加“国大”

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国民大会应该是各党派和社会贤达的民主大会，必须在政协“决议”付诸实施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下召开。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为尽快完成一统天下的使命，急于要召开国大，遭到中共坚决反对，民盟也表示坚决不参加。1946年4月23日《大公报》发表了《国民大会可以缓开》的社评：“不管中共民盟等党派代表来不来，代表即到多数，就开会，就议宪。那样制宪会议，显然不是全国性的，尤其失掉了政治妥协的依据，则制成的宪法便一定要成争论，而不足为举国共识的大法”。“今天国内的形势，剑拔弩张，搅得全国人都心神不安，这怎么可以议宪？目前至紧至急的问题：是赶快解决内战的恐怖，以一切可以寻求国家的安定。我们认为，国民大会可以暂缓举行，以寻求安定的办法”。然而，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张家口后，蒋介石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0月14日《大公报》社评《为国民大会设想》：“国军攻克了张家口，紧接着国府就颁布了国民大会召集令。从政府方面看，是一个军事胜利，紧接着一个

政治僵局,这是很欠斟酌的。”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一切,仅仅推迟了三天,于10月15日国民大会还是召开了。当日《大公报》发表了《国民大会开幕,特致两点希望》的社评。这第一点希望就是“国大开幕,应该不是和平告终,破裂完成。”11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后,宣布闭会。第二天,《大公报》在题为《国民大会闭幕了》的社评中说:“所产生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就文字与精神,在这时代,均不算理想。”“这部宪法的最大缺点,还不在于它的本身,而是这次制宪国大缺少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一个主要的党派”是指中共。

国民大会在中共与民盟等不参加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减小尴尬局面,就逼部分党外人士参加。《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就是他胁迫的对象。胡政之是根本不愿参加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决不放过,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政之,届时傅斯年先生在座。满脸怒气的蒋介石一言不发。而傅斯年发话道:“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胡政之感到毫无退路,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国民大会签到处报到。开幕式之后,在《大公报》一次社评委员会上,他说道:“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参加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胡政之面色惨淡,两眼红涩,声调近于嘶哑。可见,他的痛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周恩来1946年12月在延安的报告,说:“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销路。”(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0页)

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国家需要“中道而行”

当时《大公报》对国内形势有一个看法：“事势极为明显，以国共的军力对比，中共绝无以武力打倒国民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府要以武力完全消灭中共，也是不可能的。中共可能再失掉若干城市，但它到处打游击战，打运动战，破坏破坏，将无已时，这怎么受得了？”（见1946年10月7日社评《不许破裂！必须和平！》）认为“目前的局面，真如千钧一发，但其关键却握于国共双方之手”。并指出，双方打是打不出结果，“若有结果，那就国家的分裂，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以至国家毁灭。”（同上）

内战无结果，现实无前途，《大公报》深深地陷入了烦闷之中，只好把现实无法实现的“美景”寄托于梦中。1946年11月4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一个现实的梦》：“……全国并无枪炮之声，全国人民都过着和平的日子，绝无上兵或人民流血牺牲或转徙流离……”。“国民政府业已改组，毛泽东、周恩来、张君勱、曾琦、莫德惠等都在国府委员会上与蒋主席、孙科、宋子文等环坐讨论国事了……是一个举国一致内阁规模。”“物价稳定，又有各地丰收，粮价下跌……”一梦惊醒，外面的世界仍是打！打！《大公报》再度跌入深深的烦闷之中。1946年12月11日，《大公报》在社评《国家的烦闷，人民的烦闷》中叹息道：“国民大会在议宪，半个中国在打仗。这一个对照，就给人以极大的烦闷。”“今天事，大多数人民或对议宪不甚感觉兴趣，虽渴望和平安定，而亦无可奈何，甚至对打仗双方无所爱憎，或只有憎，然亦无可奈何。就算打下去吧！何时打完？是一大烦闷。打完了，国家能好吗？又是一个烦闷。”

梦已作过，烦闷又无法解决，《大公报》对国共两党怎么样呢？上面已经回答：“无所爱憎，或只有憎，然亦无可奈何”《大公报》只有寻找出路，既为国家，也为自己……

在国际上,《大公报》在抗战期间,对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由衷钦佩,尤其对苏联最后出兵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赞赏有加;然而由不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外蒙独立、中东铁路、大连、旅顺问题)的某些条款,到抨击《雅尔塔秘密协议》,到在“东北问题”上警告苏联“撤兵东北”。对于苏联严重的损人利己、民族实利主义决不认同。因此,对中共坚决“一边倒”路线也不以为然;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东方战场中的作用十分赞赏,对罗斯福总统也很爱戴;然而对美国战后扶持国民党打内战很不赞同,尤其不能容忍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大公报》首先喊出“反美扶日”的口号。

1946年10月1日,《大公报》首先提出“世界需要中道而行”的主张。“我们相信美苏矛盾有一条中道可走,应走”。“美国不走中道,拿美国式去裁量别国,强制别国人民接受,那是美国的错误,错误是要失败的。反之,苏联也是如此。假定美苏对中间国家都采取这个中道政策,不把中间国家拖到自己的一边,做自己的附庸国,两国的冲突就可以没有了。如各制造傀儡国,以为卫星,强诸卫星服从自己的利益,那是希特勒的世界政策,是日本军阀‘八统一宇’的路线”。“聪明的中间国家,其正道也是中道,它不能倒入一边。中间国家既无原子弹,又无征服世界的野心,倒入一边就是自陷危险,甘做附庸国。”《大公报》的主张很简单,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由于发表了《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大公报》遭到中共和《新华日报》的痛斥;同时为了批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反美扶日、抗议查封《新民报》等,《大公报》又遭到南京《中央日报》的公开叫骂,《大公报》自感到“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1946年5月29日社评《论宣传休战》)。经过慎重考虑,《大公报》决定打出“自由主义”旗帜。1948年1月1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

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的社评：“在举世巨齿獠牙草木皆兵的今天，夹于左右红白之间有一簇难以分类的人物，通常称作‘灰色人物’”。“因为‘灰色人物’们反对追随两极化的世界潮流，有人又以‘中间路线’来形容其主张。”“因为我们信念中的自由主义既不模糊，也不是灰色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自由主义“它代表的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社评在下面列举了自由主义的五个基本信念：1. 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2. 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3. 我们以大多数幸福为前提；4. 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5. 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革并驾齐驱。

此外，《大公报》还以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地位和处境。“政治集团的争执，似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盖怎样一所房子。同时，也就争执到谁来盖，谁经营的问题。极明显的是最好双方合盖，不但建筑工作不必延搁，露宿中的人民也可以尽早安居。而且可以兼容两大工程师的长处。无奈工程师的关切不尽在露宿，所以谁做主任工程师，只要房子能盖起来，他们能卖力气处，都义不容辞。事实上双方都带有自己的木瓦匠，在现状下，他不能也不屑为牧渔人之利的第三位工程师。但他们都甚关切露宿的流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流民之一员。自由主义者并不在甲乙工程师中有所抉择，他是在嚷，不论谁盖也好，你们别忘记留出透空气引阳光的窗户（民权），可也别忘记盖个容量充足的饭厅（民生），因为饮食空气阳光是健康的基础。这么一嚷，竞争者一定认为有所偏向；其实在建筑开始前，窗户饭厅都还不存在。有些露宿流民也一定看我们迂腐，认为问题总然是谁盖而已。殊不知谁盖，这原则还是基本而又基本的。既然双方争夺工程师地位，自由主义或在丙地清苦熬过，或在拉锯战地带从事朝不保夕的生产工作，都在埋首做着局部填土打地基的工作。这工作当然没有参

加争夺战的木瓦匠激昂爽快,也很有些填土工作者或不甘淡泊或因遭际而受了刺激,参加了任何一方的木瓦匠行列,但我们也愿慰问各地无声无息的填土者,你们的贡献绝不比斗争更浪费!你们有人记挂、有人尊敬!因为中国如欲现代化,填土打基工作的需要是千真万确的!”(见1948年2月9日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实际上,《大公报》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并非“突发奇想”,在抗战期间坚持的“国家中心论”,而在抗战后期及抗战胜利后,逐步形成“自由主义”信念。

“两极”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之列进行拉拢。在胡政之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还郑重其事派秘书傅泾波来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有人把“两极”斗争中的《大公报》比喻为“比较公正的裁判”,确乎?谬乎?读者当会有自己的评断。

□王芝琛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与世纪同行的《大公报》，历尽风雨沧桑。《大公报》近百年来的荣辱毁誉，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缩影与写照。对于这样一张报纸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将会有所裨益。本文仅就“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与新记《大公报》是否符实，进行初步探讨。

“小骂大帮忙”与《大公报》“结缘”的由来与发展

有“小骂大帮忙”的说法还相当早。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就有“小骂大帮忙”之名，只不过那时并不是为《大公报》而“创立”。据考，《大公报》得名“小骂大帮忙”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群众抗日情绪高昂，一致要求对日宣战。向来善于“独立思考”的《大公报》认为：“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主张“明耻教战、救国图存”。《大公报》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却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混为一谈，认为这是对蒋介石的“大帮忙”。1931 年底，天津有人向《大公报》社后门投了一枚炸弹，外埠的读者还寄给总编辑张季鸾一枚炸弹的邮包。有人指摘《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但此说并没有流行起来，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坚决主张抗战，并以“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的精神，与日阀撕拼。《大

公报》“明耻教战、救国图存”的初衷才被广大读者所理解。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了《质中共》的社评,主张共产党应“政争”,不可“兵争”,“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一贯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当然反对。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除对“政争”、“兵争”进行严厉的批驳外,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之名,还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天津刚解放,194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电报中说道:“《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天津解放后,新记《大公报》天津版更名为《进步日报》。1949年2月27日,在《进步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将“小骂大帮忙”之说,推向极至:“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治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和吴冷西纵论《大公报》时,也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不错。”(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166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建国后,《大公报》的老同事们历经各次政治运动,也屡经对《大公报》的“撕伪装,剥画皮”的“思想改造”的磨难后,1926年原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合著《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在全国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这篇被王芸生称之为“最大的违心之作”,被后人称为“自我讨伐”的长文中,几处自我“承认”《大公报》对国民党蒋介石“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之说,被千百次重复,就这样这顶“帽子”犹如

“紧箍咒”一般，牢牢地扣死在《大公报》头上。

**被称之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却被
国民党《中央日报》“斥”之为共产党的“应声虫”**

如果《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之说成立，那么国民党一定不会对《大公报》“恩宠备加”，现实并非如此，不仅不这样，反而“斥责”《大公报》为共产党的“应声虫”。按照国民党这个逻辑，其实它也可称《大公报》为“小骂大帮忙”，只不过对象换成“共产党毛泽东”而已。

抗战期间，《大公报》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战，与日寇撕拼；另一方面，又勇于揭露黑暗，抨击国民党官吏的贪污腐化，横征暴敛。1940年6月29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主张杀几个奸商以平抑粮价；1941年12月22日的“飞机洋狗事件”（《拥护修明政治案》），矛头直指孔祥熙家族，激起遵义和昆明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痛斥重庆那些豪商巨富的奢糜生活。当天，蒋介石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1944年欧洲和太平洋盟军捷报频传，惟独中国战场节节败退，《大公报》反对“空间换时间”；1944年12月22日社评《晁错与马稷》，引证史实，主张“除权相”、“戮败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权贵孔祥熙、何应钦。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派往收复区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社评《莫失尽人心》，为收复区传诵一时。当内战烽烟再起，《大公报》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而再、再而三声嘶力竭，呐喊不衰。《大公报》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并首先提出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一篇由王芸生撰

写抗议查封《新民报》的社评而引发,蒋介石亲自命令陶希圣以《中央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起了对《大公报》王芸生的所谓“三查”运动。1948年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的社论中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7月19日又在题为《王芸生的第三查》的社论中说:“我们大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第一查,查出自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王芸生君致力于国际干涉运动,为莫斯科会议作准备……第二查,查出自1947年3月以后至今,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今天我们等着第三查,本月十日,中共通过一个决议,响应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特别是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国民党对《大公报》除了谩骂之外,《大公报》多名记者遭逮捕。以上《大公报》的种种表现,以“小骂”或“伪装”一言而蔽之,只能说欠客观、欠公正。决不能是其他。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极大决战的时刻,《大公报》在两极的夹缝中两面受攻。如果在平常时期,尚无法认清《大公报》的“庐山真面目”的话,而此时此刻更能看清《大公报》不党不派的真正民间报纸的“真相”。1946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

从经济上、组织上、政治思想上认清

《大公报》，还其“文人论政”民间报纸的真实。

综观《大公报》办报特点处处充蕴着“自由主义”的色彩

《大公报》1902年诞生于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1902年是《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义和团运动的第三年。当时，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维新派亡命国外，朝政腐败，国破民奴。此时的《大公报》虽生于忧患，但仍以“敢言”报国。尤其是1926年，吴鼎昌（社长）、胡政之（总经理）、张季鸾（总编辑）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在它开办的第一天，就向公众宣布：《大公报》誓以“文章报国”、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总之，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

新记《大公报》在其成立宣言里的“四不”社训中，其中第一款即“不党”。“小骂大帮忙”之说的要害，就是对“不党”的否定。按此说的逻辑，新记《大公报》是肩负着“对国民党大帮忙”的义务与使命。

以下仅就经济基础、组织路线、政治思想等三个最重要的方面，来看看新记《大公报》。

首先，就经济基础而言，新记公司《大公报》的资金来源十分单纯，只是由吴鼎昌一人投资5万元。为何又称“公司”呢？是因为《大公报》以吴鼎昌的金钱股与胡政之、张季鸾的劳动力股相结合。后来才增设“荣誉股”赠送职工，以资奖励。持有该项股份的有：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王芸生等27人。《大公报》在“四不”社训中的第二项“不卖”中明确指出：《大公报》“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在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为发展事业，按当时官定牌价购买到20万美元，用于购

置印刷设备,这纯属商业行为,完全不是接受国民党的津贴或补助;1945年,为了凑款购买印刷机,接受了李国钦的5万美元入股投资;又于1948年,为了恢复香港版,接受了王宽诚2万美元入股投资。这些都纯系民族资本。从《大公报》近五十年的历史,新记二十三年历史,这么单纯的资本关系,实属少见。

其次,再看新记《大公报》的组织路线。《大公报》“四不”社训第一页“不党”中说:“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几十年来,《大公报》恪守力行,从不含糊。据说,在抗战前,就有《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机关报的流言,而仅是流言而已。后却被有意者流传下来,至今还有人立此说而纠之。其实,政学系为何物?它是国民党内以杨永泰、熊式辉、张群等人为首的一个既无组织又无纲领,只是一个形迹比较接近的派系。若要考证《大公报》是否是政学系的机关报,必须搞清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在这个既无组织又无纲领的派系中谁来主管它的机关报?回答是:查不出是谁?第二,这个政学系,没有纲领,那么它的机关报又如何为之宣传?回答是:谁都不知道。第三,政学系给了《大公报》多少津贴呢?回答是:根本没有。第四,《大公报》中谁是政学系任命的?回答是:没有。四个子虚乌有,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

再就从政治思想看新记《大公报》。《大公报》并不信奉什么“主义”,但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以“文章报国”为己任,然在其版面上充蕴“自由主义”的色彩。《大公报》在其社训“不私”中说:“不以报纸谋私利,不使报纸为私人操纵利用。”在社训“不盲”中说:“对问题独立思考,对事理洞悉透彻,遇事变头脑冷静,辨是非实事求是,达到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大公报》的高层领导人物,都是无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是新记《大公报》两

任总编辑(首任张季鸾、继任王芸生)共同特点。王芸生说:“我是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常随国家之忧而忧,国家之喜而喜。在这个大时代,我自然也忧深而喜浓”。《大公报》是有它的“喜、怒、哀、乐”,但都相随于人民大众。

《大公报》的办报特色,充蕴了“自由主义”的色彩。就《大公报》版面而言,具有三大特色:首先是言论。《大公报》保持和继承了中国文人办报的传统,以言论为其特色,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文人论政”。社评天天见报,从不间断。每个人所写的社评有时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但都代表报社。每星期都有一篇“星期论文”,代替社评;还有专论等,但不定期,这些都由社外专家名人撰写,观点并不相同,形式自由活泼,都不是代表党派利益说话的。1944年1月30日,《大公报》在“星期论文”专栏上登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程沧波的一篇文章,程当即被蒋介石撤了职。其次是各种学术性和时事性的周刊多请社外专家主编,报社代为发稿,对稿件内容从不干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种问题的座谈会,《大公报》召开的座谈会从不作结论,发表时也看不出大公报的态度。人们常说:“没有态度的态度,这正是《大公报》的态度。”《大公报》各版编辑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编辑出来的版面各各相异。大公报好像是个“松散的”组织,编辑主任包括总编辑,本来就不准备使各版面面貌相同。在《大公报》社的小天地里,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空气也较“松弛”。最后一个办报特点是《大公报》国内外都有特派记者,他们的通讯特写即专栏文章,构成了《大公报》另一条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大公报》对派驻国内外的记者,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或者称是纪律),即报道要求务必客观真实。

无须讳言,《大公报》也发表了一些被称为“反共”的文章。并被称之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典型之作,如《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1941年5月21日)、《为交通着急》(1945年10月25日)、

《质中共》(1945年11月20日)、《东北的阴云》(1946年2月2日)、《可耻的长春之战》(1946年4月16日)。本文不准备对以上各文逐一进行分析,仅以1945年10月25日《大公报》社评《为交通着急》为例,做一点分析。该社评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味用破坏手段去求达到目的,在这些势力集团本身来说,也是作践人心,自掘坟墓。”文章在字面上并没有指明“中共”,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摘“共军”破坏津浦路。《大公报》社评的作者或编辑们都是无党派职业报人,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根本不会理解,为了解放战争切断津浦路是必要的,打碎一些“坛坛罐罐”还不可避免。如果说此文对国民党起到“大帮忙”的作用,那他们并非“有意”;说他们都是“法西斯帮凶”,扯得太远。

综上所述,从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最后再从版面上均看不出《大公报》是为国民党效劳或所利用的报纸。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在荣获美国米苏里奖章时,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向美国公众发表的题为《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的谈话中说道:

我们对任何人或党派并无说好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的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我们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是自己的机关报。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使《大公报》 长期挣脱不掉“小骂大帮忙”之名的根源

1949年2月《大公报》天津版易名《进步日报》,在其出版第一天的《进步日报同人宣言》中就将《大公报》定性为“大地主大官僚

买办资产阶级”的报纸；《大公报》上海版虽没有更名，但在它的《新生宣言》中，也不得不承认原《大公报》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报纸。《大公报》的阶级属性就这样定了，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成为《大公报》的惯用手段，还用说吗，已是当然的了。

依照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非红即黑。无党无派根本不可能存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根据似乎都是“在世间任何事物中，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生活中“穿衣、投足”都有“阶级烙印”，更何况报纸？按此观点，《大公报》是民间报纸完全是骗人的伪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民间报纸。其实这种观点，也是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否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理论被推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在建国以后最好的政治气氛中，有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对加之于《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之说，起了怀疑。并首先提出：《大公报》对国民党“不仅是小骂，也是大骂，但都是真骂”。（见夏晓琳著文《坚持抗战，功在国家——张季鸾在抗战期间的大公报社评》）传不同观点的人，马上举出一些例子反驳，这样数番轮回，双方兴趣索然，“大骂”还是“小骂”本不能简单地从天平上称出。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只有认清《大公报》是否是真正的民间报纸，才能被打破。“小骂大帮忙”之说，十分明显地把党派之争作为衡最是非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真理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相对的。一部中共党史，也是一部向“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的历史。“实事求是”才是党的光荣传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应该特别指出，老大公报人李纯青 1985 年的论文《抗战期间的大公报》对实事求是看传《大公报》，起了“排头兵”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人对《大公报》是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报纸的定性,也起了怀疑;并干脆称新记《大公报》为一张民族资产阶级的大报(见吴延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因为他见到《大公报》版面瑕瑜互见,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写照。不可否认,此种看法,已是向“实事求是”的方向跨了一大步。但实际上这样定性,还是在“阶级分析”的框子里“打转转”,其实民间报纸就是民间报纸。

因为新记《大公报》是一家民间报纸,并无党派的属性,就不可能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了。

“小骂大帮忙”之说,是一种嘲讽之说,它嘲讽《大公报》对国民党揭露抨击不力;“小骂大帮忙”又是一种埋怨之说,它埋怨《大公报》没有完全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嘲讽也好,埋怨也罢,《大公报》毕竟是一张民间报。

□智效民

王芸生的悲剧

没出息的乡下人

把王芸生先生说成是“乡下人”，还冠之以“没出息”三个字，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自己的发明。1937年7月，王先生应《宇宙风》编辑之约，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文章，题目是《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作者的这篇文章叙述了求学挨打的一幕，又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近二十年来虽常生活在城市里，但总是脱不掉这份乡下人的气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说有些“吃不开”。人既然没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说话既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常带着那份乡下人呆头呆脑的神气，你说这样的人如何吃得开？（原载《宇宙风》第54期。转引自周雨著《王芸生》第15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王芸生原名王德鹏。河北静海人，1902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贫民家庭。他虽然只读了八年私塾，却凭借一手漂亮的文章跻身于报界。“九一八事变”后，他因为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而名声大噪，不仅被蒋介石请到庐山去讲学，而且担任了《大公报》社

的编辑部主任……。既然如此,所谓“没出息”、“吃不开”云云又从何说起呢?

我觉得,从王氏大半生的经历来看,这段话不过是表明他不会干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勾当罢了;而这种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拼死力争的东西。因此,在王先生“乡下人”的自嘲中,饱含着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王芸生还在这篇文章中说:“我现在已比十年前没出息,假使十年之后人比现在更没出息,到那时或许万念皆灰,我愿意写一篇十万言的自传,献给读者,现在则只能透漏一点消息借以还债而已。”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在二十多年之后,以回忆录的形式实现了,这就是他与曹谷冰先生合作、在《文史资料选辑》中连载的那篇长文——《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我不知道王先生是否还记得当年说过的话,但是作为读者,我却从该文对《大公报》的评价、对同人的指责以及对自己的糟踏中看到了另外一个王芸生。当然,如果仅仅是以此为“文本”来评论作者的话,恐怕会失之于皮相。因为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们说的、写的和心里想的很可能大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这篇“文史资料”的时候,除了简单的同情之外,也不妨想一想:这位说话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呆头呆脑的“乡下人”,何以会变成这样?

其实,王芸生曾经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他不仅自学成才,不以国共两党党员的身份,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这正如他在《〈芸生文存〉自序》中所说:我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残破局面中出生的,“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然而就在这时,他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明显

地感到,尽管“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于是,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误会,特此声明。”(《王芸生》第9页)这则启事也许对他非常不利,但平心而论,王芸生之所以如此,不过是想安下心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而已。所以他还说:我这个“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芸生文存》自序)在当时,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萧乾在大革命中激流勇退后,便揖别了所谓主义,一心一意要当“不带地图的旅人”;施蛰存也说过:“‘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份,没有活的机会。”(《沙上的足迹》第17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话与其说是牢骚,不如说是控诉。

在谢绝政治活动之后,王芸生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新闻事业了。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显然是他对这种职业的理解有关

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八年前,我曾亲耳听见一个黄包车夫骂“干报馆的没有好人”。从那时候起,我便立志要新闻记者努力做一个社会上的

好人,把新闻事业做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我们对国家社会纵使无益也还不至有害。((《招魂》,《国闻周报》第14卷15期,转引自《王芸生》第153至154页)

此外,他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时至今日,这些话仍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的一桩公案

尽管王芸生在说话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乡下人”的脾气,但是张季鸾先生却偏偏喜欢这种个性。张是在一次笔仗中认识王芸生的。后来,当他得知当时还是天津《商报》主编的王芸生因为与老板意见不合而愤然辞职时,便亲自登门拜访,邀请王加盟《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和这份报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众所周知,《大公报》自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之后,便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舆论界的一大重镇。作为一家民间报纸,该报之所以很快就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其最大秘诀就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宗旨和“文人论政”的基本特色。

王芸生是1929年8月22日正式声明加入《大公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使国人“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厚,而责日本凌压中国之残暴”(张季鸾语),王氏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每天为报社撰写一篇文章,最终形成一部长达数百万言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使他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日本问题专家。在此期间,他还把“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奉为座右铭,写了许多斥责奸邪、弘扬正义的政论。

淞沪战役之后,他与留在上海的《大公报》同人坚持“不受辱不

投降的报格”，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检查，由上海迁往汉口乃至重庆。在此期间，陈诚邀请他主持或兼顾军委政治部的宣传工作，但是他却以司马迁“戴盆何以望天”一语回绝陈的邀请，保持了新闻工作与实际政治之间应有的距离。

到了重庆之后，张季鸾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王芸生开始主持《大公报》笔政。前不久，我从唐德刚一篇文章中，看到了王先生的幽默和他对抗战必胜所抱的信念。唐说：“记得抗战中期，我们在沙坪坝听过一次《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讲演。王说，抗战是一场赌博。赌场上的规矩是‘不下桌子不算输’。日本之不幸是它碰上了一位无赖大赌客蒋委员长。蒋公如今把裤子都输掉了，但是还赖在桌子上不下去。王作结论时，强调：‘不下桌子不算输，只要我们不下桌子，坚持下去，必有翻本之一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唐还说：‘其实，那时输掉裤子的赌徒，也非蒋公一人。站在他背后的全国老幼，都准备把裤子脱下，交给他继续赌下去。’（台湾《传记文学》总第393期，第19页）。

也许是出于这种“不下桌子不算输”的团结抗战的愿望吧，王芸生曾写过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文章。晋南会战又称中条山战役，这是中国军队于1941年5、6月间在华北战场的一次大规模抵抗。当时，中条山一带号称是“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部署了二十多万重兵，却被数万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从而成为“自淞沪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杨圣清：《中条山战役研究述论》，《中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当时，外电对于中国军队的情况有所报道，为弄清事实真象，王芸生在《大公报》撰文说：

晋南的战事，迄目前止，是敌人占了些便宜，于是它便作种种的夸大宣传，不是说我军死伤重大，就是说某某军官被

俘,这已经我军事发言人予以驳斥。尤其离奇的,是它对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分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象,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5月21日)

王芸生还说:“山西是十八集团军参加抗战以来的光辉战场,由平型关之役以来,始终为敌人所头痛,现在到了敌人用最后之力来与我们争山西之时,十八集团军更应贯彻一贯的精神,协同友军,建立抗战御侮的功勋。”(同上)

文章发表后,周恩来当即致信张季鸾、王芸生,除反驳外电报道,并要求“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外,也承认王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98至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两天后,《大公报》根据作者要求,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为题发表了这封来信,并配以张季鸾所写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张文指出:目前国人的最大担心,就是“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

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5月23日)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发表后没有多久,张先生便溘然长逝,于是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在唁电中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由此可见,他们对于张先生的上述推论是基本同意的。

诚如著名报人俞颂华所说,王芸生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比如当他发现孔二小姐用飞机运送她的爱犬、外交部长郭泰祺花费巨额款项购买公馆时,便立即在报上予以揭露。因为这篇文章,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还爆发了大规模学潮,郭泰祺也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系列声张正义、痛斥贪官污吏的檄文:“政府法律失灵,贪官污吏如百鬼昼行”;“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政客们“只要有钱可捞,什么坏事都敢做”。这种嫉恶如仇的个性和犀利泼辣的文字,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最后的呼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王芸生也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内乱的危机早已露出端倪,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为此,他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提醒人们:“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8月16日)十几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他看到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此行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毛泽东先生来了!》一文。他预言:经过长期内争和八年抗战,毛、蒋“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

空前的大团圆”。(同上,1945年8月29日)不久,当《大公报》以民间报纸身份与中共代表团接触时,王芸生竟在天真地对毛说:“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大公报人忆旧》第29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说到王与毛的交往,有一则资料值得注意。这就是王芸生在重庆谈判之后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台湾《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216页,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委会印行)王与傅志趣相投,私交很好。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我说,这道理真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原载上海《艺术画报》1937年1月,转引自《王芸生》第143至144页)可见他们是能讲知心话的。

与此同时,王芸生还写过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出于对内战的忧患,在回顾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之后,又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2月22日)为进一步标明自己的写作旨趣,王又在文章见报时所加的“补识”中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

……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同上,1945年12月16日)

相比之下,王芸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等方面。比如抗日战争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同上,1945年9月1日)后来,《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他又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了。(《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6月5日,转引自《王芸生》122页)1948年7月,《新民报》因违犯所谓《出版法》而被迫停刊,王芸生又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中重申:“……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他还说,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平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中尤其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7月10日)不久,针对当局再度颁布的新闻检查制度,王又进一步指出:“所谓言论自由,所谓新闻自由,在中国原来是极可怜的东西,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它可怜,因为它太少了;它宝贵,因为它从来未曾真正有过……新闻检查这东西是与言论出版自由不两立的。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论自由,就不能要新闻检查。”他还恳切地说,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远离民主,”就更不必说了。(同上,1948年12月8日)

可悲的是,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谁还能听进去这些简单的道理呢?

痛苦的抉择 晚年的归宿

由于《大公报》与当局的矛盾日益尖锐,更由于战争的局势日趋明朗,王芸生陷入了苦闷与彷徨之中。正在这时,该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帮助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杨刚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虽然与王芸生交往不多,却一回来就住进了王公馆,这也说明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另一个地下党员李纯青也反复做过王的工作,据李说:

1948年仲冬,我好几度登王公馆之门,跟他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我不犹豫地直说。

他沉默良久,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吾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大公报人忆旧》第319页)

于是,王芸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以休假为名,经台湾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达北平。在此期间,王芸生最关心的莫

过于《大公报》那薄薄的一纸命运了。据李纯青回忆：“1949年2月我离开香港。行前，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芸生到北平后，一度去过天津。他告诉我：‘我们就是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同上，第320页）

王芸生真是想通了吗？只要看一看李纯青下面这段话，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从天津到北平遇见王芸生，他精神抖擞，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来帮助的。”（《笔耕五十年》第535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诚如周恩来所言，王芸生返回上海后，很快就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如果说让他做出深刻检查，承认《大公报》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并要他采用另外一套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他还可以勉为其难的话；那么面对来自经营方面的困难，他就束手无策了。从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帐面亏损达到40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与该报多年来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于是，王芸生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帮助”。不久，王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为重点报道财经新闻。这时，距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正好是整整50个年头。也

就是说,《大公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又回到原地时,已经是完全变样了。

与此同时,王芸生也变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他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那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使他如临如履,战战兢兢。例如 50 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毫不客气地说: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吓得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像地承认:“这话是我说的。”(《王芸生》第 72 页)

另据王先生的女儿王芝芙回忆,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场面。尽管后来王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大公报人忆旧》第 301 至 302 页)

据说,王先生进入晚年之后,曾经在读马列学毛著方面很下功夫,与别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可以顺口指出这问题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上有记载,甚至对重要语录能够背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及至病危,他还“几次嘱家人邀请医院中左邻右舍病友开学习会”,家人无奈,“只好邀几位医护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听他发言。”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位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博得世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为新闻独立、言论自由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报人,到了 1980 年,在“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而且连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王芸生》第 79 至 80 页)的情况下,还要召开早已被人们唾弃的“学习会”……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思想的时代：大型文化期刊《黄河》随笔精品

作者 =

页数 = 5 0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辑	霜打胡风
	林贤治 “胡风集团”案 - - 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伍宇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单世联 告别黑格尔 - - 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第二辑	诗在民间
	李恒久 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
	赵振先 《今天》忆往
	齐简 飘满红罍粟的路 - - 关于诗歌的回忆
	邵燕祥 避席畏闻篇 - - 读书札记：文字狱传统在当代
第三辑	恩怨沧桑
	章立凡 章乃器在1957年
	李硕儒 无名氏生涯记略
	李新宇 “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 - - 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
话语	
	姚青苗 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
第四辑	“红楼”风雨
	蓝翎 四十年间半部书
	李希凡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 - 关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辩
正	
	宋谋场 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第五辑	尘埃落定
	黄昌勇 寂寞孙大雨
	张耀杰 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
	王芝琛 两极决斗争中的《大公报》
	王芝琛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智效民 王芸生的悲剧
附录页	